

杭州城市发展史

HANGZHOU CITY'S DEVELOPMENT

邹身城 刘伟文 邹小芄 著

清代杭州府城圖



新华出版社

杭州城市发展史

HANGZHOU CITY'S DEVELOPMENT

邹身城 刘伟文 邹小芑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城市发展史/邹身城, 刘伟文, 邹小芃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011-7947-3

I. 杭… II. ①邹… ②刘… ③邹… III. 城市发展—历史—杭州
IV. I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8066 号

杭州城市发展史

责任编辑: 刘飞

装帧设计: 史亮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www.press.xinhuanet.com>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7947-3

定 价: 3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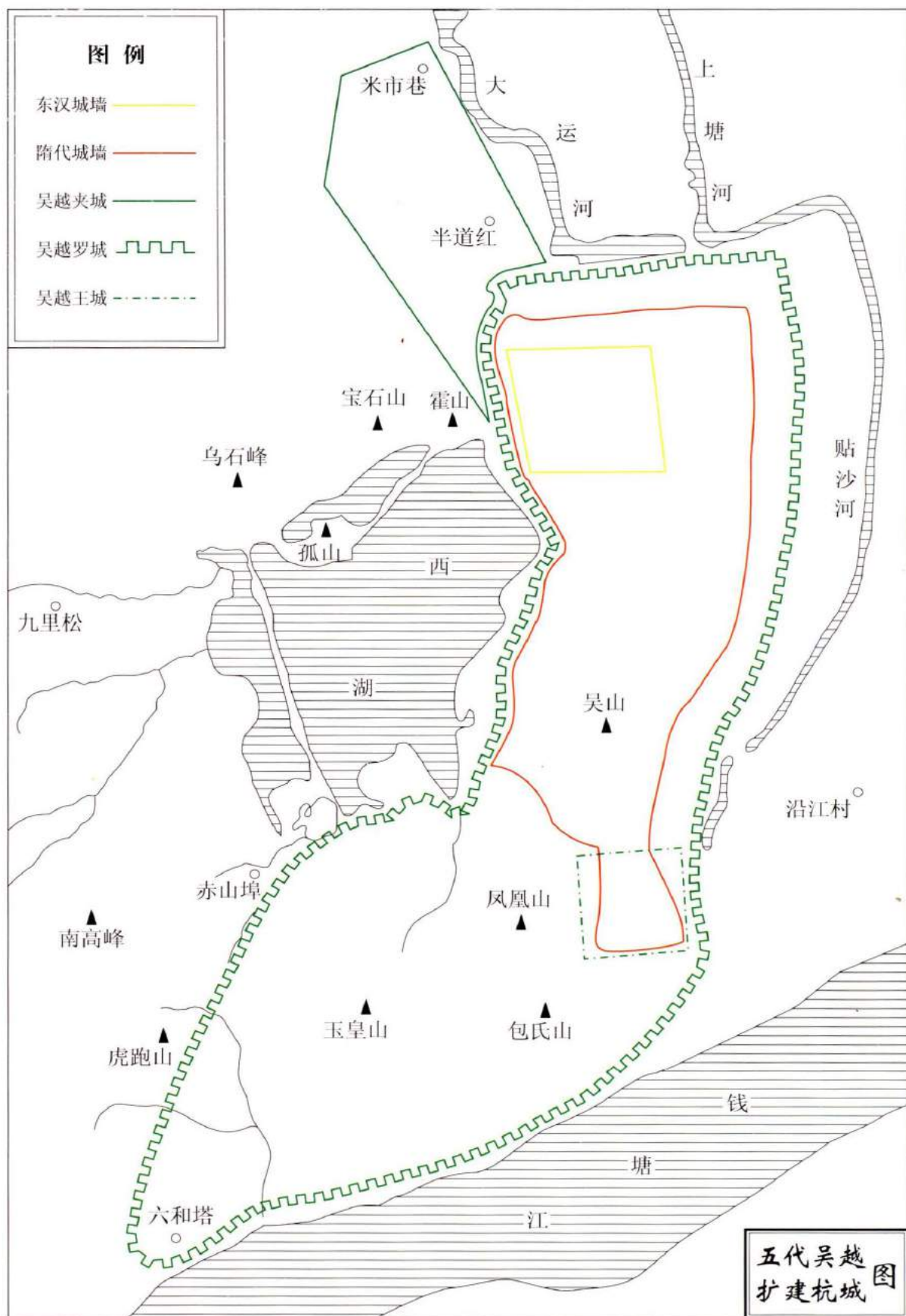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8859084

杭州之魂—治水扩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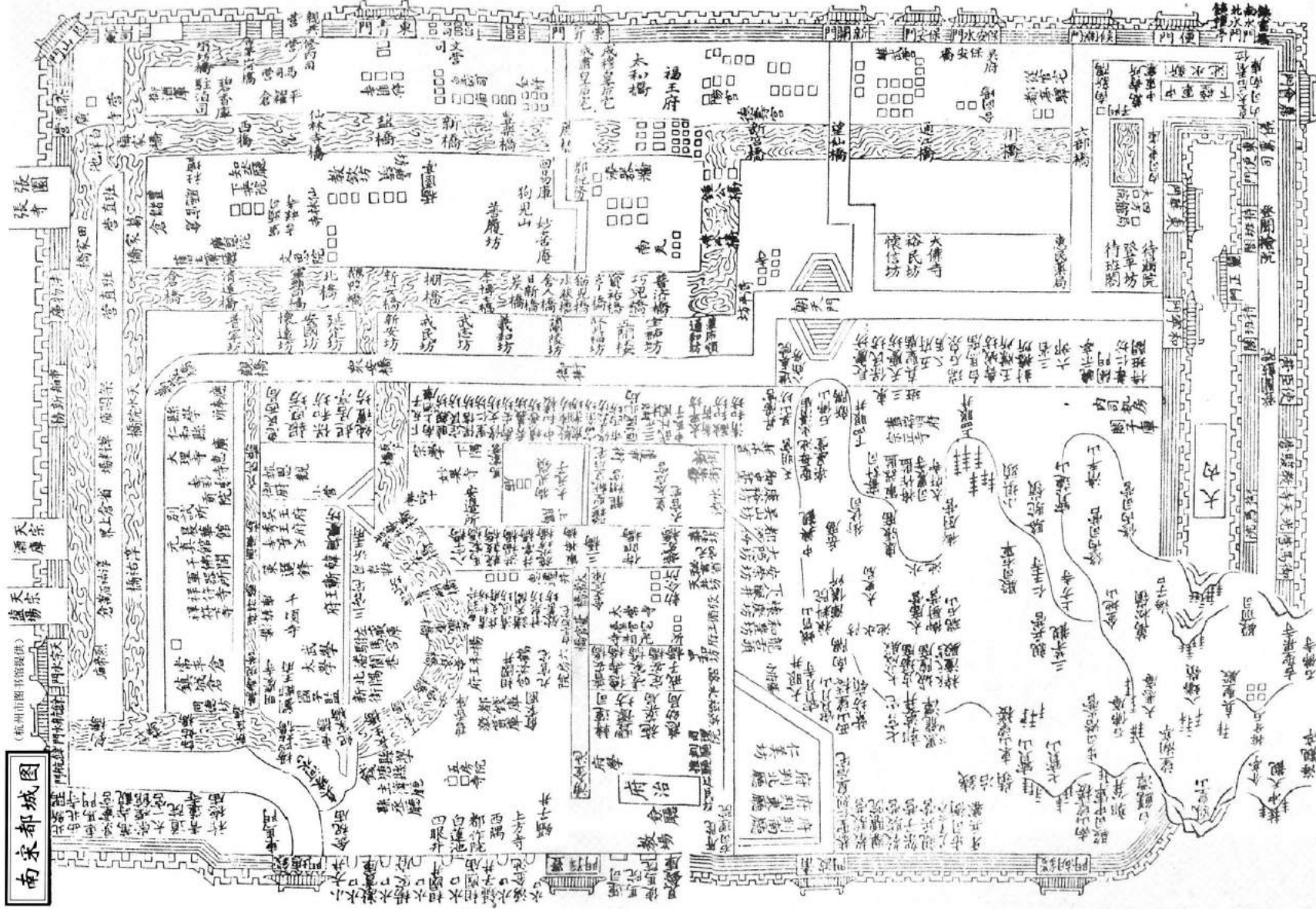


治水扩城英雄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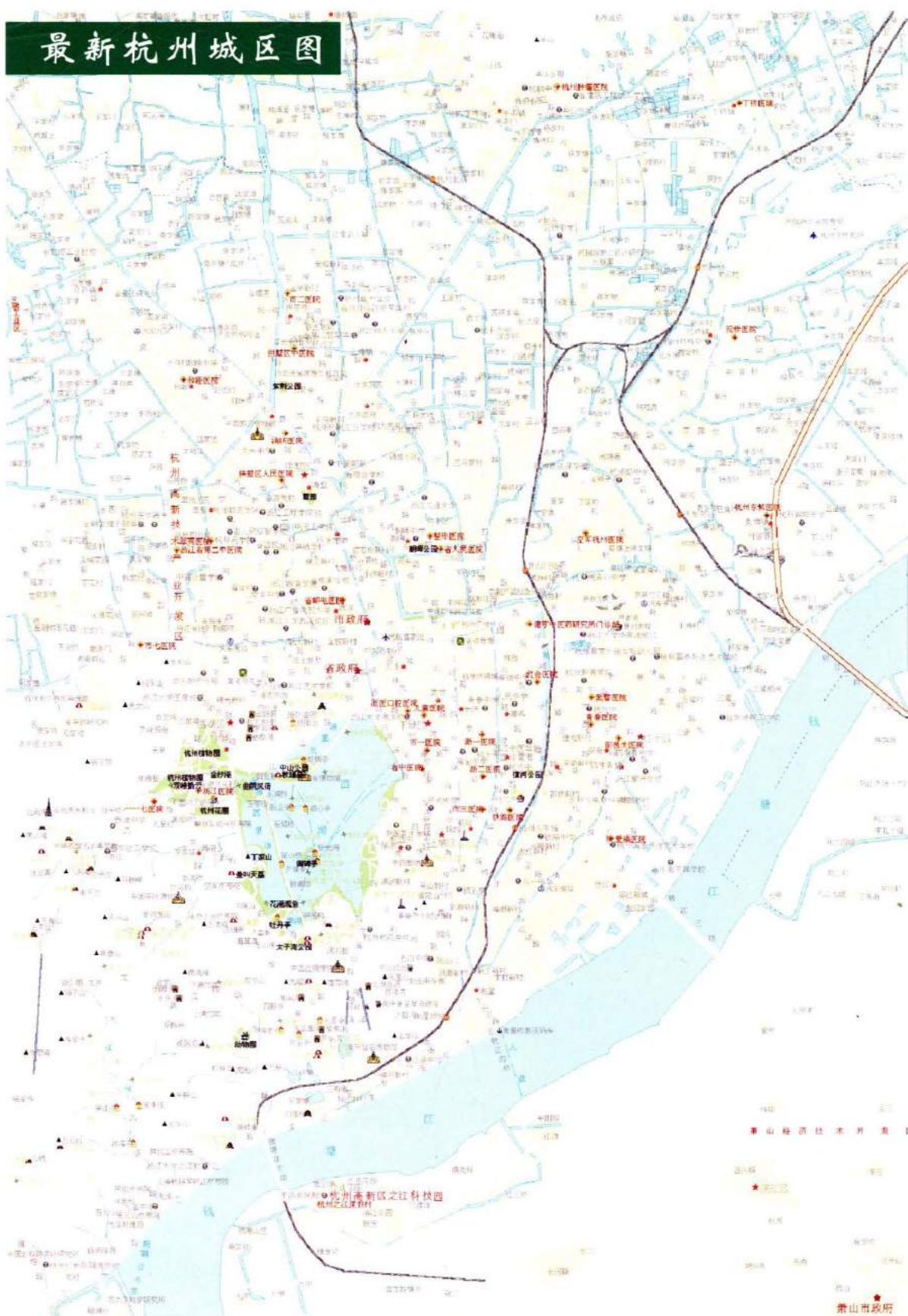
钱塘江如同杭州的黄河，既是母亲河，又曾是灾难河。唐以前江潮泛滥，地瘠民稀，赖吴越治水扩城，始获改观。史赞：射潮筑塘，非止一时之保安，实千百年之功德。当今再创伟业：跨江而治，沿江发展，造福万世之业。



五代吴越钱鏐扩建杭城70里，开城门10座，经三次施工，完成于公元910年。《十国春秋》载钱王自述：“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果然，此城奠定了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杭州城的基本格局。（见《吴越书》）



最新杭州城区图



浙江经济出版社

杭州市政府

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先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

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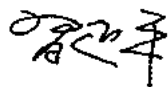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and 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

4 杭州城市发展史

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胡锦涛' (Hu Jintao).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序 一

杭州成为世所公认的国际花园城市，决非一朝一夕一蹴而成，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历史锤炼，经过了一代代人的精心雕琢。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这一方秀美土地，不断被注入智慧和心血，凝结起独特的文化资源、城市品格和人文精神，展现出“人间天堂”的不朽魅力。真金闪光，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可见，杭州的美丽富庶，不仅仅得益于山川秀美、湖泊迷人、气候宜人，更来自于人力的营造。上下同心，群策群力，持之以恒，始见成效。获得国际花园城市的美誉，打造“东方休闲之都”的梦想，既是今人的追求，也是前人的馈赠。我们正是沿着杭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继承历史遗产，遵循历史经验，才能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现代文明的辉煌。城市的演进永无休止。城市文明的繁荣源于其良好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生态。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知兴替，这对今人和后世都是永恒的宝贵财富。

综观杭州城市的发展轨迹，其主要精髓可概括为“和谐”两字。西湖山水之美，美在景物与人文和谐；杭州城市个性之独特，独特在历史与现代的和谐；杭州城市文化之优越，优越在吴越文化、南宋文化、西湖文化、西溪文化、钱塘江文化之和谐；杭州城市综合实力之领先，领先在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资本与智本、“天堂硅谷”与“休闲之都”的和谐。“精致和谐、大气开放”，是杭州新时期人文精神的最好表述；“和谐创业”是杭州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灵魂。在和谐的自然环境中，一景一物都臻于精致；在和谐的创业氛围中，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激发。

回顾杭州历史，举凡历代先贤，无论是唐代刺史白居易、五代吴越国王钱

缪、宋代知州苏东坡,还是明代知府杨孟瑛、清代巡抚李卫和阮元,凡能留下政绩为民怀念者,莫不以追求城市与西湖的和谐发展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更注重赋予城市发展以现代理念和精神内涵,努力探索和谐发展的新路。当前,我们肩负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建设和谐杭州,我们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我们尤其需要学习历史,把握当前,展望未来。邹身城、邹小芃先生合力完成《杭州城市发展史》一书,该书由杭州城市功能的演变,论及城市化起落中的社会因素,古今贯通,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多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这对于我们推进杭州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和谐杭州建设,都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5年6月12

序 二

本编作者邹小芃先生是浙江大学年轻的经济学家,邹身城先生是国内的历史学家,他们子父合写的《杭州城市发展史》一书,乃是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华城市文明的专著。

本书立足于创新,多言前人所未言。如关于杭州城市的起源,过去一般方志、史书、人物传记之类,都从钱塘建县写起,秦朝置县约在公元前 222 年,照此说法,杭州城市历史迄今仅 2228 年。然据杭州先民活动足迹,有 5000 年的良渚文化遗址。该遗址的莫角山城建有 4.5 公里城垣,已具城市文明的雏形,足以实证杭州 5000 年文明,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曙光”。可见杭州城市文明远早于钱唐置县。而且历来认为钱唐县治在“灵隐山中”,当今考古证明古城位置在今少年宫一带,不在山中。又如杭州“城市化”的第一次突飞猛进,是唐末经五代吴越国至宋代的“城市化革命”。在此之前,隋文帝置杭州州治于余杭,后迁钱唐,以及隋炀帝沟通六朝已有的古运河,加以拓宽,称为“江南运河”。这两件事为杭州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但真正从“城市化”而论,决定因素却在于五代吴越国五王发动的“城市化革命”,扩城改制、控江保湖,坚持数十年,终于缔造了“地上天宫”的西湖时代。然后经历北宋的持续发展,至南宋定都而水到渠成,攀登了古代城市的顶峰。

本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少谈现象,注重城市功能的演变,以及城市化起落中的社会因素。贯彻详今略古,史为今用。第一章 5000 年城市文明只写三万多字,而 1984~1999 的十五年改革却写了五万多字,连最近三年成就也写了三万多字。这是因为近 20 年的经验最贴近现实,也贴近民生,弥足珍贵。

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博导、著名史学家

徐 规

引 言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也是国务院第一批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and 历史文化名城。早在一千多年前启动的中世纪城市化领域里,杭州曾独领风骚。

杭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长江三角洲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区域性大都市。由于这一带文明发展较早,历史上曾多次处于“长三角”的龙头位置,成了全国“七大古都”之一。

2001年3月杭州行政区划调整后的辖区为上城、下城、拱墅、西湖、江干、滨江、萧山、余杭8个区和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5个县(市)。市区面积3068平方公里,人口373万。

杭州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之称,是江南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北距上海180公里,东距宁波168公里。濒临杭州湾、钱塘江;南与金华市、衢州市、绍兴市相接;西与安徽黄山市交界;北与湖州市、嘉兴市相邻;介于北纬 $29^{\circ}12' \sim 30^{\circ}35'$,东经 $118^{\circ}20' \sim 120^{\circ}43'$ 之间,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市区水网交织,大小河流多达200余条,水利完好,旱涝保收,水运方便。

由于城市里拥有山水极品的西子湖,天下奇观的钱江潮又穿城而过,营造国际风景旅游城市,自然极为相宜。现市内有2个国家级风景区,2个国家自然保护区,5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4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旅游业正在发展成重要支柱产业。加以交通便捷,沪杭甬铁路与浙赣铁路在杭州交会;沪杭高速公路又与杭甬高速公路在杭州交接;123公里的高速绕城公路

接通周边不少高级别公路线；江上又连续构筑大桥沟通对外交通大动脉；新建现代化杭州萧山飞机场启航后线路不断增加，可直通国内各大都市与国外一些名城；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和信息工具，使杭州有条件发展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

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足以实证中华 5000 年文明，其核心区就在杭州良渚——瓶窑的莫角山城。近又发现历史更为悠久的跨湖桥文化也在杭州萧山湘湖，尤其是检验确证出土的完整独木舟距今约 8000 年，为迄今全世界最古老的船，消息传出，举世震惊。更不用说吴越国和南宋前后共在杭建都 223 年，持续地推动中世纪城市化革命和商业革命。为此杭州自古人文荟萃，科技文化兴旺，历来是“文化之邦”。人类文明史上极珍贵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就诞生在杭州。宋元明清杭州始终是国内最大的书市。西湖周围迄今保存着许多著名的石窟造像、碑刻、古建筑，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艺术宝藏。古为今用，价值犹存。可见杭州之成为名城，名就名在历史文化。这是前人留下的遗产，而且是值得当代人研究弘扬的瑰宝，也是发展国际国内观光、旅游、会展、休闲的重要无形资产。

杭州得天独厚，孕育起独特的人文精神，产生优良的民俗民风，因而乡镇工业繁盛，民营企业壮大，市场遍地林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3 年杭州市生产总值达 2092 亿元，已连续十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均 GDP 为 32700 元，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位。高新技术、信息产业也名列前茅。

因此，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花园城市”杭州的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不能等闲视之，仅视同现代社会的铺垫，而必须把古今融为一体，把历史文化、人文精神融入城市化进程来作整体认识，才能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宏伟目标的实现，从而成为中华文明城市、国际休闲之都。钱江后浪推前浪，历史长河永不停息，永无止境，绵延不绝，光辉历史将再显辉煌。

邵青

目 录

总序	习近平(1)
序一	王国平(5)
序二	徐 规(7)
引言	邹身城(8)
 第一章 钱塘江两岸的古文化与古文明	(1)
第一节 良渚文化和莫角山城	(1)
第二节 从城邑到置县	(4)
第三节 山水名城初露头角	(8)
第二章 唐末五代开始启动的城市化革命	(13)
第一节 吴越十四州军的中心城市	(13)
第二节 扩城改制创建“地上天宫”	(17)
第三节 东南佛国点缀园林城市	(24)
第三章 归宋后持续发展并借南宋建都的	
历史机遇达到古代城市化的巅峰	(28)
第一节 保境安民与和平统一	(28)
第二节 空前繁华规模举世无双	(29)
第三节 沟通中外发展国际贸易	(39)
第四节 13 世纪中期起辐射功能缩小城市化逆转	(40)
第五节 踏上现代城市门槛	(43)

第四章 天翻地覆中的城市变化	(56)
第一节 千头万绪的城市改造任务	(56)
第二节 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摆在中心位置	(66)
第三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70)
第四节 学习苏联模式的得和失	(76)
第五章 一大二公和大跃进	(82)
第一节 重工业为中心的单向突进	(82)
第二节 农村改制由合作社进向人民公社	(84)
第三节 垄断式的国营商业	(87)
第六章 两次“逆城市化”和城乡大动荡	(90)
第一节 运动造成企业紊乱 规章制度尽行废除	(90)
第二节 坚持一大二公 廿年一脉相承	(92)
第三节 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超常发展连连受挫	(94)
第七章 结束动乱后寻求发展	(101)
第一节 杭州冲破惯性 农村改革领先	(102)
第二节 试行商业改革 推动三多一少	(105)
第三节 重修城市规划 明确城市性质	(106)
第四节 复兴文教事业 重启灵魂之窗	(108)
第八章 开展有序的改革开放	(111)
第一节 从探索性改革进入城建有序的开展	(111)
第二节 开始繁育市场 改革经济体制	(114)
第三节 撤区扩镇并乡 探索城镇化之路	(120)
第四节 加强服务意识 转变政府职能	(123)
第五节 从封闭型逐步走向开放型	(127)
第九章 整合旅游资源开拓两大旅游市场	(138)
第一节 湖山焕发青春 维护城市的“根”	(138)
第二节 坚决突破传统 创新旅游格局	(141)
第三节 海外内地并举 开拓旅游市场	(146)
第四节 优化内外环境 助推旅游发展	(147)

第五节 启动旧城改造 市容更换新颜	(151)
第十章 工业兴市提升产业档次	(155)
第一节 实施五项整顿 产值首超百亿	(155)
第二节 加强支柱产业 更替新生力量	(156)
第三节 兴起乡镇企业 呈现星火燎原	(159)
第四节 地方工业异军纷起 区县各显特色	(161)
第五节 推动多元创业实现共同发展	(166)
第十一章 新理念·新布局·新辉煌	(173)
第一节 调整区划为构筑大都市创造条件	(173)
第二节 实施“33929”工程完善都市基础设施	(175)
第三节 综合整治环湖区域使西湖面目一新	(176)
第四节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掘取得空前成绩	(180)
第十二章 城市化纳入文明发展轨道	(184)
第一节 实力上升稳步走向小康	(184)
第二节 精致和谐安宁 生活品质提高	(187)
第三节 社会事业产生协同效应	(189)
第四节 加强环保生态良好	(192)
第五节 荣获“国际花园城市”称号	(194)
第六节 城市再显辉煌 “绿色 GDP”前途无量	(196)
后 记	(198)
主要参考文献	(200)

第一章 钱塘江两岸的古文化与古文明

第一节 良渚文化和莫角山城

杭州这块宝地,很早就有先民活动。5 万年前较原始的“建德人”姑不计在内,也应追溯到 7000 年前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和 5000 年前至 4000 年前的“良渚文化”。不过古文明与古城市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据著名城市历史专家、同济大学董建泓教授多年研究后提出一个观点:一块文明发源地能不能称得上城市,要看它是否具有固定居民点、大型神庙建筑、防御性设施、手工业作坊,以及集市等要素。这一观点已为考古界多数专家所认同。

按照上述标准考察,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相继出现于四大古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有古城遗址考定时间距今约 7000 年左右;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华大地上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等不同地区,都曾陆续发现不少年代久远的古城遗址,大致距今约 4000 年至 5000 年左右。所以《中国国情报告》的《城市化》专章,开宗明义第一节就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城市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城市文明,在历史上曾长期居领先地位。”这里所说的最早之一,当然不等于说“第一”或“唯一”。而是指最早古城为四大古文明发源地的产物,考古发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中国城市文明居上述四者之一,名列世界前茅。

中华文明起源多元。早在夏、商、周区域性王国兴起以前,黄河下游、黄河

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和钱塘江两侧,均曾有方国诞生,建有古城。早些时候考古界公认我国最早的城市坐落在黄河下游接近海岸的今山东日照五莲县的丹土村,距今 4000 多年,早于公元前 1500 年的二里头文化商城遗址。而最近 10 年考古发掘硕果累累,层出不穷。日本考古队联合中国考古队,重点在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进行一系列考古发掘,连续发现不少 5000 年前的围有城墙的古城,其规模可容纳 1 万多人口,其中较大的几座古城筑有长达 3 英里的防护墙。如此规模的古城,显然不是一般的村落。到目前为止,通过考古调查已从武汉到江陵之间的长江中游地区发现 9 座古城遗址;在成都附近的长江上游发现 4 座古城遗址。城内出土的文物有多种武器、各类生产工具,以及玉制的人、鸟、兽微型雕像;还发现绘有几何图案的精美陶器,足以证明这一带是世界上最早制作陶器的地方之一。从这些古城规模之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数量之多,以及陶器制作工艺之精,显示它们并非单纯的军事性城堡,而是古老的城市化和建国进程的遗址。这一系列新发现的考古成果,使人们改变以往陈腐的忽视中华城市文明的旧观念。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说,这些发现足以改变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认识。英国学者戴维斯基认为,最新考古研究表明,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一样,中国的长江曾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文明形成的几乎同一时期,类似的城市文明和建立方国的进程也在中国长江流域涌现。其实他们所掌握的还仅仅是局部的考古资料。中华大地范围之广,随着各地建设工程的扩大和考古工作的深入,新的成果正不断发现。

与英国和日本专家的判断大致相符,2003 年 7 月 23 日新华社发表新的考古发掘消息,在巢湖附近的含山凌家滩发掘到更为古老的古城遗址,足以使中国城市史再提前 1000 余年。它具有固定居民点、大型城庙建筑、防御设施、集市及手工业作坊等城市元素。城市沿河而建,方圆 160 万平方米,城郭一眼望不到边,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从众多的文物类别分析,当年养殖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已初步形成规模。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大地上最为古老的的城市遗址。其位置处于长江与淮河之间。

黄河流域近期也有新的发现,2003 年 11 月 4 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据中国古

都学会宣称,黄帝古都轩辕丘在新密发现。在新密方圆百余里内陆续发现带有都邑性质的古城遗址达9个之多。现已被国家确定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我们杭州市余杭区内的瓶窑,近年发掘到长达4.5公里的土垣,土垣内侧有莫角山城。考古发掘中发现土垣内有大面积良渚文化时期的建筑遗址,其中有成排竖立的大木桩,有不少带有卯榫的大方木所构建的梁柱,有土坯建造的墙体,有精心夯筑的地基,这在四、五千年前的历史条件下该是雄伟的宫殿式建筑了。对照土垣内侧与土垣外侧境况完全不同:土垣内侧有众多的良渚时期的居址、祭坛、墓葬群和大量碎陶片;而土垣外侧相当大范围内未见良渚文化遗址,充分表明是一座以土垣为界的城市。

这座中心城市控制和影响着周边很大的区域。根据陆续发掘出来的同等水平的良渚文化遗址,可知这一文明分布于今桐乡、萧山、上海、苏州、长兴……范围极广,从长江以南一直延伸至钱塘江以南,环太湖流域,都包容其中。所以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夏、商、周都不过是黄河流域一角的方国之君;而方国的最早出现当在夏商之前,而且分布区域广泛,江南的良渚文化和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连专门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也承认,良渚文化和比它晚出的夏商周三代文化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应属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在考察考古界前辈的大量成果后对良渚文化的这座古城下结论说:“综观6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最初形态的国家政权早期都城,已横空出世,屹立在祖国的东方!”这座古城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规划恢宏,引人注目。

为此,以杭州良渚——瓶窑为中心的环太湖流域(即今之长江三角洲)孕育的良渚文化及其古城遗址,已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外两百多著名专家的关注。许多专家认为“良渚遗址是一个世界级的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数一数二的古遗址。”中国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秘书长、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委员会驻中国秘书长郭旂,亲自来到杭州实地考察,表示支持“申遗”工作。现“申遗”工作重点,以莫角山及“土垣”遗址为核心,要集中一批地质、水文、物理、化学等学科专家,进行多学科考古研究,强化“申遗”的考古基础,并启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现省人大已批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总体规划》,划定管理区管理范围

达 242 平方公里。省、市、区三级政府建立“良渚遗址管理局”。国家文物局也评审通过这一我国首部有关大遗址的详尽保护规划,并宣布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国务院将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鉴定以良渚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存在年代为公元前 32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即距今约 5200 年至 4000 年,正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时期。

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分布区域虽广,而重点分布在今杭州市的余杭区,初步查明这里共有 50 余处,而以莫角山城遗址为中心,足见这里是 5000 年前这个区域性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说它是“一国之都”,当非过份。其所以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决不是偶然的事。偶然性的事物中通常寓有着必然性的规律。这里显示太湖至杭州湾一带,自古具有着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优势,适于人们居住和发展。

这一带河流密如蛛网,湖泊呈半开放状,气候温暖而湿润,江湖的自然生态因子整合一体,形成世上独特而绝佳的稻作农业地理。草莽萋萋,花木森森,湿地缭绕,物种繁多,生物样态极其丰富,确是一个奇妙、天成、辽阔、生动的野生大花园。当时不可能有什么“花园城市”的美名,而古城却早已不自觉中诞生在生态优越的大花园里了。

第二节 从城邑到置县

历史的发展并非永远保持直线上升,而往往曲折多变,呈波浪形。世界上曾有多少古城乍兴乍灭,如同海市蜃楼,化作沧海桑田。当原始农业还不够发达之时,经受不起天灾人祸的挫折,都城的迁徙极为常见。以北方的夏、商为例,据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载:夏启初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城),后迁于安邑(山西安邑),太康失国逃斟鄩,(河南巩县),仲康子相转辗商丘(河南商丘)、帝丘(河南濮阳)、昆吾(濮阳西),少康中兴后回阳翟,帝杼北渡黄河迁都于原(河南济原),又南渡老丘(河南陈留),帝胤甲退居西河(陕西华阴一带),帝皋都浞池,帝桀都洛阳,前后迁移十余处之多。自禹至桀十七帝(十四世)世系分明,但夏

朝文化遗址迄今未曾发掘到。商国自契至汤凡十四代,先后迁居八次;汤传十代到盘庚,中间迁都五次;盘庚渡河迁殷(今安阳小屯村),始稳定了几代,就是现在发掘到的殷墟。可见,古都迁移无常,规模又小,只有较个别的地点为后人发现遗址,多数至今下落不明。从这一点上看,良渚文化的所谓“突然失踪”之谜,本不难理解。学术界较多的猜测是遭遇水旱灾情或外敌入侵,促使良渚人的主力北迁,融入于中原。有力的证据是良渚大型玉器文化“中断”之时,河南二里头文化所发现的玉琮、玉版、玉戈、玄圭等玉柄形器却与原先良渚文化中的出土文物极相类似,可能源自良渚文化。

早先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南方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并驾齐驱,不相上下;自良渚先进文化北移,南北文化相撞击并交融,大幅度推进了中原文化。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与此同时,钱塘江、太湖流域却出现滞后现象,由于良渚人主力出走,留下的是一些老弱和周边较落后的部族,主要文化财富包括物质财富诸如玉器、陶器、先进工具、锋利武器都被带走了,本地部族就需要经历相当一段时期才能复苏。所以,南北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是从这时期拉开的。这以后北方进入大融合时期,河北平原的黄帝部族(仰韶文化的后裔),与来自东方的九黎族(龙山文化的后裔),以及来自西方的炎帝部族(齐家文化的后裔),通过冲突而逐渐融和,终于形成为“华夏族”。而大江以南相对落后的部族被目为“南蛮”、“百越”。

杭州地区东部原先密布良渚文化遗址的地方,大多靠近湖泊或河流,海侵海退以后,地面平坦,雨量充足,气候温润,土地肥沃,适于人们重新聚居和在此开展生产活动。因而尽管一度人口流失,而夏商以来这里人烟不断,决非陷于真空。春秋时,吴越两国在太湖、杭州湾地区崛起,吴都于姑苏,越都于会稽,杭州地区正处于吴越之间,受到吴与越双重文化的哺育。实施郡县制以前,人口较密处设有采邑,据史传今梅家桥(古仁和)一带曾是吴公子庆忌的封地,有他的采邑和宅基。今临安于潜堆石村曾有古越干城,为夏少康之后的支庶封地。今萧山西兴有越国港城石塘,湘湖有越王城。未见于文献的小邑肯定还有。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时,当是凭原先的聚居点和城邑为基础,来设置县城和乡。

李斯作为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任丞相,受命全面推行郡县制,在早期所设为数不多的县城杭州地区竟占有四座。当时辽阔的两浙与江南,对秦来说系新

开拓的疆域,设为会稽郡,全郡总县城数不过二十余县,而对其中地域相对狭隘的杭州一片竟然密集地设置了钱唐、余杭、富春和晋县,说明统治者很关注这一带开发较早、自然条件优越、资源富有潜力、人口可能繁衍,更由于这里地处“两浙要冲,江海之会”,区域位置重要,所以在胸怀大局的嬴政、李斯眼里,杭州湾钱塘江边的这片土地决非仅仅是容纳钱唐一县的小地方,而需要从战略地位和人文潜力考虑这个区域的发展前景。只可惜李斯早卒,秦朝速亡,致未及看到其后续部署,而经久的历史检验却足以证实秦朝在杭州湾钱塘江岸的密集置县有其远见卓识。继秦之后,汉朝在钱塘江边专设会稽郡西部都尉府,就是重视对这个区域的控制力度。同时在钱唐县对岸添置余暨县,隔水相望,这就是今杭州市的萧山区。汉末三国东吴进一步沿钱唐、余杭、富春、潜县向西拓展,增置了临水(今临安)、桐庐、新城(今富阳新登)、建德、新昌(今建德寿昌)、始新(今淳安)、新定(遂安,已沉入千岛湖),于是由原先秦汉的5个县加上新置的7个县,总共达十二个县,虽分属周边各郡,而杭州地区的区域性发展态势,早已蔚然可观。

不过从人口而论,这些县城初建之时规模都不大,大多不过几千人口。各县之间不相上下,一时难以确立中心。其中钱唐县由于地处两浙间的交通枢纽,往来人口密集,为了加强管理,继汉代置会稽郡西部都尉治后,三国东吴又在此设吴郡都尉治,都尉虽非行政区划,对加强治安维护交通却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南北朝梁太清三年(549),侯景因军运需要升钱唐县为临江郡,但军事一经缓解,就废除了这个临时性的临江郡。正式建为钱唐郡始自陈后主祯明元年(587),辖区仅有富阳、於潜、新城,连郡治所在的钱唐,总共只有四个县。附近的余杭、临水等县都不归钱唐郡管。东晋、南朝均以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为经济基地,钱唐郡未占重要位置,只是一个尚未稳定的小郡。那时余杭与钱唐城市规模相当,所以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设置杭州时,杭州的州治最初设在余杭。至开皇十一年(591),隋大臣杨素调集民工在钱塘江近岸的柳浦西(今凤凰山东麓)筑杭州城垣。城垣按大城规制建造,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座。这是杭州首次建造州城。这年城垣竣工后,州治始由余杭迁移来钱唐柳浦西。至此基本上奠定钱唐的区域中心地位,但影响力还远远不够。例如此后名称改易,一度改杭州为“余杭郡”;也曾改称为“杭州余杭郡”;而总的趋

势州治既设在钱唐,钱唐的中心城市地位得以逐步加强。唐朝为避讳改钱唐为钱塘,由于钱塘县规模渐次扩大,作为杭州州城,后分设为钱江(仁和)与钱塘两县,并为州治。在杭州建州后四年,今杭州地区的西部设置睦州(即后之严州、建德府),先辖新安、遂安、桐庐、建德,旋又增置分水、寿昌。于是杭州地区长时期内由两州分峙,除了杭州的州城内逐渐充实,睦州(今建德梅城镇)也在扩建,不过由于西部多山,城市进展较慢。而总的趋势,这一带人口在逐渐增加,城市在缓慢建设。

隋炀帝敕令开设江南运河,工程南抵杭州为终点。这在杭州历史上是一件大事。由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太湖平原向来河流纵横,湖泊星布,为古“三江五湖”地区,人们习于水上生活,往往舟行代替车马。但港汊虽多,而河道窄浅,行船不畅;有时迂回曲折,难以逾越河浜。因而历来江南各地城乡居民曾陆续对本地水域沼泽进行零星施工,局部改善灌溉和水运。隋代修江南运河正是充分利用历代修整开凿的水道,加以集中统一的拓宽疏浚和沟通。江南运河宽达十余丈,长可八百里,北起长江口的镇江,南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嘉兴,折向西南取道长安、临平,然后由上塘河至杭州大通桥附近而入钱塘江。沿途平河漫长,沃壤宽广,水利工程浩大,江湖水源充沛,成为江南城乡富庶之保障。后人称颂这项工程说:浙右之漕渠,非止通馈运,资国信往来而已,杭、秀、苏、常、润数州之田实赖以供水,确保鱼米之利。对杭州城市来说,长远之益更未可限量。本来偶处东南一隅,江海间阻,如今有了江南运河,可以北通里运河、中运河、北运河、通运河而直抵今之京津,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联成网络,足以彻底改变钱塘江流域偏鄙的缺陷,拓通了杭城航向中原的主渠道,这无疑是为杭州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只可惜隋祚短暂,在隋末农民战争中杭城遭受破坏,战事动荡切断了南北交通,当时初修的运河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根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资料考察,隋末唐初杭州城市规模不大。隋炀帝大业五年登记的户籍,杭州州城加上所辖6县的总户数为15380户,总人口仅有79515人,州城与6县平均计算,每处不过城乡合计2千余户、1万余人,极大部分属于农户,城市里的非农人口尚未形成规模,除了地主、官僚、衙役外,专业的工商户少得可怜。

显然,杭州在东南州郡之中城市规模尚处于低下水平,远不如建康、扬州、苏州、越州,甚至比不上较偏僻的婺州(102392人)和衢州(91959)人。

不过从纵向比较,杭州区域的发展还是有成绩可说的。秦代行郡县制时本区域仅建有4个县;至隋代已增至10个县(杭州6县、睦州4县)。秦制满8000人口以上的设县令,不足8000人口的小县只能设县长,也就是说各县平均人口在8000人左右;至隋代各县平均人口已超过1万多人。钱唐、余杭在经济地理位置上的递升,成为建州的基础。但总起来看,杭州地区自公元前222年开始建县,至公元589年建州,中间经历八百多年,区域“城市化”的进展极为缓慢。

第三节 山水名城初露头角

唐初杭州屡遭兵灾,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辅公祐等军阀先后兵临杭城,又相继据杭顽抗,战乱频仍,杭州社会秩序极不安定,经济上连续遭受破坏。只有自贞观到开元的百余年时间里,杭州真正享受到大运河之利,社会经济逐渐发达。

“治世”出贤吏,杭州历任刺史中出现不少文化深厚政绩卓越的地方官,有文献可考的如袁仁敬、李泌、白居易、柳楚贤、裴倦、宋王景、刘晏、崔涣、相里造、韩皋、裴常棣、卢元辅、元冀、严休复、李宗闵、崔彦曾等,都是有一定德政的名刺史,在不同程度上解民困苦。至少不是贪酷的官僚。这是杭州百姓之幸,为城市孕育园林化提供了条件。

这期间杭州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利建设改变江湖面貌,便利水上运输,农副业丝茶增产,手工业布帛造船领先,尤其是培育山水文化推动旅游经济,使得杭州在国内城市中开始提高知名度。

农业社会水利是基础。唐朝“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全国兴修河渠陂塘堤堰工程甚多,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共有269处。就杭州而言,修筑海塘124里,局部遏止了钱塘江的水患。富阳两次大规模修筑江堤,并开阳陂湖以蓄水,溉田万顷。新城开官塘,堰水溉田。於潜疏紫溪水溉田,又凿渠30里通航。余杭疏浚了南上湖、南下湖和北湖。杭城兴建沙河塘,先后多次疏浚整治西湖。

唐以前西湖称钱唐湖,仅有水利之功,不作游览去处。西湖之名最早出现于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可见西湖的出名得益于诗人的咏唱。不过杭州湖山名胜的形成决非少数人之功力。名胜古迹半靠天然、人文,半靠雕琢渲染。杭州的佛寺园林、州治园林、亭台园林、绿化园林……多方面的造景不约而同地集约而成,才使天然山水锦上添花,长年累月,终于造就了城市的特征和个性。

杭州的灵山秀水吸引了许多高僧释子来到西湖卓锡。因而唐代杭州不但珍惜地保存着诸如灵隐、天竺等名寺大刹,还不断新建起高雅巍峨的佛寺。据《西湖游览志余》载,唐时杭城内外湖山之间有寺 360 座。诗人们对寺庙景观题咏特多,如有“张喜游山而多吟,日历僧寺,往往题咏”。灵竺山水灵秀,钟毓其间;寺院林立,文人雅士处处流连,游客骑马走九里松达灵隐,也可泛舟经灵隐浦抵冷泉,这一带景色清幽,颇多游览胜地。

开元十三年(725),杭州刺史袁仁敬发动种植九里松,“于洪春桥西达灵竺路,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苍翠夹道,阴霭如云,日光穿漏若碎金屑玉,人行其间,衣袂尽绿”。桥东筑有九里松亭,供路人休憩,又饰有跨路的“一字门”,使九里松成为著名景点。袁仁敬的这一创举,成为杭州园林史上大规模人工植树的楷模,影响所及,众山变绿。

杭州造景之风,吹及山水城市的地方首长。袁仁敬之后,有刺史卢元辅选风景绝佳处造见山亭;接着有相里君造虚白亭;韩皋造候仙亭;裴常棣造观风亭;元稹造冷泉亭;于是飞来峰下、石门涧旁,五亭相望,如指之列,组合成一景。在景区里有人造楼,有人建塔,有人刻石,有人植竹,还有人编造美妙的神话传说,使山山水水饶有情趣。

唐之孤山,“楼阁参差,弥布椒麓”,也是园林名胜集中的地方。元和十二年(817)有僧惠皎镌法华经于寺之石壁,历 7 年,至长庆四年始竣工,工程不小,大诗人元稹等资助其事,留有《孤山寺石壁法华经记》,传为佳话。

杭州州治内外有不少园林景点。虚白堂、因岩亭、高斋、清辉楼、忘筌亭、南亭、东楼、西园等,大多为历任太守出资修建。其中虚白堂面江倚山,凭栏可观赏潮涌,晴明能眺远山,长庆中白居易有诗刻石堂上。东楼一名望海楼,《淳祐临安志》载:“白公在郡诗,多于此楼发之,”构成古迹。

唐人称吴山为青山。元和十年(815),太守卢元辅重修吴山伍公庙,并作《胥山祠铭》,纪念战国时吴相伍子胥。诗人徐凝作诗谓“寄言飞白雪,休去打青山”。李绅也有“犹瞻伍相青山庙”句,说明唐人珍惜保护古迹。

沿钱塘江岸边有樟亭驿,是诗人们最爱观潮吟诗处。初唐杭州山水诗作咏江潮的多于咏西湖,如宋之间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孟浩然的“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王昌龄的“钱塘江畔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李太白的“挂席凌蓬丘,观涛憩樟楼”;徐凝的“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覆,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都脍炙人口,把钱江奇观与钱塘盛名联结了起来。至于西湖的出名是中唐白居易才开始的。在此以前“是钱塘江时代”。

距杭城稍远的沿江名胜有定山的恩德寺。离钱塘县旧治 50 里,寺本有名,寺旁又有巨大岩洞。洞内水流不竭,水洞顶上又有一洞,清风自内出,俗名清风洞,亦称恩德洞,即今之灵山洞。唐代游人已多远道而来者,诗人白居易曾与范阳卢贾、汝南周元范、兰陵萧悦、清河崔求、东莱刘方舆等慕名专程到此游览并赋诗。至今洞外还留有唐人摩崖题名。

远郊余杭径山也有唐代开发的胜迹。《余杭县志》记,径山地峙五峰,中辟高原,境地清幽,岩壑深邃。天宝初有国一禅师开山结庵于此。永泰中建径山寺,殿宇崇宏,甲于浙水,曾被誉“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山产优质名茶,寺僧采谷雨前新茶用小瓶贮装馈赠宾客。当地有龙井、金鸡、龙鼻诸泉,水质晶莹甘冽,故以“清泉茗香”著称。

唐时城内名胜主要为龙兴寺,由原中兴寺扩建,寺广九里,众多殿阁之外,尚有多种宝塔,如法华塔、铁塔、大青塔、小石塔等。开成二年(837)所筑经幢,是杭州现存年代最久的经幢。经文题记出自唐代名书法家胡季良,特请吴兴沈郁、沈成刻字,字迹工整挺丽,温润秀颖。

综上所述,可知杭州城市的园林建设肇始于唐代,西湖的名声也起于唐代。其间诗人题诗传扬,功不可没。唐代以诗择士,诗风特盛,而有唐一代诗坛巨匠均对钱江潮与西湖赞扬备至,如宋之词、孟浩然、王昌龄、李白、崔颢、綦毋潜、张籍、刘禹锡、杨巨源、卢元辅、许浑、白居易、姚合、元稹、张祐、贾岛、徐凝、韬光、真观、处默、杜荀鹤、温庭筠、罗隐等诗人,都对钱江、西湖有诗题咏。其中尤以白居易题诗最多,宣扬最为出力。诗以景名,景借诗传,西湖风景由此扬名四

海,而杭州也由此以山水秀丽逐渐著称于世。

当时杭州虽开始出名,而实力不强,处于中等偏小的城市地位。唐代在中唐以前名为“盛世”,杭州自然相应较前有所发展。但城市本身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居民饮水困难。因杭城建于江海故地,陆上挖井常与江海地下水潜相通灌,味咸苦不合饮用。后来虽构筑“六井”,对整座城市而言,供水一时难以全面普及。又如江岸外多礁石,阻碍港口航行,影响出海贸易。再如杭州各处地势高低等差各异,农田水利增加难度,但人力物力的投入由于分散而明显不足,每年夏秋之际易旱,而局部地区易涝,影响整体的农业生产。城市建设存在“城大市小”的缺点,城市管理存在“坊市隔离”的困扰,工商业不活跃,影响手工业的发展与市场的运作,非农城市人口比例极小,直接阻碍着城市化的进程。更主要是区域隔阂,中唐前重北轻南,一向满足于黄河流域物阜民丰,以中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南相对落后,经贸发展迟缓;而杭州更作为偏远小郡,处于浙东道与浙西道这两个道之间的边缘,浙东道以越州为中心,浙西道以苏州为中心,杭州自然只能落得个三等小州了。唐代中原以外,在东南的都城分为三等:全国性城市建康、扬州列为一等;地区性城市苏州、越州列二等;杭州只能与婺州、衢州、湖州之类一般州城列于三等这个档次,仅比睦州、温州、明州、处州略大一些。尤其是钱塘江水灾不断,百姓自发修建的版筑土塘挡不住江潮冲击,以致杭城地瘠民稀,人气难聚。

从纵向考察,在唐代 290 年历史中,杭州的发展大起大落,呈现曲折。即唐初在战乱中杭州遭受损失;贞观至开元间的百余年,大环境国泰民安,杭州出现较快的发展势头;但天宝以后全国大动乱,杭州也受到波及,导致在籍户口大幅度下降,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所反映,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与玄宗天宝元年(742)相比,杭州地区人口数不升反降,近百年中陆续由 585963 人下降到 339960 人,下降了约 41.98%，“城市化”明显受到重大挫折。试想一州九县总人口仅 33 万人,州城内人口是少得可怜的。

军阀战争中东南财赋加重,杭州也遭残酷搜刮,民不聊生,代宗《恤民敕》承认:“杭越间疾疫颇甚,户有死绝,未削版籍,至于税赋或无旧业田宅,延及亲邻。”所有赋税都集中于贫民身上。不久袁晃起义抗唐,一度攻占杭州,旋即退出。永泰元年(765)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记述:“近岁灾侧繁兴,寇盗连

起,百战之后,城市独存,”接着黄巢之役,于乾符五年八月(878)又攻陷杭州,虽停留未久,而大军进进出出,对城市不可能没有影响。这些史实揭示天宝之乱后百余年间杭州长期处动荡下降趋势。刘长卿有诗描绘这座山水城市的景象:“江上初收战马尘,莺声柳色待行春。双旌谁道来何暮,万井如今有几人。”战马长嘶,行旅寥寥,万井人稀,西湖显得冷落,城市荒芜了,只依稀保持着山水城市的轮廓。

第二章 唐末五代开始启动的城市化革命

第一节 吴越十四州军的中心城市

社会安定,是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吴越创始人钱镠自公元 887 年(唐僖宗光启三年)担任杭州刺史正式步入政台,接着升任防御史、节度使,成为自主一方军政民政财政的割据者;公元 902 年(唐昭宗天复二年)被晋封为越王;两年后即 904 年(唐哀帝元年)改封吴王;907 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加封为吴越国王(一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 923 年才正式由“吴越王”加“国”字称“吴越国王”)。至公元 932 年(后唐明宗长兴三年)病逝,计直接治理杭州 46 年之久,有效地控制着杭州的长治久安,成为历史上治杭时间最长、对杭州贡献最大的古代政治家。如果再加上秉承他既定国策执政的四位君王统治 46 年,杭州人民处于钱氏“保境安民”荫蔽下安居乐业将近一个世纪;至“纳土归宋”实现和平统一,更利民利国,传为美谈。

吴越控制范围在前期有 14 州,后期为 13 州加 1 个军,始终以杭州为统治中心,名为“西府”,实即国都。这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杭州推上长三角中心的位置:过去只是几个县的一州小范围中心,如今一变而为 13~14 个州的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一国之首府,地位远比浙西道的苏州或浙东道的越州重要,而且直接凌驾于苏州、越州之上,显然一跃而成全国性的一等城市。其位置的重要既超过了扬州,治绩之良好也优于南唐的首府建康,事实上推进杭州

成为“东南第一州”。

吴越时杭州发挥的另一个地域性作用,是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场“中世纪城市革命”,其影响的广泛和意义的深远,恐怕连当局者的钱镠也未必自觉地意识到的。辖区曾有所改革,放松了对市场的束缚,有利于经济的繁荣与城市人口的聚集。

近年美国斯坦福大学 G. W. Skinner 教授等 16 位城市史专家经多年研究,完成《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研究课题并出版专著,其中一章专门探讨在西方世界正处于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当口,中国的长江下游却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城市革命”,推动杭州、苏州一带部分城市进入了“城市化”的快车道。认为自唐末经五代至宋代,杭州一带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曾领先于世界。

G. W. Skinner 教授论述的重点是唐末至宋代,唐宋之间存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即五代。他们又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很不平衡。唐末至宋(包括五代)时期的“城市化革命”主要发生在长江下游,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试想,自唐末经五代和平进入两宋的长江下游执政者是谁,能起关键性作用的又是谁?答案十分清楚,钱镠是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先驱者,吴越五王对推进“古代杭州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这场“城市化革命”为后来南宋定都杭州奠定基础的。

根据美国城市史专家的新颖观点,我们调查分析了大量史料,以五代吴越国首府杭州为代表,考察当时城市结构、城市功能、城市规模,及其奠定基础后的持续发展,对于北宋时的繁荣和南宋定都杭州的积极影响,吴越确实是多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城市改革,不但对于加速杭州城市化取得明显成效,而且对周边城市——特别是对长江三角洲的苏州、秀州、华亭等城市的发展起到重要带动作用。秀州系吴越时发展而建为州;华亭即今上海松江,本为小县,吴越时成南北两城的大县,至宋置市舶务。

据斯坦福大学专家们的分析,当时长江下游部分城市的“城市化革命”,其鲜明特点是:1. 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 官市组织解散,市场允许民办;3. 坊市分隔制度取消,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4. 城市外和四郊同样可以进行买卖交易;5. 重点城市迅速扩大,商业区蓬勃发展;6. 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中小市镇;7. 赋税和贸易日益钱币化,以货易货基本消灭;8.

商人的数量、财富、力量增长，社会地位上升；9. 官府轻视商业和商人的态度缓和了；10. 为出口而发展专业化生产，同时增加区外贸易……这些中国中世纪晚期经济革命的决定性成份，都是由中心城市——首先是吴越首府杭州为核心启动，然后向周边城市逐步推广的。其中发展最快的城市，自然是区域中心地的城市。钱镠初任镇海节度使时，镇海节度使的治所本在润州延陵（唐改丹徒，今镇江市），其所以很快迁治于杭州，固然有安全因素的考虑，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选定区域中心地的需要，杭州不但地处两浙交会的中心地段，而且控驭冲要，万商云集。所谓“城市化革命”，实质是以市场化推进城市化；也即以中心城市的扩大市场化，带动江南区域的城市化。这是吴越国开府杭州取得的最基本成就和经验。

对外平和 乱世一方乐土

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历时十载，战事延及大半个中国，后虽由各地藩镇协同镇压下去，而唐王朝遭此沉重打击，从此陷于分崩离析，渐次走向衰亡。于是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唐代末年早已形成由节度使分掌各地军事、民政、财政的“藩镇割据”局面；五代十国时期是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加剧。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封建小王朝陆续接替唐朝在黄河流域一片中原疆土的统治，四周割据的藩镇各自称王，形成十多个相对独立的王国，互相开展兼并战争”。计淮河以南有九国，北方有北汉一国，合称“十国”。事实上割据势力不止十国，此外尚有后梁时的晋、岐、燕，后汉时的清源，后周时的武平，均因立国时间甚短而未计入“十国”之内。在北方边陲有辽国（契丹），西北边陲有定难（西夏前身），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也控制着大片版图。大好河山割成碎片，战事不断，广大民众陷于荡乱的苦难之中。于是，哪里能确保持久平安，那里就能赢得流民的归附。

吴越是“十国”中的一个国，却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执政者钱镠自知兵力不足以逐鹿中原，实事求是地制定“保境安民”的国策。它尽量避免与邻国冲突；同时虚心奉事中原王朝，以作万一受侮时的应援；如此长期保持“休兵乐业”，不断致力于国内的和平建设。

当多数地方战事不断，百姓不堪其苦，纷纷南下逃亡时，吴越国乘势招抚流

亡,充实户籍,开垦荒地,使农村有充足的劳动力足以增产粮食;城市补充非农的工商户口,足以推进城市化,扩大城市的容量。

城市化最基本的要素是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因为城市是人们聚居的载体,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作有力支撑,就谈不上城市化。但是,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和投身城市劳动的人力来源。首先必须依靠周边地区农业相当发达,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蔬菜,以及柴、油、盐、茶等各种生活资料,才好支持城市众多居民的日常生活之需。其次农业社会里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依附于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他们不肯轻易抛弃自己的家园离乡背井进城谋生,事实上盲目进城也无从立足。这就是千百年来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的症结所在。试想,城市如果缺乏源源不断的劳力补充,就无从实现城市化。“化”者指化农民为市民,需要城市里有生活出路,还需要农民愿意离乡进城作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这一“化”的过程很不容易实现,以致自公元前 222 年钱唐置县建城起,经公元 591 年扩建州城,至钱镠于公元 907 年封吴越王止,计共经历 1129 个年头,杭州人口尚不过 1 万余户。说明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条件下要推进城市化,难度极大,进度极慢。

钱镠开明之处,在于顺应了两方面的有利形势:一是大批来自北方灾区的流民,无家可归,无乡可依,听凭安置,只要能有一口饭吃就满足了,不计较山乡、水乡,也不计较城市、农村。政府加以甄别,适于农耕的安排开荒;有一技之长的留城从事手工业劳动;有经营能力的听任经商;有资金开店设铺的当街开店;有的前店后坊,有利于繁荣城市经济。这样城市人口得以有序增添。另一方面的有利形势是唐末皇权衰落,对南方城市管理和市场束缚的能力削弱,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水平提高,官市衰替,于是钱镠下令取消官市制,使民间工商业开始活跃,城市谋生的机会增多。政府因势利导,干脆全面放开,鼓励商贸和发展手工业,小商小贩或行商坐贾悉听其便。政府主要发挥维护境内平安和社会稳定的职能,减少了束缚就业和人口流通的负面作用。保证百姓在这方土地上得能安居乐业。

由于吴越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战事减少,社会安定;同时奖励农工商贾,发展生产,关心流通,加以江南水乡自然条件改善,因而经济文化的发展从五代起南方的吴越超过了北方的中原,成为“十国”中经济繁

荣、文化昌盛的割据小国，乱世中的一方乐土。《资治通鉴》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果非虚语。正如蔡涉在《东南重望，吴越福星》文中所归结：“唐末五代，中原干戈遍野，虫旱弥年，民废耕织，十室九空。斗米万钱，死者相枕，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相比之下，吴越不啻是天堂了。”

第二节 扩城改制创建“地上天宫”

城市的规划对城市发展起着先导作用。隋唐以前，历朝古都的城建管理体制一直奉行“宇宙论”的不变模式——即选择一块平坦地，围上方形城垣，然后遵循宇宙星象配置，“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划原则，分隔坊市，对居民间巷一坊坊区隔，有严格限制。除了个别具有特权的人家外，百姓门户均不得通向大街，一律封闭于间门之内。若要购买物品，或出售自己制作的产品，均须等到中午击鼓开市，才能进入市场买卖；傍晚鸣钲收市，市门重新封闭，禁止出入。而市场只有官市，不得私办，限定县城一市，都城两市，北方连长安这样大都市也只有东西两市。所以普遍都是“城大市小”，名为“城市”，实不相称。在“四民”士农工商中商民居末位，对于他们集市经商的地点、规模、经营时间、经营品种均有规定，不准超越。商业摊位不得设在市场外面，更不得设在大路边上，或与居民混杂。这种体制名为“坊市隔离”制。

钱镠治杭期间，先后三次扩城，打破“宇宙论”模式；同时彻底取消“坊市隔离”的封闭体制，推行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兼顾到城市防御工作的安全和市民生活和商贾买卖的方便，吴越西府的城市规划独具一格。它在前朝旧城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改造，依四周的有利地形，穿山越岭向外扩建，以增加城市容量。这样就完全打开了原先方块形的江干小城的局限，把江干小城尽力向北延伸，包容西湖以南及以东沿线。扩城工程还向东包进“大河”（盐桥河），沿河筑街，沿街设市，市内架桥，水陆通行。这样市场完全放开，白天夜晚均可贸易，街区内外都成为开放式的市场。

城市经过一再扩建，不但城市外观突破了方式旧制，建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腰鼓形城”，能容纳更多居民；而且城市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新城依

江傍湖,走向繁荣,逐步完善城市的主轴线。主轴线是城市主干道的市街,与大河基本平行,一河一道自南至北,纵贯全城。然后两侧延伸出分支。如同网络,连结小街和各处坊巷。除了中心区为主要闹市外,其他地段也各根据市民集聚的多寡自然成市。

大河的水源依靠西湖的水灌注供应,特凿通涌金池引水入城。湖水入城后向东注入西河(清湖河),然后分为南北两流,南流入菜市河,北流入小河(市河),才转入大河。因而大河的水是活水,可供饮用,并可通航运输。河两岸自然汇聚密集的居民。民户大多前门通街,可以营业;后门通河,便于拾级而下用水或登舟,运粮运柴十分方便。于是主干道和大河两侧人烟密聚。这条水陆主干道一直为两宋所沿袭。南宋都城框架除对吴越西府的城南与城北略有收缩外,城东城西承袭吴越旧制不变。直到新中国诞生以前,这条城市中心轴线维持千年未作重大改易,实因有其悠久的历史 and 地理条件使然。这也足以证明钱氏当年的城市规划具有着合理的内核,为杭州城市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钱镠的扩城工程计分三期进行,第一次扩建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招集民工万人,配以八都子弟兵,自江干老城西南部出发,由包家山到月轮山,再折向东北,沿西湖直达今湖滨路一带,扩展一道新城墙,因新城旧城互为依附,称为夹城。第二次扩建在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沿夹城东北再修筑“城外之城”。南起旧城的吴山东南麓,向东北沿东河到艮山门,然后西折抵武林门,再向南折到昭庆寺。城形似手指掌纹屈,俗称罗城。罗城最适于民居和贸易,日后成为闹市中心。第三次扩建在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于凤凰山杭州原有州治基础上扩建筑子城,作为吴越国军政机构所在处。后来南宋建皇城,便是以此为基础适当扩建加工粉饰的。

钱镠关心民间用水,除了施工引湖水进城外,还在城内大批凿井。城北百井坊巷的地名,就是在这一带打井99口而得名的。今延安北路路边还保存着一口“钱王井”,是千余年来硕果仅存的一项物证。所谓“市井”,指古代城市建设是不能离开井的。钱氏在杭打井数量之多,为历代之冠,反映吴越城建注重亲民工程。

经过上述三次因地制宜的扩建,外围城墙长度由30多里增至70多里,城

市面积空前扩大,城市人口的容量大增。正好可以用来容纳源源不断由北方逃亡南来的移民。钱缪重视移民的安置和人才的收罗,在华亭专设接待移民的安置站,派人识别外来人口中的人才,择其专长,让他们能施展才能。凡有施政才干的,充实到行政管理部门,时人称道:“满堂花醉三千客”,一时呈现出人才济济局面。有工艺专长的收进专业作坊,仅以精缣织造为例,就收进 300 名高级工匠;同时对于过去只准官营的陶瓷业、丝织业等特种行业允许官私并行,分头经营,以增加产品,扩大区域间的贸易。一时城内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各行各业盛行专业化生产,手工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商品化。商业化对城市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街市坊巷充斥作坊、商铺、酒楼、茶馆、点心铺、杂货摊,与官府、寺院群相杂处,早先的坊巷布局早已不再受传统阊门的约束,新老市民们广泛参与工商活动。人气市气集聚,市容富有生气,从而反作用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变着城市面貌。至此城市重心已由江干北移到了西湖、运河一带,形成“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为“西湖时代”奠定了基础。

吴越继承和发展了前人治理杭州的经验,在控江保湖保障城市发展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那时钱塘江并不驯服,经常为患,潮水冲塌堤岸的事时有发生。唐末梁初,据《武肃王筑塘疏》诉述:“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洪水威胁居民生命财产,良田卤化,饮水咸化。事关民生大计,针对前人所筑土塘禁不起潮水冲击,吸收集体智慧设计出兼用木桩、竹笼、巨石构筑的“双重海塘”。——即外侧用六重巨木打桩作“混柱”,以折来潮时的水势;紧贴着一条条几十丈长用竹编的长笼,笼中充实巨石,塞以灰土;堤内再用木桩护堤,采取横木和榫卯结构加固。外塘之内再筑整齐的石塘,作第二重防护。这是海塘史上的一项创举。由钱缪亲自统率 20 万兵民投入奋战,突击两个月,从六和塔至艮山门,沿江筑成一条“长达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的捍海塘,总耗资近一亿一千钱。后人称之为“钱氏捍海塘”。在此之前,巨潮直薄候潮、通江二门,威胁城基的稳固,俟塘建成后城基始定。

1983 年 7 月,在杭州南星桥江城路立交工程地表 3 米以下,发现一段钱氏捍海塘遗迹,当年工程之巨大至今犹依稀可见。据考古学家和水利专家现场考察后认为:结构这样讲究而复杂的海塘,世上罕见,堪称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

工程之一。

事实上这条海塘化大力气修筑完成以后,好多年内杭州免受潮水侵袭,有效地保护了民众的生命财产,还使江岸内沙土渐积,岸益坚实;原先的卤湿地区变成良田;城东菜地扩大,可保证城市居民获得足够的蔬菜供应;咸潮渗入内河影响饮水质量的事件被遏止住了;市民无不额手称庆。

吴越三面受敌,陆上交通受阻,唯有一面临海可沟通水上贸易。但钱塘江口自古以来有罗刹石形成的暗礁密布,行船相当危险,狭窄的航道不能满足吴越大队船只北上进贡以及贸易和军事活动的需求。为此,钱镠组织军民整治江口航道,凿平巨大的“罗刹石”和一大批暗礁,拓宽航路,利于海运。水上交通的发展,直接促进区域通商为手段的和平外交,各国间增强了友好往来,减少了兵革之祸。尤其是南北航道通畅后,每年向中原朝廷岁贡百万,被称为“群藩之冠”,换取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借纳贡之名,发展区域贸易,促进货物交流。钱镠乘机在北方沿海州城设置“两浙博易务”的机构,维护吴越国的贸易权益。接着由区域贸易扩大到海外诸国的交往,东及新罗、日本,北至契丹,南达南洋诸岛,直至西南的大食。海外各地的奇珍异宝、生活用品,通过国际贸易源源输入。如从大食输入火油(即石油),吴越水师曾用于军事,作为“火攻”的有力工具,发挥巨大威力。

航海贸易的大发展,使杭州湾口的澉浦成为吴越国最主要的港口城市和造船基地,造船业兴旺,江上舟楫辐辏,经常望之不见首尾。物流的繁盛,促进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丝织业、陶瓷业发展最为明显。输往北方的丝织品动辄以万匹计,锦绮色绢十分精美。瓷器也是出口的主要商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秘色越器尤多精品,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正如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所指出的:“当时杭州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

钱镠在大力“捍江”的同时,十分注重“保湖”。他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有水才有民”。他首先注意的是开浚西湖,唐昭宗天祐元年(904),他创设撩湖兵制,“置撩湖兵千人,专治西湖”,使疏浚西湖的工作经常化、持久化、制度化。后梁贞明元年(915),他进一步把疏浚和保护西湖的经验推广于疏浚市河、运河和太湖以及鉴湖等水域,“专置都水营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凡七八千人,治河筑堤,号撩浅军”。又置闸堰,保障水质,如置龙山闸、浙江闸,遏江水入城河。

余杭门外半道红造有清河堰，顾名思义可知为保水的洁净。他考虑到江南多洼地低地，许多水田水位与河水相平，多雨季节极易遭淹，关注保护农田水利是经常性任务，令都水营使组织和平时期的常备兵从事农田的保护工作，创建起漫长的防水护田土堤，营造大面积圩田，使鱼米之乡确保旱涝保收。

控江保湖是吴越国王钱镠建设城市的基础和手段，他更宏大的目标，是要缔造“地上天宫”。用人们后来加以通俗化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地上天宫有着两方面需要不断完善的内容：一是保护和美化自然环境，使湖山更加灵秀；二是丰富和提高民众的物质精神生活，境内百姓富足安乐。他为此办了不少实事，其后裔也一代代继往开来不断努力。

首先是加快城市化速度，使三等城市的杭城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大城市，超过原先江南区域中心苏州。据乐史著《太平寰宇记》中记录宋初太平兴国年间人口数目，杭州当地户主十六万一千六百，客户八千八五五十七；苏州当地户主二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客户七千三百六十。按吴越于宋初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上述户口数正是吴越国当年的实际记录。如以平均每户5口计算，有人口852785人，其城市规模除了北宋首都开封无与匹敌。与身边的大城市苏州比较，是苏州的六倍左右，差距甚大。行云帆等著《苏州》称：“隋唐时苏州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经济中心之一，五代时更趋繁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历史文献正式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载入史册，是北宋史学家兼文学家范成大主编的《苏州府志》，其“苏杭”并称的次序主要为了与上句的“天堂”押韵，杭州明显大于苏州，其繁荣程度当时也远胜于苏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过能把苏州与杭州并列，与天堂并称，说明杭州的城市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苏州城市化。

《苏州》书中还盛赞吴越在大建杭州园林的同时也着力建设苏州园林：“当时吴越王钱镠统治苏州，大建花园、佛寺，奠定了苏州园林的基础。”还谈到：“钱镠之子钱元璪任苏州刺史三十年，好治园，种花、叠石，相沿成风，园林胜景遂著称于世。”在手工业方面，吴越在杭州重点发展丝织业时，也带动了苏州的丝织业，使苏缎与杭罗并称。所以苏州人常以与杭州毗邻为荣，所谓“南望杭州，西滨太湖，北近长江，宛如一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长江三角洲的千里沃野之上。”事实上吴越以杭州为中心推动城市化，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的一大片城镇。当

然,众星灿烂,杭州是居中的明月。

当年吴越纳土归宋时所造册籍,列陈吴越的家底为:“十三州、一军,共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一并献给宋朝。按比例计算,杭州一州在十三州一军中所占比例,竟达户口总数的30%,实际还不止此数,因为王室成员、宫妃、太监、贵胄、高官及其家属,还有禁卫部队,大部集中在杭州居住而不计人民间户籍,可见杭州城内非农人口比例甚高,城市化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比之于向来浙东人口最多的越州高出三倍以上。

杭州城市化的高水平还表现在城市经济的繁盛和发展速度。从纳税的多寡可反映城市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如宋初杭州城区的商税,杭州远多于苏州,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录熙宁十年(1077)杭州城区商税是82173贯零228文,而苏州城区为51034贯929文,杭州比苏州高出50%以上。甚之高于唐代号称“富庶甲天下”的扬州(41849贯403文)一倍;也远高于邻近的大州越州(28916贯),明州(20220贯),湖州(39312贯),秀州(27452贯)。酒税的岁额,杭城是30万贯以上,也是全国酒税收入最多的都市。当过杭州知州的苏东坡不无自豪地说:“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可知杭州纳土时提供给宋朝的是城市化高度发展的城市,而且由于和平归宋,保持了杭州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势头,才能为南宋来此定都奠定基础。

其次是一贯重视园林建设,为西湖锦上添花。唐代西湖虽初露芳容,但与城市并未融为一体。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所写《钱塘湖春行》诗里写得很清楚:“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从中可看出那时湖东野草丛生,尚无街市。湖滨一带行人稀少,可纵马驰骋。西湖还远未出名,在白居易以前文献中未曾出现“西湖”这个名词,连白居易的大量颂唱杭州的诗篇中也只有两次运用“西湖”的名称,正如这首诗里题目写的是“钱塘湖春行”而不用西湖春行。西湖的声名既未叫响,西湖与杭城的关系也未融合,改变这种状况的主要是五代钱氏多年经营,把城市延伸到了湖滨,才形成“三面云山一面城”的风景城市特色。经济繁荣,景观增添,环境美化,游人增多,市民生活优裕,这些条件的改善才使城西的钱塘湖因紧靠城市,而约定俗成叫响了“西湖”之名。至于“西子湖”则是后来仰仗苏东坡的诗名和诗作,以及他的社会地位和积极宣传,加上五代吴越的“撩湖兵制”与入宋后的继承这种治理

西湖的优良传统——宋代杭人挖掘淤泥，芟除葑草，疏通水源，建闸造堰，蓄水泄洪，植树栽花，长期成为风气，其倡导之功，钱镠实居首位。

园林城市的精美，不但要依托自然风光，同时还离不开适当的园林建设，精雕细琢，锦上添花。钱氏三代五主苦心经营；王苑私庭，星罗棋布；亭台楼阁，点缀群山，左江右湖，极登临之胜。吴山最高处的江湖亭，昭庆寺前的望湖楼，涌金门外的钱镠故苑——西园，钱塘名园之一的瑞萼园；钱塘门外更有别墅式建筑白莲堂、绿野堂、四观轩、披颖轩、南漪亭、迎薰亭、澄心亭、涵碧亭、玉壶亭、雪霁觥亭等，胜迹无数，有些至今还有遗迹可寻。

吴越国治在凤凰山，亦园林式建筑，系利用唐代州治扩建，方圆九里，“以山阜为宫室，左界飞楼，右闾严城”，有握发等殿，都会、八会、阅礼、功臣、天宠、仙居、天册、思政、武功、大庆等堂，瑶台、义和等院，天长、全雪、青史等楼。其间不乏假山、莲池、曲水、亭阁之胜，缀饰华丽。入宋后仍复改为州治，至南宋赵构仓皇南迁，赖以栖身，后再扩建成为皇城，这是由当年吴越所建园林式国治间接提供条件的。

除了杭州、苏州进行园林化建筑外，钱镠在故乡也建了一些小规模园林。如在临安东南三里的功臣山巅建功臣塔，可鸟瞰全城。钱坞垅是钱镠的出生地，至今保存有一口“婆留井”，相传出生时钱镠父母闻满院兵甲之声，且见镠长相奇丑，啼声怪异，决定把他弃后院井中，以免遭不祥之灾。《临安县志》卷一载：“武肃王初生时有异相，弃井中，婆畚留之，故乳名婆留。后以同音字‘镠’代‘留’字，示封置兵甲于井中锁之，不复用兵。”钱镠功成名就后，衣锦荣归，重修故居，缀以园林。为崇信佛事，将故居及周围园地舍为功臣寺、净土寺，由其第十九子钱元玩主持。2003年11月临安市政府在这片遗址上建设吴越文化公园的前期施工中发现了距地面1.6米的故园遗迹，掩埋着上千平方米的古建筑，房基古道近百米全用讲究的米糕砖作人字形铺砌，错落有致，缜密清晰。部分砖石上刻有“万”字，这种简体写法在古建筑遗址中极为罕见，只有杭州雷峰塔地宫发掘的器物和临安五代时康陵出土的玉佩上也有相同的“万”字简体造型，足以证明三者都是1000多年前遗留的物件。从清理情况与文献史料对比，同样可以考定这一遗址确为五代吴越国遗存。最引入注意的是环绕遗址所建排水用青石沟渠，设计合理，切合四周环山的地域结构，其科学性直逼近代建筑。

唐末、五代著名诗人罗隐当时为称颂吴越王故园所作《婆留井颂》，有“是惟王气，宅相先征”之句。房基内侧有砖锅形建筑，为“千人大灶”，可以想象当年建筑规模之宏大和设计之精良。附近尚有净度寺、竹林寺等，均为寺院园林。海会寺经幢的《建幢记》上云：“乙亥岁，暂归故里，遍集胜因，以功臣山之奇峰，观竹林寺之湫溢，重构莲宫。半载之中，庄严俱毕。”查乙亥岁即后梁乾化五年（915）钱缪衣锦还乡之年。比照同时期钱氏构建的园林建筑，大多“重檐复屋，廊回路转”；“割然平朗，翬飞翼拱”；“雕栏花甃，万卉中出”；“怪石夹列，献瑰呈秀”……这许多园林式建筑，都为吴越大小城市添光溢彩。

第三节 东南佛国点缀园林城市

钱氏三代崇佛兴寺，使杭州成为“东南佛国”。名刹如林，古塔挺秀，留下精美艺术佳制甚多。弘扬佛教文化，不断引来外国僧侣前来朝拜，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儒佛交融，影响理学，渗入民俗，平添不少西湖佳话、神话传说、名胜古迹，丰富名山古寺文化内涵，成为名城历史文化组成部分。

杭州佛教之大盛于吴越，与统治者倡导有关。据《咸淳临安志》记：“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能举目矣。”首府杭城，自然寺院林立，宝塔遍布，成为奇观。有文献可查吴越在杭创建和扩建的寺院总数不下二百余所。如今人们熟知的杭州著名佛寺大多与吴越兴佛有关。净慈寺为钱弘俶所建，初名慧日永明院，迎衢州道潜禅师来院主持，道潜奏请将雷峰塔下地宫中十六尊铜铸罗汉移到净慈寺，扩建罗汉堂。不久灵隐延寿禅师转来净寺，建树更多，寺院因而成为西湖南山名刹。凤凰山南麓的梵天寺是钱镠造的。初名南塔，建有高大木塔，系经建筑家喻皓指点而建成。其他如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灵峰的灵峰寺、南高峰的荣国寺、天竺山的上天竺寺、紫阳山的宝成寺、月轮山的开化寺，以及海会寺、昭庆寺、玛瑙寺、清涟寺等都是吴越时兴建的。

杭州最著名的灵隐寺虽始建于东晋，后世亦曾加以多次重建，规模却都不大，只有吴越时的扩建工程最为可观，经深通园林建筑的延寿禅师精心设计悉

心营建,才成名副其实的名刹,计“建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共计 1300 多间,加以四面回廊,自山门绕至方丈,左右相通。灵隐寺得以从此中兴。下天竺寺原由印度高僧于东晋时来杭所建,唐末遭兵火,钱镠在其旧址上兴造五百罗汉院,使它名声更大了。

这类梵寺名刹大多建在湖山胜景绝佳之处,因而为杭州增添不少寺院园林和游览胜迹。如吴山襟江带湖,足以远眺城阙、江、湖,向为揽胜妙境,经五越时期经营建造,沿山道观僧寺林立。今环翠楼有海会寺,时称石佛智果寺,面对大江,石翼重垂,俯视城郭,通衢里巷一一可指。宝莲山有宝成寺,吴越王妃仰氏所建,是吴山赏牡丹胜地。寺院最集中的要数净寺周围,由钱氏所建寺院即达十余座,一度成为杭城最大的寺院群,带动了南线旅游和香火。

由于统治阶级的信奉和倡导,研习佛学之风大为盛行。不少学者还牵合儒家的经典来解释佛典;僧侣中也确实涌现出一批富有哲学思想的高僧,佛儒之间思想理念的互相渗透,使儒者在思想上、修养上更多地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于是寺院里多诗僧,官衙里多居士。钱镠的智囊人物罗隐与龙兴寺宗季禅师结为莫逆之交,留有 200 多首酢茶诗。此风延及后来的宋代,如苏东坡在杭任官时,就常与一些有学问的僧人交游,吟诗唱和,流传不少作品。就东坡的思想境界而言,与其称他为政治家,还不如说他是信佛的诗人。此后理学的兴起,也与佛学影响有一定关系。

佛教艺术在吴越也有特色。吴越时僧侣中的艺术家如贯休、蕴能等,都以诗、书、画三绝著称,现杭州孔庙内尚存贯休画的罗汉刻石 16 方。刻石原在圣因寺内,清乾隆帝南巡时赞不绝口,为之题写赞辞。吴越的经卷艺术也达到高超水平。雷峰塔倒坍时在塔砖砖心中发现的陀罗尼经卷印制极精。吴越的石窟艺术,在杭州主要有慈云岭石窟、烟霞洞造像、石屋洞五百十六罗汉像、飞来峰射旭洞佛像等,其中以慈云岭南坡石壁间钱弘佐时所铸造的石窟两龕,是杭州五代造像规模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石窟艺术。

五代吴越给杭州留下的遗产最为人们熟悉的,莫过于西湖双塔和钱江双塔。凡到过杭州的人,一到湖滨就会望见标志性的南北双塔遥遥相对各具特色,那就是雷峰塔和保俶塔,造型各异,塔的背景都蕴藏着深沉的历史故事。一到钱塘江岸,巍巍古塔高耸入云,虽已非吴越当年原物,而建此塔镇江潮之说,

历久常新。钱弘俶在闸口南高峰钱塘江畔的六和寺内建塔,塔因寺名。入宋后寺改名开化,而塔名如旧。塔圯后,多次重建重修,令人登临时凭吊往昔。白塔也位于闸口江滨,历尽沧桑,千年不改,其构造既保留有传统的建筑手法,又体现不少创新之处,并给后世造塔技术以很大影响。

吴越国在推进城市化革命过程中,上下齐心,军民合力,创业精神意气奋发,城建的成就和市场的兴旺,必然反作用于城市文化的递升,培育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吴越文化”。事实不难理解,随着移民的大批到来,城市中来自各方的人口迅速增长,促使人际交往的频繁,商品交易的广泛,物流的顺畅,市场的开放,海内外的交流,都是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的因素。包括市民文化、习俗文化、商业文化、艺术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等和许多方面的新气象新风尚新观念,都是隋唐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不同是由封闭走向开放,保守转向创新,对立变为和谐,粗犷进向精致。显著的例子如杭州的雕版印刷自吴越开始兴盛,现考古发现的实物甚多,值得注意的有私家刊本的出现,突破了官方色彩,且刻印精美。在艺术创作方面呈现自由活泼。钱镠出身下层社会,自学成材,冲出传统模式,自身“善草隶,称神品,且工画墨竹”,不落别人窠臼,对于吴越美术书画的兴盛起着推动作用。本地民间艺术家脱颖而出,外地艺术家远道前来投奔,如有王道求、李群等由北方南来投奔吴越;诗画大家贯休向钱镠投诗。吴越画家的作品传世或受文献著录评价的有王耕、钟隐、罗塞翁、蕴能、钱铎等,崇尚创新,不拘一格,据古画鉴定专家王伯敏称,有关吴越画家画事琐闻甚多,实在多得无法一一罗列,思想放松促成了百花齐放。吴越建筑艺术承前启后,具有突破性的发展,赋有高超技术的匠师纷纷涌现,并非限于喻皓等少数名家。《曝书亭记》载:“寺塔之建,吴越武肃倍于九国。”金涂塔吴越制作独多,其中有不少由民间铸造,为历代所罕见。这类城市文化特征,体现了杭州城市个性与吴越文化独具的魅力。

吴越文化中精华之处还在于群体创业精神。钱镠首倡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精神,把杭城建为“地上天宫”,但是加速推进城市化决非一日之功,也非一人之力,全靠杭州民众与外来移民持久地积极参与,还有“带甲十万”的战士在和平时期参加基建。这种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群策群力的风尚,形成吴越特有的

民俗文化。有了这种优良民风,才能完成一项项水利工程、园林建设、扩城任务,终于把杭州建成了“东南形胜第一州”。他们一心营造杭州成为与众不同的城市——“地上天宫”,就是西湖与城市融合,真正发展辉煌的“西湖时代”。由此可见,杭州花园城市的鲜明特色与吴越文化密不可分,是吴越时杭州人群体创业的果实。吴越归宋后9年出生的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描绘杭州城市景象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一派都市的繁华加上自然景物的秀丽以及人文的柔美,可谓人间难得几处有!称之为“地上天宫”是恰如其分的。钱镠为首的吴越国在几十年中为杭州创造出空前的大手笔,这种创业精神影响深远,深入人心,良好的民风民俗成了不断加速城市化的精神动力。

第三章 归宋后持续发展并借南宋建都的历史机遇达到古代城市化的巅峰

第一节 保境安民与和平统一

继吴越归宋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城市化进一步促使城市个性以花园式特征显现于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杭城独领风骚,在美景之中平添繁华安祥精致和谐风韵。湖光山色的美好不可能让杭人独享,花园城市的名声远播,北客南人游历过这座城市的都感觉无穷依恋,传为口碑。名宦欧阳修送友人诗:“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余杭几万家,日夜焚清香……夜枕闻北雁,归心逐南樯。”宰相王安石也在致友人诗中称赞杭州风物远胜京城汴京:“游观须知此地佳,纷纷人物敌京华。林峦腊雪千家水,城郭春风二月花。彩舫笙箫吹落日,画楼灯烛映残霞。如君援笔宜摹写,寄与尘埃北客夸。”可见吴越创下的“东南第一州”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至北宋已传播四方。

杭州在北宋的进一步繁荣,与历任知州重视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注意城市公共设施和环境保护分不开的。北宋的首任知州范旻实施“宽州免赋。”《乾道临安志·牧宋》载:“自是名乡巨公,接武而至。”最值得大写一笔的是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对开发杭城的园林旅游功能和水利功能贡献卓著。他发动民工疏浚西湖,取封泥筑堤,建成苏堤,跨以六桥,沟通南北,锦上添花。东

坡题写杭州山水的佳作名篇，大有助于风景名胜的播扬。其篇章之丰，更逾于白居易，人们都说：“杭州巨美，自白苏而益彰。”于是四方文士胜流好游赏者麋集杭城，旅游胜地杭州之美名，冠绝宇内。

当时就全国而言，旅游远未形成习俗，游览观光在多数地方还不普及；而对杭州来说，城市的游览观光活动已开始热闹起来。这与历任杭州地方官的倡导宣扬，“东南佛国”的宗教文化影响，以及旅游资源富有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节 空前繁华规模举世无双

及至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輶轳驻蹕，衣冠纷集，加以金人在北方荼毒百姓，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纷纷南逃，流寓杭州者数字惊人。为了接待安抚南来流民，在杭州府城内外共设立了接待寺 20 多个。据《杭州府志》载：20 余年累计接待了各界人士 300 万人次。当然这些人并非全部留居杭州，相当的一部分分别安置去外郡谋生，而留下来的毕竟不少。当年严谨的历史学家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杭州外籍居民已经超过土著。按北宋苏东坡在杭任官时说，杭城生灵约计 50 万口，据此可知外籍多于土著则总数超过百万，当可肯定。南宋定都临安近 150 年，北方人口还会陆续流入临安，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南宋后期的繁衍定然多于前期。人气既聚，民物阜蕃，尤非昔比，于是自吴越以来的东南第一州，一跃而成为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中心。在当时西方社会正处于“中世纪黑暗时代”，最大都城罗马从百万人下降为 20 万人；相比之下，杭城城市化高速发展，人口超越百万，当之无愧地可称为世界第一大都会。在中国古代发展的历史上，南宋杭州的辉煌与繁华，实无第二个城市可以与之匹偶。所以宋末元初来华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都城。”这说法是准确的。尽管他写的书中有些方面出现夸大失实之处，但不能以疵掩瑜。对于任何人说的话都需要经过分析然后才可相信。马可·波罗的这句赞语经过大量地方史料和国外较权威的专家研究成果比照核实，结论是：此话可信。

最有争议的是杭州当时究有多少人口？按宋元时期杭州笔记中记述数字

有所差异,试举如下:

《西湖老人繁胜录》载:“钱塘有百万人家。”

吴白牧《梦梁录》说有“百十万口”。

耐得翁《都城纪胜》说杭州有“百余万家”。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杭州有 160 万户。

以上几种记载的共同之点,均肯定杭州人口当时在一百万以上,但都为约数,且互有差距。

有具体确数的要数《成淳临安志·户口》(卷五十八),记户口总数为 378259 户,口为 1241156 人,即 124 万多人。但这个数字虽然具体,也需要分析,即南宋户口注重于男丁的登记,至于妇女往往被忽略而不计在内,疏漏尚多。另外有大批居住杭州而不登记户口的,诸如宫廷宫女、太监、侍从及皇室人员,贵胄、皇亲、王府人员,大批驻京卫戍部队,临时寄寓的江商海贾,运河及钱塘江上航船靠岸人员,居无定所的艺人、游医、无业人员等,合计起来不在少数,其中尤以军队人数为多。不过也有不该计入而计入了的 7 县农业人口,两相抵数大体相当。所以 120 多万的人口数大体可以考定。

美国专家埃尔文著的《中国往古的模式》(第 14 章)认为,世界史上人口曾名列前茅的是公元 2 世纪的罗马 100 万,10 世纪的长安 100 万,12 世纪金人入侵前夕的开封 85 万,13 世纪蒙古人入侵前夕的杭州 120 万,15 世纪初南京可能曾接近 100 万,16 世纪北京 85 万,此外开罗、内亚格拉、君士坦丁堡、德里等名城均未达到 85 万,直到公元 1800 年前后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伦敦等才超过百万。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巨著的著名汉学家施坚雅教授也持此议,认为近代以前最大的城市是南宋的杭州。以同时的罗马作比较,12 世纪罗马已衰落到不足 20 万人口了。可见无论在中国国内横向或纵向比较,或者东西方城市比较,杭州在南宋这段辉煌时期确曾达到了古代城市化的巅峰。

从城市规模的具体状况而论,当时人所写笔记记述甚详;城区人口日益增多,昔日荒空之地均已逐渐变为繁华街市。北宋时城西隅多空地,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诸处也是林木茂盛,阒无民居,而自定都临安后,城区日益繁艳,湖山屋宇连接,不减城中。“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城中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拥塞,街道挤狭。城郊人口也随之大增,杭

城南郊、北郊和西郊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钱塘江岸、运河边上，也人口密集，北厢 20 万，南厢 40 万，众大之区，编户日繁。城区密聚后，又向四周摊大饼式地扩展，其规模可想而知了。

商业革命 市场层层拓展

对于由吴越发轫的“城市化革命”，南宋借迁都之东风进行提升，进而深化为“商业革命”。

在北宋与南宋之际，原五代吴越国的城垣由 70 里的规模缩小为 50 里：钱镠所建的夹城被废弃了，东罗城也后退到菜市河内侧。北面吴越所筑夹城曾包容半道红、米市巷直抵湖墅，而南宋都城收缩到武林门为止。南面的包山、桃山关、冷水谷一带也均划出城垣之外，只有崇新门至保安门、候潮门一带相对完整地保留着吴越国的城垣设置。这主要是由于北宋时有意降低杭州的藩国国都地位，削弱其坚固的防御能力和潜在的独立倾向性，因而撤除“城外套城”的城市设施，以致城垣缩短了二十里，城内的面积比吴越国时缩小了。另一参考性因素是北宋都城汴京城垣周长也只有五十里，可容纳百万人口。城市化的水平高低，主要看人口的集中规模、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和社会的组织协调功能，这三方面南宋首都的水平都超过了五代吴越国国都时期的成就。特别是商业革命的深度与内外贸易的规模都非吴越国都区域性都会所能达到。从五代吴越到北宋杭州，城内空地尚多，居住密度尚未达到饱和状态。南宋迁都后引来大批的北方世家大族、富商豪门，扈从而至，相继占据城内一类的风水地块，如市中心的御街、后市街，西湖周边，以及吴山、凤凰山一带，都成为富贵人家聚居之区。本地土著大多停留在传统的二类区。至于穷民百姓只好在较偏僻的巷末、河浜、桥头、坡地、城外四厢，见缝插针搭棚寄居，像艮山门、东青门一带的低湿地，东北城角、北面城脚与东部城廓……这些居住条件较差的沙地，也发生人满之患。尽管如此，外来人士还在不断拥入。人口激增，城内空间有限，便自然向城外延伸。有文献所作估测，城内人口约 90 万，城外四厢约 60 万人。城外职业人口的主体有作坊工匠、商贸运输苦力、从事种植业的菜农、果农、花农、种粮农户、商贩杂役、军人及其家属。因此城垣虽缩小，居住区反而扩大。城内居住者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一般优于城外居民。杭州城内外按功能分，约可分为官

绅富豪区、商业手工业区和商业核,以及供给贮积区。至于南宋在凤凰山东麓台地上所筑皇城,初期袭用吴越国国都的子城,后来社会安定富庶,皇城就相应扩展,越来越富丽堂皇,那就不是吴越王的牙城所能比拟了。总起来看,南宋定都杭州,有助于杭州的城市化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不过其城市的基本格局大致仍袭用吴越国国都七十里的范围。

庞大的城市人口,需要各种商品不断供应,仅粮食一项,每天要消费大米 3 万石,即每年供应量不能少于 1100 万石。各类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资本、商品、生产、运输、供应、贮备等状况的复杂,对杭城来说前所未有的。客观的市场需求,推动着杭州持续的商业革命。

杭州持续运作的城市机能,与相应发达的商业贡献密不可分。以杭州城市为中心的物资集散流动,呈同心圆状,由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的重重叠叠的市场圈组织构成,而组织的脉络,全靠商业交通组织为背景。杭人谚语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说法虽过于简单化,倒也反映出周边物资流入地域中心的基本态势。大量的物资供应光靠本地区自产自销断断不可能的,必须要依赖外线的有序供应。从交通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北方的两条线路与南方的两条线路最为重要。北方的两条是由大运河经上塘河、下塘河,在苏州合流,通至镇江;南方两条在南门外分道,一条通往明州(今宁波),一条经严州(今建德)、或衢州至徽州。谷物的输入以北路为主;燃料、油脂、畜产品、鱼类、嗜好品的来源,以南路为主。四周布下不少为杭州辐射的中转地,以保物资流动的畅通。可见物资运作沿南北轴进行,南部的钱塘江及浙东运河极重要。近郊的市场圈,有所分工:东郊功能为强化新鲜蔬菜的供给地,同时也是粮食、建材、肉用畜类的贮备地;南郊是燃料、油脂、鱼类及部分粮食的输入口;北郊是积集、贮备谷物,批发贮积建材、燃料为主,同时辅助蔬菜供应;西郊功能为风景与供水区。

除此之外,杭州还充分利用远距离的商业运输圈。依靠海上航运,从东南海岸和南海运来进口商品,规模之大超过隋唐与五代吴越时期。长江水运运费便宜,经开拓线路,联结惠州罗浮山药市、绍兴药市、衡州药市、成都药市等中继地域市场,构筑采购和销售网络。荆湘与江西腹地所产的木材、矿产品、漆、染料、油脂、麻制品等的交易也日益兴旺。

城内商业体系完备,广设行业市场,批发商行和零售业点鳞次栉比。大宗

商品到达城内后先进入批发商的大仓库,然后分发给较小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仓库设施完善,严防火灾与偷盗,分成上等、中等和规模较简陋的下等仓库。贵重商品纳入特设的水岛仓库,以保安全。

行市各有分地,工商业中同类的经营场所,均构成各自专门的行市,集中设置于特定的街区,至今杭州坊巷还有“马市街”、“皮市巷”、“珠宝巷”等名目,大多为南宋留下的遗风。各行有自律性的组织,称为行会。有行、市、团等名目。“团”是基层自发组成生产、销售的单位,指定市场位置。“市”有专业的批发市场,也有零售批发兼有的市场。

在“商业核”中,称为“核中之核”的是汇集金银交引铺、盐钞铺的区域。金银交引铺,在榷货务管理部门的监管下,可以发放出用于兑换盐钞票据,其作用相当于城市内的银行,便利大宗货物的交易。市场化虽由无形的手从中操控,但官方仍设有商务管理机构加强监控,计分设都税务、回易库、榷货务、都茶场、会子库、杂卖务、盐榷务和市舶务等。还有编估打套局,是负责香药的选别、定价的部门。有时官方与宗室放出资本,引导商品的流行与风尚的流行。

随着商业核的出现,依附的各种服务、娱乐中心也应运而生。各色娱乐性服务和休闲服务的楼馆,包括瓦子、酒楼、妓馆、饮食店、精细的工艺装饰品店铺成批开张,大多分布在商业核的中心及其周边地区。艺能、歌曲等文娱项目组成艺人团体,参与寺庙的祭礼庙会 and 行市民众的斋醮,有时还到其他城市巡回公演,把商业性的市民文化推向外地。

由此可见,杭州的商业革命是伴同城市化革命引领全国,自唐末五代开始发动,经北宋南宋推向高峰,持续四百年之久,影响深远。特别是“商业核”的出现,“盐钞铺”的登场,与“会子”的施行,可谓古代商业革命成功的有力例证。

工贸功能 街市空前繁华

人气的集聚必然带动市气,“百物辐聚,民康物阜”,临安府城内经济文化的繁荣远超过北宋京都汴梁。城内横贯南北的天街及分布四周的10个大市与无数小市,店铺林立,买卖昼夜不息。各式物品,珠玉珍异,奇巧器皿,乃至“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贸易的扩大,加之贵族富商生活享受务求新奇,促使杭城日用工艺品的生产丰富多彩。

由于流寓临安的人口中有为数众多的各业店铺主、摊贩和各种手工作匠，加入到杭州的工贾队伍，促进工艺的交流，增添了行业的经营门类。《都城纪胜》载“京师四百十四行”，工商行业分工极细。城市中从事工商业的居民队伍迅速扩大，约占到城区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工商业者的比重之高和工商行业分工的细化，都与唐之长安、宋之汴京不可同日而语。

商品生产除了供应百余万常住居民生活之需外，每年进京述职的官吏、赶考的考生、来往的商人为数也多，往返之间都要买去一大批商品。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日用品和工艺品的生产各有作坊和销售商店。丝锦市专织丝织品；衣绢市专制成衣；枕冠市专造床上用品和各种帽子；花朵市专造妇女首饰和室内供设的假花。官巷口是当时花市中心，人造的各种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极其工巧。属工艺美术性质的还有珍珠市、玳瑁市、金银碾玉作、钻宝作、铺翠作、裱褙作等。个体工艺匠人行当也极多，如剪字、剪花样、糊刷、穿珠、制篮、符袋、做香袋、做风筝、做棋类、做蟋蟀笼、做卖烟火、剪影戏人物，还有制作泥婴、面人、面具、轮盘等各式玩具之类。扇子尤为杭州特产，品种极多，有道扇、漏尘扇、细画绢扇、金丝翠扇、细色纸扇、宜男纸扇和异色印花扇等。灯品之多，也不可胜数。诸如珠子灯、马骑灯、沙戏灯、羊皮灯、巧作灯、玉棚灯、一把莲灯、罗帛万眼灯、人物满堂红灯、五色蜡纸戏影灯……更有无骨灯浑如玻璃球；滚地灯内装机关旋转如飞，尤为精妙。日用工艺品生产的兴旺繁盛，涌现出大批名品，也诞生出大批名店。节日盛会更集中展示杭城工艺美术之精华，充分表现工艺匠人们的高度和非凡技艺。

工艺之最大成就为官窑青瓷和织染缣绣。北宋汴京虽建过官窑，但生存时间仅短短几年，即随北宋灭亡而消失；杭州所建官窑不仅时间长，而且工艺技术高，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窑，也是我国最早的御窑厂之一。其产品釉质肥润，为公认的珍世瑰宝。民间也兴窑瓷，质量不如官窑，对百姓的供应量却很大。

杭州丝绸本源远流长，宋室南渡时不少北方从事丝绸生产和经营的行家、商贾、能工巧匠，聚汇于杭城，促进杭州丝绸业在吴越国基础上进一步蓬勃发展，从而使杭城成为全国丝绸的都会。其产品最大特点，在于花色品种繁多，文献中所见名目，织染缣绣样样齐全，有绫、锦、红丝、克丝、罗、纱、缣、绢、绉、绣等。由于丝与织的分工，生产工具的改进，普遍使用脚踏丝车和花楼提花机；所

用染料已采用来自海外的苏木;加以社会对丝织品需求的剧增,产品大量流向全国乃至流向国外,以至于杭州“丝绸之府”的美名传遍天下。

南宋杭州还成了造纸业和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府所属余杭县的由拳纸和富阳县的小井纸,都负有盛名,为人珍爱。造纸业的发达,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当时临安府城里印刷业有官营也有私营,叶梦得指出:“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杭州拥有大量的精良刻工,临安国子监刊本最清,号称“监本”;临安府刊《仪礼疏》一书即使用当地刻工多达160人。私家刻书盛行,街坊书铺林立,名为“经铺”、“经坊”、“经书铺”或“文字铺”。当年杭州书铺至今有名可考的有16处,其中以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最著名,可见开书铺的书商还有文士才子的。由于杭州刻印技术高明,选用上等纸墨工料,形成中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至今犹深受藏书家宝爱。

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商品经济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商贸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收容了相当巨大的就业率,构成古代城市化的两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城市手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商业作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

临安府不但是南宋首都,也是全国最大商业都会,城市内外遍布作坊、团行、质库、邸店、酒楼、茶坊、瓦舍……交易热闹,“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大街上有日市、夜市和早市,昼夜不绝。沿路还有顶着盘子、挑着担子叫卖饮食品的;歌楼酒馆灯火辉煌,往往直到四更才会宁静下来。

饮食业特别发达,无论大街小巷,城里城外,到处都有。当时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有的名店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酒家除13家官库酒楼外,其他都是私营酒楼,大多顾客盈门买卖兴旺;有些小巷里都开有酒家,足见其消费水平之高,非其他城市可及。

茶坊在临安府也极盛行。大茶坊往往张挂名人书画,设置四时鲜花,安顿奇杉异桧,装点门面,清洁雅致,以吸引顾客。茶坊、酒楼不仅是人们聚朋会友之处,还备有说书、评话、曲艺,供人娱乐。

都市繁荣,娱乐业随之发达。临安瓦子多于汴梁,《武林旧事》记杭城共有

瓦子 23 处,其中以北瓦最大,包含有勾栏 13 个,日夜演出杂剧、说书、杂剧、影戏、傀儡戏等。瓦子亦称瓦市,即大型娱乐园;勾栏指演出的表演台。杂剧始于南宋,而源于杭州,有固定剧目和演出舞台,是隋唐演出形式的发展。说书的兴起,为后世的话本小说开辟蹊径。外地流入临安的各种戏曲艺人为数可观,丰富了杭人的文娱生活。既然形成这么多的瓦市和勾栏,吸引的观众人数自然极为庞大,这也是大都市兴盛的标志。

当然,在繁华的背面,必然存在大量贫民窟的阴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封建大都市是无可避免的。

旅游功能 园林甲于天下

风光秀丽的西湖山水诱人赏览,经白苏提倡,影响杭人游览风气,吴越至北宋除本地人外有时也引来一些外地人前来观光。到了南宋这里既成为全国中枢,往来人口激增,水陆交通发达,旅游活动随之更加兴盛起来。游客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赴京赶考的学子,“混补之年”有 10 万人纳卷。每一个赴考学子往往随带仆役,合计科举开试来杭人数不下 20 万人次。二是香客,香汛期间和佛教节日,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不绝于途。南宋崇尚佛教,有些佛教节日里城内外几百座大小寺院都隆重举行庆典,西湖“放生会”尤为热闹。这类宗教活动包含着大量旅游因素,“借佛游览”自是乐事。三是四方来京的商贾。作为“丝绸之府”、“工商之都”,经贸辐辏,客贩往来,四季繁忙,曾无虚日。人们难得进京,一有机缘当然成了游赏湖山的游客。此外,还有各国的使臣和海外的商贾,也会贪恋景色如画的异国风光,加入到游山玩水的行列里来。

适应着这种旅游的需要,沿湖沿山开拓出大批旅游景点,据《武林旧事》记录:南山路景点最集中,自半乐楼至暗门、钱湖门外,入赤山、烟霞、石屋止,沿线有景点 169 处;北山线 111 处;葛岭一带 48 处;石狮子路 37 处;小石板巷 19 处;西溪 18 处;孤山 9 处。其中有园、有寺、有祠、有堂、有庵、有洞、有古迹……当然西湖泛舟最为引入。湖上大小游艇不下数百舫,一一雕栏画舫,制作精巧,装饰雅致。贵族专用的游船更富丽豪华;皇室有楠木船,黄金装饰,悬挂珠帘;奸相贾似通的“车船”采用车轮脚踏,速度特快。湖上有商贩小船在水上供应瓜果、酒菜、茶点、小吃、时花……别有一番景象。旅游活动除湖山景区外,游市逛

街游赏购物也是乐事。所以商铺因旅游而得益,酒楼茶肆也加倍闹猛。由旅游带动出入杭城的流动人数通常在四、五万人次左右,这就促进杭城旅邸业的发展,大小旅店遍布大街小巷。今中山中路、三桥址一带位于城市中央,所以旅店最为集中,客房宽敞,设备周全。来客可在旅店办筵席,平时也可搭伙,外出代呼轿子。城南江干与城北运河码头的旅店适应商贾经营需要,常兼做货物堆放业务。应试之期和香汛庙会,城内外的不少寺观也临时添设铺位权代旅邸。官方则设有“四方客省馆”负责接待外国使者。接待来京述职的地方官员的场所称“樟亭驿”。适应各类游客的需要,服务业也增添不少项目,诸如有些人陪侍富家子弟游览执役,但不同于今之导游,他们往往须兼作体力上的服役。有一种接近于今之旅游地图、导游手同,名为“地经”,销路甚好,在不少景区景点可以买到,这也足以证明当时旅游业已粗具规模了。

贵族富豪的享受当然不会满足于普通人的游览方式,大多喜欢利用权势占地造园。随着御园的大兴土木,各种园囿兴建的不下百余处。文献记载“南宋临安园林数量之多甲于天下”,宋人有诗描绘“一色楼台三十里”,并非夸张之辞。皇家不但在大内造有御花园,杭城内外还有多处皇家园林,如西湖之南有聚景园、真珠园、南屏园,西湖之北有集芳园、延祥园、玉壶园,城南有玉津园,城东有景园、五柳园,天竺山中有下竺御园,孤山有延祥园。这些御园中,以清波门外的聚景园规模最大,系据有吴越钱镠时的小花园“西园”扩建,拆并西园四周的定水寺、水心寺、兴福寺、法喜寺等9座寺院及附近房舍,其范围南起清波门,北至涌金门,东起流福坊,西临西湖,圈占去一大片景区。与之比照,吴越时零星建点小花园实是小巫见大巫算不得什么。此风一长,豪门群起效尤,计先后建造的各类幽园、雅墅,见于文献的有贾似道的后乐园,张功甫的南湖园,史弥远的半春园、小隐园、琼华园,韩庄周的阅古堂园、南园,陈源的适安园,陈尧臣的陈侍御园,甘升的湖曲园,谢太后故居谢府园,韩世忠的梅冈园,赵伯圭的水月园,卢允升的卢园,……这些显贵富家园林大多能对平民开放,有的平时可以进去,有的春游季节开放,有的重大节日开放,因此圈地虽多,客观上还是为旅游胜地丰富了园林造景。因为园林建筑不能像珠宝细软黄金财富可以任意席卷而走,它们毕竟把山水胜地装点得更加华美。

尤其是一些特色园林,如花家山下的卢园,有文石砌成的池子,水洌而深,

异鱼种集,这就是后人所指的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大佛头西的水月园,水月瀛可俯瞰全湖,周围万柳成幕,允许民众燕游,游人如织。南湖园之大,据说需要游览两三天才能游遍,其中有“竹篱茅舍,宛如田家气象”,为人喜爱。陈侍御园也是一座富有特色的园林,园虽不足3亩,而四面临水,仅一径可通,游人登上园中高楼,犹如身在船中,水烟山碧,尽在朱碧楼台之间,令人油然而生诗情画意。著名诗人赵师秀游园时写下了“何处飞来缥缈中,人间唯有画图同,两层帘幕垂无地,一片笙箫起半空”的名句。足见当时园林建筑的设计艺术水平大有提高。

除了贵族以外,普通百姓有点积蓄的也可自建幽园雅舍。如诗人武衍并非豪门,寓居于清湖河畔,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宅园,却有林池亭竹之胜,门前临水,开窗可借到外景,他自吟:“数方蔬地一方池,吾爱吾庐只自知”;“君欲重来须更待,嫩烟浮动晚晴时”。像这类幽雅纤巧,自成一局的小别墅式园林,当时相当普遍,这无疑是受到杭城造园风气的影响。所以后人盛赞:“西子湖光甲天下,半是湖山半是园”。

这种造园风气还推动了花卉盆景艺术的发展。这类园艺作业虽创始于唐代,到了南宋由于大规模建设园林的市场需求,涌现出一些私人经营的专业性花圃,如西马塍园子仅“斗花”就栽有80余种。《钱塘县志》载:“西湖多市菊者,其种黄者九十有三,白者八十有二,紫者三十,粉红者二十有四,称异种者十有八。近日市中人工以各菊互接,则白间黄、黄间红,尤参错可爱。”可见当时菊花品种的层出不穷,且能嫁接复色的新品种;同样,桃花的品种也极多。由于讲究更新繁殖栽培技术,使各种花卉品种大量增多,这是园艺作业的大进步。这种风俗形成民间普遍重视栽花和插花,节日里家家插花,户户飘香,构成百花争艳的世界。

除了私营花圃以外,无论皇家园林、寺庙园林及私家园林,大多设有专业的园艺人员,对于植物的配置各有一定的艺术特色。百花齐放,使花园城市杭州分外妖娆,以致被爱好旅游者视为旅游“圣地”。

第三节 沟通中外发展国际贸易

杭州本为东南交通枢纽,定都后既成全国中心,辐射面积扩大,区域交流广泛,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运河北通秀、湖、苏、常、润、扬、淮诸州;西通建康,沿江联结江西、荆、湖广,可以直抵巴蜀。海道除可通向沿海各港口外,以杭州湾里的澉浦为对外贸易主要的商港,海外远航来船长年不断。

杭州的开港始于北宋,至南宋时,随着商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造船工业水平的提高,对国外的贸易更加繁荣,直接通贸易的国家多达 50 余国。

由于杭州濒海,比隋、唐、北宋建都于内陆,在海运方面较方便得多;加以南宋偏安一隅,经济上更加需要通过外贸来有所补充,在政策上对外贸积极加以鼓励,所以南宋海外贸易远远超过北宋。市舶司的收入,约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成为一项重要收入来源。高宗时市舶收入 200 万贯,超过北宋时最高额的两倍多。高宗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招徕远人,阜通货贿。通过不断采取奖励措施,对外贸易额逐年增加,形成了“东南之利,舶商居其首”的局面。

杭州市舶务,最早设在城东南面的保安门(候潮门的北面)外诸家桥之南;后来移至城北的梅家桥(今梅登高桥一带)。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直到法物库市舶前,建有“塌房”(仓库)数十所,共计栈屋数千间,专门用来租借给进口商和出口商堆货之用。这些塌房大多四面环水,以防火烛和偷盗,并便于驳船运货。由此可见政府对于对外贸易十分重视,也可透视当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不小。

为了扩大进口贸易,朝廷规定:凡市舶纲首能招引进口货抽解物货累价达到 5 万贯的,可以补官。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杭州市舶纲首蔡景芳招引贩来货物净利收入高达 98 万余贯之多。朝廷为实现承诺,于绍兴六年授予他为承信郎。这对从业人员的积极工作是很大鼓励。

在杭州东面出海口的澉浦建立专门打造出海大船的造船基地。一船海舶

的载重可达 5000 料,约相当于今之 315 吨载重量。水船有如此大的载重吨位,体积极大。大船装货外还可载客二三百人。横跨海洋的船队浩浩荡荡,可以想象比九百年后才出现的哥伦布探险船队,声势要壮大得多。这些船队大多往来于日本、高丽、印度、波斯等国。各种番品南货、珍异饰物、奇葩珍卉,源源不断地运来杭州。杭州的丝绸、瓷器,以及由内地运来杭州转运出口的货物,均可通过澈浦流向国外。这种对外贸易不但可互通有无,岁入大笔税金,而且促进了海内外文化技术的交流,也扩大了城市和国家的对外辐射功能,从而提高了杭州在海外的知名度。譬如南宋杂剧开中国戏曲艺术的先河,在杭州各大瓦子中常有演出,其剧目与舞台演出成为戏曲欣赏与感情陶冶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高台教化”的特殊工具。日本在幕府时代就吸收了这种艺术创造中的实践经验。日本地方的“教化馆”,就承袭了我国教化司的职能。朝鲜、越南等地,也从南宋开始,自南戏引去。又如我国的泥字活版印刷由中国传入朝鲜,若干年后又从朝鲜传入铜字活版印刷,在国际交流中,彼此都有收获。杭州发挥了国际交流的枢纽作用。总之,南宋是杭州都市发展极辉煌的时期,杭州人引以为荣,并可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第四节 13 世纪中期起辐射功能缩小城市化逆转

南宋杭州的繁荣,反映了都市经济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城市性质是商业城市,尽管其手工业已相当发达,但并非生产型城市,城市的基本特征来说,杭州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消费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以及皇室贵胄高官豪门的高消费,其本质是脆弱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亚洲城市的兴旺,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连带关系。”一旦南宋王朝覆灭,全国性大都市的繁荣立即烟消云散,皇室贵胄和中央政府军政人员全部被驱往北方后,剩下的地方政府消费能力势必大幅下降。于是杭州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其集聚功能、工贸功能、旅游功能和辐射功能,全面削弱,城市化之路就立即逆转了。最具体的表现是这个世界最大城市的人口遽降;手工业品产量下降;商贸衰退;市场趋于冷落。旅游业的主要游客赶考的学

子没有了；朝山进香的香客明显减少；来京述职的官员没有了；外国来的外交使节也不来杭州了；随着商业中心地位的衰落商贾稀少。当年首都的繁盛景象一去不复返了！此后 700 多年，杭城再没有恢复到南宋城市化的高水平。

元初杭州由首都降为行省治所，那时省区辖境尚包括今浙江、福建全部和江西东部、江苏南部以及安徽南部，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省会所在地，尚不失为中国东南部的区域性都会。元末面临战乱，原江浙行省分出福建道别立福建行省。明初又分出江西东部、江苏南部和安徽南部，别立一个江南行省。至此江浙行省变为浙江行省，缩为 11 个府，面积不及元初江浙行省的三分之一。加以连续发生兵灾、火灾，尤其是元末的农民战争，明代的倭寇侵扰和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都给杭州带来巨大损失，最严重时人口下降八成，仅剩两成，还能谈什么城市化？另外，明清禁海，“寸板不得下海”，海舶断绝，扼杀了外贸互市之利；运河日淤日浅，故道堵塞，内河运输远不如宋代便利。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杭州城市遽然衰落一蹶不振的原因。

更重要的政治原因，蒙古游牧文化的南下冲击，实施民族歧视，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杭州人概被划入“南人”，列于社会的最底层，尤其是南方文人处境更类同乞丐。城市文化的遭受彻底摧残，严重影响社会进步。

城市的衰落，牵涉到西湖也遭凌虐。元政府错误地认为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佚乐湖山，把西子湖当作误国殃民的祸水，对她废而不治。蒙古贵族本来就重车马而轻水利，《元史·河渠志》对西湖只字不提，当然从来未加疏浚。然而西湖这个城市浅水湖泊周边沙质，山水易把沙土和污物冲进湖中淤积湖底，加上城市的污染，需要不断疏浚整治，历来见于文献的较大治理工程多达 23 次，才维护住西子湖的生命。而整个元朝不治一次，经百年荒废，西湖堤岸坍塌，湖中长满青草，湖底大部朝天，变为平田、野陂，任人分割开垦，几至湮没，呈现极度荒凉景象。

只是到了明弘治十六年（1503），有循良能吏杨孟瑛出任杭州知府，才由他排除万难，对西湖发动大规模整治，拆毁湖中田荡 3481 亩，重新把湖底挖深，结合修复名胜古迹，将苏堤填高三丈，拓宽五丈三尺，两岸遍植桃柳，恢复“六桥烟柳”，保存“苏堤春晓”。同时利用挖起的污泥在西里湖筑起一条与苏堤平行的长堤，堤上自北而南建造环璧等六座石桥，合苏堤六桥称为“西湖十二桥”，后人

称这条新堤为“杨公堤”。经此番艰苦整治,才挽救了西子湖的秀美容颜。

此后西湖又几经湮没,几番兴治,清代最大的疏浚工程要数李卫的两次抢救,还为湖山添加了一些景点。但从西湖的总体而言,是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据地质资料考察分析,宋代西子湖为 9.3 平方公里,明清时减至 7.4 平方公里,清末至民国以后湖面继续缩小到 5.6 平方公里。要想恢复到宋代西子湖的面积和原貌,恐怕是不可能了。

至于点缀于湖山间的上百个豪华园林和密布的民间小园,那是南宋建都特有的历史条件所造成。历史不易重铸,元、明、清至民国的几百年间虽有零星建树,而总的看来园林毁多于建,“半是湖山半是园”的传统难以维持。以致让苏州园林夺取后来居上之势。想吴越国时,苏州园林是在杭州园林化带动影响下兴起的,此后对园林重视保护,故衰毁较轻,值得借鉴。

13 世纪末期以后中国城市化之趋于迟缓,除了杭州首都沦陷的特例以外,还带有全国性的普遍趋势。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是至元八年(1271),5 年后的至元十三年(1276)杭州沦陷。美国城市史专家埃尔文在《中国往古的模式》中认为,蒙古人入侵和明代前期实施锁国主义对外极其保守的政策,是这两三百年中国出现城市化倒退的主要原因,尤其对东南地区影响最为严重。他又说,“大约在 1300 至 1500 年间,由于某些迄今多半还是无法清楚地作出解释的原因,中国经济衰退了,此后恢复得很缓慢”,直接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所以宋亡以后全中国都存在着城市化的倒退和经济萧条时期。直到明朝中叶以后政策调整,经济有所回升,部分城市才有所复苏。

但此后,杭州却始终盘桓于 40 万至 60 万人口的规模,很难有更大的发展。其中破坏最惨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在战后的清同治三年(1864),杭州人口只剩下十多万人。以后靠外来移民(来自温、台、宁、绍、徽诸州)补充,才重新恢复到四五十万人口的规模。

相比之下,邻近地区有些城市却赶超上来了。例如江南地区政治中心为南京所取代,它是明初的首都,永乐后的陪都,清代两江总督驻节所在,政治上的集聚功能远大于杭州。经济地位则被后起的扬州所超越。扬州作为漕运、盐运中枢,资本雄厚的盐商木客汇聚,商业繁荣,消费水平大于杭州。进入近代,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天津、大连、汉口等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面目一

新,尤以上海租界形成十里洋场,呈现一日千里的发展势头,天津、广州紧随其后迅速发展,把杭州远抛在后面。更不用说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都城,为全国龙头,城市发展遥遥领先。遥看国门之外,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各种新型城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港口城市、旅游城市以及国际政治性大都,大批诞生,相形之下杭州昔日的辉煌黯然失色了。

第五节 踏上现代城市门槛

历史进入近代,不少传统城市的功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而杭州显得起步较晚,不能与上海同步。因为杭州有封闭的城堡,外城城墙封住整座城市,内城驻扎着旗营的将军及官兵,十扇城门的钥匙,全部掌握在满洲将军一人手里,朝启晚锁。百姓不能随便进出,缺乏自由活动空间。这意味着杭州人处在满洲贵族的牢笼里,市场无从开放,思想观念也不易松动。因此天朝王国名义上打开国门迈向近代,而杭城封闭陈旧依然如故。尽管杭州在《马关条约》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迫设立日租界,但日本人特别奸滑,不同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敢于在中国大量投资建设,来杭的日本侨民大多为小商小贩,尤以流动的居多;他们有的肩挂布袋,手托木匣,叫卖夏令药品;有的推着小车,带着铁板火炉做鸡蛋卷,现烘现卖;有的挑着担子卖玩具、日用品;有的在街头放映无声电影。拱宸桥一带在开埠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仍是生意寥寥,谈不上市场经济。中型的商店有限,没有一家上规模的工厂。开埠后倒是颓废消极的东西带进来不少:兴办妓院、赌场、鸦片烟馆……最卑鄙的一手是搞黑社会,勾结地痞流氓,发展黑势力,领事馆支持日本浪人为非作歹,公然划拱宸桥为公娼区,公开挂牌卖淫,妓院迅速发展到了200多家。二三等妓女则大批散布于茶馆、酒楼、歌场、戏院、旅社里,直至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在日本浪人带动下,帮会声势嚣张,有些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制裁,只须向日本浪人投贴拜师,清朝官府即奈何他不得。有的匿居日租界,靠日本浪人保护,罪案往往不了了之。由日本领事馆登记创办的《日商杭报》、《笑林报》、《潮声报》等报刊,品格低下,内容庸俗,散布消极思想。总之,日租界在杭州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与上海、香港等地的开埠引进

工厂、公司,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不能相提并论。

杭州城市的发生剧变,起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建立,取代了两千年的王权统治制度,古老的杭州才以此为发端迈出近代化的步子。推进城市近代化的第一步,是光复后拆毁“旗营”,开辟为新市场。旗营是两百多年来压在杭人头上的大石头,教人喘不过气来,它霸占着湖滨直到官巷口一带的杭城黄金地段,破坏了“三面云山一面湖”的杭州城市格局。杭人须绕道越过钱塘门或涌金门才能看得见西湖。妇女过旗营时还可能受到调戏。八旗子弟在杭为非作歹,终年白领饷银无所事事,有时还包庇坏人。一旦推倒旗营,打破这一带的封禁,大快人心。把旗营拆平以后,就地建为繁华的街市,使杭州商业和旅游业得以互相促进,引来不少新式企业,推动了经济文化加快发展,还间接推进社会面貌和社会观念产生变化。这是旧时封建城市模式开始更新的契机。新市场以拓宽的延龄路(今延安路)和迎紫路(今解放路)为主轴,形成一个崭新的闹市区。一下子开出许多大商店,学着上海的店面装潢,一家家五光十色,焕然一新,完全不同于旧式的闸库门式老店。回顾较早开出的新式店铺有新新百货店、建华西药店、陈永泰西木器店、陈沅昌文具店、云飞自行车行、二我轩照相馆、佛光照相馆、华胜镜店、圣亚美术馆、国华陈列馆、大世界游艺场、新新游乐场等。各种新式服务行业,各式国产商品、进口商品,几乎应有尽有。张小泉剪刀等著名的“五杭”名产(杭剪、杭烟、杭粉、杭线、杭纺)也都来闹市区开设分店。这个典型的新市场,一望而知是上海十里洋场的缩影。

湖滨建为6个公园,旅游开始形成产业雏形,带动风景区的相关产业,环湖有西湖、金城、新新、蝶来四大饭店,引进宾馆式设施和管理;还有湖滨、环湖、新泰、清泰第二、聚美、华兴等新开张旅馆。餐饮有知味馆、五芳斋、奎元馆、多益处、天香楼、西悦来、高长兴、楼外楼等大型酒菜名店;还适应大批香客的需求,开出功德林、素香斋等一些素餐馆。至于西餐馆、点心店、咖啡厅、茶楼、茶室更是满街都是,十分闹猛。来杭旅游的主要客源,是来自上海及附近城市的游人,各地朝山进香的香客,省内外的批货客商,其中不乏外商、买办、新贵、文人、阔少,消费能力之强为以往杭州本地人所少见。有不少巨商、显贵、老板、阔老在沿西湖幽静地段陆续建造起星罗棋布的洋楼别墅。商贸功能和旅游休闲功能的交互作用,使市场趋热,人气渐旺,房地产业也勃然兴起,开始显示出新型城

市的繁荣市容。

与此同时,公用事业方面电灯照明、铁路公路、市内公交,以及拓宽马路,筹办邮局、电话通讯设施等相继启动,成为进入近代城市门槛的标志。电线杆木万根,每40~50米装一盏路灯,试灯之日,市民倾城上街观赏,改变了夜间出门提灯笼的状况。但成本过高收费昂贵,百姓负担不起。后经整顿经营业务,健全管理制度,降低价格,才扩大用户。市内交通过去主要靠轿子和人力车。1921年杭州商民合资创办永华汽车公司,经营公共汽车,开始行驶湖滨至灵隐一线,继又增开了几条路线,改变了出门专靠人力车轿的交通问题。长途车开始也以民营为主,如早期经营县与县区间汽车客货运输公司的有在杭经商的徽州人程君瑞等人兼营。以后地方官办的公路线慢慢增多,沟通了杭州与附近各地的公路交通,客运货运都得到了方便。

在此前后,沪杭铁路通车,接着后又拟连接宁波,杭州城站成了铁路客货运的枢纽。于是清泰门内、城站周围,开出许多以旅客为服务对象的商业单位,有城站大旅社、清泰旅馆、聚丰园京菜馆、协兴西菜馆、王润兴饭店、吴山第一楼菜馆、镜花缘照相馆、活佛照相馆等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形成一个以接待旅客、游客为主的新商业区,与湖滨旗下新市场相呼应。在这两个市场外围,南面钱塘边的江干市场和北面运河终端的拱墅市场,都因轮船的通航与轮船码头的新建,而繁荣起来。加上城里从鼓楼至官巷口的传统旧市场,构成一个连接内外的商业网。据1931年统计,杭州共有大小商店10363家,商贸又重新趋于繁盛了,而且赋有一定的时代气息。

杭州市政府的建立,是又一个彻底摆脱旧城市建立新型现代城市的重要标志。市政府始建于1927年北伐胜利之年。国民政府宣布改革地方建置,浙江省政府划出杭县城区和西湖全境,设为杭州市,作为省会所在地。第一任浙江省主席和第一任杭州市长都是喝过洋水见过世面的新派人物。他们的登台,为杭州带来了一股资本主义经营城市的新风。尤其是省主席张静江,作为一位实干的经济界先进人物,亲抓建市工作,又善于筹资,所以杭州建市虽无财政拨款,却能够有力地推动了市政建设和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使杭州城市化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县衙门改为市政府并非只是名义的变换,而是行政体制、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化。

城市基础设施首要的是筹建自来水厂。长期来市民饮用的水源主要依靠井水,全市共打有 4842 口井。但井水不洁,吊桶打水挑着回家极不方便,尤其是万一发生火灾难以靠井水扑灭。因此市民要求兴办自来水厂的呼声很高。市政府一经建立,即通过省政府向卫生部申报,获得卫生部颁给的第一号自来水许可证,说明杭州城市领先于其他城市申办水厂。经费来源十分之九靠发行“杭州自来水公债”及金融抵押贷款等民间渠道筹措;十分之一由政府拨款。经过觅址、征地、设计、论证,然后开工,于 1931 年相继建成清泰自来水厂的进水口、药间、混凝槽、沉淀池、沙滤池、洗沙池、储沙池、调节间、杀菌间、清水池、联络管线、泄水井变电间、进水和出水机房、修理间及紫阳山蓄水池等土建工程,安装了高低压打水连动机、药机、氯杀菌机,这一切新事物,都在边学习边摸索中进行。试水之日,适逢同春坊大火,消防龙头大显身手,数分钟就扑灭。8 月 15 日正式向居民供水,并庆祝水厂成立,欢快之情当有逾于唐代李泌凿井。至 1949 年解放时为止,输水管道总长为 75 公里,每天最高制水能力为 12000 吨,其规模不算大,而当年,从无到有的创举,意义重大,不但满足工业用水,还从根本上解决了市民的饮水卫生。

其次是创办电力事业。先在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基础上组建官办杭州电厂;后官办难以维持,及时转让给“企业银团”,建成闸口电厂,总容量 15000 千瓦,输配电 5000 伏和 14000 伏的两种变电所,成为当时全省最大的电厂,也是江南三大电三之一。

有线电报原先只有 19 条较短的线路,限于省内通讯。1927 年起动工沿沪杭铁路线加挂 200 磅铜缆线路 2 条,400 磅铁道专用线路 2 条,新架沪杭直通电报;又沿京杭国道建起途经湖州、长兴、宜兴、溧阳至南京的京杭直通线路。到 1936 年已增加至 67 条线路,联接邻省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省际电报网络初具规模。

1928 年成立省电话局,筹办长途电话,并改造市内电话,把人工交换式总机改装为自动交换式,于 1931 年改造完成。这是杭州市电信建设史上的一次大跃进。长途电话也以杭州为中心,以铜缆复线,按规范架设,建立 8 大干线,接通上海、南京、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市,沿线设分支局、代办所 300 余处,电话线总长途 8000 余公里,1929 年动工,1936 年完工。在这一完整的省际网络中,杭

州处于网络的中心。

无线电通讯于1927年10月就在西大街小校场(今电政街)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当年12月改为杭州短波无线电台。1930年建无线电总台,填补了有线电报难以通达的空白点。同时期在1928年2月起建立无线电广播台。

杭州邮政向来极为混乱,早在1896年日本人利用在杭州开埠之机,在拱宸桥开设“二等郵便局”,擅自开辟邮路,先收寄外侨邮件,进而争夺杭州商民交寄的国内邮件,公然发售使用日本国邮票,还偷运违禁物品,进行偷税走私,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主权。直到1922年,才根据华盛顿会议决议案,撤销日本人在杭州的“二等郵便局”。但长期来民办代理邮务商店习以成风,也有不少弊端。1928年决定限期取消民信局,但这些民信局联名申诉,一再要求展期停办,拖延到1935年,杭州才全面关闭掉27家民信局,正式实行邮政国营。送信手段由“一条扁担两根绳,肩挑步行百里程”的落后方式,逐步有所改进。到1946年开办了航空邮路,利用笕桥机场的军用飞机代带航空邮件;市内邮政支局邮件改用自备汽车接送。

浙赣铁路和钱塘江大桥的修建,在当时是一大工程,也是杭州人民十分关注的一件大事。动工时初定名为杭江铁路(杭州至玉山),拉开了由省自筹经费的序幕。经费不足,处处因陋就简。为了周转资金,采取建一段通一段,路建到哪里车通到哪里,在运营中回流资金。1930年3月开工;1931年通到诸暨;1933年通至玉山。1934年,由浙江、江西两省,与财政部、铁道部及银行团组成浙赣铁路联合公司,把铁路由玉山通往南昌方向,再进一步与粤汉铁路接通。钱塘江大桥修成后,浙赣路可东接沪杭线,西连粤汉线,北达九江,沟通水运,成为横贯浙、赣、湘三省唯一的大动脉,从而间接通达全国许多地方。这是浙江省主席张静江首倡的一大手笔,也是杭州人民的一大幸事。

张静江一贯主张“发展交通,开发地方”,在他引导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筑路高潮,并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公路网络。他首先开筑杭长线,从杭州出发,经余杭、武康、湖州、长兴,后在江苏境内延伸为著名的“京杭国道”。另一条标准公路是杭平线,从杭州向东,经海宁、海盐到平湖,延伸到江苏境内通向上海,就是著名的“沪杭公路”。然后开筑通向安徽的“杭徽公路”。对杭州市内的道路及近郊公路,加以有计划的整理拓宽,还增修了一些路段,使市区道路与

各处公营、私营支线密切衔接,连为一体。不久,私营小汽车出租业务(的士),也在杭州街头出现。

对水上交通也很重视,他亲自主持设立航政局,鼓励民办航运,在短期内批准了内河轮船公司 173 家,外海轮船公司 60 家。还有不少个体运输户未计入内,对他们也加强了管理。对于企业的合法利益加以保护,如大华航业公司购进报废的飞机发动机,组装为“滑轮”,大大提高航速和经济效益,即批准其专利权,并授予 10 年专营权。

张静江主政浙江期间还为振兴杭州蚕丝业作出重要贡献。1929 年创办杭州丝厂,采用多条式立缫车,生产紫龙牌高勾度厂丝,与日本丝相竞争。同时倡行蚕桑统制,推广良种,禁养土种,蚕茧统一收购,提供机缫,禁缫土丝。大力扶助民营丝厂,如杭州最大的民营丝厂伟成公司,因资金不足,面临倒闭,张静江为该公司发行债券 200 万元,并出面向银行承借,帮助渡过难关,重新振兴。对此,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曾称赞张静江是“有经济眼光的人”。

张静江在杭州的另一大手笔,是首先发起并亲自主持举办西湖博览会(即第一届西博会)。他来浙任职时,正值江浙内战之后,浙江经济捉襟见肘。他看准西湖是个宝,决定用西湖为载体作聚宝盆集聚建设资金。他早年曾在巴黎经商,深知法国创办巴黎博览会宣传本国企业和产品,广敛钱财的经验;他又知道杭州都锦生的一幅唐伯虎古画织锦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独领风骚。况上海办过 4 届国货展览会都有收获,于是决心在杭州西湖创办国际性博览会开中国历史之先河。

他在西博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 12 个字的宗旨:“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并调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宣传,充分发动民众参与。结果取得很大成功——花钱少,收益多,影响大。至今还留给后人启迪,并得到传承和弘扬。

这时期杭州的工业以丝绸轻纺为重点。据 1936 年统计,全市绸厂有织坊 4000 户,机台 14700 台,年产绸货 1150250 匹,产值 411600900 元,直接及间接依附丝绸生产的约 10 万多人,占全市经济中首要地位,为城市工业化起带头作用。当时全市工业共分 26 大类,计有缫丝业、丝织业、棉纺业、棉织业、针织业、漂染印花业、造纸业、制皂业、卷烟业、洋烛业、火柴业、印刷业、电器业、洋袜业、

制茶业、制糖业、制冰业、炼乳业、玻璃业、自来水业、工具制造业等,虽工业化水平不高,而轻工业方面可称行业齐全了。若与清末相比,光绪年间杭州丝厂领有牙帖(营业执照)的仅 76 家,其余行业领牙帖的为数寥寥,不可同日而语了。

杭州的一些新式工业大多从手工业演变而来。运用机器生产始于绸业,虽起步较迟而进展甚快。1912 年杭州纬成公司首先采用由日本进口的提花机,以求改良织物的品质。接着有天章、六章、鸿章、虎林、怡章鸿等厂相继使用电力机,向机器生产迈开了步子。杭州武林铁工厂自制丝织机器供应给丝厂,使各厂缫丝、摇纡和并头络丝、打丝等工序,能采取机械生产,促进杭州丝绸织物在花色品种、质量工效、降低劳动强度等方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拓新绸厂所织绮霞缎,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后运往美国纽约丝绸展览会参展,当场被抢购一空。杭州染织布行业也与丝织缫丝业相仿,逐步从手工木机织布转变为电力机械生产,在生产的方式上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工业原料的更新,也有助于技术的提高。如 1924 年起,杭州开始引进人造丝。其他行业在扩大原料来源更新产品方面,也大多通过试用与混合施用,或逐步更换,来丰富品种,翻新花样,变换花色,为市场增添日益丰富的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杭州推进工业化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一批批从国外留学归来或在国内高等院校深造培养的技术人才。如许潜甫从日本染织专科学校毕业回国后,在杭州保国寺创办浙江公立专门工业学校,针对杭州企业所需的技术,设置染织专业方面的课程,培育出大批实用人才;翌年设立机织传习所,着重培训青年丝织技工,并交流改进丝织技术。朱谋先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国后,先在浙江工业学校任染织科主任,后来发起组织杭州纬成公司,1920 年发展到拥有丝绸铁机 300 台、缫丝车 488 部、复丝车 232 部、职工 1800 人的规模。浙江工业学校机织科副主任蔡凉友,于 1914 年创办虎林公司,到 1920 年发展到拥有织机 200 台、缫丝车 208 部,所产“虎林三闪缎”等产品畅销国内外。胡海秋从法国棉织学院留学回来,与表兄杭州大绸缎批发商徐宝琳合作,在杭州创办六一厂,后又创办福华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赵志诚,联合留日归国的汤拙存、王芑泉等人,创办光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兴旺。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的都锦生,为实现用丝织绸缎织成风景和人物的理想,苦心钻

研,终于试制成功,于1924年在湖滨花市路开设门市部,试销情况良好,就向银行贷款2000元,新建厂房,置备手拉织机100台,招来职工130人进行培训,1927年开始进入营业兴旺时期,每月营业额高达15万元,产品盛销国内外。1929年赴日考察回国后,又开发新产品竹骨花绸伞。金润屏与竺梅先投资改组民丰造纸厂与华丰造纸厂,于1932年以此两厂为核心首创“联营抗日”的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1935年又引进德国成套设备,高薪聘请奥国工程师住厂指导,使国产卷烟纸赶上外国货,中国造纸工业实现从低级纸版水平上升到高级技术的历史性突破。这些事例反映这一时期专业技术人员创业热情高涨,能刻苦钻研,引进外来技术,且富有“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思想抱负,敢于投身国际竞争,是前代杭州人中并不多见的。他们不但为杭州的工业化起积极作用,也为杭州城市化作出了贡献,因为他们创办的企业有的招工几百,有的招工上千,可解决部分城市贫民和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同时产品销售市场,可促进城市繁荣。总之,杭州是在既没有国家投资,也没国外贷款的情况下,纯粹由杭州民间自力更生——首先是靠着民间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和商贸人士,自发地启动工业化的发动机,力量虽小,弥足珍贵。

由此可见发展现代教育加紧培养人才,提高市民素质,是进一步实现城市化的基础工程。杭州离沪近便,沐欧风美雨,得风气之先,求是书院几度改制更名,由求是大学堂而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北伐后改称第三中山大学,最后改定为浙江大学,成为浙江的最高学府,也是杭州教育界的中心。这期间还涌现出不少新式学校,诸如之江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浙江医学专门学校、中央航空学校、省立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省立高级商业学校、省立高级工业学、省立杭州师范学校、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女子中学、杭州初级中学、杭州市立中学。私立中学和教会学校也有办得较好的。如有私立蕙兰中学、安定中学、树范中学、宗文中学、廷筠中学、弘道女中、惠兴女中、安徽中学、杭州初级商校、广济护士职业学校和仁爱护士职业学校等。所谓新式学校,就是清除了几千年来的“忠君”、“尊孔”教育宗旨,禁用清朝学部颁行的八股式教科书,重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的还进行实用的专业教育,因此在培育人才的同时,也有宣扬新风尚的作用。特别是普及小学国民教育,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意义重大。此外,办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国术馆,有助于普及文化科

学知识,转变千百年来颓风。

在封建社会愚民政策下,多数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积愚积弱,杭州也是满城文盲。男子拖辫子,妇女缠小脚,大烟枪杀人,玩赌博荡产,多妻妾普遍,喝花酒成风。缺乏正当娱乐生活,清朝的杭城基本上没有公共文娱设施。那时除了偶然的灯节、迎会和竞渡外,一般文娱多局限于家庭范围,官绅富室逢喜庆才邀杭滩、宣艺人来家演出,以娱宾客,俗称“唱堂会”。光复后移风易俗的头一件大事是剪辫子、禁缠足。接着文娱活动逐渐社会化和受教育的多样化,街上出现了近代戏院和电影院,还有大世界游乐场,民众教育馆、文化馆、博物馆更是引导求知的好场所。1931年在行宫前建造杭州第一个体育场,便于民众锻炼身体和提倡运动竞技。对于禁止纳妾和抽鸦片,屡禁不止;北伐后杭州曾严厉禁烟、禁纳妾、禁赌博,雷厉风行;还推行文明生活,提倡“新生活运动”,盛行过一时,多少起了点移风易俗的作用。

同样在张静江主政浙江的时候,杭州举办两件体坛盛事,影响全国。一件是1929年11月25日在杭州国术馆和通江桥原清代抚台衙署旧址举行的全国性国术游艺大会;另一件是1930年4月1日开始在梅东高桥原清军大营盘基地举行的全国运动会。这两大盛事对全国有很大影响,正当1929年办完西湖博览会以后,一桩接一桩地举办大型活动,对于提高杭州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无疑是作用不小的,而且大大鼓舞了杭州市民参与健康体育活动的热情。这阶段杭州的各项工作大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成为各省会城市的模范。短短几年中杭州为城市化做出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创举。

好景不长 战事毁灭成果

上文谈到杭州市政府建立于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间只有短短10年,杭州市政建设进行较快,新增工商企业甚多,工业产值以年均7%以上递增,社会经济趋于繁荣,呈现欣欣向荣景象。城市人口由1927年的380031人,增至1936年的530042人,九年增长率达40%左右,证明城市化速度相当高。值得注意的是未发现一般城市转型阶段常见的城市病,反而呈现一定的发展后劲。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这是杭州城市在14世纪衰落以来最具活力的10年,也是民国史上最兴旺的10年。只可惜好景不长,日寇入侵,连年战争,使杭

州遭受严重破坏,一切陷于停顿,甚至发生严重倒退。

发生停顾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的因素,张静江是一位具有实际经营能力的经济学奇才,为从事建设殚精竭力,但实际主持浙江政务不过3年半;另几年虽居住杭州,对城建有影响力,但常受保守派干扰,最终被蒋介石排除出了政坛。接替他职务的鲁涤平、黄绍竑辈,都是军人,不重视城市建设,实际上也完全不懂得怎样建设杭州。前前后后主持浙江和杭州的大多是庸庸碌碌之辈,城市化根本未落入这些官僚的视野之中,杭州市容必然难有更好的起色。对照杭州中世纪城市化革命的成功,得益于杭州外部环境长期稳定和内部政策持续不变;而民国时期的城市发展却苦于外部环境动荡、内部政策不能连贯,所以只能昙花一现,功亏一篑。设若具备吴越时的内外条件,张静江想把杭州建为“东方纽约”之梦,从长远来看又未尝不可能实现。

1937年12月24日日军分三路侵入杭州,随即宣布“放假”3天,纵兵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实际上这种暴行在杭城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到处暴露着尸体,由“维持队”收埋的掩埋工作也进行了一个多月。沿江一带损失最重,尽成焦土。

杭城在沦陷8年的时间里,天堂变成地狱。日军宪兵队是残杀百姓的魔窟,既管军又管民,队本部设在众安桥原东南日报社址,并将毗连的民房和附近空地全部圈入:东起今中山北路,南临众安桥,西至井字楼,北接竹竿巷。内设有多间刑讯的密室,用刑极其野蛮残酷。凡被押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除了有的被转往日本做苦工,多数在里面受酷刑折磨致死。宪兵分武装宪兵和便衣宪兵,便衣宪兵四出侦察,稍受怀疑便加拘捕,十分凶险。他们豢养有大批汉奸密探和翻译,其主要头目有所谓“四大金刚”和“五猖使司”,这批认贼作父的败类,全都出身于地痞流氓。武装宪兵分驻杭城所有进出要道、城门口,和车站、码头,对来往行人严密盘查;凡有百姓进出,均须向他们磕头鞠躬,稍有差池,便遭毒打,或纵军犬咬人。

日寇驻浙最高军事机关叫“枪部队”占大学路原浙江大学和省立图书馆作司令部。其中设有一“谍报课”,拥有大批爪牙。门禁森严,阴森可怕。

宪兵曹长黑泽,受权单独成立一支“黑泽部队”,设在西浣纱路28号,专门扮演出城“扫荡”的先头角色。他们绑架勒索沦陷区人民,常用毒刑逼取钱财,

有时用火烧被绑者的阴部，杭人无不为之切齿痛恨，叫他们是“烧毛部队”。

日驻杭特务机关设在青年路青年会中，是日寇在杭实施统治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它向伪省市府、伪军、伪警等汉奸组织派出日本顾问，是控制一切傀儡组织的太上皇。凡伪组织委任大小官员，均须事先征得日本特务机关同意。

汉奸组织名目繁多，先有“维持会”，继改组为“杭州市自治委员会”；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杭州也相应建立伪省、市政府及所属各种机构，其基本任务在于搜刮当地资源、供应军粮和军需品、协助镇压民众的反抗、配合向四郊“清乡”、“扫荡”、维护城市间的交通路线包括水陆运输通道，为日本人效劳。

日军由于兵力有限，只能控制城市的“点”，不能控制乡村的“线”和“面”，便对四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杭州市郊的江干、乔司、留下、古荡、瓶窑、五杭、泰山、东塘、凌家桥、占驾桥、星马桥等乡镇，几经“扫荡”，屋舍尽毁；毁后搭起临时棚屋，又会再次遭受破毁，受灾严重的乡镇往往保存不住三分之一，灾情遍地，惨不忍睹。日军曾在乔司遭抗日游击队袭击，被打死了数十人，便采取报复，屠杀镇内无辜人民 1600 余人，焚烧房屋 2000 多间，顿时成为荒无人烟的废墟。事后有人来收拾尸体集中埋葬，立碑曰“戊寅公墓”（1938 年 2 月 17 日屠杀）。玉泉马岭山先后被杀同胞万余人。这类“千人坑”、“万人坑”，四乡和附近各县到处都有，无法全面统计牺牲的人数和损失的财产。

日军为了害怕交通沿线林木背后有人掩藏，下令将铁路、公路、运河沿线的树木、竹林和房屋，全部砍去和拆去，免障视线。军车上和军船上配有机枪，远望有可疑人影随即扫射。沿路遇有乡镇，经“扫荡”后用毛竹圈成竹城，在竹城内编制保甲，随时清查户口，旨在消灭抗日分子，并严密控制物资。于是城乡隔绝，乡村荒废，城市冷落。

当时生产停废，剥削沉重，税收繁多，各种摊派任意增加，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加以物资供应紧张，腊烛、肥皂、针线、电池、煤油之类日常生活用品都成为紧缺物品，人们能吃上蔬菜淡饭、穿上件士林布长袍就算是最“优裕”的生活享受了。

日寇就地征派给养，常以扫荡为名劫掠柴米、牲畜、鸡鸭、直至衣被和家具，习以为常。同时实施经济统制，对粮食、油、盐、丝、茧、棉、麻、纱布、绸缎、呢绒、肥皂、煤油、纸张、火柴、砂糖、卷烟、医药用品、化工原料、五金器材、竹木柴炭等

等,均以满足军需为名强加统制。凡对统制物资需要搬运时,必须持有日寇军部所发“搬出入证”才能运经卡哨。否则以走私论处,轻则没收货物,重则拘捕或枪杀。商品经济几乎完全被扼杀了。

为了加紧收割,日伪广泛推行低价收购政策,以规定的低价收购农产品和金属物资。为了建造军营、炮垒、军用公路桥梁,滥伐山林树木。杭城附近山坡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余杭塘堤上的护堤林都是有百年以上树龄的大树良材,也被一一砍倒拉走。

毁坏工厂更加严重。日军进驻杭城后,把许多工厂占为军营,如崇裕丝厂、武林头祥纶丝厂、祥符桥惠纶丝厂、拱宸桥纱厂、塘栖大纶丝厂等都被占停工,机器设备均被拆卸运走,无偿地征用。厂房也大多遭到破坏。以致杭城的工业生产普遍陷于瘫痪。所有工矿企业、交通运输、银行、仓库堆栈之类,几乎全部置于“军事管理”的控制下。极少数工商企业所生产产品为日寇需要的,也往往以“日华经济合作”的方式进行搜刮性榨取。如小河的华丰纸厂等以“合作”名义生产资敌。

更狡诈的是强迫使用“军用手票”。由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发行军用手票,名义上规定与日币等值,但不准兑换日币,因为这种军用手票是毫无准备金的。用这样的军用手票收购物资,等于无偿掠夺,使民众无形中遭受巨大的损失,刺激了物价的飞涨,形成漫无止境的通货膨胀。

除了经济掠夺外,有时还直接拉伕,逼民众服劳役,分文不给劳务报酬。日寇为建筑防御工事,造碉堡、修军用公路及搬运军用物资,都用拉伕方式强迫民众去做苦工,常见成串的民工在日军的刺刀逼迫下上路。

沦陷期间的杭城,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原有城市基础设施得不到维修而老化,有的遭受硬性破坏。譬如重型的军用汽车和坦克车,在城市街道上驰驱,横行无阻,把路面压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从不修理。所以经过长达8年的破坏,整个城市破败不堪。据说连玉泉池里的鱼也被日军捕抓吃光,真是竭泽而渔!所有景区景点,被砍伐竹木,损毁古迹,都可想而知了。所以杭州之被称为“破烂的城市”,实在是从日军占领时期开始了的。

沦陷8年,是长达8年啊!杭州城市史上的这段苦难日子,不堪回首。1945年,日军侵略的苦难刚宣布结束不久,紧接着,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于是

开始了全国性的解放战争。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中,杭州不可能平静地进行恢复工作。举国通货膨胀,失业率高张,杭城也像各地一样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还有征兵拉壮丁。“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此起彼伏。人民困苦,消费不振,工厂普遍资金短缺,有的因严重亏损而倒闭。有的业主抽走资金去了香港投资,市场不景气。1948年杭州全市主导产业丝绸产量下降到50万匹,仅及抗日战争前夕的五分之二;全市布厂开工率更只达到20%,不及抗日战争前产量的十分之一。茶业开工率只是战争前的四分之一。武林烟厂因亏耗殆尽而歇业,影响所及有5家较大的卷烟厂接连倒闭。牛乳业因鲜奶销不出而宰杀掉四分之一的奶牛,西湖炼乳公司被迫关闭。……随着一家家企业的关闭,工人大批失业,市场更形萧条。在大萧条中,市场机制中的投机性行业乘机兴风作浪,畸形发展,使黄金、银元、粮食、棉花、棉纱成为主要投机对象,杭州社会呈现极不正常的“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的怪现象。高利贷的盘剥,官僚资本的控制,洋商的排挤和洋货的充斥,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正常运作。经济基础既遭摧残,上层建筑面临崩溃,城市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危机深重的状况下,杭州只有迎接解放,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恢复的生机。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社会内外环境的稳定为实现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杭州较长一段时间处于社会动荡状态,经济文化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而退。这就是抗战开始以后12年城市化倒退的根本原因。杭州城市刚从旧式的封建框架里摆脱出来,站到了新式城市的门槛上,却因战事因素而发生“进一步、退两步”的境况,这就是新中国诞生后重建杭州所面临的挑战。

第四章 天翻地覆中的城市变化

第一节 千头万绪的城市改造任务

杭州上千年的城市文明,证明这里自古以来是人类理想的栖息地,利于繁衍发展,它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列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并称为七大古都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这不光是一份荣誉,而且是当代城市研究的一部宝典。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语重心长地解释历史与当代的关系,他强调说:“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他把历史和当代视为密切相联的组成部分。他为了更好地治理当前国政,还特地邀请来三位历史学教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为政治局委员们讲解 15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不像一般干部学历史就只注意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19 世纪鸦片战争、20 世纪十月革命;胡总书记却以更深远的历史眼光,往上追溯根源,力求探索清楚历史的脉络。(详见新华社北京 2003 年 11 月 25 日电,各级党报都于第二天的头版上发布这条消息;接着还有报纸报道采访主讲人钱乘旦教授的访问稿)

对照英国大科学家李约瑟教授在巨著《中国科技史》中所指出,中华文明曾领先于世界 1300 多年,只是从 15 世纪起一步步落后了。为什么 15 世纪起中国由先进转变为落后? 这变化的历史规律,自然与当代世界发展大势有一定联系,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央领导之重视这段历史,在政务繁忙中加以认真探讨,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杭州城市有过辉煌的历史,先后三度处于长江三角洲中心地位;良渚文化时期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方国的“都城”,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唐末五代之中世纪城市化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南宋达到古代城市化的巅峰,更值得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近代城市化也曾领先于周边城市,显示活力,取得不少硕果,可惜因战争受挫而中断,值得深思。至于元、明、清杭城的长期停滞,也是 14 世纪以后的历史问题,值得联系中外演变的历史格局,进行比较研究,作深入的思考。

无可否认,18 世纪兴起的西欧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加强了城市人口的集聚功能,从而推进了世界性的“近代城市化”。这里只称之为“近代城市化”,而不附和流行的所谓“城市化始自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说法。因为公元前几百年就发展成熟的雅典、罗马等城市的历史,客观存在,并非对后世毫无传承关系。虽然遭受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破坏,但通过 14~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雅典、罗马的古典文化和城市文明。较典型的如明显体现于 15 世纪发展到全盛时期的地中海商贸中心城市威尼斯城。至今在这座城市里仍然可以随处看到古雅典式和古罗马式的建筑,散发着古代城市化遗留的气息。15~16 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的弘扬,排除迷信,个性解放,人人为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奋斗,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开辟了市场,推动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逐渐形成,涌现出一批中小城市,结成城市联盟反对西班牙封建专制统治,迫使西班牙承认其独立,推动了这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称这次革命是后来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型,也间接影响到工业革命。所以工业革命由多方面因素促成,包括各种近代科学的发展,促使西欧国家以各种新的发明装备自己;重商主义的盛行,新大陆的发现,海外市场的开拓,殖民运动的兴起,然后引发工业革命,五洲震荡。而封闭的中国对于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动一无觉察,如同井底之蛙,以致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严重滞后。这并非一城一地的落后问题,而是整个国

家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几个紧要关头跟不上世界潮流。

元、明、清以来,我国旧制度始终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解体,以致近代城市化比西方滞后了一个半世纪,直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后来本国资本的逐渐发展,才开始催化了一批近代工商业中心。19世纪中后期还只有上海、广州、天津等个别城市先走一步。杭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城市化”是20世纪初才开始起步。更可惜的是杭州这段“近代城市化”的黄金时期不过短短30余年,便为战争所淹没,在社会动荡中一蹶不振了,因而为接管这座城市的新政权留下一大堆的历史包袱。这些包袱主要由战争造成,但也与城市化水平低下有关:

首先是物资供应奇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1949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4.79亿元,城乡人民人均166.3元;粮食产量45.75万吨,人均158.8公斤。城乡交流不畅。解放军进驻杭州时,粮食缺口达15万石,合2250万市斤。杭州解放那天每石大米售价为4银元,一星期后的5月11日已飞涨一倍半,每石售价达10银元。煤也紧缺,电灯厂的储煤量只能维持40天,火车燃料存量只能运行7天(杭州开往上饶的浙赣铁路线)。全面清理仓库物资,金银财物极少存留,都已被国民党军政人员撤退时运走;接收物品报单中仅有药品、器材、布料为数略多,生活必需品储存不足。

二是百业凋零,不少工厂在解放前半年内已陆续停工,有的在解放后停工、半停工或怠工。杭州本来是个商业都市,据1937年统计市区共有大小商店14611家。但经战事摧残后,始终未能恢复元气,至解放时也只能达到9200家,比1937年减少4400多家。即下降50%左右,且店的规模大多缩小。由于行业结构畸形,大多是纯消费的商业,有的依赖于旅游消费,有的依赖烧香客消费,有的依赖官僚地主消费,有的依赖替上海洋商倾销……一经解放,市场变了,官僚地主跑了,烧香客不来了,寺院也散了,旅游业萧条,而供应农村或工业的商业为数寥寥,宏观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旧的商业结构已不能适应。工厂的生产结构也有待调整,过去生产高档商品、迷信商品、出口商品、旅游用品,都已不再适销;加以海外市场被封锁,出口产品出不去,进口原料进不来,市场必然萎缩。投机性强的行业当然受到更大的打击。于是工厂、商店纷纷倒闭。纱布行庄垮了70%;银钱业40多家只剩下七、八家;银楼垮掉100%;缺乏独立经

营能力依附于上海经济的一些分厂分店也相继歇业。最可怕的是丝绸业和纺织业占杭州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68.8%，约有 10 万工人是依靠丝绸业吃饭的，而过去的丝绸产品以出口或供应高档消费者为主的市场发生解体，整个行业生产严重衰退，如果不能采取措施应付危局，势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至于那些生产木鱼、锡箔之类迷信品的企业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了。自旅游业衰退后，织锦、杭扇、杭伞、剪刀之类杭州名品，也很不景气了。总之，革故鼎新之际市场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

三是大批的城市闲散人员急需疏散。杭城内尚留有 50 多万人口，其中生产者及跟生产有关的人口不及半数，面对这座消费城市，要在短时期内把全城半数以上过去从来未曾参加生产或无机会生产的人口，在城里安排工作，或疏散他们离开城市，下乡去参加生产劳动，这无疑是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四是户籍极其混乱，居民成分复杂，急待整理。如核查发现有漏报的黑户 4207 人，有户口在杭而人不住杭城的 26714 人，各种迁移不报的 16323 人，家虽在杭城而个人未报户口却住在家的 1139 人，登记户口与事实不符的多达 99725 件。清查中发现逃亡地主 275 人，帮会分子 1312 人，无业游民 99 人，小偷惯窃 182 人，妓女暗娼 393 人，以赌博为生的赌徒 530 人，金银贩子 40 人，贩吸毒品 231 人，来历不明 33 人，生活来源不明 20 人，拐骗敲诈流氓 13 人，造谣破坏分子 30 人，冒充公安 3 人，伪造印信 15 人，制造炸药者 15 人，反动党团骨干 4226 人，匪特 245 人，反动道会门骨干 1583 人，日伪分子 58 人，家属在敌军者 10 人，其他可疑分子 850 人。旧社会留下来的问题非短期清理得完的。

五是工人失业状况不断加剧。城市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失业现象本来并不奇怪，但像杭州解放初期这样造成市区总人口 1/3 的劳动者失业，实在超出了城市的承受力。其直接原因是大批企业关闭。自 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 2 月的三个月中，市区原有大小工业企业 3172 户，相继关闭 1150 户，只剩下 2022 户维持生产。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自旧城市积累所致。据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杭州市委书记谭震林于接管杭城后第 12 个月在《杭州市工会干部与工人积极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目前城市所发生的情况是工厂商店倒闭歇业，大部分工厂减产，工人失业不断增多，仅春节前后的二月份就增添失业人数 3000 多。从 1949 年 5 月至 1950 年 4 月合计，解放 12 个月来新失业的工人已有

14000 多人。若连同解放前已先失业的人一起计算,全市失业者共达 170000 人。对照《杭州年鉴》(1987 总述)记载:“失业人数达 17 万人,约占市区总人口的 1/3,劳动人民极端穷困。”谭震林书记在分析造成工人失业增多的原因时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旧社会旧城市对劳动者过度剥削,人民的购买力降到不能维持的地步。过去的虚假繁荣,是靠着畸形的城市结构维持经济运行,譬如依附于大都市、出口业、富人享乐靡费、迷信活动烧香拜佛之类,以及投机者买进卖出踢皮球,看似热闹,其实并非健康的购买力。这是旧城市造成的,解放后一步步暴露出来吧了。健康的购买力主要应来自城乡广大的劳动者,这种基本的购买力会慢慢苏醒的。他揭示了历史包袱的真实因素,需要经历一段转变过程,才能逐步缓解矛盾。

六是工业水平过于低下,工业结构比例失调。1949 年杭州市区内工厂规模满百人以上工厂总共只有 33 家,大部分为个人经营的小厂、手工场和手工作坊,生产设备原始简陋,机械化水平很低。固定资产全市工业企业原值总计仅 3030 万元,1949 年全年工业总产值为 1.23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 25.67%,还远低于农业的产值。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全市除了电厂和几家从事简单设备维修的小工厂以外,基本上没有重工业。1949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 96.2%;重工业只占 3.8%,微乎其微。而轻工业中各门类间也不成比例,如丝绸、棉纺为主,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68.8%,其余 24 种门类总共合计只占 27.4%,只有卷烟、肥皂、火柴、造纸、茶叶加工等少数几家厂稍具规模。而且生产的原料、材料、燃料的配置都不充裕。

七是物价波动,投机活跃,场外交易控制产业,对市场运营起破坏作用。物价狂涨是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爆发的普遍现象;抗战胜利后曾间歇平疲,内战后期重又发生长久狂涨。杭城的物价波动常与投机的活跃产生联系。这种破坏财经的状况,延续到解放以后。1949 年 5 月解放后,杭城连续发生三次涨风。第一次是由银元卖买推动涨风;第二次由米价波动引发全面涨风;第三次由纱布领导,涨风持续最久。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解放前后都以银元唱主角。尽管从解放之日起政府就宣布“人民币是唯一合法的通货”,但由于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代多年的币制混乱,使民众对政府发的货币产生不信任心理,因而较长一段时间里杭州市场上仍普遍把黄金、银元和食米当作货币来使用,严重地阻碍

着人民币进入市场;而金银投机又助长了物价的涨势,对财经起破坏作用。同时地下钱庄、私营行庄常经营非法的放款业务。有些商人向行庄高利贷款,经营赔了本,有的逃跑,有的自杀,有的关张歇业,有的卖房破产。杭州传统的交易场所,有所谓行业茶会,如有棉纱业茶会、布业茶会、人造丝茶会、粮食市场等投机交易场所,解放后,这些市场表面停顿了,实则改变形式,名亡实存,进行有组织的场外交易,还发挥着投机交易控制产业的作用。这些都不利于生产的稳定和市场的完善。

八是反动道会门、社会黑势力、地痞流氓结合散兵游勇,威胁城市和郊区的地方治安;农村封建势力猖獗,阻碍城乡的沟通。反动道会门有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等组织,不仅专事毒化百姓,聚敛诈财,妨碍生产,还散播谣言,毁谤政府,甚至阴谋暴动。一贯道在杭州基础较为深厚,并与全国许多地方有联系,道徒数量甚多,市郊良山区、彭埠的有些村落全村人口60%以上参加一贯道。群众迷信被骗入道,地霸匪特掌握领导权,道中有道长、点燃师、保引师、坛主、办事员、讲道员等名目,骨干分子相当顽固,有的拒不认罪,绝食对抗。刑事案件频发,一年中发生3976件,其中有持枪抢劫案18件;盗窃形式多种多样,以“闯窑”、“抬子”和扒窃为最多,妓女、舞女也很常见,聚赌、吸毒屡禁不止。社会黑势力发生过组织20多人攻击派出所的事件。

九是文教卫生基础薄弱,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1949年接管到的医疗机构仅有杭州省立医院、省卫生试验所、省防疫大队、市民医院、传染病院、浙江病院以及4个区级诊疗所,(两家教会医院推迟一步接管),其他卫生机构只有屠宰场、清肥所、清洁总队各1个,规模都不大。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总共只有3500人,缺医少药问题突出。对商业卫生、工厂卫生、学校卫生、食品卫生管理不力;对于私营医事职业人员只办了登记完全谈不上管理。最落后的是农村卫生工作和城市粪便垃圾污水的处理,家家户户清晨倒马桶等粪便车,用手工拉往郊外,给农民作肥料,很少使用抽水马桶的。国民教育远未普及,成年人中多文盲,学龄儿童失学现象普遍,由于正规的学校教育自1912年(民国元年)才开始推行,至1937年因沦陷而中断,1945年恢复措施不够有力,1949年接管的公立小学仅68所。零星的私立小学大多不够正规。社会教育市区有民众教育馆1所,职员14人;郊区分设民众教育馆4所,每处职员4人;教育实验区1所仅设

有教育辅导员 1 人。戏院、电影院、大世界等娱乐业,作特种行业管理,不作文化事业管理。图书馆市级仅有儿童图书馆,职员 4 人,图书不多,较上规模的唯有省级的浙江图书馆。1949 年接管的公立高等学校只有浙江大学、医专和艺专三所,总计职工 1459 人,在校大学生仅 2181 人。中等学校及高级职业学校(即中专)12 所,总计职工 875 人,学生 4668 人;另有一些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规模都不大。杭州市的文教事业如此而已,与邻近的大城市上海、南京相比,较为落后。可见素称“文化之邦”的杭州文教事业所受压制与破坏实谓严重。

十是园林城市的美丽环境遭受损坏。本来的青山绿水,遭日军乱砍滥伐后西湖诸山变成童山秃岭;长年失于疏浚,湖水污塞,封草成片。市内树木大减,行道树总数降至 4144 株。道路大部被压坏,晴天扬灰土,雨天积泥水。原有的 9 条公交线,公交车全部停驶了。寺庙园林年久失修,大为减色。城区民居,大多五木落地,泥墙板壁,小瓦屋面;使街市显得陈旧破败。住宅总量 391 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4.15 平方米,其中泥木结构占 70%,砖木结构占 28%,城市形象破烂,不再像往时的“地上天宫”了。

旧城市给新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虽然沉重,但并不可怕。无非是医治战争疮伤和改造不合潮流的陈旧体制。试看日本的东京、德国的柏林、意大利的罗马、法国的巴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都是在战火中成为废墟,战后迅速重建起来的。世界大战中受到破坏的岂是杭州一城,从西欧到东欧,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中东到非洲……多少城市严重破坏后又得到重建,而且城市化的速度反而更加快了。国际上城市间的竞争处于同样的起跑线上。

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当代城市化”是 20 世纪中期开始的。西方世界肇始于“二战”结束,社会经过几年恢复工作,逐渐复苏,走向繁荣,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由工业化步入信息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综观众多的西方城市,战后在废墟上白手重建,以较快速度平地起高楼、发展大生产,靠的只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科技知识,高水平的劳动力素质,工业化的管理能力,市场化的有效机制,归根到底一句话是优化人力资源。其历史遗产的源头在于 15 世纪起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以及长期培育起来的重科学、重教育、重工艺、重经商的习俗。这就是西方城市深厚的发展潜力,抢占领跑的先机。

应当承认杭州的人力资源,在教育水平、科技知识、劳动力素质、管理能力等方面,与西方城市存在差距;市场运作体制也不如人家灵活。不过杭州拥有自身的优势,有能力摆脱掉历史包袱;过去创造过辉煌的历史,便是最好的明证。只要重振吴越文化的优良传统——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巧于创新、群体创业,再加上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学人之长为我所用,扬己之长趋利避害,缩短差距当非难事。

杭州人最可贵的有一份自信:美好家园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理想的栖息地,良渚文化的诞生,中世纪城市化革命的成功,长期来园林化经验的积累,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其他地方所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以西湖为中心的自然资源,精致和谐,生态环境优越,更是得天独厚的珍贵资产。所以在挫折以后,用清醒眼光审视半个多世纪来与同类城市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状况,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会增添信心。

改天换地 整顿政治秩序

人民的杭州诞生于 20 世纪上下两半期转折的关键时期——40 年代末。这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的变化,而是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这也不是一般的历史时期,而是世界性的“当代城市化”启动之时。在这伟大的时刻,杭州新旧政权作了历史性的更替。

新杭州首要历史使命是通过顺利接管,保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城市的改造、恢复和发展。

接管工作分 6 个系统进行:政务系统、文教系统、财经系统、工业系统、公安系统和军事系统。由于接管工作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所以有条不紊,完整接收,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旧政权的档案资料、户籍图籍、电厂水厂、通讯设施、交通设施,以及部分库存物资、机密资料和重要器材,都较完好地保全下来,有利于接收后开展正常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早在解放军进驻杭州前一个多月就颁发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组织)根据指示作出周密部署,依靠地下党员、工人群众和各界积极分子,深入调查摸清敌情,组织护厂护校护仓护路护大桥的大量活动;加以大军来得及时,使杭城的解放和接管一切顺利。

首要的是建立政治秩序。迅速解除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非法武装；收缴隐藏的武器；下乡剿灭匪特，打通城乡交流的障碍；破获各种潜伏组织，缴获其电台、电器材料、电码本和手枪；明令一切反动党团及其有关组织停止活动，进行登记，加以控制。取缔反动道会门，逮捕其首恶，解散其组织，对坛主以上骨干进行登记；启发被蒙骗的群众控诉、诉告，号召他们自动退道。同时收集其非法活动资料，揭发其阴谋和罪恶事实，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使民众免受欺骗。对于黑社会势力，打击要犯，瓦解其组织，控制其活动。当社会调查全面掌握资料后，进行统一部署，组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对全市可疑分子进行一次大搜捕，从而有力地摧毁了反动派赖以复辟破坏的社会基础，为社会安宁创造了条件。

移风易俗 整顿社会秩序

整顿城市的社会秩序，明令禁毒、禁赌、禁偷、禁盗、禁嫖、禁聚众斗殴。接收救济院、感化传习所。成立杭州人民保育院，收容街头的流浪儿，加以保护教育，免受坏人利用，并改造其小偷小摸的恶行。由公安局建立杭州市劳动教养院，收容惯窃、扒手及妓女、暗娼。由民政局设立杭州市人民劳动院收容乞丐。两年中经过4次大收容，共收容小偷3000余人，乞丐2000余人，妓女数百人，除将其中一部分遣散回原籍外，其余统一安置在专门为他（她）们新建的福利棉织厂、五云山农场、第一精洗麻厂等处参加生产劳动，使其接受思想改造，学会生产技能，以谋得正常的生活出路。对于跳舞厅之类的滋生腐败渊藪，勤令停业。对于娱乐、印铸、旧货、旅馆、茶馆、照相、游船等特种行业，加强行政管理，由公安与工商部门相配合改组旧公会，在加强老板负责制的同时，联系职工会依靠积极分子进行民主管理，鼓励他们对盗窃、造谣、贩毒等违法行为的检举密报，有助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过收容教育、特种管理，结合舆论宣传，综合治理，终于使旧社会遗留给杭州城市的卖淫、嫖娼、赌博、吸毒、强盗、扒窃、聚众斗殴、好闲恶劳等丑恶现象，基本上取得了禁绝的效果，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同时加强社会基层组织的改造和建设，取消近千年来的保甲制度，新创居民委员会，健全社区治保，做好户口登记与编查工作。社区与派出所相配合，加强社会秩序与交通秩序的管理，开展持久的爱国卫生运动，

监督门前三保。如此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到变革民俗、安定社会、保障治安,效率之高,是以往旧城市所无法达到的。

稳定物价 整顿经济秩序

整顿经济秩序是比建立政治秩序和整顿社会秩序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物价的飞涨,在杭州解放前夕早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但到了解放之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刮起物价暴涨的风波,对新生的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民间纷起谣言:共产党善于打天下,不会治天下。国民党垮就垮在金元券危机。相当多的民众对于人民政府发行的人民币也持有怀疑观望态度,不够信任。于是投机分子炒作银元、黄金,囤积大米、纱布,刺激黑市翻滚,助长物价波动。从表面看物价风波由金融市场紊乱所造成,其实深层原因在于货源不足,供求失衡;以及货币发行是否适量,财政收支是否平衡。为此政府果断地作出决策,公布《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杭州对此不但坚决贯彻,而且灵活执行:

一是精简节约,平衡收支。经过组织定编精炼机构,把裁减的人员有组织地动员下乡开展农村工作,既帮助农村发展生产,克服灾荒,以供给城市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也节约了城市的开支。同时提倡艰苦朴素,节衣缩食,从上到下,以身作则,克服奢侈,反对浪费,一时俭朴成为时尚,浮华成为可耻,铺张浪费要受到纪律制裁。“三反”就是在这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当时克服经济困难的有效法宝。

二是城乡互助,区域交流。组织了几次城乡物资交流会和商品交易会,活跃市场。组织工商界同行业间的供、产、销联营,组织各种合作社,引导互助,重视原料收购,供应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结合土地改革大力发展郊县的供销合作社,以解决农产品的出路,并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对于城市的紧缺物资,通过上级调拨,加强区域间的互通有无,畅通物资交流,缓解矛盾。

三是全面清查库存,做好清理资财工作。成立杭州市物资清理委员会,工作布置分为动员准备、清理造表与接收物资三个步骤,有序进行,结果清理出有用资产达10亿余元,充实了财政收入,且物尽其用,减少了浪费,缓解了经济困难。

四是接管属于官僚资本或部分属于官僚资本财产的工厂40家,加以整顿,

作为国营企业的基础。充实力量,谋求发展,安排就业,增强经济实力。

五是健全财务制度和严格财务管理。先后建立起较完备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进城前财务管理任意性大,游击习气漏洞较多。推行新制度后,检查出不少过去的弊病,如有的部门对收入不及时入库,移垫他用;有的自收自用;有的随便开白条收据;有的不按预决算执行,先斩后奏;有的临时费的开支侵占了经常费的开支;有的不重视核算,以致生产成本过高。……以自来水厂为例,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后,漏水量逐月减少,由 41.6%降为 28%;每度水的购电费由 478.08 元降为 416.77 元;薪工由 626.17 元减为 547.51 元,管理费由 223.24 元减为 160.21 元。

通过清理资财,增加财政收入,建立财务管理制度,严格了会计审计制度,实行了统一票照管理,收入及时缴库,节省财政支出,保证了行政经费的供给。在地方经费上维持了市政建设最低的必要开支,财政收支得到平衡。加以物资调剂交流趋于顺畅;同时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力度,如破获投机案 1117 起,封闭地下钱庄 17 家,终于遏止住投机之风,稳定了金融市场,稳住了物价,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这样,杭州这座新城市经受住了空前的经济困难考验,结束了多年来通货膨胀的痛苦局面,以两三年的努力解除了长期积累的最大历史包袱。

第二节 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摆在中心位置

救扶失业 安定工人生活

市领导明确进城后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依靠工人阶级,要千方百计救助失业工人,帮助其就业。在旧经济改组过程中,失业工人曾多达 19878 人,政府在介绍就业、转业、复业的同时,组织以工代赈,吸收部分工人参加一些市政建设项目,还发动生产自救。暂时没有出路的,给予必要的救济,或动员还乡生产。重要的是为提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便让更多的人得以就业。为了促使工厂开工、商店开业,市委决定调整税收、调整价格、调

整经营范围、调整资金周转,让私营工商业者有利可图,迅速开工开业。同时实施劳资两利政策,以利恢复发展生产。

引导企业 改变经营方式

为了引导企业改变旧的经营方针与经营方法,专门成立了一个生产改进委员会,号召和组织私营工商业自我改造,改变经营方式,改进生产技术;同时发动工人阶级树立新的劳动态度,主动团结资方,共同面向生产。不少企业的资方认识到不发展生产就毫无出路,纷纷提出企业经营的改造方案,开始着手整顿,并通过劳资协商获得工人支持,合理组织劳动。有的资方增添资金的投入,改进机器设备。如丝织业各大厂扩增机台,提高生产率,精简臃肿的机构,将部分职员充实到生产第一线。缫丝业在生产技术上有很大提高,1949年生丝品位平均在D级以下,有40%不合出口标准;至1950年7~11月份产丝2200担,产量增加且质量提高,A级以上的占12%,B、C级75%,D、E级减少至13%,总计达标的在80%左右。在机械设备方面也有改进,开源、庆成、三益、天章等丝厂新装立缫车共146台。第一纱厂由于技术与机械的改进,纱、布的质量都有了提高,20S纱的锭扯由1月份的0.497磅提高到12月份的0.754磅(每20小时)。商业部门也有改进,如经营高贵绸缎的绸布业,改变了经营方针,大多改为售卖大路货的棉布,以适应广大民众需要。专门产销高级消费品、迷信品及投机性的工商企业纷纷转业,计工业转业的有丝织业53家,锡箔业2家;商业转业的有菜馆、土烛、卷烟、糖果、棉纱等业共47家。组织联营机构32个,参加厂店单位达870家,联合后由于资金集中,信用提高,易于取得公私银行贷款,解决资金周转上的困难,在加工订货方面也可拓宽渠道。自愿联合经营后,减少了互相倾轧、恶性竞争的现象。联营单位往往分工合作,扩展了经营范围,如丝织产销联营公司成立后销路可远达北京、天津、汉口、济南、西安、重庆等地。粮食联营公司组成后,有能力远向长沙、南昌、鹰潭采购食米供销本市,促使货源充实。部分中小型工厂联营后,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开支,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孤军奋战的风险。

鼓舞热情 开展生产竞赛

配合抗美援朝,鼓舞工人们爱国热情,开展生产竞赛,很有成效。计自觉地

投入爱国主义生产的有两万多人,鼓起生产热潮。一般职工生产积极性也明显提高,交通公司、闸口发电厂、开源丝厂、第一纱厂、杭江纱厂、新华印刷厂等公私企业,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产量质量上打破了原先的生产记录。如杭江纱厂、第一纱厂、长安纱厂接受了突击增产任务,广大职工发挥高度爱国热忱,克服了机械设备及生产过程中的种种困难,超额完成任务。他们在胜利完成这次突击增产任务后,接下去自动开展经常性的生产竞赛,因而产量、质量均持续提高。在爱国主义竞赛中,密切了工人与职员的团结,也改善了劳资关系。

鼓励民众参与,大办合作社。全市共建立基层合作社 55 个,发展社员 117647 人,占全市人口的 22.3%,筹集总资金为 1831500 万元,其中社员股金 46.8%,协助国营经济密切了与个体经济的联系,价格掌握上一般低于市价,一年中可减除中间剥削 46 亿余元。同时扩大了集体所有制的队伍,也加强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

改造新建 缔造工业基础

经济形势的好转,止住了解放初期大批关厂歇业的现象,开工复业的企业逐渐增多。在进一步恢复过程中,本市工业通过接管、改造和新建,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基础。同时又通过供应原料、加工定货、推销成品、发放贷款、发展公私合营企业等办法,大力改造和扶持私营工业,在短短 3 年时间后,杭州工业渐有起色,全市工业总产值从 1949 年的 1.23 亿元(当年价)增加到 1952 年的 2.8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 20%。为了向工业化方向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前后新建和扩建了浙江麻纺厂、浙江印染厂、杭州棉纺厂、杭州纺织机械厂、杭州炼油厂、杭州丝绸印染厂等上规模的骨干企业和急需的企业共 37 家。对于私营工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并推进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一五”期间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平均年递增 15.2%。由于迅速扩大了轻工业生产规模,直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使生活用品供应充足。

兼顾农村 保障城市供应

城市初步安定,即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解放农民才能稳定城市。旧社会

苛重的封建剥削打击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致解放时杭州农业生产水平低下,1949 年全市粮食产量仅 45.75 万吨,棉花、络麻、油菜籽等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很低。解放前城里人有时吃进口的洋籼米,解放初也靠东北运来粮食救急。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实现了多少年来所梦想的拥有自主耕地的愿望,生产积极性自然普遍提高,农产品产量相应增长。在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田水利建设加强,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抗御自然灾害能力逐步增强,农业生产的发展较有保障,农业产值由 1949 年的 1.84 亿元增长到 1957 年的 3.22 亿元。“一五”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每年平均递增速度为 4.3%。农村在实现温饱之余,必然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杭城居民的菜篮子丰富起来,鸡、肉、蛋、禽的供应不受限量,粮食可以放开肚子吃饱,城乡人民开始尝到新社会安定的幸福生活。

恢复商贸 城市人口增长

解放初杭州商业陷于萎靡,市场相当紊乱。经大力整顿扶持,杭州商贸业开始兴旺,国有、集体、个体商业保持协调发展。到 1957 年全市零售商业网点共有 12731 个商业从业人员 26479 人(其中全民 9239 人,集体 387 人,个体 16853 人),社会商品零售额 3.99 亿元,比 1950 年翻了一番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城市居民生活显著改善。

从城市化的角度考察,这期间的恢复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一是表现在城市人口从 47.38 万增至 1957 年的 65.74 万,增长比率为 38.75%,接近于民国时期发展最快的北伐后 1927~1936 年增长的 40%。二是表现在 1957 年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 79.37,比 1949 年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 75.83%,提高了 3 个多百分点。原因是 1949 年逃亡与下乡的城市人口大部回城。三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较高,反映社会安定,国家又提倡生育,出生率普遍较高。四是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前城乡来往自由,农业经济好转,农民满足了自主耕地的愿望后轻易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园,而且当时城乡生活差距并不太大,因而弃乡进城的人数不多。在杭州城市来说,虽新开办几家工厂,招工人数毕竟有限,安排了南下干部、转业军人、毕业学生和闲散劳力,劳动力的供需基本平衡。所以城乡人口都呈现持续增长之势,并未出现大起大落情况。

第三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农村土改 合作步步升高

封建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城乡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杭州市经济结构的变革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从1950年冬到1951年冬,杭州市郊和各县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先通过宣传土改法令,发动农民群众算账诉苦,提高觉悟,向地主开展说理斗争,伸张土改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同时按政策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多余房屋、多余粮食,征收其他半封建性资产,除少量留作公用外,在农民协会主持下,遵照大公无私、团结互让、自报公议、民主协商、有利生产、大家满意的原则,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困苦的农民。土地在原耕基础上抽补调整,进行分配。

郊区耕地面积比外县略少,如土改前余杭地主人均12.57亩,萧山地主人均9.17亩,市郊地主人均为7.36亩。土改后郊区各阶层占有耕地情况如下:地主1.34亩;富农2.51亩;中农1.76亩;贫农1.4亩;雇农1.47亩;小土地出租者1.14亩;工商业资本家家属0.23亩;大佃农1.84亩;其他0.51亩。事先通过细心计算确定的留田平均数,略高于分田的平均数,使抽出租入土地的农民在土改以后使用的土地略多于补进土地的农民,对生产较有利。各县情况相仿,但山区耕地少,贫下中农分到的也少些。

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1950~1952年,全市农林牧渔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1%,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易突然出现类似的高幅增长。但是有的农民缺少农具,有的苦于劳力不足,农忙季节顾不上。农民之间一向有伴工、换工的习惯。政府就顺势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小型互助组。接着通过互助组典型示范,由临时互助组发展常年互助组,即土地入组、包工保产、统一经营、常年互助。1953年一些常年互助组增产显著,其抗旱增产的成就吸引更多的农民组织起来,到1954年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已占总农户的98.2%。

在互助组逐步发展的过程,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开始孕育起来。1952年冬,市委在古荡乡试办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蒋思海农业合作社。1953年市郊各区陆续试办初级社共13个。1955年上半年市郊初级社发展到182个,接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指示,到6月底开始收缩,根据农民自愿,有22个合作社重新转为互助组。但同年7月,毛泽东批判农业合作化工作右倾保守,斥为“小足女人走路”,“站在富农、富裕中农立场”!要求纠正错误,加强领导,于是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杭州市郊初级社一下子增加为330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70%,显然是按上级意志发动组建的。遵循领导意图,杭州市委于1956年1月作出《关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决议》,郊区随即兴起办高级社的热潮,并在升级的同时进行并社扩社,扩大合作社的规模。这个月的中旬,全郊区成立高级社170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5%,平均每社130户(当时地主、富农不准入社)。由于高级社发展过于急促,农民精神准备不足,特别是扩大规模后管理工作跟不上,不少合作社发生干部忙于开会、社员等待派工、劳动不求质量、生产不计成本等现象。这是冒进弊病的初露苗头。

经过整顿,继续推进,全市各县同时铺开,到1956年底,高级社基本普及,吸收地主、富农入社,还吸收部分非农业户入社。但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方发生闹退社的风潮,萧山、临安、於潜、昌化有6500多户上万社员要求退社、分社;夏季预分中余杭等地又先后发生46起闹退社事件。各地只好不断进行教育整顿,整风批判。事实说明,高级社并未真正巩固,农民并未高度自愿。但在高级社还未巩固的情况下,半年后又冒出人民公社来了。杭州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西湖人民公社是1958年8月28日成立的。看来节奏过快,农民应接不暇。

从土改到互助组农民积极性大受鼓舞,以后搞合作社热情有所下降;由于高级社发展过快,未及时巩固,人心浮动,当初的信心大为下降了。试从各时期农林牧渔生产平均增长速度对比中,可以反映出来。1950~1952年全市农林牧渔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1%;1953~1957年为4.4%;而1958年至1962年平均每年负增长0.5%,生产力非常敏感地標示出生产关系的是否合理。列宁说得好:真理是不能多走一步的。其实农业合作化若能稳扎稳打,走一步巩固

一步,效果会更好一些,中共中央原先下达的“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较切合实际,却被一阵反对“右倾保守”的批判搅乱了一盘好棋。农业生产稳定的话,对城市粮食、蔬菜、工业原料的供应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而且农村也是城市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断一发会牵动全局,城乡关系十分密切,农村工作冒进,城市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工业改革 手工业合作化

工人阶级拥护社会主义,私营企业里的工人也一样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所以私营工业企业的改造难度较小。杭州对于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改造早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已悄悄进行了,第一批是通过清理公股公产对 12 户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公私合营。1953 年 11~12 月,华丰造纸厂、民生药厂、都锦生丝织厂、第一纱厂、长安纱厂、六一棉织厂实行公私合营。到 1955 年底,市区陆续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已达 94 家。1956 年 1 月初,全市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水到渠成,全市 66 个行业共 591 家私营工厂全面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伴同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改造,个体手工业也相应跟进。杭州市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于 1951 年 6 月 1 日,由下城区失业工人马浩明首先发起,几个同行朋友响应,组成杭州市制钉生产合作社。1953 年后,全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有计划的发展阶段。这年年底市区内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13 家;1954 年年底有 109 家;1955 年年底有 172 家;1956 年 1 月,正式成立杭州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总共批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259 个,总人数达 19457 人,组织起来的人员占应组织数的 98.07%,大体上都出于自愿。至此全市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瓜熟蒂落 私商接受改造

不打不相识,政府与一部分商人作过较量。先是解放初期市场不稳定,国营经济初建力量单薄,有些商人乘机参与投机活动,从中牟取暴利。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强市场管理,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调集物资大量抛售,打击了奸商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行为。接着发动“五反”,进行检举揭发,说理斗争,使资产阶级吓破了胆,纷纷表示愿作“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

市场基本稳定后,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明显减弱,销售市场转而呆滞。私营商业的业主感到生意清淡,日子很不好过。政府鉴于有必要发挥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为了避免歇业倒闭太多会造成店员大批失业,从1952年开始,采取扶持态度,令国营商业让出一部分销售业务,同时扩大了批发零售之间的差价,使零售商有利可图。计市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停止或部分停止供应的商品291种;调整(适度提高)批零差价的商品157类、2844种,降低批发起点商品37种;撤销部分零售点让给私营商业经营。这些政策既是扶助,又是教育,有利于私营商业的经营和社会主义改造。

在1953年以前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从1953年开始,私营零售商供应的商品多数由国营批发部门计划分配,批发商业转为计划市场。至1955年,市区内23个行业中的249户批发商,其业务全部由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替代。1956年1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市区有131个行业、2533家私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小商小贩,也组成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走上了合作化道路。1957年,市区零售商业(包括饮食服务)网点总共有2731个,从业人员达26479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961万元。这时市场虽较单一,毕竟安定。

如果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共产风马上来临,社会主义前景本该是美好的。

实践检验 制度变革宜稳

“三大改造”是史无前例的制度性大变革。它不是一般的上层改革,而是社会结构的变换,而且是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彻底改变。改革后比起改革前来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内容,并非十全十美,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员。评判改革成效的基本标准有三:一是客观经济规律,即是否发展生产力的原则;二是是否符合民众意愿,即政治文明,尊重民众选择;三是能否保持持续增长,即从实际出发,预见其发展后劲。从理论上讲,

当时流行的一种认识认为所有制的公有化,特别是“一大二公”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如今对过去制度进行反思,才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充分解放生产力;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相容。城市管理体制的逐步变革需要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协调同步,不宜片面追求公有化。否则貌似彻底革命,实是急躁冒进,长远看会反而阻滞生产力的发展。

以农业合作化为例,土改后从封建制度下把农民解放出来,解除了农民与封建地主的依附关系,下一步该怎么办?一般按照世界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是让农民拥有土地后给予他们比较自由的发展环境,充分调动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成为有独立地位、有自主权的商品生产者,鼓励个体农业经济的发展,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户为本身利益最大化而艰苦劳动,不但可为国家增产大量农副产品,还能为城市工商业开辟广阔的市场。毛泽东设计另一种蓝图——新民主主义,本来也是适应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一种新设想,若稳步实施,自然是可行的。即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归宿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保存商品关系、市场关系,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政策,让农民自主经营,自由发展;然后在战后几年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后,再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共20年左右的过渡期,逐步由合作化分步组织起来,进入社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的同时,也在20年内实施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种思路,是立足于一个“稳”字,稳步推进,协调发展。

但是革命的胜利给某些人滋长急躁冒进的情绪,要提前在恢复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并作出三大决策:一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要求20年内超过美国。二是立即实行计划经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剥夺农民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在城市由中央集权配置资源,地方政府只能按计划分配的指标办事。三是城乡同步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并准备向“一大二公”的更高境界推进。

这样,农民于1951年刚通过土改获取自有土地自主耕作的权利;1952年推行了互助组;1953年推行起初级社;1954年提升为高级社;开始粮食统购和凭购粮证供应;1955年对粮食实行定产、订购、定销;1956年并社扩社,全面实现

了农业合作化；于是1957年有不少社员要求退社，为此进行整风批判；1958年推向人民公社化；……这样飞快地超计划运作，制度环境的突变，使农民的个人财产权利、自由选择权力深受压抑。完成合作化后，农民感觉由过去依附于封建地主的关系一下子变为依附于集体，没有退社的自由，没有迁移的自由，没有出外谋生的自由，没有改变身份的自由，也没有处置农产品的自由，没有个人发家致富的自由，甚至没有贮存余粮的自由。而国家将紧缺的资金集中到重工业，势必挤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断扩大和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与市民的身份以及城乡生活水平逐渐产生差异。总之，农民在土改时的兴奋心情与高期望值产生落差；加以集体所有制的体制不够健全，劳动生产率停滞，以致增产幅度趋缓。所以过快集体化并不真正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社会效果也就有限。这主要是由于步子太快，农民在心理与物质上准备不足。

至于城市的处境虽比农村略好，但实行计划经济后，扼止市场经济，也就消减了贸易和流通的活力，丧失了竞争机制的推动作用，影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创新的追求。产品仿制多，创造少，关注数量忽视质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较旧城市虽有所提高，若论发展速度却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后起的新兴国家。杭州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城市中作为参政的四大阶级之一的资产阶级，在“五反”后总觉心有余悸，抬不起头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其本可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已经丧失殆尽。其实城市化是离不开市场化的，此后城市化的进展缓慢，与市场经济的处于低谷不无关系。

由此可见，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作用受到严格限制，杭州市委市政府根本无权按照自身的城市个性去规划城市化的发展。对于本市郊区和各县连续发生的“闹退社”事件以及民众的各种呼声，只能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去批判压服，丧失独立管理城市的主观能动性。上下间隔，上层不容易听到来自民众的反馈信息。个人威望过高，到处只听到一个人的声音。事实上，政治文明淡薄，不利于社会进步与城市发展。于是有所谓“开门整党”、“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在这历史大背景下，杭州也如同其他的许多大城市一样被卷入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派运动。结果是造成万马齐喑的一言堂局面，接着知识分子被贬成资产阶级臭老九，人才大批被扼杀。这一切

都由中央集权统一指挥,地方政府奉命办事,无能为力。这时期城市里开始组织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不过,三大改造毕竟是空前的创举,对群众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对工业化为主导,有着有力的支持作用。杭州这时期工业建设成绩显著。“一五”期间杭城基本上消除了失业现象,尤为一大业绩。

第四节 学习苏联模式的得和失

启动规划 休养疗养城市

新中国成立之初,杭州被视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游览参观城市。不少国外贵宾,来到北京后常被招待来杭州游览,成为政府接待型的观光城市。由于经常有接待国外贵宾任务,便自命为国际观光城市。市政府重视整修战争破坏的西湖风景名胜,首先对周边山区实行封山育林,对西湖作了一次较全面的疏浚,初步改善了长期荒芜的环境面貌;接着对灵隐、六和塔、西泠印社等著名景点稍作整修,便于接待观光。

1952年6月,市政府拟定《西湖风景名胜区建设计划大纲》,提出西湖风景区的范围与建设目标。由于西湖风景名胜区紧邻杭州市区,故其规划的性质与杭州城市的性质难以分割。1953年结合“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家建设部邀请苏联专家来杭州,帮助作城市规划,还绘制了《杭州市初步规划示意图》,提出杭州为“风景兼文教和轻工业为内容”的休疗养城市。城市规模定为6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这是首次编制杭州城市总体规划,又是苏联专家亲临现场作具体指导,对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产生很大影响。当时强调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盛行一句口头语:“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把苏联专家的规划和示意图视作圭臬。

其实,苏联专家并不是非常了解杭州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城市特征,他不可能了解良渚文化的重要价值及其分布面积,也不会具体理解南宋都城的风物与深厚的历史积淀,更不可能懂得唐末、五代至宋代杭州在长三角城市化革

命中的主导作用与核心地位。他当然无法预测到这座不大的城市不久后将每年吸引两三千万的中外游客来此旅游、观光、休闲,还有大批客商参加大型会展。我们不应该离开历史条件去责怪他们。但是我们盲目地去生搬硬套苏联模式,事实上是有害的。至少存在几方面的损失:

首先是把杭州定性为“休疗养城市”,很不恰当。在苏联建有不少休疗养城市。所谓“休疗养城市”,实质成了权贵们的特殊享受领地,大面积的风景区只供少数高层要人享乐;即使这些要人平时并非经常来此休养地,也是封闭园区,警卫森严,不准民众靠近。当然除了最精美的区域之外,边缘地区有一些疗养院、休养所接待所谓劳动模范、中高级官员。试问真正的普通工人、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能有机会来这样的“休疗养城市”休养和疗养吗?普通工人没有长假来不了,没有余钱也来不了;集体农庄农民更无权远道来休养疗养。休疗养均须由政府组织接待,并非自由往来。

国际旅游城市旨在向国内外普通游客开放,服务对象不分地位、身份;服务人数每年须以几千万计;服务区域应提供出最精美的景区,而不应该划出许多特殊的禁区,更不应该在一些引人入胜的路口插上“游人免进”的禁牌。这些禁牌除了特殊的军警要地外,本不应该在旅游城市出现。可以想见,本应受到热情接待的国内外游客,在此到处碰壁,会作何感想?因此早在解放初人们就大声呼吁:“整个西湖风景区的建设应该是向着全国人民的大公园这一目标努力”,“不准任何人独占或圈占”!《浙江日报》1950年5月17日载文称颂:“杭州解放后,人民政府除把西湖面向生产,在西湖养鱼、四山造林、种植果树外,并正从事西湖风景的设计改造工作,准备把少数人的清福胜地,发展成为劳动人民的乐园。”这是人民的心声,也为政府所重视。现依苏联模式规划为“休疗养城市”,有利于少数人享清福,不利劳动人民乐园的建设,有违民意。同时杭州本该可能兴旺发达的旅游产业势将大打折扣,无形中是一大损失。

果然,随着苏联模式规划制订以后,自1953年起,环西湖的不少秀美地段,被圈占土地,开辟为休养区、疗养区,陆续建起一批批休养所、疗养院,或把著名景点精品改变为特殊人物的别墅。如此把新城市初建时的有限资金与资源,投向了所谓休养所、疗养院和特殊庄园,而放松了具有潜力亟待扶持的旅游产业,忽视了广大人民和海内外旅游者的利益。以致那几年圈占的土地,为以后的规

划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至今还有一些单位在重要风景区占去大片面积,不容易让它们搬走以彻底地“还景于民”。

旅游业在那段时期是衰落的。不但解放之初很少人来杭旅游,连恢复8年后的1957年,全年总共接待外国游客(含国际高级使团贵宾)仅5807人,港澳同胞2635人,国内游人(含外地来杭出差、开会、考试、采购、营销、治病、探亲等各种流动人口)也不过500万人次。旅游业的冷落,虽有多种因素,而规划定位的导向性偏差也是原因之一。

其次是苏联模式偏重自然景观的利用,忽视历史文化的保护。苏联自身历史短浅,几百年前还只是个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其余大片领土都是靠武装征服开疆拓土,尤其是整个远东广阔区域全是殖民主义式新占的拓荒地区,其地域虽然广袤,辽阔的西伯利亚谈不上有多少历史文化名城需要保护,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杭州城市则完全不同,这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两朝古都,三度成为长三角中心城市,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历史遗产异常珍贵,这里的许多文物、古迹、遗址、古建筑是无价之宝,山山水水间到处流传富有诗情画意的遗闻佚事,因而在规划城市发展时必须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而这恰恰是苏联专家所忽视的。诸如西溪没有列入规划,鼓楼没有受到保护,杨公堤筑为西山路,市区内不少名人故居、旧居均被漠视损坏,一些名人古墓尤被目为封建迷信,……“一五”如此对待,“二五”、“三五”相沿成风,铸成几十年间历史遗产的大量破坏。

瑕瑜互见 生搬不切实际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既定的大方向,而自身没有经验,向苏联学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一种选择。尤其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只有苏联模式可供仿效。但学习过程中需要紧紧联系自己城市的实际和切合个性特征才能少走弯路。

回顾当时杭州学习苏联的情况,是盲目崇拜,一切生搬硬套,所以尽管有借鉴而得益的,但也有简单化而产生美中不足的。典型的如听取苏联专家加快工业化的建议,在“一五”计划前后开始创办几家新工厂,第一批骨干企业有浙江麻纺厂、浙江印染厂、杭州丝绸印染厂、杭州棉纺厂、杭州纺织机械厂和杭州炼油厂等,为杭州的国有工业打好基础;而且以轻工业为主,也是符合杭州实际需

要的。但是在工厂位置的选择方面欠合理,如杭州丝绸印染厂设在市区中心的庆春街六克巷附近,烟雾大、噪音大、污水处理也有问题。杭州被单厂也设在市区内,厂址是醋坊巷、珍珠巷一带;杭州纺织机械厂设在宝善桥附近的陈衙营;杭州机床厂设在环城东路刀茅巷附近;杭州电镀厂更地处居民密集点,三废污染十分严重。浙江麻纺厂、杭州棉纺厂、浙江纸浆厂、浙江印染厂虽离当时的市中心闹市稍远,而紧挨运河,对运河水产生污染,尤以印染厂和纸浆厂污染最为严重。更糟的是重化工业的杭州炼油厂,设在邻接运河客运码头的密渡桥,距今杭州大厦、大红鹰药店不远,逼近市中心,对城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都极为严重。当时似未从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角度出发合理安排工业区,在设置上有点分散零乱,更缺远见。其后遗症令人棘手,这第一批骨干工厂一直延续到近年才加以关停或拆迁。

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工业的改造自然紧迫,但对于小店小商小贩及农贸市场的改造,似乎速度不宜过快,更不能简单粗暴,应考虑到杭州是个传统的商业都会,城市的繁荣与否向来看她的商贸是否活跃闹猛?而商贸属于自由有序的零售市场体系,应具有人性化的为市民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求生活丰富多彩。旧杭州的商贸尽管存在畸形的缺陷,但市场规律仍决定了它的竞争色彩和丰富有序。改造后的城市商贸过快地转向了官办色彩,虽保障了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但官气太重,方式死板,服务人员不自觉地抱有主宰顾客的心态,淡化了商业的服务性与多样性。搬用了苏联模式,所有制趋于单一,经营方式趋于单一,商品趋于单一,品牌趋于单一,规格式样也趋于单一,使天堂的繁华气息淡薄了,城市的市民生活显得单调。走上街一色的灰布列宁装,饭店里摆着的也只有寥寥几种菜,皮鞋全是军用式的高帮鞋,没有了市场竞争,没有了旅游商品,缺少了花色品种,没有了广告促销,没有了讨价还价,没有了夜市,更没有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店面装饰,……街市不再有“钱塘自古繁华”的氛围。零售商业作为城市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力度大大削弱了。

连文化教育方面学习苏联模式的弊病也不少。譬如学校里废弃英语课程,一律改学俄语,而事实上英语在国际交往与引进先进科技方面的应用价值远比俄语重要。来杭的外国游客也以讲英语的比讲俄语的为多。英语教师被迫改行,有段时间要恢复英语课时英语教师断档。对杭州来说教育工作最大的损失

是所谓“高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这所全省唯一的名牌大学被拆散，只保留一个工学院，各院分割独立成校，还把物理系等科系撤销，资源浪费不算，部分处迁外调人才的流散十分可惜，不少院士级的著名教授被调整去了外省，如苏步青、陈建功、白正国、何增禄、郭超豪、邹元桢、王淦昌等大多是老院士（学部委员）。近隔了半个世纪再合并扩建浙大，反覆折腾，问题很多。据说当时也是为了学习苏联单科大学的模式。

更可笑的是不少学校学苏联实行“六时一贯制”，即上午只吃一餐，连续上6节课，才能吃上第二餐。那是因为苏联昼短，只吃两餐，可是杭州学生向来吃惯一日三餐，学苏联减食一餐饿得受不了。这主意是苏联专家出的，试了一段时间终究行不通。还有的笑话是提倡男人穿苏式花布衫，机关下班就把会议室布置为跳舞厅，提倡学跳交谊舞，首长带头，谁敢不从？整个城市都沉浸于学习苏联模式热潮之中。乱纷纷出现不少怪现象，而杭州民间喜闻乐见的艺人杂耍、评弹、说唱之类大众化娱乐节目一时很少见到，连作为民众消遣场所的500多家茶馆店也陆续取消掉了。这些都是学习苏联前进中的花絮。

学习苏联最大的收获，是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使杭州市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工业比重明显提高。以“一五”完成后的1957年底与解放初的1949年作比较，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由29.4%上升到48.7%；农业相应的由70.6%下降为51.3%。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趋于平衡。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的比重上升，农业、商业的比重下降。对一般的城市来说这种变化是合理的。但就杭州的城市个性来说，商业从12.8%下降到7.6%，旅游业更衰落得不成比例，未尝不是一个问題。

据党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副主席事后评价学习苏联计划工作的美中不足之说：这些年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存在的缺点主要是缺乏必要的市场调节。由于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缺少市场调节的功能。计划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单调。这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者并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杭州在套用苏联计划工作制度时，既学到一些经验，也带来一些糟粕。不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压制市场调节的弊病暴露得还不太明显,而这根子却已深深地植进经济工作的土壤里了。

总起来说,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恢复期,医治了战争疮伤,城市生活恢复到民国年代的黄金时期水平,且体制上有更新,生产力有超越,失业现象基本消灭,社会秩序有了进步,杭州显露出朝气,成绩是主要的。这段时期恢复和改造为主。1957年的经济水平,杭州与同时期的汉城、台北、新加坡等城市相接近,彼此都从战后开始复苏。至于城市化虽未正式启动,而已蓄势待发,如按正常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第五章 一大二公和大跃进

第一节 重工业为中心的单向突进

1958年起,试行扩大地方权限。杭州开始全面的大规模建设,响应党中央号召,工农业同时开展生产大跃进,但以工业为重点,尤以重工业为中心。杭州市制订的《关于1958~1967年的城市建设规划》中提出:“奋斗三、五年完全可能把杭州建设成中等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城市规模控制在80万人以内,具体布置了半山、拱宸、江干、闲林埠、上泗、良渚、回龙山、富阳、萧山、上城和下城,共10个工业区,即市区和郊县全面开花发展工业。由于工业区分布过广,污染不可避免。同时由于资金的积累有限,只好压缩其他方面的投资,集中资金投向工业,基本建设中的76%,用于发展工业,特别是“以钢为纲”的重工业。“二五”前3年(1958~1960)投入工业建设的金额为“一五”(1953~1957)5年投资总和的2.5倍。这是超常规的发展,也是超过杭州城市人力物力负担能力的。

在领导号召下,全市各行各业普遍掀起大办工业的热潮。其中由国家投资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厂有40多个。矿冶工业新建浙江钢铁厂、闲林埠钢铁厂、横山钢铁厂、富春江铜厂;机械工业新建半山重型机械厂、杭州轴承厂、杭州汽轮机厂、杭州齿轮箱厂、杭州电缆厂、萧山电机厂、汽车发动机厂,扩建杭州锅炉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机床厂;电力工业新建新安江电厂、半

山电厂、两个大型超高压变电所,扩建闸口电厂;建材工业新建杭州玻璃厂、杭州水泥厂;电子仪表工业新建杭州电子管厂、杭州仪表厂;化学工业新建龙山化工厂、杭州硫酸厂、杭州兽药厂,扩建杭州农药厂、民生药厂;纺织工业新建杭州化学纤维厂、萧山棉纺织厂,续建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食品工业新建桃源岭啤酒厂、望江食品厂;轻工业新建海潮橡胶厂、杭州热水瓶厂、杭州灯泡厂、杭州自行车厂、杭州钟表厂、杭州缝纫机厂、扬伦造纸厂。这些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从艮山门到半山的重工业区,望江门的食品工业区,拱宸桥的轻纺工业区,古荡、留下的电子仪表工业区,龙山的化学工业区;其他各区工业分布则较分散。由各行各业自筹资金自办的工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布局也较零星。

三年大跃进中,杭州工业的发展结束了过去从未生产过一吨钢、一吨铁、一吨煤的历史。一批重化工业产品,如金属切削机床、动力机械、农业机械、“三酸”、“两碱”,和化肥、农药等都从无到有生产出来;纺织、轻工产品也大幅度增长,扩大了生产规模。从主要行业门类而言,初步建立起钢铁工业、采掘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基本化学工业。这样虽距离原规划要求的“建成中等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尚有距离,但对早先工业极其薄弱的商业城市而言,进展可谓神速。这三年期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率高达44.8%,其中重工业以每年递增88.6%的高速畸形发展,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不能按比例协调发展。不但第二产业与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相适应,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比例也不协调。

工业大发展过程中,工业职工人数猛增,仅1958年一年中就增加工人18万人。这对于仅有65万市民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据1957年年底的人口统计杭州全市市区非农人口总数为654700人)。新增的工人调自各行各业,特别从郊区农业生产第一线抽调劳动力甚多,不惜削弱了农业生产。

城市大办钢铁,街道组织了城市人民公社。毫无生产经验的居民妇女也被发动参加到炼钢队伍中来瞎帮忙,小土高炉所烧铁块,大多成为废料,白白浪费原材料和燃料。这样只讲数量,不论质量,滥竽充数,造成巨大损失。

盲目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使城市经济秩序全乱了套。这类紊乱的情况,全国各大中城市大致相仿,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进行的,形成全国性乱套。为此1961年起中央重新强调“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大型骨干企业相继上

收到中央各部和省厅管理。全国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杭州市区内就关、停、并、转了134个企业。精简出职工9万多人,其中51000人动员回农村。到1962年末,全市保有中央属工业企业78个,省属企业64个,市属企业646个。尽管部分骨干企业在整顿中保留下来,但这样大起大落的工业化,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了。特别是对农业和商业生产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这种重工业单向突进,超前发展,违反城市现代化综合集聚的基本原则。

市属各县也在不同程度上实施工业化建设。发展中加强全民所有制工业的经济比重,曾将128个集体企业计10645人,转为全民所有制。在以后的调整时期,又把他们退回到集体所有制,重新建立1300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和合作工厂。但这些集体所有制单位数量虽多,而实际力量薄弱。到1965年底,全市乡及乡以上的各类工业共有177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数量占23.67%,总产值占88.32%;而集体所有制工业数量虽占76.33%,总产值却仅占11.68%。

对工业的投资从1961年起进行压缩。市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年的1.11亿元压缩到1961年的3416万元;1962年再压缩到1650万元。但对轻工业的生产则由于市场的客观需求而加以加强,自行车、缝纫机、塑料制品等工厂先后投产。小商品的生产,经过扶植,逐步恢复。这与同期全国对轻工业投资比重仅占总投资的3.9%相比,杭州重视轻工业的扶持做得较好。

但尽管调整整顿,损伤的元气却多年未能恢复。以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具体数字作比较:1960年为184808万元;1961年降为126478万元;1962年更降至103026万元;1963年也仅为107588万元;1964年为128167万元;1965年为151152万元;1966年为178133万元;始终未能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本希望再继续作一两年的努力,争取完全恢复,奈何1966年“文革”爆发,1967年和1968年工业生产又连续出现负增长。

第二节 农村改制由合作社进向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杭州

市农村随之兴起公社化运动。这年8月28日,市郊第一个人民公社——西湖人民公社成立了。10月初,郊区(含这时已并入郊区的原杭县)全部实现公社化。原先的3441个高级社,合并成124个人民公社。县政府这一级实行公社化劲头更大,如新登县全县先建立5个公社,不久又进一步合并为一个大社,成立了新登人民公社。于是郊区的拱墅、半山两区的两个人民公社也办联社,成为拱墅半山联合社。

建社后,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把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并入人民公社,当地学校也归公社管理,民兵组织成立公社人武部。原先的高级社一般降格为生产队,而在公社和生产队之间加设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这种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实在并不适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属于理想化的公社制。然而党要求高举三面红旗,强制推行,无可抗拒。

公社建立起来后便大刮“一平二调”、“共产风”,说要争先进入共产主义。实行共产的方法是将农民私有的牲畜收归公养,办成集体牧场;没收农民的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树木,尽归公有;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劳力和财物;实行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地,拉平穷队和富队的收入差别;推行基本工资加年终奖励,取消每日评工计分;推行口粮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计钱;包办全公社的集体生活福利事业,说是社员理发、洗澡按计划,看病、吃药、入学、托幼都不要钱……。这一系列的做法,事实上行不通,貌似公平,实质上冲击了一家一户的传统生活习惯,损害了群众利益,也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将各生产队多年积累的有限的农产品短期内消耗殆尽,到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农民基本生活普遍发生困难。

这时期发生的真实笑话很多:有的农民听说自己的猪不准养了,即将归公,连夜将未长成的猪勒死腌肉,谎报猪自己死掉。干部责问“猪怎么会自杀呢?”便把农民绑起来公审,以示警戒。连夜杀鸡的事极为普遍,这类事小而涉及人数又多,无法追究。然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不再有农民养猪、养鸡,城里的人就吃不到鸡蛋、禽类和猪肉。虽说公社办集体养猪场和养鸡场,但技术不过硬,管理又不善,瘟鸡瘟猪的事无可避免,生产规模缩小,产量甚低,杯水车薪不可能满足市场需要。公共食堂吃饭不计帐,男女老幼每顿饭撑开肚皮吃个十足的饱满,俟秋冬下来全年定量供应光了;食堂里改烧稀饭供粥,也很快断粮

了。偷偷砍伐门前树木的事也时有发生,私产收为公产反而无人照料,而且不再有人栽种。隐性的破坏最严重的是“出工不出力”,反正不计工评分,干多干少一个样,卖力耕作的人不多了,无形中遭致生产滑坡。

等到中央发现问题,情况已经严重,几乎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下令紧急改变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力,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杭州市委于1959年3月召开全市五级干部(生产队长以上)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会后,各分社召开万人大会,向民众解释办公社的方针有所改变,以安人心。4月,市委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开展算帐退赔,算清一笔,公布一笔,兑现一笔,以维护等价交换、多劳多得的原则。5月,市委提出分配社员自留地,每人不少于全公社人均土地的3%,但不得超过5%。同时加紧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鼓励农民安心生产。

然而同年8月政策又有了反复,开展起“反右倾斗争”来了。于是纠正“一平二调”的工作陷于停顿,“共产风”再度抬头。1960年农业严重减产减收,造成城乡粮食、副食品十分紧张,一时因营养缺乏而发生近似肝炎的疾病流行起来。

1961年迫于舆情,全市再度提出纠正“一平二调”,各级平调土地、劳力、现金合计1816万元,要求继续组织退赔兑现。市委决定缩小人民公社的规模,并重申以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大体上是早先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对所属生产小队实行“四固定”(固定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和“三包一奖”(包产量、包成本、包工分和超产奖励)制度。同时恢复评工计分,停办集体养猪场。1962年进一步把基本核算单位普遍下放到生产队(即生产小队),并调整缩小生产队的规模。生产队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可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农产品和收入除了缴纳国家税收、向大队上交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和管理费外,都可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这种核算形式规模小,看得见、摸得到,受到农民欢迎,都说比“一大二公”好。这些调整措施,有效地扭转了混乱局面,从而使人民公社获得相对稳定。

但1963年杭州奉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初期,把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反对干部贪污多占和要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列为重要内容。运动后期,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三自一包”,再次陷入左的错误,

伤害了很多基层干部,并助长了公社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

政策这样忽左忽右的多变,使上层矛盾影响到了基层稳定,反映于农业生产就是连年减产。据统计,全市农林牧渔总产值 1959 年为 68880 万元;1960 年降为 63209 万元;1961 年更剧降为 59730 万元;1962 年为 62382 万元;1963 年为 67433 万元;即减产 4 年,至 1964 年和 1965 年才获丰收,超过了 1959 年,分别为 72001 万和 78551 万元。政策的正确与否,在生产上立竿见影。如果问 1964、1965 两年获丰收的原因,那主要是杭州市暂停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业学大寨,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真所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只要让农民就能够多劳多得,农民就能安心生产,农业产量就有可能提高。

第三节 垄断式的国营商业

1957 年末,国营商业虽已处于主导地位,但尚未构成一家独大。1958 年 5 月至 1961 年 9 月,国、合商业第一次合并,基层供销合作社、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商店,在购销上全部纳入国营商业的计划管理,形成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局面。这是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的需要。

在大跃进中,农业减产,市场供求矛盾严重,城乡商品供应紧张。这时商业部门也在大跃进影响下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大购大销”,使国家财产遭受大量浪费和损失,更加加剧了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

到 1962 年底核算,市区商业部门因商品报废,损失总值高达 185 万元;积压不能适销,等待处理的商品有 467 种,价值 220 万元。粮食收购了过头粮,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在商品流通及所有制方面,急于取消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想提早进入共产主义。为此把供销合作社由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升为国营;压缩和裁并了许多网点。

1961 年冬,合作社商业重新分设。至 1962 年全市供销社零售额仅 11674 万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21.71%;此后几年的经营比重在 26%左右。

国营商业主管的商品和批发机构,可以下伸到县以下集镇。

公私合营企业原规定按“赎买”政策每年给资方年息5%,与企业经营成果分离。私营工商业者553人按量才录用原则分别安排副经理、科长等职务。1958年,市区143户小商贩实行公私合营。至1960年,公私合营商业经过撤并尚有433家。1966年全部改为国营商业,资本家定息取消;在公司和商店的工商业者的职务也全部撤销。至此,对私营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公私合营企业结束了。

合作商店,由小商从业人员联合组成。在业务上按行业或地域,由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加以管理。1958年,将参加合作小组的小商贩6356户、8173人组成合作商店。同时将部分小商贩直接转为国、合商业。在大力工业、大力农业的高潮中,将小商贩2161户、3281人转到工业生产岗位。同时将部分小商贩组织去建筑工地挑土方,或参农业生产。1961年国民经济开始调整,有大批待业人员参加到小商贩行列里来。至1962年末小商贩已增至10832户、11388人。其中参加合作小组仅325户。至1966年,又把小商贩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逐步加以淘汰。

集市贸易几经关闭,又几经复活。1956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以个人产品交换为主的集市贸易市场逐步关闭。下半年,鉴于关闭集市贸易给农副业生产和社员生活带来不便,又同意其逐渐恢复起来。1957年,在市区恢复和建立18个由政府指导管理的自由市场。不久因自由市场出售的商品多为国家计划收购,对其经营范围加以限制,只准在当地自产自销的三类农副产品进场交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取消了社会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城镇个体工商业大多组织合作小组,集贸市场因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被关闭。

1959年,中央认为农村集市贸易有其一定的存在价值,提出管理原则:“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市区先后设置拱宸桥、卖鱼桥、三廊庙、松木场、艮山门等7个初级市场,经售蔬菜、禽蛋、水果等农副产品。1961年继续在龙翔桥、刀茅巷、望江门、清泰门、米市巷等地设置一批农副产品市场,总数连郊区共25个,上市商品多达100余种。1962年集市贸易有所发展,全年成交金额约1717万元,占市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9%。1963年,遵照中央指示,杭州加强集市贸易

的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将 25 个市场减少到 20 个,控制上市商品,不准生产队和社员个人出售多余的粮、棉、油、烟、麻、茶、茧及其加工制品;凡上市的自销售产品,须分别凭“一、二类农副产品自产自销证”和“三类农副产品自产自销卡”,在指定集市或毗邻地区集市交易。同年 7 月,建立杭州市工业品小商品市场,引进小商贩 164 户进场设摊。1964 年 8 月撤销龙翔桥市场,并禁止生产队和社员在完成国家统购、订购任务后将多余的一、二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至 1966 年,集市贸易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从而采取强制措施全部加以取消。

从 1958 年到 1966 年,国民经济中的第三产业大受压抑,与一、二产业间的比例失衡。

第六章 两次“逆城市化”和城乡大动荡

众所周知,21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极左”路线的错误曾造成全国性社会大动荡,杭州自难幸免。除了政治动乱的直接灾难以外,还严重影响了城乡经济和城市化的进程。杭州在两次“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出现大起大落的畸形波动。

第一节 运动造成企业紊乱 规章制度尽行废除

政治秩序发生大动乱,经济秩序相应受到冲击。正常的规章制度遭受破坏。代之而起的是“革命委员会”的瞎指挥,劳民伤财,极大浪费,多数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呈下降趋势。其损害类似“大跃进”,而更甚之。

就工业产值而论,“文革”前 10 年工业年平均递增率为 16%,而“文革”开始后 10 年平均递增率仅为 3.9%,显得疲软乏力。其中以杭州主要的传统产业丝绸工业的总产值为例,“文革”10 年中有 5 个年头比上一年下降,1976 年的产值竟低于 10 年前“文革”刚开始时的 1966 年,尤其是 1975、1976 两年,丝绸工业全行业共亏损达 185.7 万元。这些反映出这次动乱对许多行业都是一场浩劫,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据赵福莲所写的有关老字号都锦生丝织厂的调查报告称:“都锦生丝织厂在‘文革’期间,由于受社会浊流的严重影响,一切正常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当作‘不该管、不该卡、不该压’的资本主义枷锁,一刀砍掉,取代的是造反派的红色政权新条条、新框框;在一切‘对着干’的幌子下,一些受蒙蔽

的职工群众在少数坏头头的煽动下,放弃生产,去干所谓‘革命’,造成政治事件接连不断,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遭受迫害。工厂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更可怕的是许多老字号企业被当作“四旧”清除,有的被撤销不准生产,有的被砸掉老牌子,有的被勒令更名,有的被迫改组。譬如:“杭产一绝”的王星记扇厂,在文革浩劫中老字号牌子被砸,迫令改名为“东风扇厂”,作为传统工艺美术品的拳头产品,概被斥为“封、资、修”的毒草,一把把凝聚着制扇艺人智慧和心血的精美工艺品均被付之一炬。

享誉百年的万隆火腿庄,在“破旧立新”的年代里几经更名,数度归并,先入方裕和,继改杭州腌腊店,一回儿上收,一回儿下放,几无安身立命之所。

富有特色、品牌响亮的采芝斋,在动乱的岁月中也数度易名,先改称“工农兵食品店”,而后是“东方红食品店”,再后又叫“益民食品店”。在造反派眼里,作为无形资产的品牌是分文不值的,可以任意践踏。遭同样厄运的企业,比比皆是。知味观被改成“东风馆”,如果说王星记扇厂称“东风”还有点说法,知味观喝“东风”简直不伦不类了。景阳观为全国四大著名酱菜专业商店,也被改名为“东方红”酱酒店;东风、东方红之类称呼任意乱套。高义泰是驰名全省的布庄,也改了名,被改叫“时新”布店。

张小泉也不幸无辜地被列入“四旧”而被革命除名,改为“杭州剪刀厂”,然后生产秩序遭严重破坏,产品也不能出口,产量剧降……可是高音喇叭还整日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封资修的苗!”

对有些企业来说,被取消品牌名称还算是较小的损失,更惨的是被以“文革”的名义加以撤销,这是斩尽杀绝不准留下生产的活路。如世传四代,产品曾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连获金牌、一等奖和优秀奖的邵芝岩笔庄,被无理定为“四旧”而撤销,连流传千古的文房四宝都成为禁品,实属笑话。

更多的企业是生产秩序被打乱。凡是优秀的企业,都会具有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即管理周密。文革的头头们大多蓄意破除这类周密的管理制度,美其名曰:“破旧立新”,“造反有理”。生产秩序既被打乱,产品的产量、质量势必失去保证,影响了整个社会,后果自不堪设想了。

最可惜的是仁术膏丹济世 400 余年的朱养心药室这样的利民利国的技术

部门,也遭灭顶之灾。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祖遗成方、实物资料全被焚毁;朱养心的招牌当众砸毁,不准启用,真不明白是何居心。当时造反的那股乱劲儿,都像发了疯似的,乱打乱砸乱抢,以破坏为痛快!

总之,“文革”开始后杭州工业遭受严重损失。幸而并非各行各业全部如此,杭州市的多数职工在市委陷于瘫痪的状况下尚能自觉坚持生产,维持着城市的生命力。部分企业并能在艰苦的条件下有所发展。文革10年中最有生气的要数化工工业、二轻工业和轻工业等工业部门,创造出可喜的成绩。其中化工工业的硫酸、烧碱、电石、化肥等产量都成倍增长;二轻工业的发展,保持高速的有塑料、电子仪表等产品,电子仪表工业成绩最为显著,1965年时只有10家厂、1878名职工,到1976年发展到70家厂、12900名职工。轻工业新建了手表、自行车等工厂。这是杭州工人阶级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

企业是城市的基石,成群企业的紊乱必然导致城市机能结构的损坏;只是赖企业职工的奋发图强,方能勉强维护杭州城市命脉的延续。

第二节 坚持一大二公 廿年一脉相承

一般人把文革浩劫当作孤立的一件事,其实并非偶然突发事件,而是与大跃进一脉相承的。国际上研究中国“文革”最具影响的力作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就把大跃进与文革紧拴在一起。国内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也认为:“1966年起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正如1958年发生的3年大跃进,和毛泽东在这两个时期的其他失误一样,主要是毛泽东从1957年起形成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的变革上急于向所谓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乃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序》)。这恐怕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而是包括地方上不少领导干部普遍滋长骄傲而形成的左倾思潮。左倾思潮先后表现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者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政治性质,但内在联系紧密,具有渊源关系。正如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

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其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急求“一大二公”是一条持续多年的贯穿线。杭州城乡毫不例外,深受其害。以粮食产量为例,解放后本连年上升,至1956年达836915吨。提倡科学种田的1958年,粮食产量略低于1956年,全市的粮食总产量仍达833610吨,但以后几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促使粮食连年减产,1959年为822885吨,1960年仅为733865吨,1961年也只有792570吨。产量的连年下降,造成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普遍口粮不足,被迫实行“瓜菜代”,基本生活受到威胁。1961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强调“以粮为纲”,国民经济按农轻重次序安排,把重工业移向后面,加强农业生产放在重中之重,才使农业产量得到恢复,农业总产值保持每年递增4.4%。但“文革”开始,全市农业生产很快受到影响,形成了又一个产量低谷期。

1968年7月,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学大寨纳入文化革命阶级斗争的轨道,使学大寨走偏方向。原先的评工计分、定额包工被作为“工分挂帅”批判,推广不分劳动好坏、按底分死记的“大寨式政治评分”;社员们的自留地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开展三献一并(献出自留地、献出宅边地、献出零星果木称为三献割尾巴,同时并队升级),全市有1900多个大队从生产队核算并为大队核算。“一平二调”的做法又一次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了1971年2月,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号召纠正“三献三并”。但文革期间国务院的号令受干扰而打折扣,全市只有1040个大队(占总数的60%)恢复生产队核算。1972年市委曾派出120余人的工作组分赴郊区和各县的16个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一大二公”的风气仍然流行,大寨式政治评分依旧不分劳动好坏,干部利用职权乱支、透支、垫支的“三乱”严重,社队企业任意平调生产队劳动力;以及生产单打一,忽视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状况极为普遍。社员们对此反映强烈,而苦于无权抵制,结果生产效果自然受到影响。

总起来看,“文革”对农业生产也有冲击,不过由于造反派的中上层头头对城市的控制力强,对广阔的农村相对而言控制较松。所以“文革”期间,杭州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还是继续发展的。“三五”计划(1966~1970年),粮食年平均增

加 2.1%；“四五”计划(1971~1975 年)，增幅减低而仍有少量发展。但是由于公社的劳动形式过于集中，经营方式又过于单一，生产带来的收益难以合理分配。农民们对此有改革要求，有些地方自发地试行包工到户、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结果都被公社革委会压制下去。因此“文革”时期农村经济是建国以来发展最慢的时期。种植业为主的单打一生产方式也限制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从 1966 年到 1976 年这 10 年间，除了牧业的产值稍微有点上升以外，林业、副业、渔业、多种经营等方面的收益均明显下降。因而这 10 年间整个农、林、牧、渔的总产值平均年递增仅为 0.9%；而且各年度的产值很不稳定，如 1966 年后连续 3 年整个农业总产值低于 1966 年；1972 年后又连续 6 年减产。1972 年政府提出“棉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使棉农思想波动，以至棉花在 1972、1973、1974、1975、1976、1977 连续 6 年减产，由 60 年代的平均亩产皮棉 50 公斤降至 70 年代的 40 公斤，单位产量下降达 20%，苎麻的生产向来靠闲散的劳动时间利用房前屋后、零星杂地种植，集少成多，产量可观。全市苎麻种植面积最多时达 3900 亩，产量最高时达 323 吨；1958 年公社化和 1968 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后，全年的总产量降至 21 吨。可观的财富在无形中流失了。

“文革”对于商业工作同样有严重干扰。在轻视流通的思想影响下，商业、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明显滞后。1966 年商业工作几乎陷于瘫痪，计划一度中断。由于广大消费的客观需求，和商业、交通运输职工的敬业精神，维持着市场的缓慢运作，10 年间保持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增长 4% 左右。

事实证明“一大二公”貌似进步，实质有害。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而去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势必会遏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节 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超常发展连连受挫

农民进城 一度掀起高峰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密切，适当处置可以互相促进；但倘若处置失宜也会造成对社会的破坏。常见的现象是适应工业建设的需要、工程项目的增多和扩

大,会有大批农民被召进城市去当工人。关系是一个“度”字,即工业发展的速度与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都需要科学合理。

我国自1958年起盲目开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加快步子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土法上马”的小高炉迅猛地发展到60万座,这就急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支援。除了大炼钢铁,其他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也齐头并进,大批上马。根据全民动员的组织需要,城乡普遍组建人民公社。继1958年8月农村开始全面建立人民公社,同年9月,河南率先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不到10个月,全国各大中城市也如同农村一样普遍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这种城乡联动,全面公社化,从形式上强制推行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做法,势必产生一系列的混乱。尤其是杭州,自1958年起既已列为“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就有大批工业项目陆续上马。在既无原料、又乏燃料的状况下,草草创办起几座规模不小的钢铁厂,各行各业也学着土法上马,大造小土高炉。处在宏观的大跃进形势下,杭州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高峰期很快就到来了。

就全国而言,1958~1960年的三年时间,总共有1970万农民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起来。到1960年,全国总人口66207万,其中城市人口增加到13097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的15.4%在三年内超速增长为19.7%,这显然属于失常的社会剧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既是全国性的,因此杭州的农民涌入城市,同样呈现出势不可挡,三年间非正常的膨胀连续跨越三个台阶。尽管按照“城市规划”原定控制城市规模为60万至80万人(1949年为68.67万人),而1968年起的三年高增长为:1958年突破百万达到108.15万;1959年又突破一百一十万人达到117.85万;1960年更突破一百二十万大关达到126.55万人。计三年涌进杭城27.06万人,增长率达到27.2%,为历来所罕见。粗看是好事,其实隐伏着危机。

实际涌进杭州的农民还远远不止上述比例数,因为上面的数字是每年年底的正式户口数字。除此之外,当时工业战线的大兵团作战,成千上万来自农村的临时工,一批批应召而至,并未计入正式户口。而且平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进进出出,成群结队的农民群众的拥进拥出无法统计确数,与其说是抽调农民帮助城市工业建设,不如说是无序的削弱农业战线、打乱农村的正常生产秩

序。当时农村办公社,城市也是公社,所谓公社,即亦工亦农,工农不分,城乡不分,于是产生了“城市和农村互相竞争劳动力的紧张局面”(陶鲁笏《论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新发展》,1958.5.16《人民日报》)。其后果是全国农村至少损失100亿个农业劳动日(据当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估算,正常年景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日约需600亿个)。为了解决工农业两条战线之间争夺劳动力的问题,采取的权宜之计是在公社里组织后备劳力,需要时便调到工业战线。在农闲时大约有40%的农业劳力用于工业任务,特别是炼铁任务。当跃进之年进入狂热的尾声时,农村告急,急调“突急队”返回田间。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示突击抢收庄稼和抢运农产品,学校停课下乡劳动,机关干部和商店营业员应征参加农业劳动,非重点工程也停下来,以便提供更多的劳力。这时“劳动不计报酬,不计时间,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到哪里;需要干多久,他们就干多久,不分白天黑夜,干在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其中既有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既有妇女,也有儿童”(详见《人民日报》1958.10.9社论和1958.11.9社论)。即使这样紧急地组织突击劳动,很多地方的庄稼还是没有全部收获上来。正如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所抱怨的:“虽然今年工业产量增长了66%,但与调派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农业战线而造成农业方面的损失相比,我们得到了多少?而我们的损失又是多少呢?”(见事后揭发的1967.2.22《红卫兵报》第8期)可见畸形的工业化所推进的畸形的城市化,对国民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都不见得有利。

超常速度 无法稳定持久

世界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贝利曾断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的进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彼此之间需要协调发展。倘若破坏这种内在联系,就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并产生逆城市化。

我国在1958~1960年的这种城市化速度,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破坏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这一局面势必难以稳定和持久。结果果然很快出现了全面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衡,不得不于1961年宣布实行调整政策,走回头路,紧缩城市工业的发展,并动员2000多万人口返回农村。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再次涌入城市,特地制定了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政策。可以说,后来多少年的城乡隔离制度,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强化起来的。杭州同样严格执

行城乡隔离制度,凡 20 余年之久。这以后虽有时放宽一些,但总体上城市户口控制严格,“农转非”是很难的。尤其是在“油粮凭证供应”的年代,农民即使擅自进了城市(进城须持证件),吃饭也会发生问题。试从历年城市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统计资中可看出 1959 年左右曾一度达到高峰,此后不久发生巨大落差,而且连续下降了将近 20 年。据《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资料计算出大跃进到文革浩劫城市人口变动情况绘成简表如下:

年份	全国总人口 (万)	城市人口 (万)	城市人口占全国 人口比例(%) (万)	城市化率	附注
1957 年	64653 万人	9949 万人	15.4%	(1959 年 形成高峰)	
1960 年	66207 万人	13073 万人	19.7%	+4.3%	
1965 年	72538 万人	10170 万人	14%	-5.7%	1961~1963 年 大下放
1975 年	92420 万人	11171 万人	12.1%	-1.9%	1969 年再次 大下放
1978 年	96259 万人	11988 万人	12.4%	+0.3%	

转引自《中国国情报告》1991 版第 780 页

由于出生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的绝对数除大跃进后特殊年月外,城乡人口数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城市化率的起伏却十分明显,即 1960 年比 1957 年上升 4.3 个百分点,接着至 1965 年下降 5.7 个百分点;1975 年又下降 1.9%;1978 年虽政治经济形势已根本上发生变化,但由于城市户口制度并未正式开放,城市化增长率仍然很低,仅只有 0.3%。

对这时期城市化大起大落的畸形的波动,中共杭州市委机关刊物《杭州通讯》(2003.3~4 期)整理出一篇《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程》的资料性文章,加以总结性的分析:城市人民公社化从形式上强行推行经济体制城市化,其结果反而延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年均增长 1000 万人,城市化水平由 1957 年的 15.4%跃升到 1960 年的 19.7%,但这种宛如在沙滩上建起的摩天大厦,根本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撞击,受政策失误,经济陷入全面萎缩,城市化在这场危机中遭受挫折。1961 年国家为缓解饥荒,开始大规模地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在城市里

挨饿的工人及一切可能动员出来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全国压缩城镇人口 3000 多万,精简职工 2000 万左右,出现了第一次逆城市化现象。1964 年全国城市化水平猛跌到 14%。此后十年动乱,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社会动荡,大批城市里的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断被分配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加上国际局势恶化,领导层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和去三线建设”的主张,于是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撤离城市,转向偏远山区,这样便出现了第二次逆城市化现象。其中下放呼声最高的 1969、1970 两年,城市化水平骤降到 12.2%,相当于倒退回 1952 年 12.46% 的水平。直至文革结束时始终维持着这种低水平徘徊的局面。

根据《杭州 50 年·统计资料显示》,杭州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于大跃进和文革前后连续下降了二十年,从 1959 年的 33.66%,降至 1978 年的 22.95。基本情况与全国大同小异,仅仅是比例略高,以及出现“假城市化高峰”比全国提早一年。杭州是 1959 年达到高峰,以后也直线下沉,这是宏观经济形势所决定的了。

详细情况可参阅下列逐年变化的统计数字,从农与非农的对比,以及两次运动前后的变动趋势中见其梗概:

据《杭州 50 年》载:杭州市 1958~1978 年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连年下降情况(每年年末统计数)

年份	全市总人口 (单位:万人)	非农业人口 (万)	农业人口 (万)	非农所占比例
1958	372.75	108.15	264.60	29.10%
1959	384.41	117.88	266.53	33.66
1960	391.16	126.55	264.61	32.21
1961	393.79	119.23	274.56	30.27
1962	403.74	108.96	294.78	26.98
1963	416.36	108.83	307.53	26.13
1964	426.76	104.96	321.80	24.59
1965	435.66	107.29	328.37	24.62
1966	441.84	106.64	335.20	24.13

年份	全市总人口 (单位:万人)	非农业人口 (万)	农业人口 (万)	非农所占比例
1967	449.35	107.92	341.43	24.01
1968	456.39	107.14	349.25	23.47
1969	455.58	104.49	351.09	22.93
1970	458.82	101.94	356.88	22.21
1971	467.81	105.98	361.83	22.65
1972	474.06	109.08	364.98	24.75
1973	480.62	110.10	370.52	22.90
1974	485.68	109.87	375.81	22.62
1975	491.68	110.87	380.81	22.54
1976	495.91	112.05	383.86	22.59
1977	499.96	112.14	387.82	22.42
1978	505.55	116.06	389.49	22.95

上面的数据虽然反映 1979 年以后基本上制止住了不断下滑的趋势,但此后城市化的回升劲头并非马上强烈地释放出来。一直到上世纪末才放开城市的户口控制,1997 年杭州城市化率达到 33.60%,才基本上恢复到 1959 年的 33.66%。不过有一点本质上是不同的,即 1959 年的 33.66%属于建筑在沙滩上的“假城市化”,而 1997 的 33.60%,属于基础扎实的城市化率,具有发展的后劲。

值得深思的是大跃进和文革动乱的折腾,以及盲目的工业化单向突进的超常发展,整整消耗了前后长达 38 年的城市化历程,才回归于 50 年代末的起点。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虽多,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城市的经济循环。高度集权的政治挂帅绝对支配着经济计划与城市规划,决定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单向突进,排斥了城市结构的多元化与经济功能的多样化,削弱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工业以外的商业、交通、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企事业不预协调发展,民间潜在的市场运作力量受到遏止,以致城市不仅难以吸收农村广大的剩余劳动力,甚至连城市本身

的就业问题,也不易解决。加以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出于速度减缓的工业所能提供的就业份额,落后的“三产”和僵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都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阻力。于是一面严格限制农村人口的流入城市,一面宣传“农村是青年发展的广阔天地”,不断推动“上山下乡”等城市人口向乡村反向流动的反城市化潮流,持续蔓延,长时期抑制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

第七章 结束动乱后寻求发展

1976年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杭州城乡人民像全国人民一样在政治上松了一口气。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已形成一种强固的惯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制度经济学有“路径依赖”的说法,走惯了的轨道,时间长了,大多愿意遵循旧轨道走,只怕离开了旧轨道会乱了秩序。而长期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仿佛就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而往往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使命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尽管对“两个凡是”之类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作了批判,而习以为常守旧保守的思维模式僵化已久,决非短时间所能彻底改变的。“实验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助于对以往错误做法的否定,却并不能立即总结出当前所需要的改革经验,为此中央指示“摸着石头过河”。杭州的各项工作,除了清理动乱时期当权的造反派和制止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日常运作的方式方法大多依旧遵循旧的框架,只怕急转弯酿成翻船。事实上干部们的思想定势一时不易变更。因此自1976~1978年,所有城市原有的制度环境未见明显的更新。经济的好转仅仅限于停止动乱后的低度增长。杭州的城市工作既然未能大胆作大幅度的调整,所以真正的改革又继续滞后了几年。不过在质变以前的量变还是有价值的。

1976年,杭州工业企业开始了恢复性的整顿,必要的规章制度进行了重建,名店老企业恢复了老牌子。接着,杭州市委根据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作出《关于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本市工业的意见》,将区属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交企业全部上收,按行业分别

划归各工交局,并根据干部“四化”的要求,调整和充实了市工业各局和所属工厂、公司的领导班子。

老干部们重新出山,最擅长的领导方法还是搞运动,不过把政治运动改变为工业学大庆运动。职工群众受到政治鼓舞,热情高涨起来,扭转了连续两年工业生产下滑的趋势。1976年完成工业产值26.24亿元。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毕竟比上一年增长4.52%。1977年,工业产值进一步达到35.92亿元,算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了。

这一阶段重点放在清理干部队伍,加强组织建设,恢复生产秩序;至于如何深化改革,尚处于左顾右盼,听听上面的新指示精神,看看大都市上海有何动作?工业建设持重为主。市委决定先从农村的改革入手。

第一节 杭州冲破惯性 农村改革领先

农村成为改革的先驱,其道路也相当曲折。同样由于制度环境的制约,30年来培养的农业干部大多习惯于集体化的生产体制。由于僵硬的思想定式,如一听到有人敢于大胆提出“包产到户”的设想,不少干部马上群起反对,大声嚷嚷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才几年,你们竟要提倡包产到户,这是丧失晚节。”所以出于一般人的想象之外,不但1976~1978年农村很少人敢于触及生产体制的改革,就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也未能肯定“包产到户”或“大包干”,反而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直至1982年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俗称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才正式公开肯定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可见经历几年磨砺,公有土地家庭经营的合法性方始受到确认。那是由于现实的危机,促成了改革的,以杭州为例,粮食产量1977年低于1976年,不增产反而减产;1979年杭州粮食产量1900715吨,而1980年和1981年分别为1517385吨和1562840吨,继续减产。全国的农业形势同样告急,人口增长,吃饭问题解决困难。人口不断增长,人均粮食始终盘桓于300多公斤,其中除了口粮,还包括用于饲料、工业用粮。8亿农民中贫困人口占2.5亿,粮食不能自

给,要依赖进口。农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集体生产的耕作方式维持不下去,引发了上层干部对过去僵死的制度环境的反思,提出反对“两个凡是”,其中有包产到户这一条。经过实践检验包产到户可以提高产量,为什么废弃不行而偏要墨守成规守穷挨饿呢?

主持“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杜润生(杜老在建国之初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回忆农村改革起步时经历的困难说:包产到户本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已经三起三落,约有20%社队自发试行过,但屡次都受到上级批判而遏止。1978年冬又有安徽省的3个县自发进行联产责任制的尝试。1979年春,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召集7个农业大省有关人员讨论责任制问题。那时7个省都不同意马上推广安徽试验包产到户的办法。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时,主张坚持集体方向,但说了一句“山区单门独户不好搞集体活动的可许其包产”。这样中央下发的文件继续规定了“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开了个小口子,对于有的地方有人包产到户不要批斗。1980年不少贫困地区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姚依林找我(杜老自称,编者按)商量,我就建议试一试包产到户,把土地包给他们,让他们靠自己弄饭吃,汇报到邓小平那里,小平表态同意,从此开了一个大口子。1980年中,中央改组后,主要领导一致赞成不同地区可以搞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自由选择。试验结果,一包就灵,贫困地区第二年就有饭吃,其他地区普遍增产。事实说服了多数人,这样,农村改革揭开了序幕(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

杭州农村较有活力,自1980年下半年起,即自发地开始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时的主要形式,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计酬。另外还出现少数的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责任制,或小段包干定额计酬责任制,形式多样,没有统一规范。1982年1月中央“1号文件”出来,全市各县放手地行动起来,把各种责任制形式转为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便有了充分的产生经营自主权。到1983年,全市农民实行包干到户的大田作物达总数的98%;接着进一步把统管山、水面、茶园、菜地和奶牛场、农场也承包到户;并普遍延长了承包期。全市包干农户增加到99.8%,还出现专业户16061户。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杭州地区农业生产连年

丰收。1984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比 1978 年增长 1.17 倍;农民人均收入比 1978 年增工 2.7 倍。

由于各种专业户不断增多,调整了农林牧副渔业的结构,发展商品经济,也推动了农村第三产业,推进了农林牧渔购销体制的改革,专业户人数迅速增至 24500 人,组成新经济联合体达 1979 个。全市近 6 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投向专业和联合经营活动,他们开始兴办农村运输、饮食、服务、建筑和商业,形形色色的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乡镇工业的兴起,更成为乡村城镇化的驱动力。联户、合作、私营、个体、股份经济并行,从而彻底动摇了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给原有制度环境以巨大冲击。可见,1982“一号文件”在农业改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年杭州农林牧副渔全面增产。

1976~1982 年农林牧渔生产数据(《杭州市志》第三卷)

年份	农林牧渔业 总产量 (万元)	其中农业 产值生猪 存栏(万头)	深水产品 产量(吨)	牛奶产量 (吨)	禽蛋产量 (吨)	
1976	88543	67189	140.05	9930		
1977	88985	67279	150.26	10790		
1978	85922	67365	185.75	11162	9200	4.83
1979	115649	84727	209.93	13360	11514	7.56
1980	112377	79006	196.16	14080	13342	9.53
1981	120792	87354	176.41	14890	15003	8.63
1982	150606	107566	180.26	17345	18079	9.31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杭州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文革结束的 1976 年起,呈缓缓回升之势;而 1982 年开始发动农村改革的关键性一年即第一个“一号文件”下达之年,成绩最为显著。冲破了这一突破口,不但解决了杭州农民的温饱,满足了城市的菜篮子,而且对城市的启动改革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使更多的人去反思与认识过去城乡各种单一公有制的弊端。

第二节 试行商业改革 推动三多一少

伴随农业改革的先导和工业的恢复性整顿,杭州市商业体制开始向“三多一少”逐步转变,即向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济形式和减少环节的体制改变。杭州毕竟是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活跃市场具有一定基础,体制对路,商品流通很快活跃起来。这里摘录杭州市 1978~1985 年商品零售额构成情况有关资料列表于下,分“全市”、“市区”两种统计表(单位万元):

年份	商业零售额	饮食业零售额	工业零售额	农民对非农居民零售额
全 市				
1978 年	96270 万元	4387 万元	7256 万元	未统计
1979	118860	5485	10668	未统计
1980	145885	7279	20554	4007
1981	159562	8329	27714	5879
1982	169046	8768	27492	7228
1983	185509	9849	30014	8217
1984	223202	12397	39466	11114
市 区				
1978	43243	2774	3146	
1979	53094	3617	5439	
1980	65053	501811544	1952	
1981	71922	582315527	2856	
1982	75677	624113191	3288	
1983	83085	694314496	3837	
1984	10491	482031946	55754	

以上数据充分反映文革以后商业零售额、饮食业零售额、工业零售额和农

民对非农居民零售额均逐年递升,一方面说明动乱停息国泰民安,市场就易活跃;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类型正在加快变化:1978年全民的商业零售额占主导地位,达95730万元;集体相对小得多,为16380万元;而个体仅72万元。到了1984年,集体的零售额明显超过了全民,个体也大大地发展起来;农民对非农居民的零售额也迅速增至11114万元,这都得益于农村的经济改革。相对而言,全民所有制商业的零售金额增幅有限。总之,商业零售额的活跃,尤其是非全民零售额的激增,充分体现市场的繁荣。民营经济的增长,是城市繁荣的重要推动力。

自从1958年起片面追求单一公有制和单向工业化,经济大起大落。杭州城市走向凋弊,历尽曲折;至1982年正式开展农村改革,进而影响城市的商品流通体制,促使城乡人民的均贫生活开始缓缓地回过气来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杭州人民终于摆脱掉粮票、油票、布票、肥皂票、火柴票,什么都须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时代,温饱得到保障。对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人们十分珍惜,因而也加倍勤奋!自此春满人间,城乡气氛终于回暖了。

第三节 重修城市规划 明确城市性质

早在1958年杭州市编制了《关于1958~1967年的城市建设规划》,于1959年10月由中共杭州市委上报给浙江省委,省委口头同意按此规划实施,即以发展工业为中心,“建设成中等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1960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于是杭州的城市规划落入低谷,十年浩劫中彻底废弃了规划。

动乱结束后,于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重新强调“全国各城市,包括新建城镇,都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各地区的具体条件,认真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近期规划和详细规划。”省委集中省市有关单位规划设计人员59人,重新编制杭州城市的总体规划。1979年12月,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市区135个单位参加研讨会,讨论这个城市总体规划初稿。

1980年11月27日,市规划局将规划初稿报市革命委员会审定。1981年11月14日市革委会报省人民政府转国务院审批。1983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复浙江省人民政府“原则同意杭州市的城市总体规划”,批文中指明,“杭州是省会所在地、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不再重提“建设中等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这样定位比较符合杭州的城市个性,从而纠正了二十余年来城市规划的误导。

按照国家规定,总体规划至2000年;近期建设规划至1985年。要求严格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市区人口近期控制在95万人;远期应控制在105万人以内。”市政府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采取4条严格措施,诸如:凡迁入杭州市区的户口,一律须经市人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每年制订城市人口增长指标,超过指标的不得迁入;控制外地单位搬迁来杭或在杭新建单位;对应迁出的人员进行清理,由公安部门督促迁出。这些措施虽执行严厉,而客观上导致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城市人口必然增长。1978年人口开始涨势甚猛,仅四年中由78.73万人增至92.72万人,净增14万人,其中机械增长占84.4%,由农转非的比例极小。事实反映这样的控制城市人口的做法,是不合乎世界城市化潮流的。

对于工业区调整措施比较合理。1958年起成形的工业布局,不适合于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为此规定:旧城内的机械工厂可外迁去半山;半山重工业区原则上不再新建重工业工厂;市区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的小型化工厂迁往祥符桥、小河一带;轻工业区不再新建化工厂;望江门外食品工业区内的化工厂也须逐步迁出;中村、周浦、石龙山一带原则上不再建新厂矿,控制开山,保护风景资源;旧城污染环境的纺织厂迁往拱宸桥……这样有助于改善长期来铸成的污染城市、破坏风景资源的工业格局,但成形的布局,调整工作困难不小,需要经历一段过程。

对于文革期间严重毁坏的文物古迹,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修缮和补救。最典型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坟墓、庙宇、塑像、匾额、对联及有关纪念文物均被红卫兵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污损;女英雄秋瑾等辛亥革命烈士坟墓也遭挖掘;推进杭州城市化的先驱人物钱镠,其故园遗址所建古迹钱王祠,在极左路线时期竟被改建为动物园,祠内文物损耗殆尽;分布于环湖诸山的许多珍贵石窟艺

术,有不少被人莫名其妙地敲坏甚至砸烂;名胜古迹的不少石碑被砸断,名木遭砍伐;净慈寺、天竺等名扬中外的名刹遭权势者强占;有些有价值的名人故居旧居,被房管局任意安排进去许多居民,住户拥挤,炊烟四起,门窗擅改,墙壁乱涂,杂物纷呈,成为乱七八糟的贫民窟……天堂形象、西湖风采被野蛮抹黑了。为此市园文局申请有限的经费分批修缮,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计修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1 处,又申报保护的单位 20 处,抢救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和遗迹遗址。

城建部门也对劫后寥落的市政设施及时开展维护,修桥、铺路、浚河、引水、排水、亮灯……费时几年,终于使城市面貌基本复原。

但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须与经济增长同步。80 年代前半期城市的经济实力有限,缺少经费,还谈不上系统的城市建设,大多临时应急,工程项目常因陋就简,以致城市的总体形象不可能彻底改观。诸如道路受侵,空地圈占,街巷拥挤,违章建筑一时难以拆尽,甚至有不少棚户散见路边,影响观瞻。环湖住宅尤为多年来西湖的一桩憾事,还湖于民的工程迟迟受阻,影响自然舒展之美。何时才能真正建成诗情画意的园林城市呢? 还需等待此后几届市委、市政府的进一步努力。

第四节 复兴文教事业 重启灵魂之窗

教育是城市灵魂之窗,学生是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和后备队。浩劫中高等学校长期关闭,整整 12 年停止公开招生(1966 年开始停招,直至 1977 年冬才恢复公开招生)。中学、小学时开时停,教师丧失师道尊严,广大学生荒废学业,坏人煽动“打砸抢有理”和“交白卷光荣”,毒害了整整一代青年。连国外许多朋友都清楚,在这场大破坏中,受害最大和最深的就是这一代青年。全国将近两亿青少年本该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却在紊乱中荒废了学业,胡闹着过日子,蹉跎了宝贵青春。如果说他们所受思想上的毒害还可能消除,但要弥补他们文化科学知识上的损失,那就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事情。紧接着又有两亿一千万的青少年需要上学。所以动乱结束后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加紧办好教育,

以重启城市的灵魂之窗。

但是国家当时还很穷,不可能拨出大量教育经费。1977年恢复高校公开招生时,杭州考区所招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总数不过数千人,加上历年保送在校的工农兵学员,各校合计才只有9761人。以后逐年扩招,1978年达到13319人;1979年达17518人,超过了文革前的15164人;1980年为23545人;1981年达到28936人,几为文革前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过去高校均归中央和省直管,杭州市自办高校始于1978年,为加强基础教育培养师资,补救中学教师断档,新建杭州师范学院;恢复杭州教师进修学院。为了适应医务人员的需要,杭州自办了医专。

中等专业学校在文革前原有学校15所,在校学生总数为8321人。文革开始后学生人数明显下降:1970年为2911人;1971年只有1556人;1972年为2743人;1973年为2369人;1974年为5161人;1976年为5243人。至1978年,学校增至26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8711人,人数超过了文革前,学校数几乎超过一倍。

高中文革前的1965年全市仅34所,在校学生10136人;文革后的1977年学校增419所,在校学生多达133771人。校数和学生人数均增加了13倍左右,增幅之大为历来所少见。

初中由文革前的1965年学校66所、在校学生52095人,至文革后的1977年学校增至228所,在校学生达到267492人;校数和学生数也增加了多倍。

小学文革前的1965年有学校4418所,在校学生496096人;文革后的1977年为学校5312所,学生总数620968人;前后对比也有较大发展。

总体来看,杭州市政府在财政收入不宽裕的情况下,对教育投资增量较大,同时加强了尊师爱生的教育,注重校风的改善。

市区文化事业也有发展。文革时期剧团、剧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全面关闭,只有保留电影院继续开放,主要是用于放映样板戏。文革后文化事业单位全面开放,且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增设最多的是文化站,1979年在全市范围内广建文化站,从无到有,共建立27所。其他如电影院、剧院(剧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均陆续增加。

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所作所为,从打砸抢的角度看是野蛮的文化;从关闭

学校,倡言“交白卷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臭老九”,说明是一种愚昧的文化;从鼓励学生侮辱老师、反对尊长,甚至毁坏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坟墓塑像,实在是非常落后的文化;总之是与先进文化背道而驰。针对极左时期的沉痛教训,杭州市加大教育的投入,扩充文化的设施,普及国民教育,注重尊师爱生,讲文明,讲礼貌,从而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挽救一代青年,并可保证社会安定。

小平同志再度出山之时,一开头就主动请命分工去抓科技和教育。在1979年中国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了长篇讲话,着重阐明科学、教育和四个现代化的关系。1980年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也代表党中央作了长篇讲话,着重讲了“发展科学,发展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门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开发。”杭州市的重视科技、文化、教育的投入,正是与中央的大政方针相一致的。在动乱后百废待举之时,工业、农业、商业、城建等方面虽均有进展,而增幅都不太大,只有教育事业的发展一马当先,作出较大成绩,为杭州这座文化城市摆脱愚昧、重启灵魂之窗,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八章 开展有序的改革开放

第一节 从探索性改革进入城建有序的开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与全国一样进行各种探索性改革,最先是在农村实行改革,以后才逐步由点到面,扩展到城市改革。但真正进入系统的城市改革是由第三轮杭州城市总体规划的全面实施开始的。因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各项体制的基础。城市的改革既须从属于社会制度,又须体现城市自身的规划体系和个性特点。

建国后的杭州曾先后于 1953 年和 1958 年制订过两次城市规划。但这两轮规划都因不切合杭州城市的特性,导致城市和建设发生偏差。所以城市的系统改革必须抓住这一切口,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偏差。至 1983 年国务院原则上同意杭州市上报的城市总体规划后,紧接着于 1984 年 9 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讨论杭州市改革和开放问题的会议纪要》,指明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有别于一般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城市;而且还指明了杭州城市全面改革的方向,这无疑是启动杭州深化改革的契机。

中共浙江省委据此于 1984 年 11 月 7 日给杭州市委发出《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对杭州城市改革的方向和总体规划的实施提出 7 条补充性的指示:

1、鉴于国务院《关于讨论杭州市改革开放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指出,要把杭州建设成为中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光旅游城市,按照这

个要求,杭州城市总体规划中应当把发展旅游事业列为第一位的任务。应在保护和建设好现有西湖风景区的同时,积极开发新的风景旅游点,进而把西湖风景同新安江、黄山、雁荡山、普陀山等风景区联系起来,形成中国东南部旅游网络,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事业。

2、应适当放宽人口控制规模,扩大城市用地范围,逐步开辟钱塘江南岸科学文化区、乔司下沙轻工业区和珊瑚沙、袁浦旅游区。

3、要在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杭州现有的工业基础,积极发展旅游工业、新兴工业和传统工业。大中型工业项目,宜放在郊区和卫星城镇。

4、杭州不但是历史文化名城,而且还应当是现代科学文化名城。要充分利用杭州的优势,积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人才,发展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提高杭州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

5、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景区的旅游宾馆,应在不破坏西湖自然景观、不扩大现有占地面积的前提下,适当改造,增加配套设施;同时有计划地把景区内的工厂改建为旅游设施;允许农民按规划要求,在农民居住点内建造一些与周围景观相协调的具有江南农村风格的旅游建筑,以发展旅游业。

6、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杭州城市建筑的步伐,尽快改善城市面貌。要注意吸收先进的建筑思想和技术,注意保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提高建筑艺术水平。建筑造型务求优美,层次高低相间,错落有致,不搞一刀切。

7、第二钱江大桥建在四堡的方案应早日实施。杭州铁路枢纽工程应由西线方案改为东线方案。

市委、市政府立即根据上述指示精神,调整和修改城市规划,并确定“五优化”原则——即优化市域城镇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优化中心城市圈布局,合理分布产业和人口;优化城市用地结构,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保持旅游名城特色;优化城市基础设施,提高整体水平。

大政方针确定以后,城市改革和建设就据此基本原则,把准方向,有计划地开展,避免重复过去的偏差。特别防制城市化滞后单向追求工业产量而致社会失衡。为了有序地扩大城市空间和城市规模,促使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需要

在优化环境的前提下,落实基础设施的各项具体规划,一边建设,一边落实专项的规划工作,力求摆脱规划滞后,以保证城市的整体发展。为此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着手制订杭州城乡建设管理法规体系。

这个规划体制的一系列内容,包括城市布局,风景园林,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业,土地管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环境保护,综合管理等许多方面,一一具体落实才能完成规划体系,这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首先是补充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全市城镇体系规划。城郊各乡镇在总体规划指导下陆续开展建设^①。接着是妥善安置工业园、第二文教区地块、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等 11 个区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同时为城市的经营作准备,着手制订了上城区和下城区可供出让地块规划,涉外房地产地块选点规划;四季青乡第三产业发展集中居住用地布点规划;以及为滨江区涉外出让地块提供规划设计条件。由杭州市设计院等 4 个单位与加拿大斯坦利联合工程公司等单位合作研究《杭州市战略交通规划》,运用国际上先进的 EMME/2 交通规划软件,开发出具有杭州特点的交通模型,用以预测今后杭州市交通路网上的自行车、公交乘客和机动车流量,提出近期交通治理改进方法。1992 年 7 月编制完成的《杭州市环境卫生实施规划》,附有城市垃圾粪便收运体系图、环卫设施现状图和环卫设施规划图等详细的规划基础资料。规划期限虽以 1992 年至 2000 年为主,对 2000 年以后也作了轮廓性的规划安排。各方面的专项规划走在建设工程的前面。

在城市建设的实践中,使全市各级领导明确城市规划工作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必须树立超前服务的思想,因而改革和完善了城市规划的内容和手段。一方面非常重视超前编制城市地块开发控制性详细规划,另一方面还提前抓好 2020 年城市总体规划的修订工作。同时使城市规划与管理,结合旧城改造,建立一套完整的城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办法,为城市建设集资聚财开拓筹措渠道。

^① 规划编制工作,其中留下、祥符、转塘、周浦、袁浦、龙坞等乡镇的建设规划编制,经市规划局技术鉴定后,由市政府批复,分头实施。90 年代初,相继完成了市区主要道路改造工程——庆春路、延安路、解放路、中河路、复兴路、城站广场改建的控制性规划;又完成了西斗门地区、北山街地区、转塘别墅区、中北地块、北应家河地块、上塘。

回顾杭州城市第三轮的城市规划,基本上做到科学合理。对于端正发展方向、调整布局结构、优化城市环境、安排基础设施、指导项目开发、促进城乡协调、保护历史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龙头作用、调控作用和保障作用。所以“六五”至“九五”期间,杭州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建设都能总体上做到稳步前进,并保持城市特色。当然,不足之处尚多,那是任何复杂的事物在巨大变动中,总不免会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第二节 开始繁育市场 改革经济体制

在此以前,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调节经济运行。这种经济体制实质上是自上而下的单一性计划经济,缺乏市场调节;又以国营企业垄断,缺乏多元的竞争与协调;一般说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这无疑是造成“短缺经济”的根源。随着农村改革的初见成效,给了城市的干部和群众以很大启发。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杭州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开展起来。

正好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杭州顺势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开展阶段。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仍然是围绕着改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协调,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展开的。这一阶段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改税;推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内部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和奖金制度、报酬与生产效益挂钩;探索性地开展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的试点。与此同时,进一步培育市场体系,改革流通环节;放开郊区种植的蔬菜及部分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资金市场、科技市场和建筑市场;推行资金、人才、技术、物资等全方位的横向联合。随着微观经济的搞活,建立起以经济杠杆协调会议为主要形式的宏观调控机制,为城市如何有效地开展分层次的宏观管理进行有益的探索。

关键是企业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大中企业的改革,难度极大。由于长期来

形成的旧体制,使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分配体制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对外体制上,封闭性强,外贸口子小,统得过死;产销分离,工贸脱节,以致城市经济的内在联系肢解,难以发挥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的作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局部的改进,能收一时之效,却不易从根本上促使企业机制灵活起来。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步骤地推进。

首先在计划体制上,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在工业方面,杭州市原来有 100 多种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至 1985 年减少到 29 种,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20% 左右;实行指导性计划的约占 40% 左右;其余都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安排生产。在物资供应方面,1985 年 9 月,国家体改委确定杭州为全国推行生产资料市场试点城市之一,计划分配部分所占的比重逐步降低,煤炭、钢材、生铁等计划分配比例均降到 40% 以下;计划外物资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工业品指令性调拨品从 1978 年的 200 多种减少到 5 种。固定资产投资体制,除个别国家重点项目外,全部由国家拨款改为贷款。这些改革,标志着集中统一的计划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以后几年沿此路线前进。

其次在价格体制上,本着积极慎重、“调放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稳步地进行物价改革。由于“文革”期间物价长期冻结,造成许多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价格严重背离了自身的价值。加以 20 多年来的“短缺经济”形成的凭证供应、凭票配给,票证品种越发越多,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苦恼。杭州对物价的调整分步进行,先从 1979 年开始对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突出不合理物价进行适度调整;断断续续依次推进;1984 年~1985 年把主要矛盾全面理顺;少量较紧缺的物资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初,才彻底消除票证,全面放开市场。最先是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以及部分日用工业品的价格。农副产品平均提价 38%,不过只提高收购价而暂不提高销售价格,其中亏损部分由政府财政补贴,计 19 类商品在一年中由市政府补贴 4977.2 万元。后接国务院通知,公开提高猪肉、牛肉、羊肉、家禽、鲜蛋、蔬菜、水产品 and 鲜牛奶等 8 类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售价后发给每个干部职工每月 5 元副食品补贴。1980 年财政补贴的商品扩大到 38 种,政府在这年支付补贴达 7520.8 万元。1982~1984 年

放开三类日用工业品和小商品价格的品种共达 1179 种。对生产资料价格从 1984 年起实行“双轨制”，计划内的仍按国家定价，计划外的商品按市场浮动。1985 年继续对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并放宽饮食业及其他非商品收费标准。对火车站、码头、机场、宾馆的旅客游客以及部分高级饮食店的食客，实行议价供应米饭面食，可以免收粮票。其他饮食业采取平价（收粮票）、议价（不收粮票）两种不同的供应办法，让顾客自行选择。对猪、牛、羊肉、水产品 and 禽蛋等副食品全面实行议价议销，取消牌价供应。减少了中间购销环节，上市比例提高，市场价格基本平稳。到 1985 年时，全市农副产品国家定价收购的比重只占 15%，指导价收购的比重为 25%，价格完全放开的占 60% 左右。通过价格调整，促使生产量和销售量增加，全市农村向城市供应的农副产品总额大增，足以完全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之需，1985 年农副产品商品率比 1979 年提高 1.09 倍。多年来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过大的问题，初步得到缓解。这样，既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优质优价的鼓励下，鲜活产品大量上市，鲜、嫩、细菜比重和可食率提高、烂菜大为减少。工业品实行依质定价，对经营艰难的日用品进行扶持，小商品价格相继放开。至 1992 年，除国家和省管理的少数商品外，其余商品和劳务的定价权已全部放给了企业，实际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至此“粮票的故事”之类笑话终于成为往事。

深化企业改革，是在各级政府向企业放权让利的基礎上，积极引导企业内部改革。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在计划安排、生产经营、产品销售、资金运用、财产处理、人事调配、工资奖励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自主权。企业内部推行以“包、保、核”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先以大中型工业企业试行，然后参照推广于其他企业，主要形式有：岗位责任制，把各种考核指标分解成若干小指标，考核到岗位；按不同的考核标准计分计奖。同时配合系数计奖，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工厂对车间（科室）实行“四定、四包、四放权”：四定为定人员、定生产增长幅度、定任务、定奖惩办法；四包为包产量、包工资总额、包物耗指标和文明生产；四放权为车间（科室）有自选干部权，有对班组长的任免权，有一定的财务权、奖惩权。企业还根据不同的生产情况实行承包制：对亟待增产而生产能力有限的产品或零部件，实行承包，推动增产；对产品质量要求高的生产部

门,实行联产承包;对潜力较大的车间、班组,实行利润承包;对一些产品积压、销路不畅的产品,实行销售承包;根据生产和经营的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不同形式的承包制。对于小型国有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划分标准,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办法。市区的国有工业企业,以1983年调整后的利润为计算基数,人均留利超过500元的,每年按核定比例交纳承包费。对国有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即改为集体或转为集体经营、租赁经营。这些企业在1985年实行“改、转、租”后,大多利润有所增加。企业改革形成了“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逐步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改制。杭州市在邓小平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十四大精神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这一阶段杭州市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为中心环节,认真贯彻落实《企业法》、《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推广股份制,推进企业兼并,发展企业集团。企业兼并冲破了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界限,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和第三产业流动,如杭州制氧机厂兼并杭州船厂;杭州百货大楼、解放路百货商店,分别兼并杭州照相器材厂和杭州光学测绘仪器厂。区级校办企业娃哈哈公司,居然以100多人的小厂兼并了拥有职工上千人的省级国有企业浙江食品罐头厂,更一时传为佳话。杭州重型机械厂、浙江客车厂加入东风汽车集团,强强联合,形成更具实力的企业集团。全市按规范化要求不断组建大型企业集团。90年代初初步建成16个企业集团,1992年又紧接着建成青春宝、华东制药、汽轮动力等大型企业集团12个,共达到28个集团,且呈方兴未艾之势,队伍不断壮大。这些企业集团,大多是以一个经济技术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为核心,主要以资产关系为纽带,联结若干紧密层、半紧密层的企业,优势互补,发挥综合功能,实现规模效益,带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在企业管理上大多较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杭州企业规范化的先行者。在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的带动下,杭州市较快完成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的工作。至1997年末,已有3700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企业。7县市改制面也达到了70%以上。流通领域中商业企业联合兼并、连锁经营取得进展,杭州锦新食品商店当时成为商店连锁

经营的一个范例。第一批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有 100 多个市属工业、商业、外贸及旅游等企业,至 1999 年已有 53 个企业完成改制。区、县(市)属企业的改制进度也跟着加快。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面约为 57%,小企业改制面约为 68.7%。全市乡镇企业率先于 1997 年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结构调整,转为民营或股份制企业。企业改制促进扭亏脱困的进程,至 20 世纪末,全市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下降到 18%。

市场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后,已从早先的单一性农贸市场发展到门类众多、渠道畅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布局较为合理的市场网络。自 90 年代起市场建设明显加大力度,注重以发展上规模、高层次的商品批发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市油粮批发市场、市房地产市场相继开业。市政府接着决定在市区新扩建“东方商城”工业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茶叶市场、丝绸市场……至 1993 年计新扩建各类市场 87 个,累计各类市场达 485 个(市区 159 个,县和县级市 326 个),其中消费品市场 440 个,生产资料市场 35 个,生产要素市场 10 个。市场在数量增多的同时,规模大多扩大,从原来的马路市场、棚顶市场逐渐向多功能、高品位的室内大市场方向发展。市场管理得到加强,更多地采用了现代化管理和计算机操作。同时对市场环境、市场秩序、公平交易、商品质量,经常进行重点检查,以规范市场行为。市场贸易活跃,涌现出 22 个年成交额超过 1 亿元的市场,有 7 个市场排进了全国百强市场。批发业务建有专业批发公司和贸易中心,打破过去那种固定供应对象、固定供应区域的旧模式,改以城市为依托,实行开放式经营,从地区性封闭式的小流通向全国性大流通方向转变,形成了开放式交易型的新批发体制。1993 年入市交易的批发和零售总额首次突破了一百亿元大关。到 20 世纪末又突破两百亿元大关,零售额达到 204.72 亿元。

流通体制的改革,迅速地由国营企业一家独大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新格局。1984 年起,杭州对个体工商户在登记对象、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方面放宽政策,促进了个体经济大发展,形成了以公有制为领导而以私营个体为主力军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尽管公有制企业实力强大,不过个体商户发展速度之快、分布层面之广、参与人数之多,不能小觑。以市区商业服务业网点为例,总数数万户中大部分为个体和私人投资经营,其规模超过旧中国商业较

兴旺时期 1931 年的 10363 户,也超过新中国诞生初期商业最兴旺时期 1957 年的 12731 户。由于私营、个体户从事商业服务的活跃,使杭州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群众“理发难”、“洗澡难”、“做衣难”、“吃饭难”、“住宿难”之类问题,在 80 年代后期基本上获得解决。正是由于 1984 年起放宽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使市区商业服务业中各种所有制比例发生变化,1985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仅占 7.6%,集体所有制占 28.9%,私营个体和其他所有制却占有 63.5%;进入 90 年代,国有、集体商业服务业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个体私营联营经济快速增长。至 20 世纪末,全市个体工商户增至 172100 户,其中从事第三产业的达 151200 户;私营企业 20700 个,连分支机构登记总数共 21846 个。还有股份制和联营商业,合起来算数字十分庞大。不过,从总体实力而论,国有、集体的实力仍大于私营、个体,据上世纪末《'99 杭州年鉴》载:“全年国有、集体商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 110.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其中国有商业下降 4.4%,集体商业增长 4.1%;个体、私营、股份制和联营商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 94.48 亿元,增长 15.5%,其中私营、个体商业增长 66.7%,股份制和联营商业增长 19.5%”可见个体商业资金少、销售额低、而增幅惊人。

商贸企业改制,在市场竞争中加快步伐,并求规范化。90 年代新兴的连锁超市商业发展迅猛,各类商品市场增幅放慢,不少大型商场的营业额曾连续几年出现滑坡。30 个超市的连锁门店发展到 412 个,商业连锁经营以其方便、快捷、价廉的优势,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其销售增幅大大超过传统零售商店和一般商品市场,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杭州市召开商业连锁经营工作会议,确定把连锁经营作为商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以推进规模经营和规范管理为重点,通过资产重组、联合兼并、特许加盟等方式,进一步促进连锁商业加快发展。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下发《杭州市连锁经营发展规范(1998~2000 年)》和《杭州市连锁企业考核标准》,组织建立杭州连锁经营协会,以加强竞争中的自律,并引导其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为推进全市商贸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出台《关于加快商贸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按照“抓大放小”方针,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以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商业结构,推进企业改制。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配股工作,筹集资金 1.42 亿元,收购杭州园林旅游贸易公司,形成以百货业为主,集酒店餐饮、进出口贸易、房地产、旅游为

一体的大型集团化公司。杭州大厦以承债式兼并杭州新天龙实业公司,盘活存量资产,重组新的优势,并及时创新经营路子:以重点经营高档精品为特色,把购物中心定位在中高档,有计划地发展为高档商场,与其他大商场及连锁超市错位发展。在几年内聚集到 120 多个全国最著名的高档商品,有的是国际名牌产品,借集中的名牌产品造势,打响杭州大厦的品牌,争取到社会的认可,终于从一个账面亏损 191 万元、潜亏 1.4 亿元的亏损企业,在 10 年内发展成营收 88 亿元、赢利 10 亿元的商业旗舰——获全国大型百货商场单店中创造利润、上缴国税、人均创利、每平方米创利、每平方米营收五个第一,为彻底扭转大型商场下滑颓势创造先例。杭州市商业部门和大小企业共同加大开拓市场的力度,采取多种措施转变营销方式,调整经营结构,不断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全市消费品市场保持稳定的增长。

第三节 撤区扩镇并乡 探索城镇化之路

小城镇发展问题第一次受到中央政策的公开肯定是 1984 年。其标志性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这年,正好国务院办公厅给杭州市政府下达《关于讨论杭州市改革和开放问题的会议纪要》,中共浙江省委也给中共杭州市委发下有关杭州城市总体规划的《省委常委会议纪要》,三者同样是涉及杭州城镇改革指路明灯式的历史文献,不但启动了杭州的城市改革,同时也推进市郊区和各县迈出城镇化的步子。接着又陆续出笼“小城镇、大战略”、“促进小城镇发展”、“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等一系列指示,这都有助于促使杭州城镇化进程加快步子,摆脱前几年城市(镇)化徘徊不前的境况。

首先表现在不少建置镇仿效杭州城市规划,制订本镇的发展规划。譬如萧山全县 24 个建制镇中就有 21 个镇作了总体规划的编制,并送上级评审。1985 年对几个集镇试行集镇一级财政;1996 年全部乡镇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上交(或补助),增长分成,定期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鼓励乡镇自行积累和投资基础设施。实行新财政管理体制的第一年,全县乡镇税收增至总额 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9%,年终净结余 223 万元,占全县财政净结余的 62.8%。

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费共支出 1112 万元,其中城镇市政建设投资额 385 万元,比上年增长 6.5%;旧城拆建 8115 平方米,新建住宅 6.2 万平方米。不少城镇基础设施有新的进展,使过去长年停滞的集镇建设开始动起来。新建集镇所在地的农贸市场 8 个;投资 79 万元,修建集镇道路 29 条;又有尖山等 4 个镇安装了自来水;新建县乡公路 104 公里,有 65 个乡镇通了公路。这样的新气象并非限于萧山一个县,各县都出现程度不同的城镇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次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勃兴。当 80 年代初农村生产关系率先改革时,对农工副各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户成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多形式的联合体在专业户、专业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为乡镇企业奠定基础。各县不少农民抢抓机遇,纷纷向附近小市镇集聚,出现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现象,成功地启动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共中央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下达后,杭州乡镇企业更加快了向纵深发展的步子。以起步较早基础较好的萧山为例,1986 年已涌现乡镇工业企业 2720 家,工业产值 19.44 亿元。建筑业有 100 多家,总产值 2.94 亿元。还有不少村办工业,虽较小而分散,合起来总产值也达 7.46 亿元。此外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等也有较快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增加到 88 个,全年成交额 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3%。乡镇企业经营的门类逐渐增多,如有纺织、机械、五金、食品、化工、建材、服务、造纸等,发展势头强劲。其中不少乡镇工业已初具规模,甚至成为县的重点和骨干企业。1986 年产值在 100 万元以上的工厂 337 家,年产值达 12.87 亿元,其中有 26 家年产值在 1000 万元以上。那时杭州万向节厂初露头角,1986 年产值 2402 万元,创利税 911 万元,产品打入世界汽车王国之称的美国市场。萧山五金工具厂生产的各种花色钳,畅销 24 个国家和地区。

其他各县也不示弱。余杭乡镇工业 1986 年产值 13.02 亿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 70.8%,比上年增长 40.6%。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乡镇有 3 个——崇贤、双林和亭趾。各乡镇紧跟而上,不乏后起之秀,到 1995 年有 25 个乡镇被杭州市命名为“小康乡镇”,有 415 个村跨进市级小康村行列。至 1998 年,全县乡镇工业总产值为 162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改革起步之年年产值 5400 万元的 300 倍。

临安工业的发展特色也在于乡镇企业。该县乡镇工业很早就成为全县工业经济的主导力量,1978年就占有21%的比重;到1998年更由1978年的21%提高到85.1%。随着乡镇工业丝绸、纺织行业的迅猛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丝绸之乡、纺织之村,经过引导,有的走向了集团化、规模化经营。不少新兴“集镇”式聚合点正在崛起。

富阳的乡镇工业的规模与发展速度,几与余杭相仿。据1998年统计,全市乡及乡以下工业总产值为165亿元(比余杭多3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3423万元的482倍,年均增长36.2%,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0%,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农村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市)。

其余各县(市)乡镇企业发展势头也很迅猛,不必全部列陈了。正是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推动集镇勃兴的背景下,杭州适时推出了“撤区扩镇并乡”改制方案。

这种撤区扩镇并乡,成为杭州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项目。先在1992年4月起以建德作“撤扩并”试点,5月份就在杭州全市各县(市)铺开,着令各县(市)提出撤扩并方案,然后在杭州市撤扩并领导小组指导下顺利开展:全杭州31个县辖区全部撤销;270个乡、95个镇,扩并为101个乡、114个镇,即新增加19个镇,减少了169个乡,无疑乡镇规模比撤并前扩大了。撤扩并后行政领导减少了一个层次;乡镇平均面积由原先的44平方公里扩大到73.19平方公里;乡镇平均人口由原来的1.21万人增加到2.11万人。这种新的乡镇行政区划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基本适应,有利于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全面发展,形成农村生产的规模经营。合理的城镇布局,也便于落实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实施。

小城镇总体规划是杭州推进城市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发挥小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功能;有利于集镇的管理和建设,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还有利于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市县经济一体化。这股势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各县(市)更纷纷提出“高起点建筑好小城镇”的要求,城镇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如富阳投入不少人力物力进行街景建筑,还围绕着几个重点城镇的建设,完成100个行政村的布点规划编制工作,以村为网络,构成村镇体系,促进镇的发展。桐庐也继萧山之后完成24个小城镇规

划和 288 个村庄的布点建设规划。同时各县(市)都开始把环境整治放到重要位置。如余杭集资数亿元投入城区和附近城镇的污水治理工程。富阳在 1998 年一年内完成 16 条道路和恩波桥、立交桥及其配套绿化工程。萧山、临安、建德、桐庐、淳安也都积极做好城镇的环境整治工作。在城镇的基础设施方面,各县(市)各自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抓住重点项目开展施工。如淳安建成红山隧道;萧山建成西山隧道;建德重点扩建新安路;桐庐建筑瑶林路、大奇山路;富阳、建德扩建规模较大的自来水厂;余杭、临平、塘栖等城镇都开展了自来水引水工程。这批城镇建设工程,大多经费自筹,项目自建,这在“扩镇、并乡”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节 加强服务意识 转变政府职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一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机构与规章制度急需调整,某些政府权力需要下放,政府职能的转变自 90 年代初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对机构改革,成立杭州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首先分别选择市纺织化纤工业公司,实行由行政性公司转向经济实体的试点;对市体改委与市经济研究中心实行合并,作为行政部门合并改组的试点。对全市机构改革根据工作需要稳步进行。农村实行撤区、扩镇、并乡也涉及基层的机构改革。

对政府权力下放,开始搞试点,先后于 1992 年两次分别放下了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限;市劳动局、市物价局、市工商局等综合管理部门,以及市机械局、市轻工业局等企业主管部门,都分别制定了落实企业自主权的规定,逐步让出行政权力。

对政策法规的清理,市政府全面清理了前一段时间“治理整顿”阶段所制定的政策法规,撤销了一些不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文件和有关条文,相应制订了一批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

对重大制度的改革。当时最迫切的是住房制度的改革——由福利分房向货币分房过渡,推进房地产的市场化。杭州市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制

订出《杭州市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于1992年11月交全体市民讨论后，报给省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审批。1998年进一步完善了公积金制度；全面开展公房出售工作和租金调整工作；推动房屋抵押业务；房改换购发证；推进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开展分阶段整治和转制的试点实施工作，提高住宅小区的环境质量……这一系列的改革程序，先在市区探索，稍有经验即向各县推广。养老保险也是关系到民众生活的重大制度，先对市区提出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养老保险办法，由单位自理转向社会化管理。在1992年4月起修改完善，明确按职工个人、集体、国家三方共同负担，筹集基本养老保险金，调整了全民单位统筹比例。城镇个体户、私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先在上城区试点，然后分步推广。农村养老保险，只在部分农村试行。社会待业保险，先在市区和富阳试点，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推行于全市。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政府颁发了农业承包合同签证，以及仲裁等配套办法，使农业承包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对开发区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以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为例，度假区管委会为了强化自我约束机制，配合市人大、市法制局进行度假区立法，草拟《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条例》报省市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这一《条例》的制定，有助于推进度假区的建设进程，使开发建设纳入法制轨道。在《条例》施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特别是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的实施，足以促进度假区基础设施建设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同样，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也都制定类似的《条例》，依法治区。

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启动了经营城市的新路子，为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服务城建，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早在1992年庆春路改建工程揭开帷幕时，市领导就开始考虑国有资产的有效开发，研究如何借鉴市场化运作手段来开创市政建设新局面，尝试以基础开发与房屋开发并举的新办法。为此特别组建基础设施开发公司，把重点放在房屋开发一级市场上，试行“以地生财”，在庆春路改建过程中有效地实施“以路带房，以房养路，路房结合，综合开发”的方案，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出让地块34幅，计412公顷，其中涉外23幅计375公顷，可收资金14.75亿元人民币又1.52亿美元。道路两侧土地使用权有偿划拨和出让：其中10幅公开招标，通过招标、投标、开标、议标、询标、决标等过程，按照标底高低、对庆春路改建工程贡献大小、投资者咨询情况、投标建设方案优劣4项条

件,最后确定杭州立新五金店、澳门 L&N 集团公司等 10 家企业获得中标权。其余 24 幅地块采用定向议标方式予以出让。为了将庆春路建成 90 年代气派的繁华商业大街,对庆春路街景实行统一规划,对两侧建筑造型、立面处理等方面实行集中审定。道路工程按照先地下后地面的施工原则,雨水、污水等管线的铺设由道路的西段向东快速推进;菜市桥、联桥重建工程和庆春立交桥工程均按时竣工并通过验收。动迁工作虽然繁重,通过努力,也如期完成。计共搬迁居民 5084 户、个体工商户 230 户、企事业单位 266 家。由于与庆春路改建工程相配套的景芳住宅小区建设创造了高速度,有助于拆迁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接着拆除旧建筑物 26 万平方米,清理废土 42.27 万平方米,一切都按照既定计划实施,施工难度较大的 13 条地下管线的埋设也提前完成任务。于是两三年的时间,就把这一条全市最拥挤最难治理的旧式街道,在不费国家财政拨款的状况下旧貌换新颜,改建成为现代繁华大道。这一街道改建工程高速高效的实现,得益于能采用市场经营的运作方法经营市政工程。此事给了杭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以很深刻的启示。

接下去于 1995 年推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就继承发展了庆春路改建工程的成功经验,除了依法采取行政划拨用地外,对于其他建设用地全部纳入有偿使用轨道。这样扩大了有偿使用范围,大大增加了土地收益。

按原先的计划,要改造“破烂的城市”,彻底更新市容市貌,至少需要国家财政投资 50 亿至 60 亿元,如何筹集,困难很大。如若推广“借地生财,综合开发”的发展思路,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以资定项”为“以项集资”,当可吸引国内外多方面自愿投入的资金。于是在 1995 年年底以前,以出让方式供地 474.7 公顷,占全市非农用地 32.8%,可得地价款 10.82 亿元。借鉴前几次成功的地块招标经验,这次又推出了三块地区的旧城招标项目。

在招标过程中,通过广告策划、舆论宣传和地产炒作,激发有关客商的抢购热情,纷纷投入竞标。较好的地段竞标相当激烈,不少房地产公司和外资企业为了赢得“地利”优势,甘愿出高价购取土地使用权,因而实际售价往往远高出于市政府原先预期的价位。这样经营地块的出让,可收得数目可观的附加价值,反过来用于“再生产”——重新投入其他旧城改造项目与新建工程项目,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经营方法,在此后推广运用中,大多能产生一定效果,逐步积累经验,终于形成杭州经营城市的一种较成熟的战略。尽管“经营城市”的新理念涵盖着对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平衡等城市要素全方位的经营,并非仅仅限于城市建设经费的筹措。但由于过去对城市的治理方式注重行政手段,忽略经济手段,尤其不习惯市场手段的介入,如今利用市场运作模式改善经济管理,提高建设城市的效能,探索出一些经验,对此后改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经营也有借鉴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成为创新“经营城市”的先导。

鉴于杭州拥有湖山之美、创业之利、人才之多、市场之大和人居条件之优越,有利于开发经营的地块甚多,为了更好地发挥这方面的优势,杭州市政府特地筹建成立了杭州市土地储备管理委员会,使这方面工作更趋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土地储备管理委员会下面,设置土地储备中心,逐步形成土地收购、储备、出让机制。储备中心于1997年成立后,边组建、边工作、边规范,在当年就签订9块地块的收购合同,累计收购土地8.43公顷,同时草拟有关收购、储备、出让工作的规范条文,然后根据建设工程的需要,利用市场机制的商业操作方法,运作转让招标业务。此后多次土地出让招标,开展顺利,为国家节省不少财政支出,并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类同于地块开发,也逐步推广运用于开发区的经营,旅游资源的经营,大桥立交桥建设的引资,以及不少文化事业、公益事业的承包、森林的承包经营等,这些项目都曾适当引进市场化经营方法来有效地经营。

市政府作为经营城市的主体,深化改革后的职能已不限于治安、建设、管理、税收、教化等行政性业务,更多的是强化机关服务与经营管理的职能与功效。这些政府职能的转变,都是体制改革深化的成果。

为了确保政府机关加强服务职能,杭州市政府决定实行政务公开;在报纸和网上公布政务公开的范围、内容、对象、形式、职能处室直至责任人和联系电话;并公布投诉部门和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政府还自1999年起开始策划施行一整套的评比服务满意度的措施——包括争创“人民满意单位”、办好民众监督电话、目标责任制考核、评选十佳公务员、排查民众最关注的问题、规范评选程序、扩大“末位告诫”制等。每年年初定目标,年末作考评,力争持之以恒。

关键是排查出一批当前民众最关切的大事,定为服务的中心项目,并以此作为机关效能建设的目标要求。然后由各个部门根据分工负担的任务,明确特定的服务对象、服务重点,分别制定与其职责范围相适应的服务评价标准,结合经常工作改善服务。至年末按照评选程序,广泛征集各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的考评。通过评选“人民满意单位”和“十佳公务员”,结合“末位告诫”,进行奖评,态度严肃,而且注重过程、注重创建、注重整改、注重提高,使评选活动公正有效,成为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增强干部为民服务意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载体。平时辅以公开的投诉电话和信访工作,疏通联系民众的渠道,加大对投诉信件的督办力度;一面组织学习“十佳公务员”的勤政、廉洁、高效风尚。实践证明,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经常发动民众监督,形成制度,才有保证。

第五节 从封闭型逐步走向开放型

政策转变 开启封闭关卡

杭州口岸自古以来是全国对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代开始杭州已对海外发展外贸业务;五代十国时更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宋代杭城专置“市舶务”通商 50 余国;延至民国仍设有海关。解放以后,由于海外受到封锁,地方经济以自给为主,并无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意向和条件,国家撤销了杭州海关。

自 1949 年至 1978 年的三十年间,杭州几乎处于与海外市场隔绝的状态。街上偶尔见到的洋人都是政府接待的友好国家贵宾或零星旅游者;见到的进口货大多是从上海、北京等地转运来杭专门供应华侨、外籍人员,由华侨商店和涉外宾馆负责经销涉外商品,市场上不得经营。涉外商品的来源,除了依靠国家计划固定的外配渠道(列入专项指标、专物专用)以外,华侨商店还与各地生产特种商品(如供高级人员专用的茅台酒、大中华烟、特级龙井茶之类)的工厂争取货源。侨汇物资供应单位对市场紧俏商品可经由主管部门专项调拨供应。这种专为特种人员开设的特种商店(华侨商店、友谊商店和文物商店)由于货源

有限,不能敞开供应而是凭票证供应,即按外汇兑换券或侨汇物资供应券定量供应。外汇兑换券是有价证券,是入境的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支付用的外汇代价券,商店售货后收入的外汇兑换券必须当天送交中国银行;华侨物资供应券系无价证券,允许赠送亲友使用,但严禁买卖,营业员按购物全额回收侨汇券后须在季后10天向华侨商店主管部门结算。这些都是那特殊的年月里封闭型的特殊措施,反映当时几乎完全中止正常的进出口贸易。

1979年再次设置杭州海关。此事象征着政策环境的转变。从这一年开始,杭州进行“三来一补”的外贸业务,即允许接受海外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加工和补偿贸易。这年年末结算,“三来”加工的包括纺织、丝绸、电子、轻工、五金、粮油、食品七大类总共只有16项;该年整年没有接到一项补偿贸易。加工业务的总金额仅230.85万美元,金额虽少,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后逐年有所增加,至七年后的1986年,已从16项增加到50项(包括补偿贸易),外汇金额也由原先的区区230.85万美元递增至10.28亿美元,这是第一次突破10亿美元。据“六五”期间统计,全市收工交费594万美元,创汇149万美元,促进了杭州对外经济贸易的初步发展。

这段时期最重要的是1985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在杭州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了国际贸易洽谈会——“首届杭州国际二手设备洽谈会”。所谓“二手设备”,指出口方转让第三者的设备,即并非生产方直接出口的贸易。主要是由香港的公司将欧美国家出口到香港的产品,转手卖到杭州。这次成交的数量有限,好在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二届杭州国际二手设备洽谈会”于1986年12月3日至12月9日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进出口公司、杭州经济开发总公司和香港泛菲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参加这次洽谈会的人数比上次略多,达到100多人,代表着40家海外厂商。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组织14个国内的交易团来杭参与洽谈,他们是北京、西南、华中、青岛、大连、沈阳、天津、上海、南京、南通、宁波、厦门等交易团。国内外厂商交易团在浙江展览馆内设置31个展台。会上洽谈和交流的主要有纺织印染设备、塑料橡胶机械设备、化工设备、食品加工包装设备、建筑材料加工机械、矿山机械、金属加工机械、印刷机械及包装机械等200个项目。各用户与各展台的客商进行了广泛而具体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前后一周时间的洽谈会上各地交易团与外商共签合同或

意向书 187 份。杭州市的纺织、丝绸、食品、电子等行业的 20 家企业,分别与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联邦德国、香港 8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签订 20 份意向书、协议书。到这年年底为止,正式成交签约的项目共 6 项,成交金额为 108 万美元,算是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除了上述国际二手设备洽谈会以外,杭州市企业还分头开展引进技术的活动,在 1986 年一年中总共竣工投产的技术引进项目达 80 项,实际成交额为 3970 万美元,分别占全省项目和成交额的 37% 与 41%,在全省起了领跑作用。

这年全市还新增部、省、市批准的技术改造项 80 项,有的引进先进的流水线,共用汇 3309 万美元。这些项目的竣工投产,对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发挥一定作用,足以增强产品出口创汇能力,1986 年一年中全省创汇 10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共 12 家,杭州就占了 8 家,便是明证。杭州洗衣机总厂引进日本新技术和设备,研制出两种新产品,利润增加 1.5 和 1.7 倍,打入国际市场创汇 219 万美元,分别获部优产品和省优、特、新产品称号。杭州富强服装厂原有生产设备陈旧,靠手工裁剪,生产效率低下,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出口需要,自引进国外电剪、平缝、锁眼、钉扣等先进设备,产量提高 44%,利润提高 53.6%,创汇 500 万美元。1986 年连同“六五”期间,全市共竣工投产新项目 250 个,新增年产值 21.5 亿元,利润 2.84 亿元,交税 1.62 亿元,为国家创汇 7374 万美元。

由于外贸出口的形势好转,出口商品收购额迅猛增长,1986 年首次突破 10 亿大关,达到 10.66 亿元。市属 4 个进出口支公司外贸收购额都在 1 亿元以上,7 县外贸公司总收购额达 2.5 亿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多。但当时杭州尚无外贸自营进出口权(后来到 1988 年才获准取得外贸自营进出口权),以致只能借助其他口岸出口。幸收购额高,1986 年全市共计出口创汇 2.79 亿美元,其中轻工业品 1.96 亿美元,占 70%;农副产品 6254 万美元,占 22.4%;重工业品 2003 万美元,占 7% 左右。出口商品共分 16 大类、610 个品种,生产外贸产品的企业在不断增多。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以轻纺工业为主,其中又以丝绸为大宗,因杭州丝绸久负盛名,被国际友人誉为“东方艺术之花”,拥有可供出口的绸、纺、缎、锦、绢、绫、罗、纱、绒等 200 多个品种的 1000 多只花色。除丝绸外纺织品可供出口的还有棉、麻、毛、化纤、印染、针织等 9 个门类的许多品种。全市机电产品 1986 年创汇 1203 万美元,占全市出口总数虽只有 4.3%,而增长幅度快,显然

是有前途的出口产品。全市乡镇企业有 183 家提供出口商品,具有一定潜力。

杭州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后,改变了长期来信息的封闭和技术的封闭;贸易洽谈和引进技术设备更直接推动旧企业的技术改造,尤其是进口的关键设备,足以使产品升级换代,提高质量,增强出口创汇能力。外贸的发展,可以互通有无,增收创汇,有助于搞活经济。

经济协作 扩大内外开放

80 年代初,杭州市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市内外搞活横向经济联系不断发展。至 1986 年,杭州市的横向经济联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据《1987 年杭州年鉴》记录:“到 1986 年底,全市已有 3200 多个企业与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7700 多个单位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协作项目达 8500 多项,其中 1986 年新增 2000 多项。全市已建立各种类型的经济联合体 1250 多个,联合领域从生产领域发展到商业、金融、科技、旅游、文教、卫生等各种部门。这一年中全市通过横向联合和协作获得的产值约 22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12.8%。”经济协作的内容,从物资的互通有无,发展到技术协作和经济联合;从短期的协作,发展到较稳定的长期合作;从而加强了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

技术协作的形式,主要有从事技术攻关和新产品开发,地区性技术综合开发,技术转让,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开发创新等。全市企业计与全国 210 所大专院校、430 多个科研单位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 100 多个。还有大企业扶助乡镇小企业的结对协作,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州华丰造纸厂、杭州食品厂等 10 多个市属企业,从技术、设备、管理方面帮助了 160 多家乡镇企业。

产销联营,开拓市场,对西北、西南、东北市场扩大杭产品幅射面。杭州市轻工部门先后在南宁、兰州、芜湖、武汉、厦门、包头、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城市举办产品展销会。单独或几家联合到外地举办展销会、订货会的企业,数以百计。

工贸联合,扩大出口。全市建立工业与贸易部门联合体 34 个。如杭州标准件总厂与浙江五金矿产进出口分公司实行工贸联合,仅 1986 年一年中就出口创汇 300 余万美元。杭州棉毛针织厂与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贸合资联

营,大批出口手套、帽子,外销美、英、日等 29 国。

跨区域的商业部门协作,全市有 1400 余家商业企业与全国 100 多大中城市、400 多个县(市)的商业企业发展协作关系,新建联营销售网点近 2000 个,经销杭产 4000 多种。同时吸引外地企业来杭州合资开办商店,约有 200 多家。

向外地投资,建立较稳定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由本市(市、县)协作办牵头,向外地投资基地调进原油、重油、汽油、柴油、钢材、煤、木材、生铁、有色金属、水泥、玻璃、化工原料、轻纺原料等各种紧缺物资,以缓解杭州短缺能源和原材料的矛盾。

90 年代初,杭州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据 1992 年统计,全年协作系统牵线搭桥参与洽谈达成的横向联合和协作项目约 150 多个,引进资金近 3 亿元。组织来本市和出去参加跨地区、跨行业的各类经济技术协作洽谈会、商交会、展销会总计 49 次。市协作办主动联系苏、锡、常、杭、嘉、湖经济技术协作区,参与洽谈,牵线搭桥各类经济联合,这一年中促成引进技术、拆借资金、中外合资等项目达 120 项。市协作系统全年引进各类物资 151 万吨,比前几年有较大增长。

除物资协作外还重视对外开拓供货渠道。如余杭协作办以巩固老渠道,发展新渠道为经营战略,提高对外销售额,1992 年总销售额达 7.23 亿元。市协作办提出“筑巢引鸟、借鸡生蛋”的战略,参与组建浙江金浙石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为省市的油品供应创造良好的条件。

鉴于外地驻杭办事机构众多,到 90 年代初累计已达 204 家,市协作办就发起成立杭州市各地企事业单位驻杭办事机构联谊会,利用这个联谊会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物资洽谈,促进杭州经济的发展,在加强为外地驻杭办事机构服务的同时,也发挥驻杭和驻外机构的作用,组织杭州所缺的各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货源,并推销杭产品的外销。杭州市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外地驻杭办事处开展代理服务及其收费标准规定的通知》,有序地开展各地之间资金、人才、物资、技术、设备、劳务输出等牵线搭桥代理服务。由市协办为核心,联合市政府 5 个驻外办事处,成立杭州协作总公司,组建商品交流的各种信息网络,组织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发运回杭;推销杭产品,价值常以百万计,为扩大对外开放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杭州市协作办与市经济研究中心、市体改办和市计委一起,共同发起召开了把握机遇接轨浦东研讨会。市协作办承担了杭州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的职责,不断组织杭州市的企业到浦东设立贸易“窗口”;同时还联合上海当地机构,参与上海的旧城改造,如杭州市协作办与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等4家单位联合筹建杭州金山房产综合开发公司,参与上海旧城改造相关的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开发外向型经济更是横向经济联合最有前途的发展内容。但杭州市限于过去长期封闭,对海外关系疏淡,以致中外合资启动较晚。杭州全市第一家合资企业是1983年与港商合资经营的杭丰纺织有限公司,以生产OE棉纱为主,全公司仅有管理人员13人,而生产运转有条不紊,工厂规模不大,效益却很好,三年即达到年产值1900万元,出口创汇400万美元。全市在1983年至1985年的三年合计只引进中外合资企业19家。至1986年稍有起色。由于杭州市政府进一步放开政策,对外商投资在水电、能源、运输等方面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尽可能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1986年一年吸收外资来杭新签协议合同12个,为前三年平均数的两部;投资金额3563万美元,占全省同期合同金额的61%,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至此杭州市外商投资企业达到31家。

90年代初在大力发展国内横向经济联合的同时,注意开发边贸与外贸渠道,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市协作办在1992年一年中组织经济考察团到外地考察42次。各县(市)区协作办纷纷开发边境贸易。如富阳协作办到满洲里兴办经营部和公司。余杭协作办通过产权转让,买下了香港中国兴业贸易有限公司,为日后组建跨国公司迈出了重要一步。到1992年全市三资企业累计达684家。接着,1993年全市三资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新注册三资企业多达1063家,超过了前9年之总和,累计达到1747家,总投资额为34.36亿美元,注册资本总额21.80亿美元,其中外方认缴11.08亿美元。这阶段外方投资出现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投资国别(地区)增加:从1992年的20个扩展到34个,其中欧美外商投资明显增加,国际著名企业、财团开始有来杭投资的。二是投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增加了基础产业投资;第三产业利用外资步伐加快。三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有机会利用外资进行改造、嫁接,有成效地利用老企业原有设备、厂房,引进外方先进技术和管埋。这一阶段嫁接成功的先后计有670

个企业。四是利用外资的形式有新的突破,开始出现新型的中外合资股份制公司。五是“四区联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之江旅游度假区)引进外资,一年内新登记三资企业 53 家。此后连年增多。

对外协作除了“引进来”以外,还组织“走出去”。1992 年到 1993 年,杭州通过洽谈考察,组织有实力的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一些过去在外经方面尚处于空白的县(市),如萧山、余杭等,能抓住机遇,开始涉足境外办厂领域。实行跨国经营扩大对外协作的,不仅是工业系统,而且向商业、外贸、教育系统以及乡镇企业扩展。杭州企事业单位走出国门进入境外领域的国别,开初以港澳地区和原苏联、东欧地区为重点,渐次扩大到美国、洪都拉斯、乌拉圭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呈现继续扩展的趋势。较早到国外协作创业的如有萧山经济建设发展公司在乌拉圭与当地合作开办乌拉圭联合发展公司;杭州第三建筑公司等单位与香港、贝劳客商协作,在贝劳共和国合资设立宏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杭州青春服装厂与美商联手,去捷克合资设立 C&A 有限公司;杭州楼外楼茶馆与美国罗氏世界旅游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和发酒家有限公司;杭州工联实业总公司与日本佑物产株式会社在南非共和国夸夸工业区合资设立的杭林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齿轮箱厂在香港设立 8 家企业,中方投资 284.49 万美元,外方出资 87.5 万美元。两三年间,全市累计批准去境外办企业的共有 16 家。此后增加的速度加快,每年都会新设 10~20 家。2000 年,杭州市批准设立各类境外企业(机构)15 个,其中境外非贸易性企业 5 个,累计批准各类境外企业(机构)总数已达 101 个,其中境外非贸易性企业 57 个,总投资 1.07 亿元,注册资本 4757 万美元,中方协议出资 2847 万美元。到这年年底为止,杭州市在境外投资举办非贸易性企业和开办各类贸易性机构的国家和地区,为美国、加拿大、挪威、比利时、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蒙古、阿联酋和科特迪瓦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境外开办企业和机构的,除了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个私企业,先后已有 3 家在境外开办市场。杭州在获得外经权的 1993 年,就成立有杭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经营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进出口业务和技术咨询服务,为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仅 2000 年就外派各类劳务人员 1235 人,比上—

年增长 11%，这些外派的劳务人员分布在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输出的劳务人员包含各种不同的专业，较受欢迎的是园林、建筑、餐饮、纺织、丝绸、机电、农业、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自营出口 规模由小到大

杭州自 1988 年获得外贸自营进出口权以后，外贸出口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可以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次授权对杭州意义重大。

在此以前，只是收购制的外贸经营方式，大多限于国家指定的项目，选收部分企业的优质产品和农村适于外销的产品，供给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间接办理出口，由国家统一组织外销。50 年代杭州能提供出口货物的供货企业仅 10 多家，年供货值不过 2000 万元，提供的外贸产品档次低、数量少，以农副产品和低档工业初级制品为主。国家下达的计划产品是纺织、针织、轻工、化工、机械、中药、水产、土畜产八类。60 年代杭州年供货值约为 7000 万元左右。此后供货品种、数量虽略有增加，而增速缓慢，年供货值不过一两亿元。直到 70 年代中后期，杭州市外贸收购值仍在 2 亿元左右徘徊。1979 年杭州设置海关，出口手续较前方便，外贸政策有所松动，但杭州仍然没有获得自营进出口权，作为代理收购，这年的外贸供货值达到 4 亿多元人民币，仍不足 1 亿美元。80 年代全国外贸形势好转，杭州市外贸供货值逐年有所提高，1986 年达到 10.66 亿元，总算已超过 1 亿美元的货值了，达到创汇 2.79 亿美元。可见新中国诞生后的 30 余年，杭州的外贸业务如同蜗牛爬行，进度极慢。只有 1988 年获得外贸自营进出口权后方始放开手脚，呈现“加速度”突进：外贸出口增量第一个 10 亿美元用了 8 年（1988 年～1995 年）；第二个 10 亿美元用了 4 年（1996～1999 年）；第三个 10 亿美元只用了 1 年（2000 年）。杭州在 2000 年一年中，自营出口 29.61 美元，比上年的 19.36 亿美元增加 10.25 亿美元，创造出口净增量 10 亿多的特好成绩。由此可知 1988 年获外贸自营进出口权一事，在杭州对外贸易史上是具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此后不久，杭州又获单独组织团参加三大交易会（春季广交会、秋季广交会、华东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权利，以此作为洽谈出口的主阵地，杭州外贸如虎添翼。杭州接着于 1993 年首次获得外经权，形成全市性的外经网络，也有助于

为外贸扩张声势。

1993年4月,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市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制订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战略,并确定了《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十年发展规划》。总体是根据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抓住外贸体制和外汇体制改革的机遇,加速杭州经济从内向型为主向外向型为主转变。所谓“全方位开拓”,就是开阔视野,实现市场多元化、企业外向化。在对外贸易中,形成外贸、外资、外经一起上,全民、集体、乡镇一起上,本口岸、外口岸、自营出口一起上,工贸联营、企业自营、三资企业出口一起上,贸易创汇、非贸易创汇一起上的局面。要求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培育杭州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之一,贯彻“以外贸为基础,外资为重点,外经向更高层次开拓”的方针,坚持三外一起抓,共同求发展。为了扩大出口商品的供货,杭州企业开始树立“大外贸、大流通”观念,打破区域与行业的限制,力求供货多渠道,市场多口岸。要求多层次开发,就是从杭州的实际出发,有步骤有目标地推进不同层次的开发开放。加快市内4个国家级开发区和各类已获批准开发区的发展,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完善电子、机械、化工、化纤等既有的工业区;把开放的幅射面向大杭州延伸,让众多的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增强配套能力和创汇能力,提高全市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经济实力。同时制订出到本世纪末的发展目标为:全市出口商品供货总值达到200亿元人民币以上,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以上。自营出口创汇达到15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其中技术含量和产品水平高的机电产品占35%以上。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达到5500家,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在2100家以上。

目标明确、认识统一,加以措施得当,杭州外贸出口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当年全市出口商品供货总值增至111.87亿元人民币,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9.2%,标志着杭州经济格局的外向度上了一个新台阶。与开始启动外贸的1979相比较,可以清楚地显示出变化巨大:全市出口生产企业由200多家发展为1000余家;出口商品种类由200多种扩展到1000余种。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已形成传统出口商品和机电产品、重点出口商品和一般出口商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一起上的新格局。工业制成品占到出口商品总额的80%以上,特别是自行车、电视机、工业汽轮机、小发电设备、船

用齿轮箱、万向节、工业链条等机电产品出口量迅速增长,在全国同类产品出口中占有重要位置。纺织(含丝绸)、机电、轻工等已成为杭州的出口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汇农业,正成为杭州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

杭州外贸出口快速增长过程,形成进出口公司、自营出口生产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三路大军。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因在海外自有营销渠道,所以生产与出口良性循环,出口额高,约占杭州市全部出口总额一半以上。以2000年为例,杭州全市共有进出口公司21个,出口6.38亿美元;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353个,出口7.24亿美元;有产品直接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718个,出口15.99亿美元。以上三者合计为29.61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杭州市出口总额的54%。不过从增长速度来看,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颇具潜力,比上年增长64.0%,而外商投资企业比上年增幅为56.5%,进出口公司比上年增幅为33.6%,均低于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的增长幅度。

杭州市贯彻外贸市场多元化方针,既重视主体市场,同时也注意开发新兴市场。试以1993年底与本世纪末所不同的市场分布情况来作点比较:

1993年自营出口到86个国家和地区。杭州自营出口的国家 and 地区遍布六大洲,计分布于亚洲31个、欧洲25个、北美2个、南美15个、非洲10个、大洋洲3个。自营出口额居前3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和日本;自营出口额分别为6488万美元、3049万美元和2964万美元,占一般贸易出口比例分别为31.6%,14.9%,14.5%。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出口超过了原居4位的德国。俄罗斯联邦是近年新开发的出口国家,对其出口较快,已达283万美元,位居杭州市出口国别的第11位。其他出口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法国、新加坡、英国、荷兰等27个。表明杭州出口市场基本格局,在巩固香港、美国、日本三大主体市场的同时,呈全方位开拓发展趋势。

本世纪末自营出口的市场空间更加扩大了,由1993年的86个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66个国家和地区,几乎全世界都成为杭州自营出口的市场。三大主体市场已增至四大主体市场,其位次也有所变化,美国由第二升至第一位;欧盟新起插了进来,而且位居第二位;日本仍居第三位;香港实力下降,位于末座。四家所占份额依次为30.1%,20.3%,17.3%,14.8%,合共占全部市场份额的82.4%;远高出于1993年三家主体市场所占总份额的61%。说明对于主体市

场的深度开发、巩固和扩大,已卓具成效,足以确保杭州自营出口的稳步增长;同时也是显示杭州出口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才能在这些主体市场敞开渠道,这是杭州外贸坚持“以质取胜”方针所取得的成效。尤其是注重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全市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额的 94.2%,初级产品只占 5.8%;这与 1993 年工业制成品占 80%,初级产品却占了 20%,两相对比,显示出重大进步。

杭州自营进出口的另一重要经验,是加强进口与出口结合,“以进养出”。每年外贸自营进口订货货值,约略与出口发货货值相当,出口略多于进口,保证收支平衡。通过进口国内紧缺的优质特种钢材、羊毛、柴油、纸浆、化工原料、电视机显像管等商品,解决了生产企业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从而降低了出口成本,提高了商品附加值,又扩大了出口创汇。通过以进养出,出口商品的增值率在 3 倍以上,因而也可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回顾杭州自 1988 年开始自营出口,到 20 世纪末的 10 多年时间,出口额逐年递进,翻了七番以上。外经贸进展顺利,推动着杭州开放型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开放对于旅游的国际化、工业的现代化、乡村的城镇化、城市的信息化等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反过来看,杭州全方位的开放,又依赖于系统的体制改革,开放与改革实在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

第九章 整合旅游资源开拓两大旅游市场

第一节 湖山焕发青春 维护城市的“根”

西湖是杭州的根和魂,杭州城市的历史离不开一条“以湖而兴,因湖而名”的贯穿线。这条线索是动态的,不断精雕细琢,推陈出新,可以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后新时代的杭州人正是带着感情、肩负责任,保护和建设西湖景区,使之焕发青春,历久常新,为杭州的开放服务。

西湖景区属于国家级名胜区,已列入我国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预备名单。它总面积有 60.04 平方公里,景区内以西子湖为核心,环湖拥有国家级、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65 处;风景名胜点 100 多处,散落于周边诸山之间。名山秀峰并肩携手构成锦绣屏风,最令人向往的有玉皇山、宝石山、灵山、万松岭、北高峰、南高峰、云居山、凤凰山、名人岭、美人峰、灵峰山、老和山、九曲岭等。湖边精品,向来以西湖十景最为出名。西湖十景题名源自北宋山水画家宋迪以四字句标出写真内容,后继者群相仿效;至南宋画家马远等在撷取西湖风景精华所作画中,分别标上“柳浪闻莺”、“两峰插云”、“平湖秋月”、“断桥残雪”、“三潭印月”、“雷峰夕照”、“苏堤春晓”、“南屏晚钟”、“花港观鱼”、“曲院荷风”,民间传开,合称十景。到了清朝康熙南巡西湖,见景起兴,替十景一一题名立碑,其中把“两峰插云”改作“双峰插云”,“曲院荷风”改作“曲院风荷”。经此御碑题名,“西湖十景”更名扬四方。

由于新社会的建设为西湖风景丰满了整体风貌,人们要求应时补缀,于是1985年由杭州日报社和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等单位发起征集新景名的活动。前后共有5万人参与,历时8个月,最终遴选出“云栖竹径”、“满陇桂雨”、“虎跑梦泉”、“龙井问茶”、“九溪烟树”、“吴山天风”、“阮墩环碧”、“黄龙吐翠”、“玉皇飞云”和“宝石流霞”,10个景点组成“新西湖十景”。由陈云、刘海粟、赵朴初等10位名家为之题名立碑。这样西子湖头便呈现双十景。其实西湖美景并非以此为限,近湖的著名景点还有玉泉、白堤、孤山、刘庄、郭庄、葛岭、狮峰、西溪、花圃、植物园、天竺山、五云山、湖心亭、放鹤亭、水乐洞、紫云洞等。其间西溪湿地,野趣横生,既具人文积淀,又富有江南水乡风味,且面积辽阔,有进一步开发前途。

名胜以外,杭州的古迹价值更高。跨湖桥遗址、良渚文化遗址都是世界珍稀的宝藏,其出土文物资料的丰富、珍贵,足以实证中华民族文明的古老和杭州历史文化的悠久,但是这两大文化宝库,尚有待深入研究与保护开发,然后才能在规划的遗址保护区内建博物馆,并拟筹建文化公园。近年杭州新发掘或新修缮的古迹不少。较珍贵的有“中国五大名窑”之首的官窑,在南宋官窑原址,建立官窑博物馆,开放制作场及龙窑原址。通过科技攻关,恢复了原官窑的烧制技术,重现了官窑瓷器的光彩。老虎洞窑址的初步发现,是几百年来制瓷界的一件大事,正准备作更深入的考古发掘。六和塔系我国建筑史上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经大力维修,保存完好。现塔后新筑小园,设“典故壁”,又新辟“中华古塔博览苑”,汇集中国近100座古塔的缩影,一批享有崇高声誉的古塔,如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北京白塔、崇山寺塔、应县木塔,均以1/10原形入选,供人观赏。胡庆余堂、张小泉剪刀、都锦生等杭州名产“老字号”,均建有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大型博物馆,有中国茶叶博物馆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内容之丰富、建筑之别致、专业性之强为国内所罕见。原孔庙大成殿经整修后重展雄姿,也颇壮观。宝成寺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为吴越王妃仰氏出资修造,寺院现修复完好,寺内保存有全国迄今硕果仅存的麻曷葛刺佛像,为佛教中的“战神”,凿于1322年。西湖南屏山麓小有天国,有司马光《家人卦》刻石,为北宋书法家米芾所书,迄今庵与石刻均保存完好。位于杭州闹市区中山路上的凤凰寺,是我国现存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通玄观造像是杭州市

域内仅存的道教石刻造像,与灵隐古寺、净慈名刹等一起受到维护,体现了杭州对于宗教文化的重视。名人故居,如都锦生、盖叫天、郁达夫、胡雪岩等故居旧宅,均得到修缮,建为纪念馆。名人墓葬,如岳飞墓、于谦墓、张苍水墓、章太炎墓、秋瑾墓、徐锡麟墓均加重修并保护。

杭州的园林文化久负盛名,迄今仍继承修园栽花的传统。沿湖园林以郭庄最为雅洁,向来被园林界誉为“西湖池馆中最富古趣者”。1950年后郭庄曾长期被移作他用,以致一度建筑损坏,庭园荒芜。1989年由园文局收回整修,按修旧如旧原则复其原状,在设计上吸取西湖传统园林之精华,既保持了原庄园古朴、恬静的风格,又融合了现代的造园手法,特别是借景西湖,自成一绝。1991年竣工后,受到众多园林建筑专家和中外游人的好评。1994年被评为全国园林优秀设计一等奖,这是浙江省在建园后第一次获得最高园林设计奖。

展示中国传统奇石、宝石精品的江南名石苑,于1994年元旦建成开放。名石苑具有宋代庭院式的建筑风格,清幽秀逸,分室内区和室外区两大观赏区,汇集了全国各地300多块奇石精品。室内观赏区内陈列玲珑精致的鹅卵石、钟乳石、墨石、彩霞石等6大类观赏石;有天然的人物肖像、动物形态、文字或景观,形状逼真。室外观赏区展示的是形体较大的假山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三大名石之一的绉云峰,以“漏、绉、瘦”的奇丽造型名扬天下。

福井·杭州友好公园于1993年11月底开工,施工不到一年,至1994年10月竣工。进入园门,迎面是一块日本福井市长书写的石碑。临湖有一块石墙,镶嵌着反映福井四季景色的铜质浮雕。公园的主体——“友爱”铜像矗立在草坪中央,与周围配置的日本式园灯、方亭、花架和众多的樱花互为映衬,体现浓郁的日本园林风格,也是中日人民对和平友好的祝愿。

时花广场于1999年10月建成。作为花圃改建工程的组成部分,占地5万平方米,绿化面积2万平方米,包涵水下喷泉、散花台、莲池、映花泉、花海主题雕塑等单体项目,两翼还有锦鲤渠、涉水池、静水池、柱廊……在造园艺术上遵循“隐、小、精、奇”的造园原则,与西湖自然山水相协调。在花卉布置上,以栽种高质量的进口花卉为主,采用大色块、流线型手法,突出群体效果,使花圃成为以花卉为展示主题,以水景、花景为特色,以游览、休闲为主要内容的国内一流的综合性主题公园。

吴山城隍阁是杭州市一处融园林景观、历史文化和风俗风情于一体的具有杭州特色的标志性景点,已在1999年底竣工,其中一、二两层展示南宋时期杭州的名胜古迹,还设置有精美的雕刻作品“南宋风情图”;三层重点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四层着重反映特色的茶文化;五层以表现时代特色为主;六层为高档接待包厢和观景台。高山楼阁配以亮灯工程,使夜晚的城隍阁更添一份雍容华贵的魅力。

其他还有俞楼的建设,钱王祠的重建,灵隐、天竺佛教圣地东南佛园的扩建等等,各项园林工程大多各具特色,各有优势,而联系着考察,又会发现这些分散着的园林建筑都与西湖山水自然协调,浑然一体,足以使人深信西湖的梦——“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荣誉迟早会实现的。

第二节 坚决突破传统 创新旅游格局

杭州地区除了西湖周边洒满美景以外,其所属各区、县(市)也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之所以过去未能全面地充分利用,主要是由于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过于倚重西湖风景名胜区的老格局。其实西湖虽美,接受海内外游客的容量毕竟有限,势必难以适应现代大旅游的客观需求。环顾杭州全市各地的山山水水,到处都潜藏着锦绣,正等待着人们去深入开发,广为利用。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杭州的旅游项目仍然围着西湖兜圈子,迈不开大步。事实上西部的千岛湖早已崭露头角,而1995年杭州市政府核准《千岛湖镇总体规划》时,规定该镇近期到2000年为4万人口,远期2010年为8万人口,只带上一笔“千岛湖镇是以滨湖山城为特色的风景旅游城市”,但尚未真正落笔为千岛湖的旅游做大文章,更未设想西湖与千岛湖携手。

局面的根本改变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深入到包括旅游等领域,杭州市从“经济保领先,文明创一流”的指导思想出发,重视区域比较优势,提出发展特色产业,明确“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一起抓”的方针和“大杭州、大旅游、大产业”的新观念,才决心跳出单纯倚重西湖景区的格局,扩展为“三江、两湖、一山”轴线组成的“大杭州旅游新格局”,以便全盘开发广阔旅游资源,以

西湖为中心组合郊县景点联成网络,发挥大旅游优势产业带动作用。

先是在 1997 年在市政府首次召开的全市旅游工作会议正式把酝酿过一段时间的变革思路,以发展新战略的形式,公开提出“大杭州、大旅游、大产业”,同时拟订了《杭州市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接着于 1998 年又召开全市商贸旅游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杭州旅游业管理办法》。这一系列决议和文件,结合实际进行实施,形成了发展杭州旅游经济的良好社会氛围。于是,除了一方面以西湖为中心继续重点建设以外,另一方面沿钱塘江上溯富春江、新安江,直抵千岛湖,构筑“两江一湖”的新景区开发建设。这需要沿线各县(市)协作实施规划。首先是淳安改革管理体制对旅游深入开发。各县(市)也齐头并进,分工合作,使“两江一湖”开发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关于加快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杭州旅游业管理办法》的颁布,促使杭州旅游业的地位提高。市委、市政府提出在 2010 年把杭州建成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战略目标,不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期限的行动目标,有实施的措施,有具体的内容与指标,不仅明确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计划,而且把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努力使它早日建成为全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市政府对旅游业的发展和市场促销,都有专项资金和专项政策支持。城市建设也与之配套,设计好“绿起来、亮起来、洁起来、美起来”的城市形象工程,明显改善了旅游环境。三年内,全市用于道路建设和改造的资金近 100 亿元,1998 年一年中用于绿化建设资金就达 4 亿元。城市现代旅游功能明显增强:市区内和通往风景区的道路上设立了中英文对照的路牌和安全标志牌;风景区内更新了导游牌、说明牌、指路牌;各种公共场所普遍设置规范、准确、醒目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和中英文引导标志牌;中心地带每 40 米内设置有 1 部公用电话;设立一定数量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和服务点以及投诉电话网络;亮灯工程还方便游客在晚间购物、餐饮、娱乐、观光游览活动。总之多方面为便利游客着想。除了杭州城区外,各县(市)也仿效着改善旅游设施。

旅游交通更加便捷了。至 1998 年底,民用旅空开通国内航线 41 条,国际航线 2 条;铁路火车提速,始发旅游专列增加到 6 对;内河客运增加了至苏州、

无锡等旅游城市的航班;同时陆续构筑大量高档公路、高架桥、立交桥;市区公交车增至 100 多条,出租车增至 6000 余辆,还开通环西湖游览车。

为提高旅游行业综合素质,加强了旅游教育培训机制,并加强整治和监督检查力度,使旅游市场保持净化。市政府把旅游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保证旅游行业管理规范,制订实施《杭州市旅游涉外定点单位审批管理办法》、《杭州市国内旅游定点单位审批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同时贯彻星级饭店划分标准、旅游船舶星级划分标准等有关规定,促进旅游行业向规范高效的轨道发展。为此在 1999 年 1 月 3 日,杭州被国家旅游局正式命名为第一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评语是:杭州市“旅游工作基础过硬”,“已经达到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标准”,在同级的副省级城市中综合评分名列第二。

自从 1988 年颁布杭州市旅游业发展规划和召开全市商贸旅游工作会议后,各县(市)的旅游业普遍行动起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试以第二年的 1999 年为例,萧山建成湘湖旅游度假区,出台鼓励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开通了旅游专线车。景点建设,著名的有杭州乐园、东方文化园、山里人家和天之泉生态公园相继落成。至这年年末已建有旅游涉外宾馆 10 个,其中四星级 2 个、三星级 2 个、二星级 4 个。旅游节庆活动红红火火,‘99 中国国际(萧山)钱江观潮节暨经贸博览会接待海内外游客 56 万余人次,其中境外游客 4800 余人,还达成经贸项 44 个,引来资金 22.5 亿元。同年 6 月举办了首届杜家杨梅节,吸引游客和客商 4 万多人。杭州乐园还举办了啤酒狂欢节等活动。开了这个好头,为进一步发展商贸旅游奠定基础,对邻近县(市)也产生积极影响,以旅游带动经贸的经验,足以取得综合效应。

余杭市对开发旅游组织了不少活动,如组团参加‘99 昆明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组织沪杭 60 多个旅行社总经理到余杭实地考察旅游线路;组织本地旅游企业代表出访广州、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进行促销;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余杭人看余杭”,举办‘99 临平羊肉食周活动。推出的“余杭二日游”,所游景点有:东明山森林公园、塘栖古镇、超山、良渚文化博物馆、竹海漂流、径山、章太炎纪念馆、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史料馆等。在旅游项目的招商引资方面也有所突破,如由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杭州科学乐园 3 亿元,被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工程;超山风景名胜区租赁给旭日旅游开发公司,租期 50 年,计划投资 5000 万元;径山

风景区引进资金 500 万元建成双径旅游公路。开放型的经营方式,果然易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临安市突出生态主题,编制《青山湖森林公园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评审,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旅游新景点——全长 80 余千米的浙西大峡谷风景区正式接待游客;北郊横畈镇泉坑的白水涧风景旅游区也正式开业,被誉为“人间香格里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了百万大关。

淳安、建德、桐庐、富阳四个县(市)联成一体,修订了《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名胜总体规划》,以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水路为主轴线,沿线四县市作基地,把“两江(富春江、新安江)、一湖(千岛湖)”划分三个风景区,并将 172 个主要景点(景群)组织到这三个分区中。这个《规划》重新界定了风景区核心保护区范围,并实施相应的严格保护措施。如把深澳、狄浦、河村等有价值的古村落、古城镇列入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推荐名单;划定狮城水下古城遗址、淳安五龙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建造乌龟洞石器时代遗址等为特色保护区;对重点风貌建筑和文物古迹按原样维修整饰,同时通过用地布局的改善和古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提升,对不符合整体风貌的建筑,予以适当改造,提高整体环境质量。

通过《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修订和实施,终于正式获准成为“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此,上游的“两江一湖”与下游的西湖钱塘江景区联结成片,真正构成“三江、两湖、一山、一河”的大旅游区域。

桐庐特别重视旅游的规范管理。成立县旅游培训中心,成为全省第一个县级旅游培训基地,一年中培训旅游专业人员 500 人。同时加大了对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定点单位的管理力度。召开了旅游质监会,在 20 个旅游企业中成立质监小组,建立每月巡回检查制度,使全县旅游质监工作纳入正轨。推进旅游体制改革,实施国有产权转让。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将浙江富春江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整体转让给浙江金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桐庐垂云风瀑风景旅游公司与宁波中国旅行社联手开发垂云通天河景点。旅游项目除了开发富春江“七里扬帆”,“红灯笼乡村家园”,“瑶林仙境”外,还举办了富

春山水旅游节,桐庐直升飞机首航式,使桐庐旅游实现了从平面旅游向立体空间旅游跨越。这年桐庐接待游客 204.78 万人次,创造出县旅游接待的高纪录。

建德对旅游业也十分重视,由市长亲自担任组长,吸收各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组成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确立了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建立旅行社 16 个,涉外旅游饭店 10 个,新批准国内旅游定点单位 8 个。151 名导游通过了年检考核。完成组建建德马坪庙旅游机场股份公司。把千岛湖建德一侧的好运岛建成好运度假村。完善子胥渡、葫芦瀑、南峰塔等新景点。组成几条新旅游线路:灵栖洞、大慈岩、兰溪诸葛村线;龙游石窟,名人、名寺、名祠、名窟线;新安江水电站、龙舟漂流、九姓渔民婚礼表演、新安江城郊游线等。由建德市旅游总公司与建德林场合作建成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发富春江七里泷景区。

淳安接受教训,加大了社会治安的整顿和旅游行业管理的力度,规范旅行社和旅游饭店的经营管理。组织饭店员工技术比赛、导游技能大赛。改进旅游市场的开发,变政府型促销为市场型促销,为千岛湖建立销售网,对团队市场、散客市场、特色市场结合起来开发。在江浙沪主要客源城市建立营销网点,开通 8 条散客旅游专线。成立“千岛湖记者之家”,联合媒体举办'99 千岛湖杯全国新闻、散文、摄影大奖赛,以扩大影响。同时加大投入,完成五龙岛、温馨岛、名犬岛的改造。新增索道、水上飞机、水上大世界旅游项目。

富阳市有多种所有制成分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富阳市旅游局与东南汽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杭州富阳旅游有限公司;东南汽运公司独资创办富阳市东南旅行社;浙江之俊集团公司和龙门镇风景旅游管理站共同组建杭州龙门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非公有制企业富阳新沙旅游有限公司获准成立;个人投资 1200 万元的富阳国际大酒店开业迎客;由蓝马旅游商贸有限公司投资开办的旅游工艺品生产基地,集旅游商品的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各种形式的旅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旅游行业管理随之加强。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和宣传促销活动相当活跃。较大的景区往往经过专业的园林设计院帮助设计,并经专家论证通过。天钟山风景区、龙门古镇、白鹤青少年实践营地等旅游产品相继推出。为了塑造富阳市旅游整体形象,接待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拍摄系列风光片,其中如《南方有龙门》、《富春江》等专题片在中央台黄金时间播出,颇引

人注目。全年计接待中外游客 88.31 万人次。

县市旅游活力增强以后,旅游项目增多,游客明显增加,1999 年七县(市)共接待中外游客约 660 万人次,占杭州全市的 27%,呈现出“大旅游”的强劲增长势头。

第三节 海外内地并举 开拓旅游市场

“大杭州、大旅游、大产业”方针确定后,加大了整体性旅游市场开发力度。对国际旅游市场确定了稳定东南亚、日本、韩国及港台地区市场,努力开拓欧美、澳大利亚市场;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国内旅游市场,内外并举,大力开展旅游促销的战略。

1998 年 4 月,由杭州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率队的大型旅游宣传促销团在上海举行“最忆是杭州”旅游说明会和广场咨询活动。5 月,市政府组团赴香港进行宣传促销。10 月,在上海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杭州市与长江三角洲 14 个城市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12 月,在泉州举行的国内旅游交易会上,杭州市统一布置了 20 个展台,展示了“大杭州、大旅游、大产业”的整体形象,以综合第一名,获国家旅游局颁给的“最佳展台奖”。

为了直接走出国门拓展国际旅游市场,杭州市多次组团出国促销,先后参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举办的国际旅游展。还组织有关旅游企业在韩国、日本举办旅游说明会,参加了匈牙利旅游、商品及投资洽谈会。

1999 年进一步突出重点市场,加大海外促销力度。利用海外媒体发布消息;并通过国际互联网,设置有关杭州的行、住、游、食、购、娱等 21 个栏目;制作《杭州通》CD-ROM 多媒体光盘;编印旅游节宣传册《中国杭州》精装本;筹拍大型音乐风光片《天堂之旅》10 集(长 200 分钟)。

在利用多种媒体宣传“西湖之春”、“金秋国际旅游节”前期推广促销的基础上,先后派员参加'99 香港国际旅游交易会、日本东京国际(JATA)旅游展,以形成持续促销效应,争取周边市场。

为了进一步拓展欧美澳国际旅游市场,先后派员赴澳大利亚、新西兰、法

国、荷兰、美国进行促销,多方面设法增加市场客源。同时首次派员参加'99莫斯科国际旅游促销会、中国台湾旅游专题促销。

为了显示大杭州的旅游资源实力,全杭州市旅游行政部门筹划联手行动。1999年萧山市旅游局正式挂牌成立,至此7县(市)全部建立了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便于联合。于是杭州市旅游局联合各县(市)旅游局以及有关旅游企业,开展旅游的整体促销,使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一步拓展,得以招徕更多的国际国内旅游客源。

经过努力,海外旅游市场呈现明显变化,1999年来华游客大增,其中亚洲市场客源增速最快,韩国客源增长3.64倍;印尼客人增长228倍;泰国来客增长56.2%;日本原来基数较大,在外国人市场中日本来华游客向来居于首位,这年也仍增长5%;美国来华游客增长23.4%;台湾游客增长13.7%;这一年杭州市总计接待海外游客59.19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2.37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7%和12.9%,超过1978年的10倍。

国内旅游市场的拓展也取得一定成绩。1999年杭州市共接待国内游客2207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66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4.1%和13.7%。这样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达到18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5.2%,被评为杭州市物质文明建设10件大事之一,显示旅游经济开始成为杭州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节 优化内外环境 助推旅游发展

杭州旅游业之所以能由一度衰落转为快速振兴,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引发外向型经济的走向繁荣,联系着带动旅游的产业化和国际化。反过来看,在“大杭州、大旅游、大产业”的新理念指导下,实施国际旅游国内旅游一起抓,必然导致城市的进一步开放,不但会提高杭州国际上的名声和美誉,而且也有利于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发展。

所以,杭州旅游的振兴既受惠于外部环境的开放,而内部环境的改革又反作用于外向型经济的繁荣。内外环境的互动,发挥了驱动作用。关键在于环境

建设,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政策环境 and 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更具体及于接待环境、服务环境、休闲环境、会展环境、市容环境、交通环境、景点环境、饮食环境、通讯环境、商贸环境、娱乐环境、安全环境……杭州市委市政府把环境建设作为系统工程来抓,完善了城市内外环境,并加强了经常性的环境整治和环境管理,从而推动国际旅游、国内旅游一起发展,不断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体现旅游发展最具说服力的是游客人数的增幅,入境游客人数的变化尤为敏感。闭关时期杭州虽经 30 年努力,入境游客始终停留于区区几万人之数。1978 年改革开放,不到两年,1980 年就立竿见影般地跨越 10 万人次台阶。紧接着 1985 年跨上 20 万人次台阶,1987 年上 30 万人次,1992 年上 40 万人次,至 1997 年实施“大杭州、大旅游、大产业”新战略,就立即跨上 50 万人次的大台阶。进入新世纪后又是捷报频传,连上两个台阶,增速可谓惊人。前后对比,不难看出,改革开放的力度愈大,城市的环境愈优化,入境游客便愈来愈多,国际国内旅游业方始能兴旺发达起来。

这里排出杭州历年接待境外游客人数不断增长的具体数据,列表如下:

年 份	入境旅游者人数
1949 年	0
1952 年	1734 人数
1957 年	8442 人数
1965 年	12005 人数
1973 年	21923 人数
1974 年	15261 人数
1975 年	13269 人数
1976 年	10833 人数
1977 年	20273 人数
1978 年	53475 人数
1979 年	84914 人数
1980 年	124960 人数

1981 年	154745 人数
1982 年	152897 人数
1983 年	160564 人数
1984 年	179200 人数
1985 年	238385 人数
1986 年	266370 人数
1987 年	300603 人数
1988 年	349246 人数
1989 年	248502 人数
1990 年	388345 人数
1991 年	390197 人数
1992 年	489578 人数
1993 年	459620 人数
1994 年	337362 人数
1995 年	441262 人数
1996 年	462313 人数
1997 年	504276 人数
1998 年	507243 人数
1999 年	591900 人数
2000 年	707100 人数

国内旅游前后作过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客源市场的客观市场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杭州市旅游客源市场的客观条件正逐步改善。第一次在 1993 年底,由杭州大学旅游系学生有组织地深入到各著名景点内向游客作实地抽样问卷调查,共抽取样本 700 份。调查表明杭州市国内客源市场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旅游者年龄以中青年为主,20~50 岁占 80%以上。文化在高中或高中以上居多,达 79.5%。

二是旅游者阶层分布广泛,工人占 26%左右,农民占 5.2%,商人占 6.2%,学生占 18.8%,干部职员知识分子及其他占 44.8%,这些数据表明旅游已开始

成为大众的活动。这与过去以公务旅游和烧香客为主的情况大不相同。

三是近程旅游为主。45%来自浙江本省,外省游客中大部分来自邻近的上海、江苏等省市,反映远程旅游尚未形成风气。

四是消费水平较低。85%的游客日均消费为100元以下,其中约45%的游客日均消费不足50元。这是由当时人均收入较低所决定。

五是在杭停留天数较短。停留不满三天的占被调查人数的88%左右。

六是旅游目的与方式,以观光型居多,约占70%,公务型占25%,仅5%的游客为疗养型。

七是旅游费用的支付,大多数游客是自费,约占65%,公费报销者约占35%。

抽样调查还反映了国内游客对杭州旅游现状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风景点的收费繁复,设施不够完善,城市交通拥挤,个别地方存在拉客及强行推销现象,部分导游素质低,对西湖周围的风景点历史文化宣传不力,以及夜里生活单调等。

第二次客源市场调查的面较广,回收问卷达9724份。调查时间是1997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与第一次相距3年半。前后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杭州国内旅游有不少进步。

一是接待国内游客人数增加100多万人次,由1900万人次增至2009万人次;游客的年龄不限于20~50岁的中青年,而是向两头延伸,有老有小;市区国内旅游收入从45亿元增至113.92亿元。出游人数骤增,实行新工时制后“上班族”大多举家出游,或与亲朋好友结伴出游,或参加旅行社组织的一、二、三日游,所以以短线为主。反映国内旅游消费金额虽然有限,而旅游业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二是旅游者构成成分虽广,而主体是在职、在学的度假旅游者。在全部游人中,度假旅游者所占比例最高,达四成以上,占40.1%;出差和开会占32.4%;探亲访友占14.8%;看病、疗养和其他占12.7%。这样的旅游业态基本健康。

三是游客虽多数来自邻近地区,但也不乏远道而来者。由于飞机航线增多,班次增加,直通的铁路、公路专线,专车客运便捷,所以远程慕名而来的游客

正在增加。

四是消费水平略有提高,在杭平均每日消费由 90 多元增为 237 元。

五是在杭州停留时间,由平均不满 3 天,增为平均停留 3.3 天,其中留住一个星期以上者占 11.8%;住 3~5 天的占 31.7%;逗留 1~2 夜的占 48.8%;不过夜者占 5.5%;总的看来逗留时间还是偏短,影响消费水平。

六是旅游目的以观光型占极大多数的状况正在逐渐有所改变,慢慢转向休闲。旅游者往来频度提高。七成旅游者曾几度来杭,在纯游客中自称来杭已有两次以上的至少六成多。尤其是上海游客常来常往,目的在于休闲放松。从住宿地点看,住在招待所、疗养院、度假村、宾馆占 66.6%,住亲友家的占 22.5%,反映着休闲度假倾向。

七是旅游费自费开支为主,公务报销的占 32.4%,公费旅游的风气有所收敛。

旅游投诉虽有所减少,而问题仍多,诸如交通拥挤、导游素质不尽理想、拉客强销,以及夜生活单调之类,远未解决,都有待进一步改进。总起来看,杭州国内旅游业也已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无论国际旅游或国内旅游,杭州均得益于城市环境的优化。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苏浙经济蒸蒸日上,人们物质生活优裕以后,观光旅游和休闲等精神文化生活也开始成为必需的内容之一。杭州市正好抓住这一时机,加快了城市环境、旅游景观、旅游交通、旅游商贸的建设,并加强了旅游促销与旅游服务,因而取得巨大成效。

第五节 启动旧城改造,市容更换新颜

长期来杭州城市的破烂,与西湖风景的秀美,简直同样出名。为此加强城市建设、改善居住环境、改进交通条件、美化市容市貌,成为改革开放后刻不容缓之要务。要发展成为国际旅游城市,现代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尤须配套。

首先是居民以居住为本,为改善市民居住条件,自 1979 年至 1999 年二十年间,市区陆续建成住宅面积累计达 2266 万平方米,使人均居住面积从 4.15

平方米扩大到 10.1 平方米。住宅质量也大为提高,供水、供电、供气和卫生设备基本配套,直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加以住宅小区的建设和社区管理的加强,有的还有较合理的物业管理,保证了居住区内外的卫生、安全和美观。农民人均拥有居住面积 46.2 平方米,全部用上电,85%农村人口用上自来水。

其次是道路、桥梁、立交桥、隧道和供水、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20 年中总投资达 322 亿元。市区先后新建、改建了庆春路、凤起路、湖墅路等数十条城市主次干线,道路总面积由 1978 年的 270 万平方米扩大到 1999 年 996 万平方米,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市内交通的堵车、拥挤状况。城市公共交通线也由 28 条增加 86 条,达到 114 条;拥有营运公共汽(电)车 1364 辆,增加 2.2 倍。出租车更不断涌现,大量增加,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方便。

水为人生最基本的生活要素,通过应急供水工程、抗咸供水工程,扩建新建钱江水厂、西区水厂等自来水工程,使市区供水量大幅增长,水质大为改善,从而基本结束了长期来杭州市民缺水和喝咸水的历史。1999 年供水总量达 3.2 亿吨,日供水能力 110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2 倍。

新建、增容和扩建了一批变电站。1999 年市区生产和生活用电 101.29 亿千瓦/小时,比 1978 年增长 10.66 倍。但是供电紧张的局面尚不易从根本上彻底解除。涉及到某些客观条件,非本市主观上所能决定,譬如遇干旱缺雨严重时新安江、富春江等水电厂、水电站会因水位过低而难以发电;火力发电有时也会遭遇意外事件;秦山核电站也可能有故障、检修或换原料停机,总之应急能力尚感不足。

煤气供应正在继续改善。随着煤制气厂、杭钢焦炉输配工程、液化气第一灌装厂扩建工程,和第二灌装厂相继建成,市区居民用户已由单一的液化气发展成为液化气与管道煤气双供气格局。1978 年液化气用户仅 0.72 万户,至 1998 年使用液化气和管道煤气的家庭用户达 38.31 万户,燃气化率为 90.8%。

国民经济先行官的通行、运输、通信等事业,快速发展。钱塘江、富春江上相继在近年架起 8 座大桥。320 国道杭州至富阳、新登段,和桐庐、建德、余杭段,02 省道杭昱线由杭州至余杭、临安段,03 省道杭金线萧山段,沪杭甬高速公路杭州段的完成,尤其是杭州绕城公路等工程的建成,极大地便利了杭州市区至各县(市)以及外省的交通往来。1999 年末全市公路通车里程 5794 千米,比

1979 年增长 48%。全社会公路客运量 1.66 亿人次,货运量 8196 万吨,分别增长 7.7 倍和 9.6 倍。河道大面积疏浚,京杭运河钱塘江沟通工程和三堡一、二线船闸的建成,及港口设施的完善,加快了水运交通的发展,水运量达 2713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3.1 倍。1999 年用于交通邮电的直接投资达 30.6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165 倍,至 1999 年末,全市移动电话用户 62.93 万户,市话用户 123.65 万户,话机普及率 27 部/百人,市区话机普及率 60 部/百人。数据通讯管网已深入到证券、银行、贸易等领域。

铁路运输建设有成效。杭州铁路新站于 1999 年 12 月遵照原计划正式竣工,开始投入使用。在施工期间,由东站代替城站的职能照常营运。1999 年杭州铁路客运量 1168 万人次,比 1978 年增长 1.5 倍。铁路货运发运量 403 万吨,也增长 1 倍多。

民用航空始于 50 年代,1957 年首开第一条航线,至 1999 年笕桥机场国内外航线增至 49 条。1999 年旅空发运量 110 万人次,比 1978 年增长 35.2 倍;货物发运量 3.5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49.1 倍。同时在萧山修建杭州萧山机场,已于 2001 年建成启用,通航城市 49 个,航线航班密度大大增加。

科技进步成绩斐然。全市先后建起 5 个国家级技术中心,7 个省重点实验室。1999 年末,全市独立核算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有 84 个。在 6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建立了技术开发机构。全市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4.04 万人。至 1999 年末,全市累计取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 4026 项,其中 1979 年至 1999 年获国家科学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含星火奖)33 项,省科技进步奖 1274 项。杭州市的科技进步综合水平居全省首位,跨进了全国科教兴市先进行列。

杭州市文化系统建有群众艺术馆 1 个,文化馆 13 个,公共图书馆 9 个,电影公司 8 个,电影放映单位 116 个,其他文化企事业单位 9 个,艺术表演团体 11 个。1999 年共演出 1443 场,观众约 120 余万人次。艺术精品获得不少奖项。为提高文艺活动品位,市区举办了多次大型艺术节庆活动,并推进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转变。

杭州是文教之邦,拥有一批著名高校。1997 年,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充分发挥教育资源整合优势,已连续八年名列全国高校排名第三。其他在杭高校普遍扩大招生名额,增

添专业,并完成大批科研成果。对中小学加强素质教育,修订和完善《杭州市教育强镇(乡)评估标准及实施办法》,有22个乡镇进入市教育强镇(乡)先进行列。

对城市的建设改造发展和美化是全方位的,其中有重点美化环境的硬件,也有优化内涵的软件,但“旧城改造”无疑放在重要地位。最明显的成效是市容的整治、违章建筑物的拆除,干道的拓宽,广厦的建造,广场和绿化的扩展,因而使道路宽畅、高楼成行、一扫过去破烂景象,呈现出现代都市的繁荣气派。但是旧城改造过程也暴露出严重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于施工过程随意性大,未能严格遵照保护文化名城的规划,使街市显得凌乱而缺乏特色,历史文脉几乎腰折。幸而及早发现问题,清河坊、河坊街一段历史街区总算在推土机下抢救出来。至今北山路得到较为完整的保护,有专家认为,“北山路的建筑是典型的中国近代史在杭州的缩影”;还有专家认为“以北山路新新饭店为中心,画个半径为500米的圈,在这个圈圈里所包含的建筑历史文化内涵,超过其他任何城市的街道”。这算是“旧城改造”中不幸中的幸事。但愿今后能永远坚持“保护中建设、建设中保护”的原则。只有既保护好千年古城的神韵,又具有现代大都市的风采,才能成为国际旅游城市,并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誉。

第十章 工业兴市提升产业档次

第一节 实施五项整顿 产值首超百亿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的工业作了恢复性的调整,区属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交企业全部上收,但机制紊乱,亟待整顿。正好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2年1月下达《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用两三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点面结合地分期分批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五项整顿,即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整顿财政纪律、整顿劳动组织、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于是市政府责成各工业局和人事局、劳动局、财政局,着手全市县以上国营工业企业、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整顿工作,到1984年底才初步告一段落。1985年进行验收,完成了这次工业企业的全面整顿。

这次通过整顿验收的大中型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共655户,约占规划内企业的95%左右。领导班子状况有所好转,其整顿前后的对比是:领导人数从1812人调整为1694人,平均年龄由48.36岁下降到43.55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由整顿前的258人,占14.2%,上升为521人,占30.75%。经过领导班子调整后,开始贯彻厂长负责制,并对1200余名厂长(经理)分4批培训和考试。

整顿过程中曾先后下达《关于放宽国营工业企业几个政策问题的意见》和

《关于放宽二轻集体企业几个政策问题的改革意见》，使企业在生产经营、生产计划调整、产品营销、劳动用工及调配、机构设置、厂级以下干部任免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在这基础上，又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市政府对各主管局实行利润全额留成办法，各局对所属企业也明确经济责任。又根据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的报告》，对有利润的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利改税，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逐步完善为以税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企业内部也实现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营责任制，较好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工业企业的改革整顿推动了技术改造，技改重点放在对于发展风景旅游城市有密切关系的丝绸、纺织、服装、食品、电子、家用电器、精密机械等行业的技改项目。整个“六五”期间，市属工交企业技术改造竣工项目共有 1083 项，投资额 5.32 亿元，年新增产值 17.85 亿元。

这期间在技术引进工作方面也跨开了大步，经由部、省、市批准成交签约的共有 273 项，用汇 1.44 亿美元，重点是改造轻纺、丝绸、机电、基础工业，努力使丝绸、纺织、化纤、服装、电扇、洗衣机、罐头、啤酒、食品等行业形成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

通过企业机构整顿、落实经济责任制、开展技术改造，工业生产的活力明显增强，1984 年度全市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百亿，达到 100.87 亿元（未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值）。这与文革后初传捷报——1976 年完成工业产值 26.24 亿元和 1977 年进一步达到 35.92 亿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由此足以证明“六五”期间的工业整顿富有成效。

第二节 加强支柱产业 更替新生力量

继“六五”整顿以后，杭州工业在“九五”中发展势头持续良好，不但维持住一百亿元产值的底线，而且一波高过一波：1986 年达到 1779640 万元；1987 年更突破两百亿，达到 2262956 万元；1989 年再上新台阶突破三百亿大关，达 3315612 万元；1990 年达 3594684 万元。总计“七五”比“六五”高出 3.5 倍以

上,这其中大中型企业作用显著。如据 1986 年调查,全市大中型工业企业 89 户,多数属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产业,拥有较好的人力物力条件,掌握传统的先进工艺。这些大中型企业单位数虽只占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 1.53%,但工业总产值却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38.4%以上,实现利税占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 60%以上,其中产值超过 1 亿元的厂家就有 16 家。有的在同行中生产技术领先,并以开创名牌产品的骨干企业为核心,联合经济联系密切的较小的企业协作生产,形成企业群。

如杭州玻璃厂、杭州仪表厂、杭州毛巾被单厂、张小泉剪刀厂等,都相继联合上下游企业,建立了产业链。

杭州市坚持扶植优势的支柱产业,但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工业为主、工业调整以企业为主、企业调整以产品为主,随着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工业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80 年代杭州的产业中轻型结构比较突出。如据 1986 年统计,轻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63.5%。其中丝绸是杭州的传统产品,国家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而且丝织、印染设备完善,真丝提花织物比重大,绸缎品种达 300 多种,花色 1600 多种,织锦缎、古香缎等提花织物和各种真丝绉类织物在国内外素负盛名。纺织行业已形成棉纺织、麻纺织、毛纺织、印染、针织、复制、纺织机械等门类。棉纱、棉布、针织品、化纤、麻袋等产品产量均占全省首位。在轻工业 50 多个大类产品中,有 23 个大类产品产量居全省首位,其中缝纫机、保温瓶、铜版纸系省内独家生产。因而 80 年代逐步形成的杭州四大支柱产业是:纺织丝绸、轻工食品、化工医药和机械电子。

但 90 年代的经济形势发生着重大变化,已不再是年产值超 1 亿元便称得上“特大企业”的时代了,年产值超过 3 亿、5 亿元的企业也非少数,产业结构面临新的调整。这时传统的丝绸业呈现滑坡;机械、建材、冶金、仪表等也由盛而衰,逐步趋于萎缩,在全市工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一批新的产业在市场需求带动和政府扶持下加速成长。于是形成了四个销售额超过 100 亿元的支柱产业:即以娃哈哈、利群卷烟、钱江啤酒、西湖卷烟、金义集团、养生堂、康师傅、旺旺、中萃等品牌为龙头的食品行业;以金松、西湖电子、西冷、华日等著名品牌为龙头的家电行业;以东方通信、UT 斯达康通讯等为龙头的电子行业;以及分

布较广、数量众多、机制较活、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纺织服装行业。

到了 21 世纪初,形势继续发生着变化。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3 个国家级开发区,经过上世纪末 90 年代中后期的建设,开始崭露头角,每年连续保持 40% 左右的增幅,因而成为杭州工业发展的新生力量。于是杭州开始形成五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医药化工、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和机械制造。传统的机械制造曾一度中衰,但通过出口打开局面和技术振兴,重新恢复生机。至此,五大支柱产业都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令其他行业望尘莫及。尤其是东方通信、UT 斯达康、富春江集团、富通集团、信雅达、数源科技等一匹匹黑马,以领先的高科技和创新能力,显示出前途未可限量,其 IT 上市公司实现低成本扩张,投入杭州信息港建设。华东医药、青春宝、天目药业、康莱特等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在杭州新药港的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看来“江山代有新秀,各领支柱风骚”,杭州的支柱产业并非永恒不变的铁饭碗,而是在竞争角逐中走上奖台的。

这里试以 1998 年调查核实的“杭州市十大集团经济情况”为例,反映当年全市规模最大的集团公司处于不同的境况,有的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发展势头,而有的利税较低,或者出现了负增长,正面临危机,受到挑战:

企业名称	资产	利税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	268 1 66 万元	7298 1 万元
万向集团公司	5096 1 4 万元	34344 万元
杭州金松集团公司	348223 万元	2 1 962 万元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公司	140482 万元	12320 万元
杭州中策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126087 万元	1203 1 万元	
西湖电子集团公司	1 98960 万元	10589 万元
杭州炼油厂	7420 1 万元	930 1 万元
杭州汽能动力集团公司	98993 万元	7343 万元
杭州西冷集团公司	12399 1 万元 4739 万元	
杭州玻璃集团公司	1 1 7523 万元	-1 454 万元

从以上各大集团年度利税差距之大,可以测知市场竞争兴衰无常。大型集团虽实力雄厚,但“大”也有“大”的压力,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常盛不衰。

第三节 兴起乡镇企业 呈现星火燎原

乡镇企业为浙江经济特色,也一度成为杭州经济之一大特色。早先由于极“左”路线时期人们经历过追求单一公有制和单向发展工业从而破坏经济平衡的弊病,所以对于改革开放后自发涌现的各种多元经济形式,持相对宽容的态度。杭州市政府在重点扶助大中型优势产业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分散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新生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市场空间。

杭州的乡镇企业起步晚而发展快,在1978年之前全市总共只有67家,在1978年一年中发展为1241家;此后几年间蜂拥而起,据1986年统计为3610户,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5888家的61.31%;另有村及村以下工业企业11600多户,城乡个体工业8000多户。这些小型的集体企业和个体工业,经营灵活,生产勤奋,市场适应能力很强,对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城乡市场、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特别是自1985年杭州实施城市工业整顿改革以后,在市政府引导下,不少工业企业把横向经济联合扩散到乡镇企业。由城市工业企业出资金、设备、技术;由乡镇企业提供农副产品、劳力、场地,联合办厂。这一措施有效地带动了乡镇企业的繁荣,计这一年市属11个工业局(公司)系统就有297个工业企业,与1225家乡镇企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形成了以杭州市区为中心,以7个县为腹地,市区工业向各县乡镇延伸发展的趋势,带动大批乡镇企业崛起。受惠的不仅仅是直接参加横向联合的乡镇企业,间接接受影响的还有附近的企业,包括村和村以下的企业,因为乡村可以乘机吸收城市工业的经验和技術。由此可见,杭州乡镇工业之迅速崛起,是与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引导以及城市工业企业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

乡镇企业在初始阶段,由于规模较小、实力不足,在全市工业企业中所占比

重份量不大。不过由于机制灵活,其发展潜力未可小窥。据《1987 杭州年鉴》反映,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按隶属关系分,县属工业(以街道工业和乡办工业为主)增长速度快于市属和部属、省属工业。在杭中央部属工业产值 9.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省属工业产值 6.76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市属工业产值 8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县属工业产值 49.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1%,如果按经济类型分,则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幅度。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 77.64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6.9%;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 67.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6%,其中乡镇工业产值 2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2%。可见在 80 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生产的绝对值虽不算庞大,而发展势头已呈现一枝独秀、出类拔萃之势。因此,1985 年乡镇工业在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还只占 14.7%,1986 年就迅速上升为 18.8%;对比之下,城市工业所占比重在相应缩小。

10 多年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乡镇工业更迅猛发展,高峰时杭州全市各类乡镇工业企业总数达到 10.24 万家。他们共吸纳了农村富裕劳动力 108.09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43.5%;乡镇工业企业在 1999 年的总产值占杭州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 63.5%,小企业成就大气候,生产总量远超过城市里的许多著名大企业。

乡镇工业的勃兴,是封闭式的农村向社会化生产方向转变的一个侧面。全市农、贸、工、销,连接着广大农户,并与外界市场接轨,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使新的市集涌现,旧的集镇扩展,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商品经济的兴旺,农村巨变,村及村以下的工业也不断涌现出来。

为了形成规模效益,1995 年起乡镇企业率先作改制试点,逐步分批通过调整整顿把大批乡镇企业转化为民营、联营、或股份制企业,至 20 世纪末基本上完成改制,多数化解为非公有制性质。于是统计数据显示比例颠倒过来:国有占全部工业中比例 30.83%;集体占 25.45%;而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及其他工业总和却达到 43.72%。工业经济的类型重新划分,计分列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三资经济和其他经济,共为七大类,这里已看不见“乡镇企业”的名称了。这是由于乡镇企业声势浩大,经过改制后分解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之中。他们完成了一

个时期的历史使命,进入一个新时期,渗透于各类经济形式之中而壮大了区域经济。由此可见,乡镇企业对于各县(市)乡镇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四节 地方工业异军纷起 区县各显特色

杭州各县(市)早先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大多是为数不多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厂。据《杭州 50 年》引用杭州市统计局统一换算的资料记录,杭州所属区域范围的各个县,在解放之初,大多全年的工业产值不过几百万元,如桐庐全县工业年产值为 280 万元,临安 381 万,建德 256 万,淳安 549 万,余杭 788 万,富阳 797 万;达到一千万元的只有一个萧山县(1179 万元)。到 1978 年时,虽然在省、市扶助下经过 30 年的发展和积累,各县工业年总产值仍然极为有限,大多停留于一两个亿,如桐庐 1.1 亿元,富阳 1.4 亿元,临安 1.05 亿元,余杭 2.67 亿元,建德 2 亿元,淳安还不到 1 亿(0.59 亿),萧山最富也只有 4.6 亿元。

1985 年在城市工业企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影响下,经乡镇企业推波助澜,各县工业经济才初试锋芒,萧山、余杭率先突破 10 亿,萧山为 20.82 亿元,余杭为 15.56 亿元;其他各县依次为富阳 5.43 亿元,建德 5.39 亿元,桐庐 4.48 亿元,临安 4.17 亿元,淳安 1.46 亿元。其实当时的所谓县属工业企业,其主力还是乡镇企业,不过是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居多,归县管理。1986 年起各县的工业管理开始正规化,并开始出现多种经济形式,致使 1986 年后成为杭州县域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以萧山为例,1986 年国营工业基本上实现了速度和效益同步增长,年产值 1.9 亿元,利润 0.2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5.6% 和 21.8%;二轻工业实现产值 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7%,居全省同行业的第三位;农场工业产值 2.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7%;乡镇工业产值最高,达 18.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2%,其中村办工业产值 7.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3%;其他系统的工业也都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样算是初具规模,还开始出现名优产品。行业分类主要有机械、纺织、建材、化工、食品等门类。全县有 45 家企业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

有 13 只产品被评为国家、部、省的优质产品。如萧山花边总厂的“玫瑰牌”花边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金杯奖；钱江味精厂的“可得福”大颗粒结晶味精获十三届巴黎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到 1986 年年底，全县已有 240 多家企业与外地近千家企业开展了横向经济联合；有 403 家企业与 504 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大中型工厂建立技术合作；联合协作单位遍及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不少企业还组织各种轻工业产品到郑州、广州、乌鲁木齐等地展销。此外，乡镇企业也冒出一批尖子，年产值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有 26 家；万向节厂就是这批尖子中的一家，当年产值 2402 万元，其产品开始出口去美国；萧山五金工具厂生产的各种花色钳，已畅销 24 个国家和地区。

余杭县的工业也不逊色，生产规模逐步扩大，行业结构趋于合理，至 1986 年底全县已涌现工业企业 2358 家，其中年产值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骨干企业有 25 家。初步形成了临平区的轻纺丝织，塘栖区的纺织机械，余杭区的建筑材料，三墩区的印刷制版和瓶窑区的家用电器五个企业群体。轻工业产值 14.16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77%，其中丝绸纺织行业初步形成了从缫丝、纺机制造、花本设计，到织造、印染、服装加工一条龙生产。食品行业以乳制品、酿造、油脂发展较快，技术改造开始起步，完成 113 个项目。横向经济联合，发展技术协作项目 465 个；引进近 1 亿元的资金和一批物资，还有技术人员；注册中外合资企业 6 家，其中三联电子有限公司、兰美塑料有限公司于 1986 年投产。又组建成以临平绸厂为主体，由 6 家企业参加的杭州恒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余杭县第一家对内一体化管理、对外全方位联合的新型企业集团。

富阳县稍逊一筹，但也紧紧跟上，到 1986 年底全县共有工业企业 3750 家，其中县办工业企业 160 家，区、乡、镇办工业企业 390 家，村办工业企业 1027 家，联户和个体工业企业 2173 家。全县固定资产合计原值 2.35 亿元，拥有造纸、机械、建材、纺织丝绸、电子仪表、工艺服装、化工塑料、食品饮料、皮革鞋业等 34 个行业。在企业内部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还模仿杭州推行厂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制。技术改造立项 79 项，共投资 8249 万元，到年末竣工投产 44 项，开发新产品 42 只，产品质量有了稳定提高。富阳无线电厂的日月牌小型二芯插口和富阳水泥厂的登城牌 425 号普通硅酸盐水泥等 3 种产品，获得了省优质产品奖。重视专业人才，全县工业企业中共拥有各种专业技术人员

304人,其中有大专以上学历者181人。

建德县的特点是轻重工业协调发展。1986年县属重工业总产值为1.88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3.6%;县属轻工业产值2.44亿元,占56.4%。全县已查明的矿种有26种,各种矿床、矿点63个,以煤、铜、石灰岩等矿产价值较大。工业产品有草甘磷、五加皮酒、8410等5种获省金鹰奖;秦箭牌微碳铬铁获国家优质品证书;甘泉牌工业磷酸、严州牌磷酸二氢钾分别获国家银质奖和省优质产品称号。梅城工艺厂和新安江工艺厂的玉雕为重要出口产品。国内第一台漆包线耐溶剂检测仪在建德研制成功,获国家发明专利奖。其中五加皮酒厂是源于前店后坊上百年经营的老牌产品,推陈出新,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桐庐工业企业由1978年的207家发展到1986年的2095家。另有中央部、杭州市直属企业富春江发电厂、富春江水工机械厂、杭州拖拉机厂、杭州工程机械厂等设在桐庐境内。桐庐就近与兰溪建立经常联系向那里学习取经,完善经济责任制,生产稳步发展,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59亿元,是1978年的7.21倍,年平均递增28%;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43.2%上升到1986年的77.3%,其中全民企业产值8805万元,县办集体企业产值6536万元,乡镇工业产值为17600万元,村办工业产值10500万元,联户、个体工业产值2369万元。轻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74%,市场适销社会需求量较大的产品如自行车链条、车把、机制纸、井岗霉素、饮料酒等增长幅度较大。名优产品不断增多,有链条厂、锁厂、富春江家俱厂、农药厂、茶厂、硅纤厂等10家工业企业被批准为计量合格与标准化验收合格企业。有车把厂、造纸厂、春江印染厂、横村针织厂、横村漂染厂等五个大厂产值均超千万元。横村镇形成了以针织原料、针织品等为主导产品的外向型工业格局,产品出口20余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省针织品的重要出口基地之一。横村镇以6家镇办企业带动近10家村办企业,组成出口基地,成为桐庐工业的一大特色。

临安在1986年已形成以轻纺工业居主导的格局,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9.1%,特别是丝绸行业发展迅猛,绸机一年增加一倍。产品结构中以丝织品、白铁丝、精制茶、弹子门锁、手表螺钉、床单增幅较大。名优产品手表螺钉增长45.5%,总产量占全国1/3;鲤鱼钳增长76.6%,产量列全国第二位;弹子门锁增长17.5%,为全省最大的门锁生产基地。全县共组织出口产品38项,工业品

占出口商品比重提升为 62%。全县工交企业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城市企业建立 200 余个项目的联合,引进新技术 25 项,使能保持继续发展的后劲。

淳安在市属 7 个县(市)中工业基础最为薄弱。改革开放后通过落实简政放权等措施,才使淳安工业生产初具规模,至 1986 年时形成了轻纺、食品、电子、机械、化工、林产品加工、建材等 14 个行业,产品 2000 多种,工业总产值 1.63 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产值 7408 万元,比上年增长 3.3%;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 744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8%;两者产值平分秋色,而增长幅度上集体所有制明显处于优势。其中乡镇工业产值 401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8.2%;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 14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42.7%;可见增速以小型的村办工业和村以下的联户和个体工业企业为最快。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淳安县的地域条件决定的。全县被评为部、省优质产品 10 只,100 瓦级立体声调频机、卫星接收机、慢活肝治疗仪、J7030 强力切削锯床、拼木地板、DCH-50 型电视差转机 etc 在全国同行中享有一定声誉。

市区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行政区划有上城、下城、西湖、江干、拱墅、半山 6 个区,对工业生产一般只管辖区内的集体工业;部、省、市、属工业不归区管,所以各区的工业经济还不如几个大县发达。

由区管的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是在 50 年代手工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企业管理的体制上经历过几上几下的反复。直到 80 年代初才开始稳定下来,明确由区对辖区内集体工业企业贯彻“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进行指导。不过各区情况有所不同,大多因地制宜,灵活发展。这里也从整顿后的 1986 年说起。

上城区的工业,在 1986 年获得新发展,产值达到 1.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6%。全区有工业企业 70 家,主要产品有冰箱、电视机配件、电子仪表、建筑装潢材料、灯具、文具、丝绸毛线、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零件等。优质产品电子皮带秤获国家建材局科技成果二等奖;黑白电视机一体化回扫变压器在全国同类产品评比中获第一名。与省内外 100 多个单位进行经济技术协作,成交实施项目 80 多个。从日本引进彩色电视机配件生产流水线和毛线厂 1600 锭毛纺机等先后竣工、安排投产。由于位置处在市中心内,区内无乡镇企业,体制单一。

下城区有工业企业 59 家,总产值仅 7869 万元。23 家企业同省内外 53 个

单位发展经济协作关系,达成项目 55 个。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新产品 59 种(项),从原单一的丝织为主的产品结构向电子、小五金等领域发展。但因区内无乡镇工业企业,民营经济也未兴起,所以工业经济不发达。

西湖区处于风景区内,发展工业受到条件限制。全区有工业企业 529 家(含村办工业),年工业总产值 2.79 亿元。行业有 30 多个,以机电、纺织、食品、电子、建材为骨干。产量较高的产品是 7C-1 型挂车、水泥、民用钢质船、微型潜水泵、直流电机、丝织品、饮料酒。其中杭州挂车厂的 7C-1 型 1 吨挂车在全国行业检查中获华东二组第一名;杭州双流水泥厂的石灰获全国行检冠军;杭州西湖潜水泵厂的 QX 型、QXD 型微型便携式潜水电泵获得省新优名特产品金鹰奖。开展横向经济联合,有 116 家工厂同省内外 128 个单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

江干区地处老城区的边缘,有乡(镇)村两级企业 462 家,工业总产值 3.37 亿元,居老城区的第二位。除了乡镇工业,还有区街工业,所占比重较低。区政府采取 16 条措施促进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有 102 家企业与市大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挂钩,多方面引进外部资金、技术和人才。笕桥镇和四季青乡实现了“亿元乡(镇)”,为各区县所少见,因而这年江干区被评为全省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单位。

拱墅区工业有区、街道所属企业 69 家(无乡镇工业企业),1986 年工业总产值 1.19 亿元。行业骨干主要为家用电器、机械、丝绸三大类。友谊电冰箱总厂、杭州电视机二厂、侨丰静电设备总厂是全区年产值在 400 万元以上的骨干企业。优质产品有百乐牌四喇叭 35 厘米黑白电视机、友谊三门电冰箱、GF-1A 型高压静电发生器、BL-1 型电磁疗机、4095 桑华缎等,分别获得省市奖项。

半山地处郊区,坚持走乡村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商品化道路,重点扶植乡镇企业。1986 年底全区工业企业 279 家,其中区属工业企业 31 家,乡镇工业企业 234 家,街道工业企业 14 家;共拥有固定资产 7185 万元,其中乡镇工业企业占固定资产总额的 93%。乡镇工业企业年总产值 3.59 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95.3%,上交国家税金占 95.64%,利润也占到 91.7%。行业结构以纺织业为龙头,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45%;其次为机械业,占 12%;第三位是家用电器,占 11.9%;三者合计占 68.9%,即达 2/3 以上。产品创新方面,杭州皮革机

械厂研制生产的 XJ8C11-7 型制鞋配底流水线,填补了国内制鞋机械的一项空白,远销也门民主共和国。大新皮鞋实验厂生产的女式皮靴和华星冰箱厂生产的 150 立升双门双温电冰箱,均荣获省金鹰奖。东恒工业公司化工厂生产的佳美牌氧化铁红被评为部优质产品。由于半山区发展乡镇企业取得成效,在市区中独树一帜,所以其工业总产值在杭州 6 个区中能独领风骚,为其他各区所不及。

全面考察杭州各区县(市)工业经济的勃兴,主要在于各自善于发挥自身有利条件,摸索出农村经济商品化和城镇乡村工业化相结合的经验,从而才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展示出各个区县(市)的特色。

第五节 推动多元创业实现共同发展

杭州工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发展,城市工业与区县工业齐头并进。城乡共同发展工业取得成效的前提,是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所谓“天时”指借改革开放东风漫卷、简政放权氛围宽松、乡镇企业冲劲十足的大好形势,市场经济份额不断增多,计划经济份额相对缩小,这是前 30 年所未曾有过的历史机遇。所谓“地利”,是各区县与市区同样能充分发挥杭州地区优越的“地利”因素——国家投资在杭州地区建设电力、水利、机械以及水陆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诸如新安江发电站、富春江发电厂,还有一些机械厂、拖拉机厂等,提供了能源,开创了风气。更重要的是沪杭一带“长三角城市圈”集中有较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型城市工业,便于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和合作技术改革项目,可不断引进技术、资金、人才,提升发展的后劲。更不用说本地区实施开放较早,发达的外向型经济直接有助于工业化的进程。加以杭州城乡轻工业资源甚多,工业产品消费市场较大,这些都是一般地区所不具备的。

然而古语说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杭州区域经济特色之形成,最大的决定因素还在于“人和”的深厚底蕴——杭州地区历来有重视工商的传统,工艺水平精益求精,营销经验灵活丰富,市场竞争勇于创新,城乡民众自

强不息,孕育成杭州独特的人文精神。试看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何以首创在杭州,织染缣绣首盛于临安,小井纸首产于富阳,由拳纸著称于余杭,……凡此等等,都非偶然,看似平淡,其实寓有着重要的人文因素。推而广之,可以想见成功人士张小泉、胡雪岩之辈作为安徽籍人却未能在其家乡成就事业,需要杭州“人文”因素的滋养,才能在杭州这块土地上办成百年老字号并至今保留工艺基础,转而发展成为现代工商业。当今企业家冯根生正是胡庆余堂人文精神企业文化的直接传承者。鲁冠球的发迹自然靠他自强不息、精于工艺,而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却正是萧山民风的生动写照。萧山经济的繁荣不可能只靠一个鲁冠球的个人贡献,而主要还是靠萧山民众群体的创业精神。余杭人以出了一个王力成而引为自豪,其实余杭的工业发达靠的是无数余杭人的拼搏精神。人所共知,冯根生是药店学徒工出身,鲁冠球办农机站起家,王力成早年办过扫帚合作社,宗庆厚推销过棒冰,成材并非天生,都是杭州这片土地和时势所培育,加上人为的努力,才有如今的成就。杭州每个区县都涌现不少企业精英、工业才俊,具体体现了杭州地区优良的民俗民风,才能创造出一浪高一浪的工业增长速度。同时内因之外,还有外因,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后为全国经济建设带来一股暖流。如同春暖花开,杭州人深感气候美好,发展的环境好极了,于是干劲十足。

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工业经过系统整顿后,区县工业跟着迈开步子,显现出杭州整体的工业素质已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所以“八五”、“九五”的发展水平,远高出“六五”、“七五”的状况。据《2000 杭州年鉴》上记载:杭州市1999年全部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两千亿元大关,达到2028.46亿元,为1984年工业整顿后创百亿元好成绩的20倍。同时完成产销值1973.8亿元,计工业产品产销率为97.3%。独立核算国有工业和年销售收入500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对全市经济增长作用明显,改变了大中型企业增幅低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的状况。其轻工业实现销售产值600.59亿元,占总量51.0%;重工业实现销售产值576.28亿元,占总量49.0%;轻重工业之间基本上保持平衡。

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攀升,大中型企业亏损面下降。至20世纪末亏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减少到16个,亏损面由35.4%下降为18%;亏损企

业亏损额由 13.53 亿元下降为 1.6 亿元,占利税总额比重 5.5%,使原先巨大的亏损包袱有所减轻。

技改投入的稳定增长,成为工业经济主要增长因素。计全年完成技术改造竣工项目 899 个,完成投资 55.49 亿元;列入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25 个,总投资 11.6 亿元。建设项目中含引进技术和关键性设备的项目 222 个,用汇 3.53 亿美元。通过技术改造,部分老企业重现生机,优势企业规模更上一层楼,产品结构得到调整,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发展。华丰造纸厂投资实施技术改造,很快形成高档卷烟纸生产能力。大自然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一次性写入光盘,迅速形成国内同业中最大的生产能力。娃哈哈集团公司连续 4 年共投入 15.2 亿元进行技改扩大生产规模,结合品牌经营,大规模拓展了市场。万向集团、钱啤集团、富通集团、万马集团、新安化工集团等集团企业,均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产品更新,壮大了实力。

271 个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实现自营出口 4.37 亿美元。先后涌现出庆本纺织印染公司、中策橡胶公司、万向集团等一批出口创汇大户,其中年出口额 1000 万美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 29 家。

招商引资工作成绩显著,至上世纪末已有 1312 家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来杭开业并已投产。从业人员达 18.9 万人,1999 年销售收入 398.6 亿元,实现利润 22.8 亿元,其中 577 个外商投资企业完成自营出口 10.22 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不小,其销售额占杭州全部工业销售额的 20.2%。杭州欢迎外来投资,尤其是对于促进技术改造的嫁接改造型外商投资企业,更特别欢迎。

1999 年全市列入省工业新产品项目 309 项,列入国家经贸委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 15 项全市工交系统共开发新产品 1221 种。其中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的有数字卫星机顶盒、无纺手术衣巾面料、依维柯汽车变速箱等 32 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有 135 吨/时高炉煤气锅炉、高透气度滤棒成型纸、122 厘米北投式彩电、绿色玻璃等 328 种。全年新产品投产产值 259.69 亿元,全市累计有省、市名牌产品 123 种,其中浙江名牌 59 种(占全省的 22%)、杭州名牌 64 种。全市的省市名牌产品销售收入达到 299 亿元,利润 20.32 亿元。这批名牌产品企业群体,已成为工业经济的支柱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大批高、优、名、特产品迅速发展,并向全国辐射,有的出口海外。

除了市区工业高速高效发展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末叶,县域工业发展速度和规模更超过中心城区城市工业。其中尤以萧山为杭州区县经济的排头兵,发展迅猛,潜力巨大,1999 年实现工业产值 457.48 亿元;销售收入 426.53 亿元;产销率达 96.6%;完成工业性投入 32.48 亿元;出口商品交货值 90.6 亿元;自营出口 6.26 亿美元,居浙江全省区县(市)第一。从萧山乡镇企业起家的万向集团被国家经贸委正式列为全国 520 个国家重点企业之一。早先的机械、纺织、建材、化工、食品五大主导产业,已渐改组成纺织印染、机械、精细化工、新型材料四大支柱产业。其中纺织印染业占有全萧山工业总产值的 40%,成为最大行业;而且其产业链的延伸、装备的更新,产销效益的增幅,都领先于其他行业。高科技含量高的精细化工业,也是萧山一枝新秀。创办于 1992 年的南阳开发区,1994 年正式获准为省级开发区,1999 年精细化工园区正式落户南阳,至年末区内已集合有 10 多个企业投产,开始有年产值 4 亿余元。园区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为建设全省第一个精细化工园区创造了条件;现园区化工产业既已集中建设并形成规模,发展成块状经济,从而更利于推动浙江省精细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

余杭工业总产值 233.09 亿元,1999 年比 1998 年增长 17.1%;销售收入 185 亿元,产销率为 79.49%。完成工业性投入 11 亿元。这些指标虽略低于萧山,而余杭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整体实现扭亏为盈(萧山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虽比上年减少 24.6%,而亏损面仍存在 2.39%,尚未能做到全部扭亏为盈)。二是个私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特快,比上年增长 23.5%,完成工业产值 107 亿元,占余杭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45.92%。3 个余杭市市级个私工业园区启动,有助于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转制为民营或股份制企业进园发展。余杭经济开发区进一步发挥着龙头作用,全年新批准进区项目 30 个,投资 4.4 亿元。临平轻纺业依旧是主导产业之一,其装饰布尤成为引人注目的特色经济。华立集团的电子仪表及相关产品依旧为余杭支柱产业,并受国际同行重视。1999 年 4 月 26 日华立与以色列最大的电子仪表使用客户尼斯科电气有限公司合作签约,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和驻华大使南月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与余杭民营企业企业家汪力成,一同出席签约仪式。此事具有国际影响,对余杭进一步开发高精度高技术含量的电子仪表及其相关产品起着

一定的推广促销作用。

富阳 1999 年工业总产值 213.61 亿元,工业销售产值 204.57 亿元,产销率 97.1%;个私工业产值占全富阳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 73.5%,成为富阳与众不同的特色之一。另一特色是重视引进外资,累计有外商投资企业 157 个,投资金额共 5.45 亿美元。通讯电缆和造纸,为富阳特色产业,富通集团公司是全省最大的通信电缆制造企业之一,经省政府审定,被评为浙江名牌产品。其所产层绞式、中心束管式通信用室外光缆,具有传输能量大、光传性能稳定、机械性能优良等特点,该产品已通过 ISO9002 质量体系认证。造纸为富阳长期来的传统产业,久盛不衰,主要由于其能够适应市场需求,不断更新换代。

临安工业平稳增长,至 1999 年末工业总产值 157.48 亿元,工业产销值 153.23 亿元,产销率达 99.83%,为 7 个县(市)中产销率最高记录。优势企业组成 8 大集团、18 个“小巨人”企业和 30 个“小强人”企业,对全市工业经济起支撑和拉动作用。其中天屹集团的 TY800 系列多路广播电视转发机、天松集团的 LB9818 路标树脂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新产品项目;天松集团、天伦集团被评为浙江省三星级企业,万马被评为省四星级企业。不少产品被评为杭州名牌产品,先后 31 个企业通过 ISO9001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三资企业累计达 104 个。

桐庐工业也有所增长,1999 年工业总产值 95 亿元,工业产品销售总产值 92.435 亿元,产销值达 97.3%。针织和制笔算是桐庐的特色产业;由中外合资杭州天地保健品有限公司研制开发出的皇浆蜂胶粉胶囊于 1999 年连获国际蜂疗博览会优秀新产品金奖、全国发明博览会优秀新产品金奖、省农博会优质农产品金奖等荣誉,销往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近年建筑业发展加快,有建筑企业 34 个,产值 4.44 亿元,较上年增长率高达 41.9%,全员劳动生产率达 6.73 万元/人。

建德 1999 年工业产值 97.8 亿元,完成销售值 83.6 亿元,产销率 96.6%,技改投入 3.6 亿元。新增技改项目 60 个,在建 61 个,竣工 74 个。其中以化工为支柱产业,浙江新安江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确定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浙江省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因此对新安江化工集团的年产 1 万吨草甘膦扩建项目作为重点加以实施。同时有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年产量 16 万吨天然水、建德市新技术实验总厂年产量 5000 吨稀土催酶尿素等项目竣

工投产。累计引进外资工业企业 67 个。

淳安 1999 年工业产值 28.36 亿元,工业销售产值 27.69 亿元,产销率为 97.63%。产业结构调整有突破性进展,较好地完成了新安江罐头食品有限公司技改和商辏公司绢纺扩建项目;关停一批高能耗企业,转产一批扭亏无望和产品无市场的企业,兼并一批规模小、档次低的企业。全县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 8.7%。完成技术改造投入 1.85 亿元,开发新产品 28 种,其中县木业公司的竹模板被定为省重点新产品;甜玉米饮料列入省级新产品开发计划。全年又新办个私工业企业 227 个,个体户 2493 户。总的看来淳安工业规模相对较小,而工业经济效益也正处于提高之中。

以上 7 个县(市)在 1999 年中的工业产值合起来计算共有 1278.47 亿元,占杭州全市同期工业总产值 2028.46 亿元的 63.03%,远远超越市区城市工业。杭州县域经济壮大之速,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了。

90 年代杭州工业经济运行的特点,不但表现在城市工业县城工业并行发展,而且论规模大、中、小的企业齐头并进,论所有制公有、私有、外资、内资五彩缤纷至。按经济类型分: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三资经济和其他经济,都能各显神通,共同发展。为便于统计,试以国有工业企业和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非国有企业总共 2474 个单位来作考察:企业的单位数,以集体经济(689 家)和股份制经济(673 家)为最多;工业产值的总量,以国有经济企业(316.46 亿)和股份制经济企业(309.79 亿元)为最多;其销售利润,以国有经济企业(42.48 亿元)和三资企业(36.09 亿元)为最多,其亏损工业企业的个数,以集体企业(146 个)和国营企业(144 个)为最多。但从杭州全部工业企业总体而言,还是中小企业经济实力强大。尽管大中型企业对全市工业发挥着支柱作用,特别对新技术的创造和推广,对先进管理经验、经营经验的示范作用,功不可没,但在经济总量中比重不够大,据 1999 年统计表明,全市工业企业总数多达 65545 家,其中大型企业仅有 107 家,中型企业也只有 194 家,其余全部都是中小型或小型企业。可见杭州工业特征是中小型企业唱主角,多元经济配合运作,互相协调,共同发展,有利于活跃市场,有序竞争,从而共同创造经济奇迹。

这种多元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结构,同样有助于一、二、三级产业的协调发

展,避免失衡。这里试以 1978 年、1985 年和 1999 年三年中三级产业的收入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列表比较如下: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收入	所占比例	收入	所占比例	收入	所占比例
1978 年	6.34 亿元	22.33%	16.93 亿元	59.61%	5.1350 元	18.06%
1985 年	15.97 亿元	17.65%	52.08 亿元	57.55%	22.44 亿元	24.80%
1999 年	97.58 亿元	7.96%	630.75 亿元	51.48%	496.95 亿元	40.56%

从以上统计数据里可以看出,在工业年收入由 16.93 亿元而增至 52.08 亿元,再增至 630.75 亿元时,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却节节下降,由 59.61% 降至 57.55%,再降至 51.48%,这符合国际旅游城市三级产业结构逐步调整的需要。再看第三产业,无论收入、或所占比例都迅速递升,已遽升至 40.56%,直逼工业所占比例,这也是符合现代化的客观规律。至于第一产业收入虽增而所占比例下调,则有助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总之,杭州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工业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社会全方位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杭州地域文化与多元经济高度融合,使社会经济相对协调。这就是“杭州现象”乃至“浙江现象”形成的奥秘所在,也是杭州之所以能持续发展并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

第十一章 新理念·新布局·新辉煌

世纪的变换,促进观念的更新。世界环境发展大会在发表《里约宣言》的同时,通过了《21 世纪行动议程》,昭示世人“增长有极限”,不能只是单向追求经济增长,而要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综合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国内也相应产生“发展=经济+社会+人”的理念,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建设小康社会。敏感的杭州人得此启迪,及时改变 20 世纪的城市发展老模式,由“增长第一”单向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导向,转为可持续发展型的新模式,提倡全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从资金、器物、工具为中心的生产增长,转到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从不惜破坏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一时繁荣,转变到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正逐渐成为主流思想。于是从 2000 年到 2003 年的三、四年间,杭州城市开始出现崭新面貌:跨出旧城中心,沿江组团发展,统筹城乡协调,注重环境谐和,保护历史文化,发展社会事业,建设花园城市,全面奔向小康……虽宏图初描,而落笔不凡,已为 21 世纪展示出动人开篇。

第一节 调整区划为构筑大都市创造条件

杭州市区原先只有 683 平方千米的面积,是全国省会城市中地域最小的城市。其建市基础本为旧杭县的城区及沿西湖附近一片土地。后虽略有拓宽,奈四周地形受江、湖、山、河所限,施展不开。所以历来杭州人虽以“山水绕城市,门前有花园”而自豪,但又常为城市发展空间狭窄而苦恼。尤其是偏促的古老

城市格局与建设现代大都市不相适应,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的保护产生矛盾,工业化建设更与西湖景观自然环境存在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地域过于狭窄,旧城本已拥塞,改造新建诸多不便;靠着见缝插针,难免杂乱无章;摊大饼方式向四周迭床架屋,自然捉襟见肘,无法缔造现代大都市的恢宏气象;因而城市的整体规划,陷入了被动局面。

为此,杭州市委、市政府于20世纪末开始作“扩市”的准备工作。进入新世纪的200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对杭州行政区划作了较大调整,将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并入杭州市区,撤市设区。并入以后,杭州市区面积由683平方千米扩大为3068平方千米;人口也由原先的179万增加一倍左右,达373万人;使城市规模迅即扩大,在全国省会城市序次升为第五。由于驰名海内外的跨湖桥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固陵古城遗址等珍贵古迹,和径山、湘湖等名胜并入杭州市区,对城市声誉和品位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增添14个镇、19个街道办事处、260个社区,还有国家级的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几个工业园区,连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也一并划入杭州市区,经济实力集中,开拓领域放宽,城市管理强化,对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新的情况也产生新的问题——钱塘江不同于黄浦江,这里两岸开阔、波涛汹涌,一座城市中间受江流阻隔,分成两半,要融为一体谈何容易?!

针对这一现实,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新战略:即在钱塘江上陆续架设一座座大铁桥,钱塘江下打通一条条隧道,钱塘江两岸兴建“外滩”(滨江大道),形成以钱塘江为轴线,南北两岸滚动开发。这样,把钱塘江变成为杭州城市的“内河”。杭州的城市格局不再局限于西湖一隅,而是向东、向南大幅度延伸,进入了一个以钱塘江两岸为发展中心的新时期。人们称之为“钱塘江时代”。其实,这个发展计划并非“西湖时代”的终结,确切地说,是西湖时代辉煌的延伸和提升。因为兴起钱江新城,并未扬弃西湖老城,而是将新城老城分开发展,各具重心,又加强联合,双城一体,共同构成杭州雄伟的主城;然后围绕主城周围,联系3个副城和6个组团,构建组团式的大都市格局。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杭州城市发展空间狭窄的困境,投入现代大都市建设的进程。

果然,钱江新城建设开局良好。2001年新城先期开发的3.29平方千米的

核心区块内,汇集当代建筑之精华,营建壮丽的大型建筑物。包括新杭州大剧院、会展中心、行政中心等,已率先开工,标志着杭州市“城市东扩”拉开了序幕。第一个战役的三年会战,把杭州“外滩”搭起了架子,可透视出不久之后,复兴路一带即将成为集行政、商贸、金融、文化、娱乐、旅游于一体的繁华闹市。按照规划,这里东部将矗立起一大片高层或超高层建筑;中部则形成多层和高层错落有致的花园式住宅群;西部为白塔公园和大片供休闲、度假、疗养的多功能度假村;街区的布局与沿江自然环境相协调,体现人与自然的谐和,也显示区域位置的优越。“外滩”东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邻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隔江通过大桥、隧道与萧山经济开发区相连,发展潜力无穷。照常理建设以交通先行,首要是拓宽新城与老城间的主要道路;铺设新城城区内的道路骨架;抓紧在2003年前完成123公里的环城高速公路,把新城和老城全部包容在环城公路圈之内,疏通过往行车。然后构筑纵横密集的路网,对主干道一一加以拓宽,力求使汽车从市区任意一地到达另一地的时间,正常车速不超过40分钟。为改善市区与杭州所属5个县(市)的交通,须全面提高公路档次为一级公路(争取下一步建高速公路),以实现一个半小时的“大杭州”旅游交通圈。“十五”期间,继前已建好或重修的一桥、二桥、三桥之后,新建四桥、五桥、六桥,使钱塘江上6座大桥并架齐驱,十分壮观。于是南北沟通,天堑通途,两岸的市区联结成整体,不但有效地实现跨江而治、跨江开发的城建计划,而且6座大桥同时发挥对外的交通大动脉的作用,可以加强省会杭州对浙东广大地区的辐射力。

第二节 实施“33929”工程完善都市基础设施

令人鼓舞的是2003年全面实现了“33929”工程——33条道路、9座桥梁、2个隧道、9个入城口的竣工和整治。零星市政工程也顺利进展,如七格污水厂如期完成;市区全面完成了10条河道的整治;另完成94个生活小区、83个公建单位、100条河道的污染源截污纳管,新增纳管污水10万吨/日。天然气利用工程基本修造完毕。完成自来水一户一表的便民措施。余杭——闲林区域供水工程完工投入使用。新增公交线路几十条,新添公交车辆千余辆,新建候车亭几

百个,主动听取民众的反馈信息随时增补公交设施,以不断改善交通条件。对城市低洼积水整治项目全部按时竣工。新建规范的公厕和垃圾中转站一大批,自2002年5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取消了公厕收费,居民游客均称方便。建设成果很多,每年都有新的成绩,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各城区也全面配合行动,推进现代都市的建设。围绕着杭州全市城建总目标,根据各区自身的特点,抓好环境综合整治这一中心工作,强化城市建设管理。分头做好道路整治与保养,市政管理与养护,借地绿化,小区整治,物业管理,城中村的整治,以改善各城区的居住环境和创业发展的硬环境。同时注意完善管理体制,严格依法行政,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强行风建设和市民素质教育,较好地营造社会发展的软环境。

杭州从新世纪开始实施的现代都市建设,跨江而治优化拓展了城市空间,提高了城市整体环境质量,加快了各项基础设施步伐,也改善了城市管理,向“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总体目标一步步接近。尽管工程浩大需要时间,而头几年高起点、高效率的大手笔,已气势恢弘,引人入胜。俗语说得好,“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杭州建设现代大都市的前景无限美好。

第三节 综合整治环湖区域使西湖面目一新

苏东坡的妙喻,不但把西湖比作西子,而且还把西湖比作杭城的眉眼,非常确切。历来杭州人正是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护西子湖。西湖的兴废也就成为这座名城兴衰的一面宝鉴。近年杭州进入兴旺发达期,人们同样没有疏忽对西湖的关爱。2000年起,整治西湖景区的工作已开始形成规模,2001年迎着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更进一步作出具体部署和动员,号召全力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作,要求以3至5年时间,在充分展示西湖景区原有风貌和特色的基础上,装扮得更靓丽和谐,成为自然景观优美、人文景观丰富、服务设施一流、交通便捷通畅、环境整洁卫生、管理科学合理的世界级风景旅游胜地,名副其实的世界景观文化遗产。其整体布局为:“东热、南旺、西幽、北雅、中靓”。

“东热”,是把湖东的湖滨路改造成融旅游、休闲、购物为一体的繁华街区,

而仍保持与西湖的完美统一。设计上坚持历史与现代柔性结合,城市与湖山谐和协调,强化其生态功能、观光功能、商贸功能,弱化交通功能、居住功能。通过功能置换,将西湖的自然空间、山水景观引入城区,降低街区的建筑密度、居住密度,限制车辆对游人游览观光散步购物的干扰,提供充分的闲适空间。遵照智者亲水、仁者亲民的理念,在静态的湖滨配以动态的大型音乐喷泉;并以圣塘景区为契合点,造就城市溪流,开通西湖—古新河,引西湖水流进城内,通行小型游船。这样,钱塘江水既已导引入湖,西湖水又可导引入城河、运河,三水共导,诸流贯通,构成充满活力的“三水城市”。鉴于湖滨路是百年前兴起的老街遗存,自应保存一定的文化特征,特重建百姓所熟悉的骑楼,使人似曾相识,感觉亲切;建筑物的设计控制高度、体量,避免过高过大会破坏西子湖的纤巧精致风格,注重造型和色调,使带有人文气息的滨湖风貌渗入街市,保护湖光山色的优美天际轮廓线,保持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特色。于是新湖滨路真正成了“西湖的大门”、“城市的客厅”,观光休闲购物的乐园,人们漫步其间,会从心底升起“天堂”的感受。

“南旺”,是在沿湖南翼构筑一道文化与景观相结合的艺术长廊。著名艺术学府中国美术学院就设在南山路边,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氛;而且在整个西湖景区中环湖南翼环境容量最大、历史积淀深厚,又是景点类型较完整的一片。本着“还湖于民、还湖于游客”的宗旨,省市领导坚决把原居住在这里沿湖一带的居民(包括不少高干宿舍),以及一些与风景区不相协调的单位,全部撤离景区。然后拆除围栏、调整树木、整合为无阻隔的大园区,布置灯光、配以音乐,沿湖接通步行道;又合理布置游艇码头,引湖水进陆地成小河、池沼;拓宽环湖公共绿地,打破独立建园组景的老概念;把沿路的原少儿公园、老年公园、长桥公园、柳浪闻莺公园进行资源整合,合为免费开放的景观廊道,实现了开放性、通透性、可进入性的大花苑布局。根据园林文化的要求,采用拱桥、河埠、雕塑、景观小品、文物建筑、古典型的楼台亭阁等,在美化景区的同时,适度体现了民俗文化、园艺文化、名人文化、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提升文化品位。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雷峰塔,造型华贵,既古典,又现代;隔岸与保俶塔相峙,与钱王祠、万松书院等景点串珠成链,其历史文化内涵尤令人浮想联翩。过去人称“西湖南冷北热”,如今经过通透性的改造,南线不再冷僻,其兴旺更超越北线了。

“西幽”，是在西湖以西地段，恢复生态环境，建成充满古趣野趣的景区。这一带在明清时本为西湖水域的一部分，区域内分布有大量自然风景资源、人文资源、水资源和动植物资源，形成湖西独特的自然环境。奈湖西的水浅土松，极易淤塞，早先的杨公堤及其堤上的“里六桥”已掩上历史的尘埃，变为西山路；沼泽地化作陆地；不少古迹都已湮没不闻。本着还西湖历史原始性、贯彻生物多样性原则，按照“整治、引水、美化、造景”的方针，启动了湖西区域综合保护工作。采取综合手段，动员非农人口外迁，推动农居点适当集中，以降低这里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提高景区环境容量。利用水塘密布河港交错的地形条件，可促使现有地表水、溪涧水在入湖前得到净化；同时加大钱塘江向西湖的引水量，改善和复原湖西生态湿地，提高水体质量，打造江南水乡风情；改变植被单一，改进绿化结构，保持四季花开；突出明代文化特征，西湖水体面积也有所扩大，接近于明代的湖面；在滨湖区域适度造景，力求幽静自然，野趣横生，以便达到返朴归真的效果。

“北雅”，是通过保护和改造，使北山路在保护的前提下求得必要的整治，保持高雅精致的特色，维护完好的历史街景。北山路南临里西湖，北靠宝石山、葛岭、栖霞岭。考古资料证明，这一带曾是西湖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现存最早的历史遗存为秦始皇缆船石和汉代出土墓葬；东晋葛洪在葛岭曾建“抱朴庐”；宋代北山一带有智果寺、玛瑙寺、大佛寺、风林寺；元明清后各种别墅、饭店云集北山路；尤其是近现代有一批名人入住，如号称“西博会之父”的张静江在此建有静逸别墅，与别的一些名人所建坚匏别墅、孤云草舍、菩提精舍、秋水山庄等雅居构成一片别墅区；还有首届西湖博览会工业馆旧址也在这里。这些依山傍水的古迹和名人别业，与湖山融为一体，环境雅，品位高，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街区。但由于年久失修，民居杂乱，设施老化，环境受到污染，致与西湖景色极不协调，亟待整治。现北山区规划整治面积 97.69 万平方米，本着尊重历史、挖掘文化、营造环境、追求特色的原则，逐步实施搬迁安置，拆除违章建筑，清洁卫生，去除围墙，敞开庭院，连接精致园林；整修名居别业，形成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互相陪衬；修缮菩提精舍、玛瑙寺，辟建具有宗教文化特色的休闲场所；沟通道路，扩绿建绿，营造幽雅的生态环境；修复西湖博览会工业馆旧址，设立杭州西湖博览会收藏馆。把整个街区建成为特色鲜明的

宝石花园。

“中靓”，是对湖中“三岛三堤”的整治，使西湖核心区锦上添花。这里是西湖上的主要景观带，为极大部分中外游客来杭后必到之地。根据各景点的历史成因和现有格局，明确各景点不同的功能定位，强调各自的景观特色。对三潭印月的整治，主要是调整网点布局，充实文化内涵，整合码头资源，形成主游览线。对湖心亭的整治，围绕湖心平眺品牌，完善植物配置，淡化商业气氛，突出“风月无边”的景观，恢复观赏西湖美景的最佳位置。对阮公墩的整治，注重生态功能，完善植物种类，营造体现自然的宁静氛围。对白堤的整治，突出朗艳风格，保持十里花堤特色。对苏堤的整治，维护幽野风格，烘托西湖艳丽色彩。对杨公堤的恢复，与湖西综合保护工程配套，再现明代杨公堤“里六桥”历史风貌。

经过杭州各有关部门协同奋斗，几路工程进展神速，2002年国庆节前西湖南线景区、雷峰塔、万松书院及时完工开放，游客如潮。2002年12月起，杨公堤景区、新湖滨景区、梅家坞茶文化村、西湖隧道、西湖水环境保护等建设工程相继启动，先后竣工。2003年国庆节前，湖东的湖滨路和湖西的杨公堤至梅家坞，全面开放。至此剩下的只有北山路的收尾工程了。

这次西湖综合保护治理，工程庞大，涉及面广，而进展顺利，效果良好，受到上下内外一致称道。回顾杭州历来的为政，都以维护西湖的山清水秀和杭城的人文氛围为最大政绩。白、钱、苏、杨、李、阮都是古代贤太守的典范。当今杭州市领导坚持西湖保护与大都市建设双管齐下，在钱江两岸着力建设现代化城市新中心的同时，实施西湖保护工程。在新世纪头4年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营造古城神韵，焕发清丽湖光，使这座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天更蓝、水更碧、地更绿、空气更清新、生活更舒适，不能不说是杭州史册上最值得肯定的卓越功业之一。尽管离不开前人的积累，而建设整治西湖规模之大，品质之高，进度之速，实在前无古人。西湖的魅力大放异彩，反映于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事业的发展迅猛，实效明显，试以主要数据把四年前后的变化发展作一简单对比：

	接待境外 旅游者人数	杭 州 外汇收入	国 内 游客人数	国 内 旅游收入
1999 年	59.19 万人次	2.37 亿美	2207 万人次	186 亿元人民币
2003 年	86.12 人次	4.22 亿美元	2776.3 万人次	290.9 亿人民币

众所周知,2003 年遭遇“非典”风暴,国际国内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而在大灾之年,增长率分别高达 45.5%、78%、25.8%、56.4%,可谓奇迹。

第四节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掘取得空前成绩

历史文化名城是杭州的“生命线”。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名”就名在历史的独特性和遗产的丰富性,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仍然如此:历史文化作为杭州永恒的主题,不朽的历史遗产万古常新。果然,当人们满怀信心进入新世纪的时候,考古界又在杭州连续地发现了足以震惊全国,甚至可能震撼世界的重要人类文化遗产。

其一是世界最早的独木舟在萧山湘湖发现,深受世人关注。发现时间是 2002 年 10 月;发掘的地层是跨湖桥遗址底下的第⑨层——文化遗址早期阶段,即距今 8000 年左右。为了慎重起见,市文物部门特地把独木舟的标本和遗址第⑨层的陶片标本,分别送给北京大学和上海博物馆,分头做了碳 14 测定和热释光测足,以求确证。结果,两个不同的考古权威部门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里,使用不同的科学测定方法,对两块不同标本所作测定得出的数据,却是基本上一致,其年代都为 8000 年上下。这就意味着这艘独木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船。船身长 5.6 米,宽 0.53 米,两侧有若干木桩和几片划船用的木桨,还有许多经过人为加工而尚未成形的木料,以及当时的湖泊遗迹。显而易见,这艘独木舟的存在并非孤立现象。它与湖泊、木桨、木料等遗物是相互关联的共存关系。周围的文物信息告诉人们,这里可能是杭州先民造船或修船的船坞。从 8000 年前造船技能之高,足以使人联想当时杭州地区制作工具的水平 and 从事生产的能力,都已相当先进。这一批保存完整的遗址,也反映出远古时期杭

州湘湖一带的经济文化曾经是同时代相当先进的区域。在此以前,国际上的考古学者和古船史学者公认独木舟最早起源于 7000 年前的南部非洲,如今这一定论当被杭州出土文物所推翻。所以湘湖独木舟的发现,具有国际性的重大考古价值,杭州湘湖的名声借此机会可再次远播于海外。

史前文物为今人留下遗产,也给今人出了难题。由于独木舟出土接触空气后,“体质”一度恶化,舟体开始出现裂纹,如不及时采取抢救性措施,很快就会变形变质。如何保护呢,而且需要连同周围遗址作原址保护,世上尚无先例可资借鉴。何况独木舟出土时如同棉花一般软,一碰木头就会断折,如今不干不湿搁在地上实在难以保存。经过多方打听,请来这方面的一流专家,以集体智慧设计出保护方案,进行脱水试验,脱盐试验,恢复木头原来化学、物理特性的 40%,不使变形;然后浸泡活化水——发明专用于遗址中高含水木构件脱水定形的微生物方法;经过大量复杂的科学实验,才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由此可见,保护历史文化是当代城市建设者重要使命之一,不可等闲视之。

其二是下孙遗址的发现,为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命名及确定浙江最早的史前文化找到可靠证据。这一遗址的发现时间在 2003 年 11 月;此前曾对跨湖桥遗址多次发掘,因缺乏研究而未能定论,须得联系两处发现作比照研究,才能产生新的突破。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与 70 年代,就有人在跨湖桥一带多次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陶片,但由于那时不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遗址受到破坏,令人遗憾!1990 年 6 月又有人报告,说萧山城厢砖瓦厂取土工地现场发现大量黑陶片、兽骨、鹿角、木器残件,疑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有一件耜耨农业出现的标志物——骨耨为钻孔式,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捆绑式骨耨明显不同。从出土文物的特征分析,两者属于非同一般的史前文化遗址,因而以出土文物地名跨湖桥村的名字称呼出土遗址为“跨湖桥遗址”。这年 12 月作第一回考古发掘,得文物百余件,还发现了灰坑、建筑遗迹。经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碳 14 测定,年代在 8000~7000 年之间,明显早于河姆渡遗址层及罗家角层,应该算是浙江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许多专家对此持有疑问,对海洋研究所测定的年代予以否定。于是再一次因历史偏见而受挫。

2001 年 5 月至 7 月,省市文物部门正式进行规模较大的抢救性发掘,出土

了一大批陶器、石器、骨器、木器及动物残骸；其中陶器复原器近 150 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等邻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以肯定跨湖桥遗址是一个新型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较权威的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实验室对 5 个地层所出土 6 个木头标本的碳 14 测定数据（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 8000~7000 年间，证实前次由海洋研究所测定的年代是正确的。这样才基本上肯定了跨湖桥遗址属于面貌独特新颖的文化类型。其年代早于河姆渡，而先进性也超过河姆渡文化遗址。2002 年 4 月在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评选活动中“跨湖桥遗址”被评为“2001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为了慎重起见，只称作“跨湖桥遗址”而未定名为“跨湖桥文化遗址”。那是由于跨湖桥遗址仅是一个单独的遗址，尚缺乏旁证材料，在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来龙去脉等问题尚未调查清楚之前，命名为“文化遗址”的条件还不够成熟，须在找到一个与跨湖桥遗址同时代的、其文化类型又是相同的遗址，才能正式命名“文化”。2002 年 10 月至 12 月在发掘研究遗址整体性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人工培植的稻谷颗粒，还发现了独木舟和相关遗迹。2003 年 5 月至 11 月，终于在下孙自然村找到了与跨湖桥遗址同类型的文化遗址——下孙遗址。这次下孙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但发现了灰坑及柱洞近 70 个，经碳 14 测定，其年代也为 8000 年左右，标志着“跨湖桥文化”的条件最终成熟了。这是非同凡响的重要发现，将与早先发现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齐名，而且是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这一发现还有助于考察中华文明的前奏来源于多重谱系，也为长江中下游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三是良渚大遗址保护取得突破。杭州市迄 2003 年止，累计在余杭区内先后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共达 119 处。可以断言，以莫角山、瑶山、反山为核心呈辐射分布的 50 平方千米，是全国同类遗址中内涵最丰富、分布最集中的遗址群落。为此，省市决定成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将原良渚、瓶窑、安溪、勾庄、彭公 5 个乡镇的区域划入管理区，挂上“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局”的牌子，统一负责管理区的文物保护、城乡规划、经济开发、社会管理等工作。2001 年 12 月 26 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市政府提交的《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以正式立法手段加强良渚文化遗址的保护。

其四是杭州 4 项考古成果入选“200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个城市

能在全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占有四席，这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2001年国务院新公布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杭州有8处入选；加上原有的6处，增加为14处，丰富了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原来的6处是：飞来峰、六和塔、岳飞墓、白塔、良渚遗址、胡庆余堂；新增的8处是：南宋临安府城遗址、凤凰寺、西泠印社、文澜阁、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梵天寺经幢、临安吴越王族陵墓、临安功臣塔。上述“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的4项新发现——跨湖桥新石器遗址、五代雷峰塔地宫遗址、南宋老虎洞民窑窑址、南宋恭亲圣仁烈杨皇后宅遗址，尚未来得及申报，只好留待下次申请增补。事实再次证明，杭州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存、考古新发现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丰富，在全国城市中是不多见的。加上西湖的魅力自然更引人注目。无怪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亚洲高级别研讨会在杭州举办时，当谈及选择杭州作为会址的原因，会议发言人表示：“天堂杭州的美誉由来已久，婉约的西湖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让杭州成为一流的旅游城市，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杭州为研讨会提供的宽松舒适环境，赢得与会人士的普遍赞誉。”

第十二章 城市化纳入文明发展轨道

第一节 实力上升稳步走向小康

由中国市长协会组织近百名海内科学家、院士及一流专家共同完成的《(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发布:根据城市综合竞争力、发展潜力和真实能力3项指标,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和沈阳等城市位列前十名。就是说,杭州不但入选综合竞争力十名之内,而且排在著名的特大城市南京、武汉、成都、沈阳之前。

第二天(2004.3.2),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联合公布《200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杭州仍旧被排名在全国竞争力最强的十大城市中的第六位。再次证实了杭州实力由上年第十一位上升到本次的第六位,并非偶然。

正是由于杭州城市综合竞争力迅速上升,2003年的经济列车实现了全面提速,因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多方面刷新了纪录,明显表现出实力的飞跃。

首先表现在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了两千亿大关,达到20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连续十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是1996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其次表现在农业跟着起飞,摆脱滞后,实现增加值127亿元,比上年增长7.5%。茶叶、花卉苗木、水产品、节粮型畜禽、蔬菜和竹业等六大优势产业实现产值108.9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比重高达57.6%;水果、干果、蚕桑、药材和蜂

业等五大特色产业实现 18.27 亿元,也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的 9.7%;两者合计共占农业总产值 67.3%,即三分之二以上。这一比例,显示出杭州第一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卓越成效,都市型农业快速发展,走向成熟。

杭州工业是典型的“两头在外”的加工业,原料大部分需要从外面来,产品三分之二要在本市之外销售,要想有竞争力,就须占领技术制高点,把握核心技术和先进工艺,依靠科技的跨越来实现工业的跨越发展,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利用外资嫁接,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一方面把改革、改造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加强科技含量,加大投入力度,不间断地推进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技术改造项目,促使工业整体素质在产品、工艺、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开展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推动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探索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新路子。2003 年尽管承受着非典和高温缺电两大考验,规模以上企业仍尽力克服低、小、散的状况,做大做强。其中如杭钢、物产、广厦、万向、娃哈哈、UT 斯达康、华东医药、华立等 8 大集团成绩辉煌;二梯队的东芝、恒逸等也实力雄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总数达 3198.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3%,增幅上升了 9.5 个百分点;实现利税 347.76 亿元,利润 192.92 亿元,分别增长 26.6%和 30.8%。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 2001~2003 年三年间,信息产业化和城市信息化为杭州新世纪跨越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加紧以“两港五区”建设为重点打造“天堂硅谷”,信息产业作为信息港建设的主体,持续迅猛发展。同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136 家重点软件企业和 67 家重点制造企业,合计年产值增长 60.16%。

杭州旅游业在 2003 年上半年因非典疫情而损失严重,下半年通过努力求得回升,“旅游西进”也取得重大进展,全年旅游总收入仍达到 32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旅游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商贸服务业的兴旺,市区相继建设起 7 条商贸旅游特色街,成为旅游新亮点。全市餐饮业零售额达 64.42 亿元,增长 8.9%。宾馆业客房平均出租率达 70.6%,据测算旅游总收入相当于 GDP 的 16.55,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

商品交易市场活跃。2003 年末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 693 个,其中生产资料市场 101 个,消费品市场 592 个。全年商品市场成交金额 93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8.6%。其中成交金额 1 亿元以上的市场有 67 个,10 亿元以上的有 14 个。连锁超市发展最快,年末全市连锁门店和连锁餐饮企业共达 1035 个,年零售额达到 92.5 亿元,比上年增长达 40.1%。

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全年进出口总额 182.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9.2%。其中出口总额 109.5 亿美元,进口总额 72.8 亿美元,计出超 36.7 亿美元。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 62.71 亿美元,占 57.27%;机电产品占大宗,出口 26.0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8%。

利用外资取得新突破。2003 年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869 个,比上年增长 48%;实际利用外资 10.09 亿美元,增长 93.3%。其中投资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 138 个,大项目协议利用外资 12.66 亿美元,占全部协议利用外资 63.3%。

引进内资大幅增长。2003 年引进内资项目 3779 个,为上年的 2.21 倍。协议引进内资 354.58 亿元,实际引进内资 150.39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31.2% 和 82.5%。

四个国家级开发区继续发挥着招商引资主平台的重要作用。计 2003 年一年内签订外商投资项目 202 个,合同外资 8.38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4.74 亿美元,分别占全市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41.9% 和 46.9%。开发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911.63 亿元,利税 102.66 亿元,产品出口创汇 25.63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30.4%、13% 和 62.5%。同时,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对加快城市东扩起到了推动作用。

“交通西进”,路网建设再续新篇。至 2003 年末全市共有公路里程 6692.8 千米,其中高级公路里程 1806.51 千米,比上年增长 11.3%。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 22838.84 万人次,其中铁路 1534.27 万人次,公路 21000 万人次,民航 215.4 万人次,水运 89.17 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为 15697.79 万吨,其中铁路 438.46 万吨,公路 11000 万吨,民航 6.2 万吨,水运 4253.13 万吨。与上年相比,发展平稳,计客运增长 8.3%,货运增长 9.4%。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2003 年总收入比上年增长 20.9%。邮政特快专递完成国内业务 283.43 万件,完成国际业务 13.38 万件。固定电话用户 313 万

户,比上年增长 24.7%;固定电话主线普及率 47.29 线/百人,其中市区 56.4 线/百人。全市移动电话用户 395 万户,比上年增长 43.1%。年末全市因特网宽带用户 39.72 万户,比上年增长 86.8%。

房地产业蒸蒸日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由于“住在杭州”的品牌打响,吸引着外地企业家人住创业,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用。加上休闲业的推进,杭州正在形成“休闲之都”,大款来杭购买别墅的也为数不少。2003 年商品房施工面积 2406.78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6.8%;竣工面积 605.47 万平方米,增长 7.3%;商品房销售面积 487.61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0%。房地产市场活跃,由于房价看好,连二手房也十分畅销。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改善。2003 年第一产业投资 1.05 亿元,增长 56.5%;第二产业投资 320.3 亿元,增长 43.6%;第三产业投资 573.25 亿元,增长 26.2%。建筑业继续快速发展,限额以上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占 32.6%。所有制结构合理调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占 50.5%。

上述各行各业全面发展,协调均衡,其投入与产出的具体数字都充分显示杭州在进入 21 世纪后发展的速度惊人,为“排名全国第六”作出有力的注释。

第二节 精致和谐安宁 生活品质提高

杭州人口出生率 8.04‰,人口自然增长率 2.31‰,2003 年年末杭州全市户籍人口 642.78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5.97 万人。其中市区户籍人口 393.19 万人,增加 6.18 万人。较低的生育率,较低的人口增长压力,确保了经济稳定发展。

近年杭州矫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化的停滞状态,开始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前后试作对比:“文革”结束的 1976 年,杭州市城镇化率为 22.59%;启动改革开放的 1978 年略有回升,城镇化率为 22.95%;至上世纪末的 1999 年,城镇化率升为 35.55%;至 2003 年杭州及其所辖市县的城镇化率进一步上升到 41.02%,高出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约 2 个百分点,并向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 47.62%逐步接近。杭

州市区(包括萧山、余杭及其农村)如若单独计算,非农人口的比例已达54.97%,已超过了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从总的趋势考察,杭州近年的城市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园林化同步发展的,因而比较健康,有助于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稳步提高。人们生活其间,自然会感到安定和满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镇化过程中关注城镇的协调发展,全市已出现一批乡镇发展势态良好,其市容面貌不逊于城市。在2004年春召开的全市中心镇试点工作会议上,不少代表纷纷赞美乡镇的巨变:门前修马路,休闲有公园,看病有医保,购物有超市,街头像城市,失地有保险——会上表彰8个城镇为城镇化的排头兵,计实现城镇化较高水平的有临浦、靖江、瓶窑、新登、分水、乾潭、文昌和太湖源等。组团式的城市发展,促使主城以外的3个副城和6个组团分头扩张,扩大了对周边郊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力,从而也增加了农民到市镇就业的机会。

就业,是保障多数人生活稳定的最基本要素。2003年全市净增就业岗位13.38万个,实现再就业12.35万人,使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年末共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7.09万人,登记失业率4.39%,其中市区4.36%。杭州农村劳动力大多亦工亦农,由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较发达,脱离农业的农村劳力以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为主。市区从业人员在连续多年总数减少之后,自2001年起从业人员开始结束负增长。全市就业总数达413.1万人(含农村从事农林牧副渔的生产者和城镇的非正规就业),就业形势转向良性发展;至2003年,失业率呈下降趋势。当前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社会服务、民营制造业、建筑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等行业的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以及城镇私营个体非正规就业,成为城镇就业总量增加的主要来源,足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就业与失业的压力。所以许多人反映,杭州工作的机会比以前增多了,这是广大失业人员共同的感受。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有所提高。据市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得知,2003年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98元,比上年增长9.5%;人均生活费支出9950元,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5740元,比上年增长9.5%;人均生活费支出4578元,增长15.7%。由于收入日益增长,居民储蓄相应递增,2003年末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达1589.96亿元,比上年增长20.85;其中城镇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1307.96亿元,比上年增长20.9%,按人口平均计算,人均储蓄高达

60517.28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资料显示,杭州市区居民收入在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中排名为第七位。

杭州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十分明显。1999 年市区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 9.6 平方米,至 2003 年末已增至 17.2 平方米;虽计算口径可能有所出入,但总体增幅甚大亦是不争的事实。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也由 1999 年的 42.2 平方米增至 2003 年的 54.7 平方米。房屋建筑的结构与设施,也大有改观,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社会保障体系有了改进。2003 年末,杭州全市有 4.1 万家企业、124.15 万人参加养老保险,其中有 54.74 万私营和个体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 1.4 万家企业、98.71 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有 2.88 万家企业、155.65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福利事业持续发展。2003 年末全市有各类福利院、敬老院 225 所,收养人员 5170 人。年末全市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47 万人。

杭州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继续稳居浙江全省的第一位,得益于自身的努力,也得益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短短几年内,GE、伊莱克斯、东芝、三菱等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纷纷落户杭州,世界 500 强中已有 42 家与天堂牵手,助长杭城经济活力,居民收入随之攀升。例如世界 500 强之一的德国博世公司落户在杭州,投产后将需求 2000 名员工,除了少数技术人员来自德国外、主要吸收杭州本地员工,工资水平也高于我国一般企业,不仅促进了杭州经济发展,而且可促进人才就业。

第三节 社会事业产生协同效应

杭州现阶段所达到的小康还仅仅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也是不平衡的。全面建设小康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更要全方位的统筹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中社会事业文化建设是不可缺少的一翼,越是城市经济水平提高了、居民物质生活改善了,就越是需要配套建设好社会文化事业。杭州正是循着这一路子前进的。

首先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现代教育为实现全面小康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也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且直接决定居民的知识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影响着城市的竞争力。《（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有一段评价杭州人才竞争力与城市竞争力产生协同效应的话说：“杭州居民的知识水平、整体素质、技术水平、价值取向、能力水平较高；居民人均收入、就业机会、城市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指标排名，均名列全国大中城市前茅。”袁晓航等记者在《第六位从何而来——瞩目杭州城市综合竞争力特别报道》分析文章中也引述这段评语作深入分析，都认为教育为树人之本。杭州市过去一贯重视教育，现在仍然非常重视教育，全面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把基础教育的持续协调发展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03 年全市学龄前三年幼儿入园率高达 93.5%，学前教育如此重视，为一般城市所罕见。小学入学率为 100%；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比例为 99.99%；初中毕业升入各类高中段比例为 87.71%。说明杭州在认真贯彻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已向高标准、多元化普及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有中等专业学校 13 所，在校学生 2.17 万人；职业高中 42 所，在校学生 6.97 万人；普通高中 77 所，在校学生 10.81 万人。高等学校 35 所，在校学生 26.4 万人，其中研究生 18435 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20.4% 和 16.9%；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13.73 万人，自学成为风气。鼓励社会办学，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学校 61 所，在校学生 9.39 万人，比上年增长 13.7%。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仅杭州师院就有在校学生 14000 人，其中本科师范生主要培养本市所需师资为主；现市区中学教师全部大学本科学历，小学教师全部大专学历，保证了教育质量。高教园区建设达到现代化要求。教育基地引进国际大企业入驻杭州联手发展的实例不少，如三星电子与浙江大学结缘便是一例。当三星电子集团代表团到杭考察时，惊喜地发现浙江大学的专业学科以及国家级 IC 设计产业化基地，堪称中国顶尖的半导体开发资源集群，这段姻缘就水到渠成了。

其次是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杭州创造条件成为全国首批科技孵化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得到了国家科技部确认。2003 年一年中全市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103 项。活跃技术市场，全年签订各类技术合同 32286 项，合同成交额 42.75 亿元，其中技术交易额 42.64 亿元。申请专利 3400 件，专利授权 1600 件。至年末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506 家；培育认定研发中心 41 家，累计认定

研发中心 69 家。重视科技人才的引进、培育和使用,支持他们在科技研发和科技孵化中的创造性活动,有助于城市经济文化活力的增强。

第三是加强文化名城建设。在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开发的同时,也注重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杭州在鼓励创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2003 年一年中全市文艺作品获国家级奖 29 个,省级奖 62 个;11 部广播电视作品荣获“飞天奖”、“星光奖”等国家级奖项;69 部广播电视作品获省级奖项。文化设施建设完工的有杭州大剧院、东坡大剧院、杭州文化商城等。全年发行报纸 12 亿份,各类杂志 8000 万册,图书 3.2 亿册。杭州电视台 4 套节目平均每周播出 549.5 小时,电视综合覆盖率 99.07%。数字电视开通试播。杭州广播台 3 套节目平均每天播出时间 67.5 小时,广播综合覆盖率 99.24%。总之,建设小康既需着眼于人民物质的需求,也须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和素质提高的要求,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杭州的文化名城建设做到古今并举。

第四是医疗卫生工作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战胜“非典”的侵袭。杭州“非典”病例的出现,正值全国疫情总爆发的高潮初期,有关部门及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能沉着应对,控制局面,保持良好秩序,实属不易;且能把非典控制在输入型,并严密控制在最小区域内,这就是不简单的胜利。尽管在这次战斗过程中也暴露出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和医疗应急机制脆弱的一些缺点,这是值得反思引以为戒的。2003 年末,全市共有各类医疗机构 1820 个,各类医疗病床 2.77 万张;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3.72 万人。另外,建有社区医疗服务中心 34 个。其医疗科技水平、卫生服务能力、人民健康水平均居国内领先地位。

第五是体育事业基础较弱,近年有了进步。在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上,杭州市体育代表团获金牌 14 枚,列参赛城市的第八位。全年杭州籍运动员参加国际性比赛共获金牌 15 枚,其他奖牌 20 枚。全市举办区县(市)级以上健身活动 2338 项次,参加的有 28.88 万人次。新建 126 个全民健身点,35 个全民健身苑,新配置各类健身器材 3542 件。这些都是杭州市关注人民健康为民办的一些实事。中小學生《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率达到 98.95,江南素称文弱的青少年,体质比前强健了。杭州人已普遍懂得,健康是需要城市与个人合力投资的新竞争力。

第四节 加强环保生态良好

早在 50 年代,杭州市政府曾提出“家家种树、户户栽花、人人养护、株株成活”的口号,开展过群众绿化运动。旧城区内先后辟建小块花园绿地 1002 块,总面积近 80 公顷,城区密集的居民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遍种树木花草,植树不下百万株。当时曾经形成护绿的风气。

但“文革”期间由于社会动荡、绿地失之管理,出现了滥砍乱伐树木和乱占绿地的严重现象。70 年代以后,杭州城区又出现了“见缝插房”式的建房热潮,大批的小块绿地被侵占,散布在城区的大量池塘直至小河都被填没,塘边河畔的树木花草荡然无存,导致绿地树木花草水体不断减少,绿化覆盖率急剧下降。据杭州市园林管理局 1977 年 5 月的《杭州市园林绿化调查资料》称,绿地面积由 80 公顷锐减至 9.67 公顷,散布在城区街巷的大量小块花园绿地基本被毁,零星残存的寥寥可数。

1984 年起绿化建设逐步恢复,趋于正规。1988 年起对新建改建居住区要求按照《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的规定,实施绿化指标,审批绿化规划用地、绿化设计方案,旧城成片改造的绿化率不得少于 25%,新建住宅区的绿地率应不少于 35%,并加强了监督管理。对过去的旧城区“见缝插房”改为“见缝插绿”,推广居民区绿化连片。自 1983 年至 1993 年十年间,居住区绿地由 8.4 公顷增加到 134.8 公顷,超过了“文革”以前的水平。

花卉的生产在 60 年代有花圃 4 个,面积 31 公顷,花卉品种 1965 年曾达到 2945 个。“文革”期间花圃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花卉被毁坏,只剩下 500 余个品种。70 年代恢复花圃各生产园区,重新去外地搜集花卉品种,至 1976 年有 1545 个品种;到 1993 年增至 4238 种,重新超过了“文革”以前。

行道树的种植,随着道路建设而增加。50 年代初市区通车道路总长度仅 14.5 公里,种有行道树 4144 株。至 1994 年普查,市区植有行道树的主次干道及通车小街共 348 条,总长度 291.87 公里,种有行道树总数达 49390 株,计增长 12 倍。

义务植树,加强了机关干部带头的群众性植树运动和义务植树的宣传教育,并采取多种组织形式,诸如义务植树与重点工程相结合,或与建设公园相结合,或与美化市容相结合,或与目标管理创先进相结合,或与植纪念树造纪念林相结合,或以资代劳相结合,或与养护承包责任制相结合,或与种、养、管相结合,涌现出不少“青年林”、“团结林”、“三八林”,名目繁多,成绩不小。特别是创建绿化先进活动,每年开展绿化检查、评比,对推动群众植树很有效。1966年因“文革”而中止,1982年起恢复评比,涌现大批先进单位、先进街道、先进居民区、先进学校,大多对绿化和精细养护管理作出一定贡献。“十年树木”,持之以恒,绿化终见成效。加上专业化的园林机构和园林科学研究机构人员的共同努力,杭州市在90年代连续获得了“全国园林城市”、“全国绿化先进城市”、“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等称号。

但是正如原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局长施奠东在《杭州城市绿化志》一书中所写:“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杭州城市的绿化水平还不高,绿地的分布很不均匀,如果剔除西湖风景名胜区,现有的城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均落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这是与‘全国园林城市’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的称号很不相称的。面向21世纪,杭州城市绿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同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新一轮城市竞争中,生态环境已成为重要因素,不仅主导了城市的品位,而且主宰着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和潜力。中共十六大已将“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为此,杭州市十分注意这方面补课,提出了“环境立市、生态优先”的城市发展战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累计投入环保资金150亿元。

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以后,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均明显上升。以2003年为例,一年扩绿面积达764公顷;至年末市区园林绿地面积达到8703公顷,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605公顷。年末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8.67%,市区人均占有公共绿地6.73平方米。

杭州城市生态面临的新课题是:大规模城市建设带来环境污染的压力越来越大。2002年杭州市在建工地超过2000个。噪音和尘土飞扬在所难免。道路建设施工、管网建设施工、拆房建房施工……给人以“晴天一脸尘,雨天一身泥”的直观感受。加以过高的人口密度和人类活动强度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极

大的压力；机动车辆增速极快，带来严重的扬尘及尾气污染……城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许多新的环境问题，形势不能不说是严峻的。

经过加大治污的力度、关停了一批污染企业。加强环境保护，使城市污染物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局部区域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2003年，杭州市工业废水达标率为97.39%，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98%，烟尘排放达标率98%，粉尘排放达标率为96.73%，市区区域环境噪声加权平均值为56.1dB，全市年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理率为86.24%，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为92.93%。国家有关部门对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沈阳等20个城市在社会、经济、环境及法规制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比，杭州市环境状况处于第2位，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第8位。杭州市获得了“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

然而杭州环保的实施情况，与客观要求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由于历史遗留的环境欠帐甚多；农业对农药、化肥使用量大，畜禽污染物排放量多，严重影响水环境；……事实告诉人们，环保治污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需要不懈努力。

第五节 荣获“国际花园城市”称号

这是杭州人民难忘的日子——2002年10月7日，从德国斯图加特市传出喜讯，杭州市荣获“国际花园城市”称号。这是在相继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奖等一系列荣誉后，获得的又一块含金量较高而且符合杭州城市特征的“金字招牌”。

“国际花园城市”向来有“绿色奥斯卡”之称，是一个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在世界上的最高荣誉。全球有400多个城市正在努力争取这个荣誉。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自然不甘落后于人，决定争创这一荣誉，从世纪之交前后就开始作准备工作，3年来不断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加倍努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并着手准备申报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的评比。

国际花园城市的评比活动始创于 1996 年,每年只举办一次,且名额有限,一般每个级别选中的不过一两个城市。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城市间的竞争,改善城市和社区的生存环境,鼓励推广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优秀经验。

杭州市在年前获联合国人居奖后深受鼓舞,为了进一步走向国际舞台,这一参与当有助于加速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评比还可以交流经验并加强自我认识。为此,杭州市委、市政府于 2001 年 6 月公开向各有关部门和全体市民提出了创建“国际花园城市的设想。随即专门组织了调研观摩团,向先期获得此荣誉的城市学习取经、实地考察调研,又参加了 2001 年度全球“国际花园城市”的评比活动,进行观摩。观摩回来不久,正好赶上中共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市领导就在党代会上发布“要在 2005 年前作好一切准备去申报国际花园城市”的动员令。会后指定一位市委副书记和一位副市长挂帅,成立杭州市创建国际花园城市领导小组,还从各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建专门的创建花园城市办公机构,开始领导创建工作。

创建活动从 5 个方面入手:

一是景观改善:城市绿地本来逐年增加,2001 年更加大力度,新增绿地 700 万平方米;2002 年继续完成绿化面积 400 万平方米;又加强 30 多条新建扩建道路的绿化;历时 7 个月的西湖环湖南线整合工程提前建成,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绿化工程,获得市民一致好评。

二是遗产管理:全市拥有文物保护单位 153 处和文物保护点 215 处,全部保护完好。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剧目、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同时,实施抢救保护工程,以点带片,先后对胡雪岩故居、六和塔、白塔、梵天寺经幢等 40 余处珍贵遗产进行修复。海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的雷峰塔及时重建并及早开放。

三是环境保护:确立“环境立市”。全面实施“蓝天、碧水、绿色、清静”工程,对城市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统一无害化填埋,处理率达 100%。同时严格实施水环境、大气质量的保护和改善。建成 6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达 91 万吨。城市居民均使用煤气和电,并创造条件准备分批接入天然气。

四是公众参与:建立环境教育基地,开设环境教育课,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引导市民种植纪念树、纪念林,平均每年都有 30 万的市民参加绿色义务

活动,有 5000 多市民认育了自己喜欢的树木。积极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率先开通市长公开电话 12345,每年收集市民意见和建议达 3600 多条,成为政府与市民沟通的一条纽带。

五是未来规划:城市规划始终以人为本,体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原则。在新城规划建设贯通各组团主要客运集散点的城市地铁网络;对于整治运河(杭州段)、建设商业特色街制订出更具体的规划;还计划在现有 71 个市级公园的基础上,增建体育公园、运河公园等特色公园。

2002 年 4 月份“国际花园城市”6 个评委来杭视察后认为,杭州环境基础较好,创建工作扎实,评比的 5 个方面都已具备一定条件,建议提前在 2002 年 10 月的评选会议前提出申报。于是从 4 月起着手撰写英文的陈述报告,正式申报,并制作幻灯片及拍摄电视片等;8 月底起“创建办”用 1 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中英文封闭强化训练。由于准备充分,决赛现场又能发挥到位,杭州的申报终于得到圆满的结果,赢得不少国际友人的赞叹:“没想到杭州竟是如此迷人的城市”,“生活在杭州太幸福了”。

这次国际花园城市比原计划提前 3 年申报成功,对杭州具有深远的意义。有了扩大国际影响的有效载体,将使这座秀美的花园城市吸引更多的人来创业、旅游、学习、居住,从而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对于即将在杭举办的国际医博会(2005)、世界休博会和世界休闲峰会(2006)来说,如同铺好了迎宾的红地毯,并为世界休闲的“杭州宣言”的发表,预先准备好献礼的满园繁花。事实上,在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优美环境方面,国内几乎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与杭州这样一座花园城相匹敌。杭州利用城市差异化的定位,拓展出错位发展的新天地,前景自必十分美好。从此,“国际花园城市”几个光辉大字,将与西湖山水、杭州文化融合在一起,照耀千古。“国际花园城市”这块宝石镶在“历史文化名城”皇冠上,恰如其分,锦上添花,分外灿烂。

第六节 城市再显辉煌 “绿色 GDP”前途无量

杭州城市的建设不会满足现状,沾沾自喜的。下一步的前进目标是建设好

休闲之都,创业之都,生态城市,文明城市。

中心工作要把生态放在第一位,即以“深生态学”的环境价值新理念,把握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互相协调与平衡。当然,GDP 仍然是衡量城市发展的指标之一,不过今后所追求的是“绿色 GDP”:把通常的 GDP 作双扣除,扣除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损耗,以确保城市化、工业化的整体素质,维护城市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使能永续、科学、有序、健康的发展。同时注重文明工程,奠定百业之基,创建更多的文明社区、文明行业、文明村镇、夯实文明城市的基础。

写至此算是历史短篇进入尾声,而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永无终结。2003 年已成为历史,2004 年又揭开新的一页。所谓“当代”,瞬息即逝,只争朝夕,今后的岁月应该是洁净的世纪、宁静的世纪、永葆优美环境的世纪。新世纪杭州的城市化,除了须继续伴同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齐步并进以外,还需要紧密结合生态化、园林化、休闲化、国际化等多种元素,争取杭州城市形象愈来愈美,新老杭州人的生活品质愈来愈优越,永远保持“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2004 年新春脱稿

后 记

对于杭州城市发展的研究,最早是上世纪末在省市当代史研究机构发起后开始启动的。选定由我承担其中的历史篇。后来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牵制,延宕几年未能出书。今年适逢吴越国在杭建都 1100 周年,鉴于吴越建都在杭州中世纪城市化历史上是个关键性的事件,有关领导鼓励我把既成的稿件作深一步研究,扩写为《杭州城市发展史》专书,以示对当年钱镠启动杭州古代城市化重大功绩的纪念,并为当代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为此卷首以“治水扩城”画幅象征古今杭州人的创业精神。

这期间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王国庆同志,他对我所提出“钱镠是推进杭州古代城市化的第一功臣”的观点给予极大支持,在收阅拙稿后立即批示:“很有新意,很有启迪”。接着《杭州日报》辟出专版摘要介绍基本论点;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科新视野》也以《城市化研究专辑》刊载;《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论文集》(2004)也公开载文表示同样肯定了本课题:《杭州的古代城市化、近代城市化与现代城市化》。俟书稿补充完毕,王书记又代为作《序》,对本课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国内杰出的史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规先生也写了鉴定式的《序言》,对我们执笔人员是极大的鼓励。

我们还须感谢在研究、编辑、出版和配图设计等工作过程作过支持的王克平、蔡卫民、李建国、张翼飞、杨作民、汪行健、雷前进、施小玮、刘勇、史亮、褚树青、赵凌等同志。没有大家的无私帮助,本书不可能顺利出版,在此当一一致以敬礼!

本书的撰写有别于传统的史著,我们不以政治事件、朝代系统作通史式的平铺直叙,而是把握“城市化”的“化”字为主线,按城市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根据,探析城市发展中的特点和关键性问题,阐释城市功能的演变与城市化起落中的社会因素。鉴于城市发展非一帆风顺,而不断呈现曲折,因而详今略古,对于历史掌故、名人事迹、地方文物之类很少涉及,而腾出一定篇幅探讨杭州历史上几次逆向运行的城市动荡提出看法。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我们真心希望学术探讨更加多元化。

主要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调查所编：《中国国情报告·城市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
- 2、涂文学：《第二届全国城市史研讨会述评》，《城市史研究》，第五辑，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9 月出版。
- 3、邹身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类型》（上、下），《城市史研究》，第七辑、第八辑，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和 1993 年 2 月先后分两次出版。
- 4、陈宝辉、姜秉正、邹身城等编：《中国城市史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起出版。
- 5、王国平：《考古的根本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美丽洲》，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9 月出版，第 1～5 页。
- 6、单天伦、陈宝辉、韩乃锦、邹身城等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0 年起出版。
- 7、胡锦涛：《认识历史规律把握时代大势提高治国理政才干》，新华社北京 2003 年 11 月 25 日电，各级党报头版刊载。
- 8、姜英爽：《中南海领导人听历史“说话”》，《杭州日报》2003 年 12 月 5 日“视点新闻”。
- 9、陈云：《计划经济与市场问题》（1979 年 3 月 8 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出版，第 466～477 页。
- 10、胡耀邦：《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出版，第 466～488 页。
-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古城使中华文明史向前延伸到 7000

年》，新华社 2002 年 7 月 23 日电。《每日电讯报》、《安徽日报》、《钱江晚报》等报刊均先后刊载。

12、刘慧：《良渚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浙江日报》2001 年 7 月 18 日。

13、周春燕：《下孙遗址掀开神秘面纱——为跨湖桥文化命名奠定基础》，《杭州日报》2004 年 1 月 8 日。

14、单纯刚等：《华夏文明从这里起步》，新华社 2003 年 11 月 4 日电。

15、王倩：《杭州考古惊世之作》，《杭州日报》2002 年 6 月 7 日“专题报道”。

16、[英]戴维·基斯：《最新考古研究表明长江流域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英国《独立报》2003 年 8 月 3 日。

17、[美]G. W. SKINNER 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 年出版。其中论述“中华帝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与晚期的城市发展”，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 2000 年出版。

18、邹身城：《杭州中世纪城市化革命成功的启迪》，《社科新视野》2003 年 10 月 17 日，“城市化研究”专辑。

19、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9 月出版。

20、潘丽萍：《世界名城》，长春出版社 2000 年 1 月出版。

21、俞晓群：《城市》，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5 月出版。

22、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出版。

23、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 3 月出版。

24、倪士毅：《古代杭州》，西泠印社，2000 年 6 月出版。

25、周峰等编：《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 月出版。

26、周峰等编：《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 2 月出版。

27、周峰等编：《吴越首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 月出版。

28、周峰等编：《南宋京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 月出版。

29、周峰等编：《元明清名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 8 月出版。

30、周峰等编：《民国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出版。

31、潘荣琨、林牧夫：《中华第一奇人张静江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年 3 月出版。

32、吕春生主编：《杭州老字号》，杭州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33、金延锋、李金美主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杭州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34、[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译，何祚康，王泽槐校，廖盖隆序）。

35、赵福莲：《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杭州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36、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杭州市统计局合编：《杭州五十年》（1949～1999），杭州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37、仇保兴：《杭州市志》，中华书局1999年4月出版。

38、朱金坤：《杭州市城乡建设志》，中华书局2002年7月出版。

39、钟伯熙：《1987年杭州年鉴》，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部综合年鉴；同时还参考了1993～2003年的历年出版的杭州市年鉴，这些年鉴分别由历届市长任主编，并分别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或方志出版社出版）。

40、杭州市建设委员会编印：《杭州建设年鉴》。（系内刊性质，并无公开出版书号，但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逐年编印，资料详实，有参考价值。计收集到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和2002年共计八本《杭州建设年鉴》；虽未齐全，既曾抽阅，谨此说明）。

41、史及伟等：《SARS后的反思》，中共文献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42、史及伟等主编：《杭州蓝皮书·2004年杭州发展报告》（文化卷），杭州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重点参考了孙跃所撰《西湖综合保护与文化建设》一文。

43、史及伟等主编：《杭州蓝皮书·2004年杭州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重点参考了傅立群所撰《2003～2004年杭州社会发展总报告》和柴莹所撰《杭州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现状与发展分析》等文。

44、史及伟等主编：《杭州蓝皮书·2004年杭州发展报告》（经济卷），杭州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重点参考了陈国勇所撰《2003年杭州经济发展总报告》、赵升可撰《杭州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等文。

45、杭州市统计局编印，《2003年杭州统计快报》。《杭州市2003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2月16日《杭州日报》第7版。

46、[日]斯波义信著，徐海荣、徐吉军译，《宋代浙江经济史研究》，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7月出版。

4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48、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